

二十年 中国

银行破产 企业改制 改革目标部门化 部门利益政策化 突发事件暴露脆弱性 金融风险机制 制度改变 媒体曝光 教育公正 腐败是和谁争 寻租型企业改革 红顶商人 垄断工 制度只有经济 国家企业 公共投入 开放世界 循环

一编 政策改变 经济适用房 学校 公立学校 资本 制度 权力 重要 折 经济 学 重 征 经济 学 舶 来 经济 学 是 国 经济 学 重 征 经济 学

杨继绳 著

中国
民主
法制
出版社

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为什么说国有企业是吸引银行资金的黑洞？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这些社会不公正问题该如何解决？

我们成天讲义务教育，但一个基本概念没弄清楚：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

为什么说常人政治难以走出“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的困境？

为什么说红顶商人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

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双轨价格运行时期，金融资本起始时期，国有资产重组时期，为什么成为红顶商人聚敛财富的四大高潮？

为什么说按劳分配仅是一种口号、一种旗帜？按劳分配为什么实行不了？

为什么说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或“权贵资本主义”？

为什么说“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含章行文

256

人文馆 049

含章可贞 行文若水

9 787543 045880 >

ISBN 978-7-5430-4588-0



9 787543 045880 >

定价：39.80元

-45

三十年河东

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CATION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 杨继绳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430-4588-0

I. 三… II. 杨… III. 经济 - 研究 - 中国 IV. D6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7057 号

书 名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著 者：杨继绳

责任编辑：曹汝珉

本书策划：张永超

装帧设计：✎ ③ ④ ✎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9

字数：41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0-4588-0

定价：3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免费资源
网购返利
PINMUCH.COM

站在新的 30 年的门口

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近 30 年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怀着极大的关注。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如此重要的社会进步，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历史活剧！流下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的泪水！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难怪不同国籍的作家、记者、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著述了这将在人类历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迹的 30 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 30 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 30 年，站在新的 30 年的门口，重新反思刚刚过去的 30 年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 20 世纪这短短的 100 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 19 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 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做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 4 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

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 20 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 1935 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一、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二、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三、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四、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五、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 1929 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 20 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1]通过人类在 20 世纪 100 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以前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烧尽。1978 年新华社记者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 户人家有 4 户没有大门，3 户没有桌子，68 人中有 40 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 个孩子，10 口人，只有 3 只缺口碗。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 2 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 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 0.11 元，1.9 亿人每天能挣 0.13 元，有 2.7 亿人每天能挣 0.14 元。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 年，全国有 2/3 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有 1/3 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 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 70% 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 41.5 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 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 3.8 平方米，1972 年，下降到 3 平方米。50 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 80 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农民终生活活动半径不超过 100 公里。

为摆脱原来体制造就的危机，30 年来，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竞争性企业民有化，国有控股企业吸收非国有资本）；发展私有经济；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由单一公有的利益主体到利益主体多元化。

二、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1]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 年 9 月 29 日，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3 月第二版，第 144—145 页。

三、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四、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

五、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七、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吸收国际成功的经验和管理制度，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为一体。

改革大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0年来，GDP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即人均GDP)还是由378.7元增加到19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30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领导干部任期制代替了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

过度干预经济，甚至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广大群众中对不公正问题是很不满的，因此不断引发群体事件。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数。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 60 年了，这 60 年可以划分两

个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可以说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3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30年对前30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30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

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我经历了改革前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还有幸对中国30年改革的整个历程进行了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30年来，我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发表了数百篇关于改革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还不时抨击了改革中的问题，发表时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本书选择了百余篇评论奉献给读者。我想读者看了这本书后，不仅会加深对中国改革的了解，也会加深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杨继绳

银行漫谈

- 1 夹缝中的财神爷
- 3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 5 从柜坊到钱庄，经营货币的商店
- 7 货币不会自己管理自己
- 10 央行“工具箱”里的三大“法宝”
- 13 借债还钱竟成了金融改革的关键
- 15 银行家的心
- 18 居民储蓄：多彩的棱镜
- 24 RTC 不是魔术师
- 27 从另一个角度看非法集资

股市随笔

- 29 且看蝴蝶在跳舞
- 32 向国有企业倾斜是中国股市的病根
- 35 把鸡蛋放在哪个筐里
- 37 看安然事件，想中国股市
- 39 多在分母上做文章
- 41 谁为数万亿元买单？

财富流动

- 44 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
- 47 从熵的基尼系数说起
- 50 “胡雪岩热”的背后
- 53 当代“红顶商人”

财政漫谈

- 56 若无远虑，必有近忧
- 65 国债这块大蛋糕能吃多久
- 67 凯恩斯水土不服
- 73 何时欢送凯恩斯
- 76 中国财政：提高“两个比重”要慎行
- 84 凯恩斯依赖症

宏观经济

- 90 上游干涸，下游泛滥
- 98 跷跷板，两头翘
- 101 谁来解开生死结？
- 104 北方怕热，南方怕冷
- 106 话说“软着陆”
- 112 经济“大三角”透视
- 119 经济增长要有“限速器”
- 122 鞋帮鞋底同时破

市场，市场

- 125 市场，魂兮归来
- 127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 136 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 138 平等和效率的适度选择
- 141 权力不能进入市场
- 144 发展市场经济，防止拜金主义
- 147 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
- 149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 152 “权力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交易

对外开放

- 156 围墙，围墙，围墙

- 159 用好外资，也要用好内资
162 立足内需也要放眼世界
165 全球化不是霸权全球化
170 用对内开放迎接对外开放
172 弱势群体看汇率
175 两队“外国人”在中国舞台上打架

经济与社会

- 178 从“全民皆师”所想到的
181 按劳分配，难道是皇帝的新衣？
186 交通启示录
190 提高城市的厂商控制力
193 小政府，强政府
196 私人轿车：无可奈何的选择
203 歌厅酒楼，一掷千金何处来？
206 机制泛谈
209 首钢，还首都以绿色！
212 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
216 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220 大声呼唤 教育公正
227 媒体怎样丧失公正

企业改革

- 235 依靠产品打天下
237 谁来解开“九连环”？
240 厂长应当是商人
242 麦当劳、饺子和汽车
244 “三不”启示录：用现代信用规范企业关系
246 国有企业的病态：过度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并存
249 品牌不是空手道
252 企业管理还是管理企业？
254 “拿了不该拿的”和“该拿的没让拿”

- 257 沉重的脚印：中国企业家五十年
267 关注企业的社会资本
270 买不断，管还乱
273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民有化过程剖析

当代老板

- 282 为民有经济正名
287 九十年代新老板
289 历史的旋梯：中国民有经济的沉重轨迹
304 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307 不当“流星”，也不要当“明星”
310 中国私有企业的道德偏差

改革回眸

- 322 特色，在历史合力的延长线上
325 篱笆、利益与体制
328 艾哈德童话
331 改革也有“鸡和蛋”的哲理
333 两个28年之后
339 集体世袭和不公平交易
345 谨防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中国的暴君
349 住房改革：永远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353 不应当忘却的故事

知识经济

- 357 技术应当如何引进
361 工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阻力
370 一个“主意”值多少钱？
372 高技术未必高效益
375 不能把知识都装进经济这个“篮子”
377 反一下知识经济的潮流

- 381 “知识”要怎样进入“经济”
383 让发明家暴富
385 “资本家”解雇“知本家”

人才，人才

- 388 怀才不遇与自用其才
391 学历、知识、才能、贡献
395 绝顶聪明和绝顶愚蠢
398 用人的着眼点放在哪里
400 腾出脑袋，用于创造
403 也谈“红道”“黄道”和“黑道”
406 “人以文名”和“文以人名”

经济学的左道旁门

- 409 奏折经济学
411 论证经济学
413 舶来经济学
415 地图经济学
417 诠释经济学
419 显学的危机
432 “经济人假设”和“经济人”现实

熵与社会

- 435 所有科学的第一定律
438 以最少的消费获取最大的幸福
440 经济指导思想的革命
442 愚蠢地“向地球开战”
444 愿社会稳定有序

>>>>>

夹缝中的财神爷

我的一位朋友在某地担任农业银行行长。日前进京时显得疲倦而憔悴。我说：“财神兄，搞市场经济，你可大有作为啊！”他苦笑了：“我现在是在夹缝里过日子，两面受挤。作为专业银行，亏损了不好交账。可是，政府让我干的都是赔钱的买卖。”他扳着手指头向我算了一笔账：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如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农业开发贷款、预购定金贷款等。这些政策性业务占他们贷款总规模的60%。

我国的专业银行转变成商业银行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专业银行还身兼两职：既要它像企业一样完成利润指标，又要它按照政府的意图进行没有收益的政策性贷款。这样，它们就处于两难境地。或者偏重社会利益而不能自负盈亏，或者偏重自身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

专业银行要变为商业银行一个前提条件是，只从事商业性贷款，不能兼管政策性贷款。那么，政策性贷款由谁来发放呢？成立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的职责是专门从事政策性贷款。它的特点是：完全服从国家政策的需要，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发放的是有利于社会大局稳定的特殊性贷款，它对局部利益小于全局利益、近期利益小于长

银行漫谈



远利益的项目进行贷款。它的利率水平与市场利率不同，根据国家倾斜的需要，实行低利或微利经营。今后几年的政策性贷款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 一、支持大型机电产品出口的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
 - 二、基础设施(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所需要的贷款；
 - 三、重要物资(例如农产品)的储备和农副产品收购所需要的贷款；
 - 四、扶贫贷款、救灾贷款等重要的专项贷款。
- 等等。

政策性银行实际是政府的金融机构，它的资金具有一定的财政性质。但它不是财政，它的资金活动还是以信用为基础。它的贷款一定要还本付息，使它能够保本经营。它不是各级政府的钱口袋，不是福利机构，它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策性贷款应当由该项政策的决策者承担风险，谁确定的优惠利率谁负责贴息，谁安排的政策性贷款谁承担补贴。政策性银行不参与商业银行竞争，但要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督。

政策性银行一般不吸收社会存款，对社会公众不直接构成债务关系。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一、财政拨款；二、中央银行再贷款；三、向社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四、社会保障基金的经营性余额；五、间接运用邮政储蓄。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政策性银行是专业银行而不是综合银行。以日本为例，它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银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还有十大金融分库。在十大金融分库中又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如住宅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医疗公库、环境卫生公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等。美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有详细的专业分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在建设初期也应有专业分工，但不会有国外那么详细。据可靠消息，我国将成立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走出夹缝天地宽，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分开以后，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都有广阔的发展天地。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3年12月15日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1965年1月24日的香港，像平常一样热热闹闹。谁也不会想到要发生什么大事。一位客户拿一张海外支票到明德银号提款，明德银号拿不出钱来兑现，消息马上传开，在这里存款的人无比恐慌。大批客户蜂拥到这家银号门前，急切地要求提出自己的存款。焦急、叫骂、哭喊、乱作一团。该银号无法控制局面，眼看大难临头，只好请求政府出面干预。于是，政府下令关闭明德银号。明德事件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其他多家银行门前都排起了挤兑的长龙。这场银行风波一直持续了几个月之久。

居民把钱存入银行，最起码要求是保证金钱的安全。一旦有储蓄不安全的信息，储户会马上把钱取出来。这就出现银行最害怕的“挤兑”。存款是银行的债务，“挤兑”就是所有的债权人同时到银行去讨债。据说英语“破产”一词来自最早建立银行的意大利，其原因是银行不能偿还债务，债权人群起砸坏柜台的一种情况。

如果说银行是经营货币的商店的话，那么，这个商店完全是靠信用来维持的，没有信用，谁敢把钱存在这里？所以称银行为“信用机构”。信用，它对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某家银行的信用出了问题，而且得不到支持，这家银行就难逃破产的命运。

银行的信用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储户存款的安全。为客户保密是措施之一。瑞士银行的工作人员如果泄露有关客户的情况，轻则罚款，重则判刑。瑞士银行对外国主要人物的巨款都有密码和暗记，只有存户本人和银行的两、三个最高级的职员知道。所以，大量外国资金流入瑞士。最早外国人存入瑞士银行的钱没有利息，有一度存款超过一定的额度还在倒贴利

息。无息或负利息并没有阻止外国钱财源源不断的流进瑞士银行。1979年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一居民找到了30年代失落在外国的29万美元。我当时报道了这一新闻，一时引起轰动，但我至今还不知道这位居民的姓名，因为银行一直对我保密。

客户能够随时提取自己的存款是银行信用的根本所在。我们有些银行没有钱支付储户的提款时，常用的办法是在门前挂上“今日学习，停止营业”的牌子，这实际是一种逃债的行为，是有损信用的。

为保证客户能随时取到钱，银行至少得做好两方面的事：第一，它放出去的贷款能够收回，它必须选择有信用的贷款对象。信用是双方的。银行有信用，客户也得有信用。这个信用不仅是指道德上的，而且以财产作保证的，它是通过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进行科学评估并行登记的。没有信用的人和企业到哪里也借不到钱。第二，它不能把客户的全部存款都放出去赚钱，它必须留下足够的钱来准备客户来提款。这留下来应付客户提款的钱叫做“准备金”。准备金加上可以贷出去的钱俗称“头寸”。

为了防止出现挤兑风波，中央银行规定了准备金占存款余额的比例，称为“法定准备金率”，简称“准备率”。我国目前要求专业银行的准备率为13%。这13%的钱交中央银行管理，另外还要求专业银行再留8%的备付金。按规定，商业银行每天结账时都要保证准备金符合中央银行规定的比例。不够这个比例就不能“轧账”。必须通过同业拆借或其他办法调动头寸，当晚把这笔钱补足。

为了保证存款的安全，一些民办银行较多的国家规定了开办银行的条件——例如它们必须具备最低数量的资本等。有的国家的政府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对存款进行保险。

我国的银行都是国家开办的，它的信用由国家担保，信用是不成问题的。但目前专业银行还不是商业银行，它还吃国家的“大锅饭”。今后要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就得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这时，商业银行的信用问题就显得重要了。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3年12月14日

从柜坊到钱庄，经营货币的商店

在经济繁荣的唐代，大都市出现了商人开办的“柜坊”。它代客保管金钱和财物，收取手续费。客户需要时可凭证或约定的信物取回。宋、元之后，“柜坊”逐渐演变为“钱庄”。它不但不收手续费，反而给客户一定的利息。

柜坊怎样发展成钱庄呢？因为老板发现所存的金钱有一种不具名的性质。如果客户所存的是祖传宝物，到时必须原物奉还。如果他存的是货币，即使写上了他的名字，也不必原物奉还，只要数量不变，他就不会有意见。机灵的老板还有一个发现，虽然客户存的钱必须保证随时可以提取，但全部存款并不会同时被取走。也就是说，没有必要把客户的存款全部留在手上准备提取。

这样一来，柜坊的老板就从客户的存款中拿出一大部分来为自己赚钱。最简便的是把这些钱拿来放债。他便一面千方百计地吸收存款，一面大量地向外放债。到了明、清，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大商人为了筹措资金，纷纷在各大城市设立钱庄。

钱庄是银行的雏形，它实际是经营货币的商店。

世界上第一家银行是1580年创立的意大利威尼斯银行。我国最早的银行在1854年英国人开的东方银行。1897年中国人自己开办了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它改名为大清银行。

银行经营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为客户经办货币的收付和结算，在组织信用活动中充当信用中介人的角色。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还是经营货币的商店。

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商店，也像一般商店一样，它必须一副担子挑两

头：一头是它的“商品”来源——主要是储户；一头是它的“商品”买主——它的贷款对象。也就是说，它必须吸收足够的存款，也要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可靠的贷款机会。它的利润来自存、贷利率之差。

既然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它就应当像所有的企业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商业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它不能去“救济”那些亏损企业，它必须认真选择贷款对象，确保贷出去的钱能按时收回来，没有还款能力的，坚决不贷；不讲信用的，坚决不贷。

商业银行不是政府。它没有义务承担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它不能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它更不是市长的“钱口袋”，不能按照官员的意志，从这里拿钱投放没有收益的事业。它既然是盈利机构，政府也就不应当交给它社会管理的权力(例如分配资金的权力)，否则，它很容易用权力来谋取利益。

银行这种企业，经营的商品就是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就是利率。说得确切一点，利率是借贷关系下货币使用权的价格。利率的高低和货币的供求关系有关。货币紧俏，利率就高。在货币紧俏的情况下，利润率高的主业才能承受这样的利息。反过来，作为企业的银行，它总是追求较高的利率。因此，利润率较高的产业就容易得到贷款。在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条件下，利润率高的产业一般是求大于供的产业。这样的贷款机制，使产业结构趋向合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商业银行。那时的所谓“银行”，全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品。我国目前的专业银行还不是商业银行。没有商业银行，就搞不了市场经济。所以，邓小平早就定出“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金融改革目标。尽快地把专业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是推进金融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3年12月13日

货币不会自己管理自己

19世纪英国的金融记者和经济学家沃尔特·贝杰浩特有一句名言：“货币不会自己管理自己。”众多的商业银行各自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至少会出现两种可怕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如果一家银行出现了信用危机而倒闭，会引起连锁反应，其他银行也会出现挤兑。从而大量的银行破产，不仅储户遭受损失，还会造成全局性的金融危机。

第二种情况是，各家银行都千方百计地扩大存贷规模，由于多家银行造成的信贷乘数效应，使全社会信贷无限扩张，从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总之，为了防止众多银行各行其是造成的不良后果，必须有一个机构对整个银行体系进行管理和支持。这个机构要既能控制总的货币流量，也要保证各家银行的安全，防止出现金融危机。这个机构就是中央银行。大多数国家都有中央银行：

英国：英格兰银行。初建于十七世纪。

法国：法国银行。建于1800年。

加拿大：加拿大银行。建于1935年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建于1913年。

这些中央银行有的是从商业银行转变过来的。当时的职能也没有今天这样完善。例如，在三十年代的那次经济危机中，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竟没有站出来防止大批商业银行倒闭。

中央银行尽管也称为银行，但它不是商业银行那种银行。它是政府或半政府机构，它执行的是政府的职能。它代表政府执行货币政策管理金融秩序，但它又不是一般的政府机构。它是按银行的规则进行工作的。所以

它还称为银行。不过这个银行不对面广大储户和贷款对象，它只面对众多的商业银行。它是银行的银行。

必须指出来的是，中央银行不是赢利机构。因为它是发行货币的部门，手中拥有很大的管理权力。如果让它赢利的话，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财主。

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能是，第一，控制货币量和利率水平，保持币值稳定；第二，充当最后贷款者，防止商业银行大量倒闭。此外，还有其他日常职能。

在商业银行只把吸收来的存款的一部分用作准备金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信用危机，就会发生大批银行破产。在1930年到1933年间，美国的商业银行像多米诺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闭，全国8000多家银行破了产。货币体系被灾难性的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危急状态。今天的美国经济学家回顾这一历史时说，如果当时联邦储备系统为商业银行提供它们急需的货币，也许历史就要重写。

一方面，中央银行把商业银行的现金储备的一部分存放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当商业银行出现支付困难时，作为最后贷款者为商业银行提供额外的头寸，帮商业银行渡过难关。实际上，自从有了中央银行作后盾，储户就不担心它的支票不能兑现了。银行也就不会发生挤兑危机了。

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能是保障币值稳定。中央银行是批准印票子的。票子印多了，钱就不值钱。要行使好这个职能中央银行在执行货政策时必须有足够的独立性。

当今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有三种情况：一是德国、美国、瑞士、瑞典等国，中央银行直接对国会负责，不受政府干预；二是日本，法国等国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影响，但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里有一个较超脱的决策机构，使得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有相当大独立性；三是意大利等国，中央银行的政策受到政府的约束，人事由政府任免，业务上的依赖政府部。

我国的中央银行应当有什么样的独立性呢？首先，银行和财政不能穿“连裆裤”，财政出现赤字时不能用向中央银行透支的办法来解决。即坚持

货币的经济发行，杜绝财政发行。其次，地方政府不能干预中央银行各分行的业务，不能把中央银行变成“地方银行”，因此，不应当每个省、市都设分行。分行要相对集中、跨地区设立。

我国的人民银行从1984年开始就是中央银行。但它至今还不能完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还是因为，第一，它还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陷入一般信贷事务之中；第二，财政对中国人民银行还考核利润指标，实行利润留成，逼迫它从事经营活动，失去了超然地位；第三，各级政府对它的干扰太多，无法独立执行职能；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標是双重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而且政府官员常常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即满足货币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因而无法去稳定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要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还要走很长很艰苦的改革之路。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3年12月16日

<<<<<

央行“工具箱”里的三大“法宝”

前面曾谈到，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对货币形势进行宏观调控，而货币运行又像一架高速运转的庞大机器。中央银行用什么“工具”来控制这架大机器呢？现在，让我们先看一看中央银行的“工具箱”里有些什么“工具”。打开“工具箱”一看，发现里面装有“三大法宝”。这就是法定准备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列位读者不要害怕这些陌生的名字，它们和我们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可能都是银行的储户。我们希望随时到银行都能取到钱。银行手上必须准备一笔钱，用来应付我们这些储户随时来提取。这笔钱叫准备金。准备金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就是准备率。中央银行规定的准备率叫法定准备率。

准备率的出现带来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现象——存款放大现象。存入一元现金可以放大为若干倍的存款。我们可以用并不复杂的数学推导来说明这一现象。为了不给不懂数学的人增添沉重感，这里我们仅从直观上去理解。某人将10万元钱存入银行，这家银行将其中的八万元借贷出去。借钱的人当然不会把这笔钱放在口袋里，他要用来买原料，发工资，最终这些钱还会存入另一银行。另一银行又把其中的80%(6.4万元)贷出去，这6.4万元最终又会存入第三家银行……这样不断继续下去，各家银行由此产生的存款是：10万，8万，6.4万，5.12万……这是一个以20%递减的无穷数列。利用数列的知识可以算出，这个数列的总和是50万元。这也就是说，第一个储户存入了10万元钱，最后这10万元钱在各家银行里的存款总共50万元。存款放大了五倍。这就是存款的“乘数效应”。显然，

存款乘数是和准备率相关的。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知道，存款乘数是准备率的倒数，即如果准备率是 20%，存款就放大五倍；准备率是 10%，存款就放大 10 倍。准备率降低，存款放大倍数就增加，准备率提高，存款放大倍数就降低。

这样，准备率既有放大作用，也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因此，它就有了控制器的基本功能。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可以随时操纵这个调控器。如果经济过热，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就提高准备率，使商业银行可以贷出去的钱成比例地减少，信贷一收缩，市场上资金就紧俏起来。资金的供求关系使得利率提高。利息上升，私人 and 公共投资就会下降，股票、土地、住宅等价格就下降。投资减少，就业机会就减少，收入降低，价格下降。

如果经济衰退，就需要启动经济，中央银行就降低准备率，商业银行可以贷出去的钱就成比例的增加。货币供应就比较充足，利息就随之下降，公共和私人的投资就随之增加，如是就业机会增多，居民收入增加，股市上扬，物价上涨。

中央银行工具箱里的第二大“法宝”是“公开市场业务”。什么叫公开市场业务呢？说简单一点就是在金融市场上买卖各种有价证券，如国库券。如果有通货膨胀的危险，中央银行就大量抛售国库券。买者主要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债券经纪人。这些买者当然用他的商业银行的支票来支付。这样，中央银行就收到了大量的各商业银行的支票。它就可以用这些支票向商业银行提款。从而减少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根据上述“乘数效应”，准备金减少，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就会成数倍的收缩。这就紧缩了银根。与此相反，如果经济不景气，中央银行就大量收购国库券，也就是向商业银行提供了较多的准备金，因而放松了银根。

中央银行的第三件“法宝”是提高或降低贴现率。什么叫“贴现”？贴现就是从借款人的期票面值中，预先扣除到期利息的一种作法。例如，老王急需一笔现款，他交出一张下周到期的面值一万元的期票，但他得到

的现金只有 9990 元，10 元的利息事先扣走了。商业银行一般是通过要求贴现他自己的基期票来向中央银行借款。商业银行也用为客户现过的某些期票，要求中央银行再贴现。贴现是中央银行给以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的一种方式，贴现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商业银行贷款的利率。降低贴现率，就可以扩大贴现的数量；提高贴现率，就可以减少贴现的数量。因此，需要松动银根，就降低贴现率；需要抽紧银根，就提高贴现率。

我这里说的“三大法宝”是最基础的，其运用是变化多端的。现代银行业还有其他新的“法宝”。上面说的中央银行的“工具箱”里的这些“法宝”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所向无敌的。它们必须有相应的条件下才有用武之地。例如，公开市场业务要求有发达的证券市场，用好第三件“法宝”的条件是，社会的票据化程度很高而且以中央银行再贴现率为导向的市场利率已经形成。显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这些条件。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3 年 12 月 17 日

借债还钱竟成了金融改革的关键

日前采访一位资深的金融家。当我问及金融改革的关键何在时，想不到这位满腹经纶的专家却用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语作答：“借债还钱。”

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天经地义。这还用得着说吗？然而，当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当前实际工作情况之后，才知道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却道出了当前金融改革、企业改革、宏观调控中的一个矛盾结点。

当前银行和企业间的借贷关系中，借债不还或不按期还是常见的事情。1993年，专业银行24000亿元的全部资金中，估计有6000亿元处于死贷状态，据保守估计，其中有4000亿烂账。目前这种情况还在继续。银行明明知道借方无力偿还，出于各种因素考虑，还得照贷不误。

金融改革至少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建立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建立完善的商业银行体系；三是培育完善的金融市场。目前，这三方面的改革已经全面推开，并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但是，发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使这三个方面都难以深入推进。

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资金准备率也好，公开市场业务也好，再贴现率也好，这“三大法宝”的运用，最终还是要通过利率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这就要求企业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现在相当多的企业连贷款的本金都不想还，还管什么利率的变化？谁都知道，用控制贷款额度的办法，来防止企业过度贷款，从而防止投资膨胀，这不是市场经济应当采用的办法。为什么我们还要采用呢？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语道破了个中苦衷：“我们的厂长从银行借钱时根本没想到还，利率对他们不起作用。控制贷款额度，是因为企业改革不到位，是不得已而为之。”

什么是商业银行？说穿了就是经营货币的商店。它必须吸收足够的存款，也要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可靠的贷款机会。它的利润来自存、借利率

之差。说它是商店，因为它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果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商业银行还办得起来吗？

至于建立金融市场，借债还钱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市场。这是不言自明的。

还贷要有保证，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运营效益。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必须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现在不少企业，它的资金利润率比银行的贷款利率还低，贷款越多，亏损越多。厂长明明知道这样很不合算，他还照样要求增加贷款。因为他知道贷款可以不还，至少在他的任期内可以不还。有的国有企业是在错误的决策下建起来的。在它还没有出世之前就注定了它是一个亏损企业。建成以后，就成了一个吸引资金的“黑洞”，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更谈不上还贷。

企业的资金运用不讲效益，投入的资金收不回来，又逼着银行接着贷款。这样的企业一多，资金就紧张。而地方政府将有限的资金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把非花钱不可的事情给中央留下资金的“硬缺口”，逼着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中央银行就无法行使稳定币值的职能。货币发行过多，就造成通货膨胀。

借债不还，有商业道德问题，有法制建设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借债不还的情况能够发生，至少有三个条件。一是借钱的人无法独立承担责任；二是贷款方（即银行）不收回钱也可以维持下去；三是借贷双方的财产关系不明晰。我们目前正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的企业还不是真正的企业，它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它还不能独立地承担责任；我们的银行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它并不靠自身的盈利来生存、来发展。我们的银行和企业都是一个老板开的，都姓“国”，烂账，肉烂有锅里。

显然，银行和企业的问题是互相缠绕的。只要一方面的改革不到位，就牵制着另一方的改革不能到位。在这里，我单讲企业对银行的影响。只要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商业银行就办不起来，中央银行就无法行使职能，金融市场就很混乱。

没有真正的企业，就没有真正的银行，目前，我们既无真正的企业，又无真正的银行。要建立市场经济，既要加速金融改革，又要加速企业改革，这就是结论。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4年7月21日

银行家的心

在旧金山美洲银行总部大楼前，有一块巨大的黑色大理石雕塑，造型怪异。接待我们的这家银行的公关部主任，问我们这块雕塑像什么？我们七嘴八舌，答案不一。公关部主任说，美国的新闻界说它像一颗心，银行家的心：又黑，又硬，又冷。他接着说，金融界的确有这种心肠又黑、又冷、又硬的人。但这种人不是真正的银行家。

真正的银行家应当有一颗什么样的心？他用这家银行创始人的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久前，美国《生活》杂志出了一期专集，对本世纪最重要的美国人进行介绍。其中只有一个银行家，他就是 A. P. 甘尼尼。他是美洲银行的创始人，人们喜欢用他名字中的前两个字母来称呼他：A. P. A. P 在 19 世纪 60 年代随父从意大利移民来到旧金山。世纪之交，他父亲去世后，就随继父在旧金山从事农产品购销业务。1904 年，他创办了一家银行——意大利银行。1932 年，意大利银行和加利福尼亚银行合并，成为美洲银行。

真正的银行家是远见卓识的。A. P 的眼光看得比一般人要远得多。那时，小业主是没有资格从银行贷款的。A. P 说：“今天的小业主，明天可能是大富翁。”他的银行向所有的人敞开大门。1906 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破坏十分严重，很多人无家可归，没有人有偿还能力。所有的银行宣布停业 6 个月。A. P 却与众不同，他在断瓦颓墙面前用两个桶和一块板支起了简易柜台，向小业主贷款，握手成交。小业主们用这笔钱使震后的旧金山恢复了生气。结果，这批贷款没有一个美元的坏账。从此，意大利银行名声大振，客户猛增。A. P 把学生作为客户，甚至接收学生一美

分的存款(今天的美洲银行还开展这项业务),还向优秀高中生发放奖学金。这些学生成人以后,绝大多数都是美洲银行的客户。

真正的银行家热心公益事业。旧金山市被金门湾分割,交通不便。五十多年前,一位工程师拿着一张金门大桥的设计图纸,却没有资金使图纸变成现实。A.P.帮助发行债券,使金门大桥得以建成。在庆祝金门大桥建成50周年,100万人步行通过了这座大桥时,人们想起了银行家的功绩。

真正的银行家,重视钱,但他更重视文化。当年,迪斯尼画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没有钱拍成电影,A.P.为之提供贷款,这两部传世之作的动画片才得以问世。以后,在美洲银行的资助下,《皮诺曹》、《水晶鞋与玫瑰花》等动画片相继和儿童见面。影片《飘》在拍摄一半以后,因超预算无法进行下去,美洲银行立即贷款。著名的迪斯尼乐园也是用美洲银行的贷款建成的。

真正的银行家是不断创新的。A.P.开创了银行为自己的业务登广告的前例。他的第一个广告是“信誉和服务是最重要的东西”,他开创了通过邮政渠道开展银行业务的先河;他首先开始向客户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他打破了一个地区只有一个营业部的陈规,广设分行,使意大利银行“无处不在”……

真正银行家的心,是一种维系事业的精神。A.P.1949年逝世了,但他所崇尚的精神,成了美洲银行的企业文化。有了这种企业文化,美洲银行的面貌日新月异。现在,从可口可乐到百事可乐,从麦当劳到苹果电脑公司,都是美洲银行的客户。它的业务遍布全世界。不久前,在中国也设立了代表处。

今天的美洲银行,充满了现代气派。我们在旧金山参观了美洲银行最大的分行。这家分行有三万多家客户,我们参观的那天,存款余额15亿美元。但是,在它的营业大厅里,却很少看到顾客。为什么呢?这里的负责人解释说,客户拿起电话就把事情办了,打开家庭电脑就把事情办了,在全国各处街头设有9000多台自动会员机(ATM),客户凭磁卡身份证在

会员机前就可以把事情办成。现在，70%的业务不在营业厅里进行。

在美洲银行大楼的10层，是外汇交易大厅。几百台电脑荧光闪闪，交易员聚精会神。每个交易员管一个品种，或是日元，或是英镑……，一共有几十种。交易员在这里代客户同全世界各地进行外汇买卖。由于全球各地时差不同，所以这里一天24小时交易。一天交易额几千亿美元。仅在北美地区所代理的外汇交易客户就有3000多家。

什么是银行家的心？就是银行的企业文化。美洲银行的成功有多种因素，但是，谁也不会否认，A.P.所创立的企业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刊于《金融时报》，1996年1月28日

<<<<<

居民储蓄：多彩的棱镜

1995年末，居民储蓄余额达29700亿元，比年初增加了8130亿元。

这个储蓄余额的数字有多大？它可以买下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它可以维持全国人民一年半的消费。它占国家银行各项存款总额76.5%。

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改革开始的1979年，全国居民储蓄余额不到300亿。10年以后的1989年，就增长到5000亿元。当时人们觉得这个数字大得惊人，有人说它“虎”（关笼子里的），有人说它是“洪水”（关在水库里的）。谁也没想到，在四年以后的1992年，就突破了一万亿元。接着，仅用两年，到1994年底，又突破了两万亿元。仅过一年，到1995年年底，又接近三万亿大关。

我国居民储蓄第一个一万亿用了三十年；第二个一万亿用了两年；第三个一万亿只用了一年，可见加速度之高。这样的加速度，连一些资深经济学家也目瞪口呆。

庞大的数量，超高的速度，包含着多少社会奥秘？居民储蓄是一个多彩的棱镜。通过它，可以观察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真有这么多吗？

我们的经济数字中常有水分，有人也怀疑居民储蓄中有没有水分。严格意义上的居民储蓄是居民的净收入扣除他的实际消费以后的结余。我们居民储蓄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以1994年为例，这一年新增居民储蓄6315亿元，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生活费收入计算，这一年，居民货币总收入是21300亿元。另

外有利息收 2000 亿元，总共 23300 亿元。这一年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 16053 亿元，再加上 2000 亿元的服务费支出，当年消费掉了 18053 亿元。这样，这一年居民当年结余只有 5247 亿元。即使全部存入银行（实际上有一部分手持现金），也凑不够 6300 亿元这个数。这就是说，有相当多的并非居民消费结余，也存进了银行。

这些存进银行的非“居民消费后节余”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部分是公款私存，一部分是私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承包人的经营性资金，一部分是商业承包后小商贩的贷款。这几部分资金在整个储蓄中占多大比重呢？我曾请教过一位专家，他的回答是，约占 20%。

储蓄之源：国民收入分配

即使去掉 20% 的水分，我国居民储蓄数量和它的增长速度还是很惊人的。中华民族历来有勤俭节约的风尚，我们的居民储蓄这么多，有一定的民族文化上的原因。不过，从根本上说，它还是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1978 年为 49.3%，1985 年为 58.7%，1988 年为 61.7%，1990 年为 68.6%，1994 年为 65%。

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居民口袋里的钱比过去多了，这是储蓄逐年大幅度增加的原因。

改革前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太小了，把老百姓搞得太穷。改革初期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是合理的，带有补偿性质。改革进展了十几年之后，还大幅度地向个人倾斜，说明资金这个闸门还没有把好。现在，哪一个单位不千方百计地多发一点？国家只能控制工资，控制不了各种名目的发放。现在，有的单位工资只占收入的 50% 左右，有的比重更小。

对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利与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有一点是可以一致的，即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以后，居民并没有把这笔

钱消费掉，其中的大部分还是通过银行这个中介，投入了国家建设。

家家都是万元户？

如果用全国总人口数除以全国储蓄余额，会有这样一个结果：1995年末，全国人均储蓄2500元。四口之家的储蓄一万元。家家都是万元户！你如果相信这个说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多数家庭存款不到一万元，还有相当多的家庭没有存款。

这是因为，这29700亿存款分布得很不平均。据有些地方抽样调查，20%的高收入者占有储蓄总额的80%。1988年到1993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储蓄存款平均以23%的速度增长。其中最低收组以19%的速度增长，最高收入组以23%的速度增长。最近两年没有数据，但人们估计收入差距不会缩小。

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调查，1985年，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是2.9倍，1993年扩大到3.8倍，平均每年以34%的速度扩大。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实际感受比上述数字还要大。

储蓄的城乡分布也是很不平衡的。城镇人均储蓄存款相当于农户人均储蓄存款的10倍。在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均储蓄存款的差别也很大。从居民储蓄的分布，可以看到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还在拉大。

收入差距拉大以后，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超过了消费能力的增长，即使他们中间有些畸形消费，钱花不完；中等收入者对高档次商品消费能力不足，对低档次商品的需求已经饱和，出现了消费断层。这两种人都增加储蓄。低收入者考虑到将来子女上学、住房改革、生病养老都要花大笔的钱，他们也要节衣缩食，尽可能多存一点钱。

被迫储蓄

居民储蓄超高速增长，当然说明居民对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信心，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但是，不能排除在相当程度上还有被迫储蓄的性质。

这里说的被迫储蓄并不是有什么人对居民进行强制，有钱非存银行不可，而是指居民在处理收入节余时，不得不做出把钱存入银行的选择。

如果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的利率，存款利息就是负值。在负利率情况下，存款当然是不合算的。所以，在通常情况下，一出现负利率，储蓄就要下降。

但是，最近两年出现了反常情况，连续两年的负利率，却连续两年储蓄超常增长。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7%，储蓄却增长了42.8%，1995年，通货膨胀率高到18.5%的时候，当年的储蓄比上一年仅下降了13.6个百分点。

你问周围的朋友，利率比通货膨胀率低这么多，为什么还要存钱？你的朋友一般会这样回答：“不存有什么办法？！”这就是被迫储蓄。

谁都希望自己手中的钱能够增值。要增值就得投资。前几年股票火热了一阵，有人发了财。但是，后来想发股票财的人，大多数吃了亏。最近几年，股市持续低迷，靠买股票增值的想法更是没有了。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股民投入股市的资金有13.5亿元，只占北京市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1.6%。北京市每百人中，参与股票投资的不到两人。直接融资（如靠发股票融资）是居民承担投资风险；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由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在股市不景气的情况下，把钱存进了银行，也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住房制度改革进展缓慢，想买房保值的人，想改善居住环境的人，都无法买到房。但是人们也明白，房改总有一天要实行的。那些想改善居住环境的人不得不存钱。

银行是最大的“杨白劳”

储蓄是银行的负债，居民储蓄近三万元，就是银行欠居民三万亿。现在，银行是最大的“杨白劳”。

不过，对商业银行来说，储蓄是它赖以生存的基础。谁没有足够的储蓄，谁的资金调度就很困难，谁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各家银行都把吸收存款放在首位。“存款立行”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争取更多的储蓄是当今金融竞争的焦点。“存款大战”越来越激烈。为此，各种手段都使出来了。有的银行把存款指标分配到每个员工，“揽储”多少和奖金挂钩。有的银行在黑板上公布每个人“揽储”多少的考核记录。因此，“一人在银行，全家揽存款”。1996年，为了逐步改进信贷规模的管理，实行“核定存、贷、还，多存可多用”的方法，多吸收储蓄对银行就更加重要了。

但是，作为商业银行，经营货币这个特殊商品，要想得到一定的利润，是很不容易的。现在，银行对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12.06%，固定资产贷款的年利率也只有12.24%，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高达10.98%，三年期和五年期的更高。银行只能在这1%左右的利率差中谋求利润。还要开支储蓄业务支出和各项费用支出，稍稍松松手就要出现亏损。

居民把钱存到银行，是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假如银行经营不善，发生支付危机，要出现可怕的挤兑，银行就要倒闭。银行的经营风险主要是来自坏账，即无法收回的贷款。银行的贷款收不回，它就不能支付它的储户的提款。银行的资产质量是银行信用的基础。保证它的资产质量一要有规定数量的核心资本(即银行自己的钱，不是储户的钱)，二要减少坏账。此外，在储蓄业务中一定要降低储蓄成本。那种不顾本成本的“存款大战”是不可取的。

储蓄与通货膨胀

居民储蓄增长会吸纳流通中的货币，减轻当前市场的需求压力，会缓解当前的通货膨胀。但是，居民储蓄是把当前消费延期，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减轻，却为今后积累了更大的通胀压力。这种消费能力的集中，一旦有新的消费热点，或市场上的风吹草动，就会形成对市场更大的冲击力。

把居民储蓄通过银行中介来进行投资，会不会加剧通货膨胀？假定建设规模的盘子是既定的话，储蓄作为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可以减少货币发行量(M0)，应该说对缓解通货膨胀是有好处的。但是居民储蓄还在广义货币(M2)范围之内，储蓄的增加，不仅没有减少货币流通量，反而使货币流通量以准备率的倒数的速度放大，如果对投资规模不加控制，会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用居民储蓄作为基本建设投资，会不会加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投资效果。如果投入资金产出的有效供给超过了投入的资金购买力，就会缓解通货膨胀；相反，如果投入的资金产出的有效供给少于投入资金购买力，就会加剧通货膨胀。

存款利率和物价指数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非常敏感的。而物价指数通常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我们在负利率情况下储蓄还超常增长，这与保值补贴有直接关系。巨额的保值补贴，国家财政是难以承受的。银行吸收的存款也要承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保值补贴是由银行和储户分离还是储户独享，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要使储蓄稳定增长，又不增加国家和银行的负担，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甚至避免通货膨胀。

巨额的储蓄要求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只要经济和社会稳定，“老虎”就不会出笼，“洪水”就不会泛滥成灾。而抑制通货膨胀是保持稳定重要方面。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6年2月10日

注：1996年初，中国经济界，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经济学家，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经济界的这种担心。其实，一股通货紧缩的阴云，在1996年上半年，就悄悄地在笼罩在中国的上空，逼得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扩张的政策来刺激投资。

<<<<<

RTC 不是魔术师

当前中国经济有两大隐忧，一是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太大，潜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二是国有企业处境十分困难，年年作为改革的重点，但年年没有突破。

什么是银行的不良资产？就是放出去了收不回来的贷款。银行的钱不是银行自己的，也不是国家的，而是老百姓存在这里的。老百姓把钱存银行一要保证它的安全，二希望能够增值。银行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使放出去的贷款能按时收回，并且能增值。现在大批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就影响老百姓存款的安全。一旦老百姓感到钱放在银行里不安全，都想把钱取出来，就出现挤兑。这时，金融危机就爆发了。现在我国居民储蓄已 6 万亿元，相当于 1997 年国家财政收入的 6.94 倍，相当于 1997 年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 2.45 倍。所以，一旦出现挤兑，倾全国之财力也还不起老百姓的存款。金融安全不仅关系到经济安全，也关系到社会安全。

是谁借了银行的钱不还？主要是国有企业。有些国有企业投资决策失误，资金收不回来，有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造成亏损就无力还债。1983 年实行“拨改贷”，国有企业的资本金由过去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提高了国有企业负债率，现在国有资产负债全国平均 85% 以上，企业赚的钱全都交了银行利息，天津“大无缝”（天津大型无缝钢管厂）建厂时财政没给一分钱资本金，1995 年竣工时就欠银行贷款 134.64 亿元，还没有投产当年就要还本付息 26.83 亿元，每天就要付出 300 万元的利息，成为一个天生的亏损企业。

一个苦根两个苦瓜，国民经济两大隐忧是连在一起的。国有企业解困和缓解金融风险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个苦根就是不良资产。当前

紧迫问题就是化解不良资产。这不良资产的所有权是银行的(说到底是客户的),而经营权还在国有企业。巨额的不良资产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它使国有企业难以自拔,也使银行难以正常经营。这个问题多年找不到良策。最近推出了资产管理公司,算是出现了一丝曙光。

继信达资产管理公司4月20日成立之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也很快分别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这是借鉴RTC(美国重建信托投资公司)的经验,用来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

资产管理公司是怎样化解不良资产的呢?第一步,它要把不良资产接过来,替代银行成为国有企业的债权人,这叫剥离。通过剥离,从名义上降低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使银行在没有包袱的基础上正常经营,加速改革。第二步,它要运用市场手段、金融手段,对不良资产进行专业化处理,以提高不良资产的质量。第三步就是卖出,把已经改善了资产卖给国内外其他企业,或通过证券方式取得资金,用来归还银行贷款,银行得到了还款,不良资产率才真正得以降低。资产管理公司是一个过渡性机构,它不能长期把接受来的不良资产放在手里,它必须尽快卖出去变现。

对于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来说,如果它原来的亏损仅仅是过重的利息负担造成的,资产管理公司就可以把债权变成股权,资产公司就成了它的股东,企业的利息负担就会大大减轻,从而扭亏为盈,进入正常经营状态。还是以天津“大无缝”为例,如果债权转股权当年就可以扭亏为盈、实现利润1600万元。显然,如果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变现时把这家企业的债权卖给了非国有单位,它的所有制性质随之发生变化,这家企业再也不是原来的国有企业了,这对提高企业的效率有好处。

在我国,像天津“大无缝”这样的企业很多。由于信贷资产财政化,即用银行的贷款充当国有企业和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所形成的不良资产占到整个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40%。

资产管理公司就是这样同时解决银行和国有企业的问题。然而,资产管理公司不是魔术师,它不能化腐朽为神奇,那些彻头彻尾的坏账是不能化解的。那些投资决策失误和经营不善造成的不良资产是难以化解的。能化解的不良资产至少要具备几个条件:债务人的产品必须有市场,企业有

发展前途，企业有较好的成长性，通过减轻债务负担和其他处置措施以后，企业必须有利润；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有足够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保证它在资产重组、资本经营、证券化等方面能得心应手；经过专业处置、质量得到改善的资产能够很快卖出去。这就是说，必须有发达的产权市场和足够的买方，使得债权在短期内能够变现。没有这些条件，不良资产不可能变成良性资产。

说资产管理公司不是魔术师，还表现在它在接受不良资产到最终卖出，这部分资产不能够百分之百地保全它。从国有企业的状况看，能收回一半就很不错了。银行的贷款变为企业的设备经过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有的可能一钱不值。最终变现的价值和面值的差额由谁来补？还是通过由财政手段解决，即发行国债或由政府担保的债券来填补。

既然不良资产不能百分之百地按面值出售，卖多少价格最合理？没有一定的规范，一个企业一个样子，在权钱交易横行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交易不公开、不透明，这又是腐败分子们大发其财的一次好机会。

关键在于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如果这两方面的改革跟不上，剥离了的不良资产还会再度产生。显然，这次为双方放下了一个大包袱，为其改革创造了良机。

资产管理公司不是魔术师，在它前进的路上没有洒满阳光，却是满地荆棘。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9年6月15日

注：据金融业内人士著文介绍，在2005年以前从商业银行清理的40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中，实际上只有和小部分出售给了国内外的专门资产回收公司，另有90%划到了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账面上。而管理公司对划过来的不良资产未作处理。

从另一个思路看非法集资

今日的中国，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 70% 以上，而得到的资金只占全社会资金 20%。全国金融机构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发放的短期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的比重：1994 年为 5.4%，1996 年为 5.07%，1997 年为 7.23%。其中私有企业的贷款比重更是微乎其微。

如是，占国民经济 70% 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不得不在银行之外寻求资金。

其实，国有银行的钱还是老百姓的。老百姓在银行里存了 6 万亿！既然国有银行拿了老百姓的钱不给非国有企业，它只好直接以较高的利率向老百姓集资。所以，地下钱庄、储金会、互助会等民间借贷非常流行。这就是近年来“非法集资”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这种不规范的地下金融市场，是很混乱的，最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国家一直采取“堵”的办法解决非法集资的问题。国有银行还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体外循环”，还要千方百计把“体外”资金纳入“体内”。这种南辕北辙的办法使非法集资愈演愈烈。

根本问题在于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国有银行不管民有企业，逼得民有企业另外想办法搞钱，你又说它“非法融资”。为什么不把这些“非法”渠道规范起来，合法起来呢？如果真正这样做，就可以改变国有银行独家垄断的状况。

经过 20 年的改革，中国各行各业都向市场化进展。但是，不同的行业市场化程度是不同的。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要算金融业。直到今天，中国的金融业还处于国家银行绝对垄断之中。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银行）的金融资产占全社会金融资产的

70%，占存贷款市场份额的60%以上。再加上其他国家直接控制的银行，国家垄断力量占据了90%以上的金融市场。国有银行处于绝对控制地位。

国有银行的独家垄断使得中国金融业缺乏竞争。

绝对垄断的行业必然腐败。国有银行处于“一家包天下，天下求一家”的地位，也就成了寻租的主要对象。90年代以来所揭露的贪污受贿的大案要案中，金融业占的比重最大。尽管1993年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但大案要案还是层出不穷。

没有竞争的一个重要恶果是金融服务效率低下，金融工具单调缺乏，信用监督和评估体系缺失，银行没有对付风险的能力。这些，都使得商业信用制度迟迟难以建立起来。这在“三角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1991年清理“三角债”时，其规模约为2500亿元，1994年上升为6000亿元，1996年上升到10000亿元。

国有银行独家垄断使得政企不分，地方政府干预银行业务(在国家银行独家垄断的情况下，地方没有自己的商业银行，又不能发行地方债券融资，只好挤银行贷款)，所以，90年代后期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呈上升之势，不少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地方性的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质量处于十分危险状态。

在国有银行绝对垄断的情况下，在中国金融界竞争缺失，这就使得中国金融业很难和国际金融业接轨，使得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成为遥远的未来。

刊于《经济参考报》，2000年1月19日

>>>>>

且看蝴蝶在跳舞

一位科学家说，南美一只蝴蝶振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在欧洲大陆引起一场风暴。

现在，美国这只大蝴蝶，不仅仅是振动了翅膀，而且跳起舞来了，这会在我们这里引起风暴吗？

2001年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2点左右（北京时间6月28日凌晨2点左右），美联储宣布将隔夜拆借利率再降低25个基点，至3.75%，将贴现率同步调低25个基点，至3.25%。这是2001年以来第六次降低利率。这次降低的25个基点，是在连续五次大幅降息50个基点之后。

降息频率之高、幅度之大，在美联储近90年的历史中罕见。如果只有这一个大动作也够引人注目了，然而，美国联邦政府还采取了与联储同一方向的动作：大幅度减税，今年计划减税600亿美元。

采取这么大的动作，说明美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布什一走上政坛，美国经济就进入了颓势。在一年时间内，纳指跌幅达63%，道指幅达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底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仅为1.5%，大大低于去年的5%。今年第二季度，美国企业业绩持续恶

股市随笔

化，逾千家美国大公司调低获利预测，实际获利可能比已调低的预测还差。

美国的麻烦主要出在新经济上。前几年，新经济迅速飙升，与新经济相关的企业股票像吹气球般膨胀，财富效应使得美国企业大量举债投资，家庭大量举债消费。投资和消费造成了空前大的市场需求，外资大量涌入，美国也成了世界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如今，新经济气球胀破，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动摇，市场需求锐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连续繁荣了十年的美国经济，正在滑向衰退。

对实体经济来说，股票市场是一个“放大器”。实体经济好，股票市场就过分地好，经济不好，股票市场就过分地坏。纳斯达克短期突破 5000 点，太过分，一年内降到 2000 点以下，也太过分。今天这种对不好形势的放大，形成了不好的预期。不良预期的恐惧，使得人们急于想挽回局面。格林斯潘的空前举动，正是人们这种急切心情促成的。

美国降息和减税双管齐下，意在扩大内需。只要内需一振，经济就会回升。我们期望这些措施取得成功，因为我们需要美国经济繁荣。通常情况下，利率变化对经济发生充分的影响需要 6 到 9 个月的时间。让我们等着瞧吧！我们从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汇率渠道和市场预期四个方面看“蝴蝶跳舞”对我们的影响。

中国经济对出口依存度很高，2000 年出口总值占 GDP 的比重已达 23%。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美国占 21%，如果加上香港等地的转口贸易，对美出口要占到 40% 左右。由于美国内需下降，一季度对美国出口增幅同比回落 46 个百分点。这对我国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如果“蝴蝶跳舞”能促成美国经济回升，对中国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

资本是追逐高利率的，由于过去美国七次提高利率和需求旺盛，大量资本流入美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估计，2000 年美国吸收了 7% 世界其他地区 and 国家的储蓄资金。现在利率大幅度降低，有些国际资本能从美国流出。这一情况有利于我国吸引外资，扩大外资使用规模。即使不考虑资本从美国流出，单从美元利率降低，可以使我们利用外资的利息减

少，从而降低利用外资的成本。

自 1995 年以来，由于大量进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迅速扩大，占 GDP 的比重由 1.5% 上升到 4.5%。按照历史经验，美国出现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美元就要贬值。近来美国出现了战后以来破纪录的经常账户赤字，但美元币值依然坚挺。这是因为有大量的资本流入来弥补。如果“蝴蝶跳舞”没有能使需求扩大，资本就会流出美国，美元贬值就可能发生。如果美元真的贬值，将会波及全球金融市场。我国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元贬值对中国的出口和金融都有很大的影响。

前几年美元连续多次升息，而人民币利率多次下调，美元利率高于人民币的利率，形成了资本外流的压力。只有人民币升息才能缓解这种压力。但我国通货紧缩趋势尚未彻底消除，扩大内需需要低利率政策。人民币利率升降进退两难。美国 6 次降息，缩小了美元与人民币的利差，有利于维持人民币的低利率，便于我们治理通货紧缩。

一般来说，降息对股市的影响是利好，但是，美国股市跌势主要原因是网络股泡沫破裂和技术股业绩表现欠佳引起的。利率调整可能有利于总体股市的恢复，但一时难以扭转网络股目前的局面。技术股占美国股市总值的比例较高，因此总体股市的上扬空间有限。世界各地的股市基本上是随美国股市的升降而波动的，虽然中国的股市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美国高科技股的不良表现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技术股的表现。美国股市处于熊市，资本市场偏冷，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步伐将不得不放慢。一些企业将选择国内上市，这将增加股市扩容压力，不利于国内股市的上扬。

刊于《上海证券报》，2001 年 7 月 3 日

向国有企业倾斜是中国股市的病根

近两年来对企业上市有一种说法：向国有企业倾斜。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是某些地方确定上市公司的指导思想。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股市向国有企业倾斜至少有以下两个危害：

一是缺乏公平竞争，影响上市公司质量。什么样的企业能成为上市公司，应当有一个客观标准，企业不管姓“国”还是姓“民”，都应按照上市条件一视同仁，不应当向哪一方倾斜。倾斜，就失去了公平竞争，倾斜，就使一些不合格的企业进入了股市。向国有企业倾斜，就很容易把上市当做对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的脱贫解困的手段。“倾斜”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的。不正当的“包装上市”是其中之一。如果真正按规则进行“包装”，也无可非议。然而，“包装”者像一个个技术高超的魔术师，可以把亏损企业变成盈利企业。魔术师常用两种手法，一是加法，为了让一家亏损企业上市，就把另外一家盈利企业包装进来组成“集团”，这个“集团”就成了盈利企业。二是减法，一家亏损企业可能某个局部单独算起来盈利，魔术师把亏损的大部分剥离出去，只取其中盈利的一个小小的局部。这个小小的局部就成为吸引股民资金的香饵。这个“局部”上市后吸收的资金再进入它的母体，去填补那无底的黑洞。在今日的中国，真正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很少，会计师事务所帮助上市公司做假账的事并非个别。把上市公司的资金抽给它的母体是难以避免的。

上市公司的《公告》堂而皇之，数字十分可观。但其中不少公司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此，北京有家权威报纸发出了“上市公司也要打假”的呼声。假，是“倾斜”造成的。

把不合格的国有企业推上股市，就是让股民把钱投向这些没有前景的

资金黑洞。人们说有些国有企业“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吃外行”。外行就是股民。但股民也不会长期外行下去，吃了几次亏以后再也不会买这类企业的股票。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五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五次累计下降了6.21个百分点。五年期存款利率累计下降了8.6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法定准备金率由原来的13%降到8%。这么多、这么重大的利好并没有把股市刺激起来，这期间股市大盘指数基本还是在原地徘徊。个中原因很复杂，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股市一有上升，就有几家国有企业上市，股市就跌了下来。一段时间以后股市再上升，又有几家国有企业上市，股市又跌了下来。“向国有企业倾斜”就像一个放歪了的水盆，无论怎么向里灌水，它总是满不了；“向国有企业倾斜”又像悬在股市上空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只要这把悬剑不拿下来，股市就“牛”不起来。

二是造成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通过上市公司吸收社会资金，上市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动，实际是一种资源配置。用股市来配置资源，应当是利用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用行政力量控制股市，这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被扭曲了。扭曲的配置方式不可能达到合理的资源配置。

以钢铁行业为例。全国钢铁企业1500多家，平均每家企业产钢54000吨。86家重点及地方骨干企业平均生产规模也只有95万吨。500万吨以上的企业只有4家。日本在六十年代建设的5家钢铁厂，规模都在1000万吨以上。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钢铁行业过于分散。提高其集中度是资源配置的方向。靠谁集中？主要靠企业间的兼并和联合。其中，优势企业要起主导作用。

再看看钢铁行业的上市公司。上市的钢铁公司有30多家。其中相当多是不知名的小企业。而像宝钢这样的大企业却不在上市公司之列。这就是说，上市公司助长了钢铁行业的分散，和钢铁行业的资源配置方向背道而驰。

不合理的资源配置首先是上市公司选择不当造成的。股票上市本应是市场行为，在中国却变成了行政手段加公关活动。先是上面用行政手段分配上市指标和审批，后是下面为得到指标或通过审批而进行“公关”。公

关活动大都是背后交易、暗箱操作，不择手段。一年以前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海南一家企业想通过上市摆脱资金困境，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到海南省的指标。如是，这家公司组织了一批人在北京活动，活动的目标就是想利用某中央级群众组织的上市指标。总经理很直率地说：“我们想找干爹。”我问：“什么叫干爹？”“干爹就是我用他的上市指标，我给他干股。”他接着说：“找亲爹也行。亲爹就是他出一部分资金，成为真正的股东。”据我所知，在北京专门谋求上市指标的有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怀揣钞票，白天出人机关，晚上出入豪宅。对真正帮了忙的人，出手大方得惊人。

行政手段是“向国有企业倾斜”的实现方式。上市公司指标分配就是行政手段之一。指标是按地区、按部门这样的行政系统分配的。荒唐的是，一些没有企业的中央级群众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也分有上市公司指标。有了这样的指标，他们就可以坐在家当“干爹”了。试想一下，这种地区分割、部门分割地配置资源，怎能不产业政策背道而驰？这种幕后交易方式来配置资源，怎能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

向国有企业倾斜实际是政府和国有企业联合起来(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二者本来是联在一起的)套取老百姓的钱。以前是政府直接出钱办国有企业，接着是政府利用银行吸收老百姓的钱办国有企业，现在政府利用股市套老百姓的钱办国有企业。换汤不换药，还是政府想变着法儿向国有企业注资。只要政府向国有企业注资这根脐带不断，企业改革就没有成功之日。“向国有企业倾斜”，实际是政府和国有企业联手同市场争夺资源配置权。这和党的“十四大”确定的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的精神相悖。

中国企业改革经过了利润留成、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经营机制一系列漫长过程。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有一定的效果，但都没有能够解决企业的问题。最后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股份制上。希望通过股份制改造，使企业建成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被人们当作企业改革有最后一张王牌。

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人们对股份制的希望变为忧虑：这样下去，这最后一张王牌恐怕也不灵了。

刊于《方法》，1998年第11期

把鸡蛋放在哪个筐里

2002年1月1日，欧元钞票上市，欧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储备货币。将鸡蛋放在哪个筐里，成为众多人面临的选择，欧元的走势更加令人关心。

1999年1月4日欧元正式启动，没有钞票，只是虚拟运行。那时欧元和美元的比价为1比1.17。开始人们对欧元看好，但现实和人们的预期相反，欧元启动后一路下跌，2000年10月25日跌到最低点，1欧元只能兑换0.825美元。此时，美、日和欧洲主要国家联合干预欧元汇率，2001年1月上升到0.95美元。但欧元疲势难改，又跌到0.84美元。9.11以后，美国经济受到打击，欧元上升到0.93美元，到2001年12月31日，1欧元兑换0.8913美元。欧元面钞上市的第一天，欧元和美元的比价上升到0.9066，比前一个交易日上升了1.7%。

欧元具有强势货币的潜力。其根据是：第一，欧元区经济实力强大。欧元区国家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5%，但GDP占全球的16%。就三种国际储备货币相比，欧元地区的GDP总值6万亿欧元，仅次于美国，远远高于日本。欧元地区是全球最富有的地区之一。第二，欧元地区有足够的内需空间。该地区拥有消费人口为3.03亿，超过美国的2.78亿和日本的1.27亿。在欧元地区，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7%，仅低于美国的68.2%。2001年该地区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1.5%，虽然低于日本，但高于美国。这为欧元地区经济稳定提供了条件。第三，欧元地区经济运行良好，财政收支平衡，多年贸易没有逆差，虽然今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还是高于美国。2003年后欧元区国家可能会达到15个。15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经合组织的38%，而美国占32%左右、日本仅为20%。以贸易而论，美国的出口总值相当于世界出口贸易总值的12%，而欧盟15国

则将近 17%，即使按静态计算，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应达 25% 以上。当然，欧元也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例如，经济各异的多个主权国家共同使用一种货币，有着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看欧元走势必须将欧元区和美国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一要比欧元区和美国经济规模 and 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二要比欧元区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水平；三要比欧元区和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四要比投资者对两个地区的信心和预期。以上诸多因素决定着两个地区的近期和长期的资本收益率和投资风险的差异。资本总是向收益高、风险低的地方流动。资本的流动方向决定着欧元和美元的供求关系。前三年欧元一路下跌，主要原因欧洲资金大量流向美国。

“9·11”以后，虽然欧洲也同样笼罩在恐怖袭击的气氛之中，但美国还是恐怖袭击的首选目标。就投资风险和投资者的信心而言，美国相对欧元区处于弱势。近一年来，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经济衰退，这也有助于欧元走强。但是，由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欧洲落后于美国，美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还是优于欧洲，投资收益还是高于欧洲。美国一旦走出“9·11”阴影，美国经济一旦走出低谷，国际资本还会对美国看好。

除了国际资本流向决定欧元走势以外，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国际贸易结算中欧元和美元所占的比重，影响对欧元的需求，从而影响欧元的走势。欧元面钞问世以后，在这两个方面有可能加强。现在欧元已是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目前，在全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重为 60—65%，欧元只占 15—20%。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美元的比重在 50% 上下，欧元只占 30% 左右。从长远看，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多极化发展，欧元在外汇储备和国际结算中所占的比重应当有上升的趋势，能否真正上升还得看欧元区和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比较和两个地区的银行政策。

将鸡蛋放在哪个筐里？从短期看还是放在美元这个筐里可能较安全，从长期看，放在欧元这个筐里也许会有更多的收益。在欧元运行的前几年会有较大的波动，如果在汇率波动中看准走势，不失时机地在两个筐里倒腾鸡蛋，就可能实现低风险、高收益。

刊于《经济参考报》，2002 年 1 月 7 日

看安然事件，想中国股市

在安然事件出现以前，我曾有一个梦想：随着市场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市场的不断规范和整顿，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会真实可靠，中介机构会公正无私，股票市场的欺诈行为将会消失。被中国股市连番欺诈气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也像我一样，期望有这么一个纯洁的世界。

安然事件的出现打破了我这个美梦。

在世界上最成熟的、被我们奉为楷模、天天学习不止的股票市场——美国华尔街，却发生了如此大的骗局。

安然曾经是美国最大的能源贸易公司，连续4年荣获“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称号。2000年8月，安然的股价飙升至90.56美元，市值800亿美元。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么一家大公司却利用复杂的财务手段和关联交易，虚报巨额利润、掩盖巨额债务。虚假一旦暴露，股价迅速狂跌到1美元以下，最低达26美分。最后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股价崩跌之前，公司的29名高级主管就抛出了173万股股票，获得11亿美元的巨额利润。而该公司的2万名职工用养老金购买的本公司股票却被禁止出售，养老金顷刻化为乌有。很多中国人认为信用很高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自安然公司成立伊始到现在一直为它做审计和咨询。问题暴露后，安达信还销毁有关安然公司的资料。这也令人震惊。

震惊之余，细想一下，安然事件的出现并不奇怪。成熟的股票市场不一定是纯洁的世界。进入股市的公司和投资者是为了追求利益而来的。多数人会用道德束自己，但不是每个人都讲道德。在利益诱惑下，总会有一些不讲道德的人做出非法之事。

自从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以来，就难以避免“内部人控制”，即难以避免高层管理人员牺牲所有者的利益为自己谋利。上市公司是典型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企业，它的所有者是分散的，而经营者是集中于一个组织之中，信息极不对称，“内部人控制”更容易发生。

然而，像中国股市中的银广夏这样凭空制造弥天大谎的低水平欺诈，在美国市场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安然和银广夏不同，他们创造了一套非常复杂的财务结构。在会计财务方面，安然率先采用了一些技术，使能源公司得以记录尚未创造收入的长期合同的盈亏数字。在证券及会计制度上，安然则尝试打擦边球。在安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文件中，陈述的内容十分复杂，连华尔街的分析师和会计学教授都觉得难以解读。一位在华尔街有近50年工作经验的金融业人士感叹：没有哪一家公司的内幕曝光能与安然的财务造假同日而语，这是一个十分经典的案例。

高水平的管理就会有高水平的欺诈。

美国股市的法律和制度是相当完善的。但是，这些法律和制度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多年来不断博弈的结果，是多年来不断试错和纠错的结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种博弈是不会终结的，试错和纠错也不会终结的。再严密的防范也会有更高明的突破者。我们期待的规范的市场像数学中的极限概念一样，只能逼近，不能达到。

安然事件的出现我们应当避免两种心态，一种是“用别人的缺点为自己的缺点辩护”，华尔街如此，我们的问题不算什么；一种是对规范市场完全失去信心，认为市场永远是赌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安然事件发生以后，华尔街进行的一系列纠错措施：不良公司的破产，一连串索取赔偿的法律诉讼，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咨询业务的即将拆分，对责任的追究从企业界、中介机构直到政界。这些措施一是着眼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二是着眼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些，是银广夏事件发生后我们应当做却没有做的。从这里我们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刊于《上海证券报》，2002年1月16日

多在分母上做文章

自 1999 年 5.19 行情启动之后，上证指数从 1200 点上升到去年 7 月初的 2246 点，不到一年时间内，上涨了 90% 以上。而在此期间上市公司的总体业绩的增幅不到 20%。在这不到 20% 的业绩中还有不少是虚假的。可见中国股市的泡沫之大。

人们常将市盈率当作测量泡沫的一个指标。市盈率 = 每股市价 / 每股年盈利。盈利是每一股的税后利润。虽然盈利是上一年度的，不是股票的动态现状，但年年滚动下去，还是能反映泡沫大小。我们用境外股票市场的市盈率为参照，可以看出中国股市的泡沫之大。在 1993 年以前，美国纽约交易所平均市盈率是 16 倍，纳斯达克是 18 倍。最近几年，美国股市泡沫较大，但泡沫较高的网络股、高科技股、计算机股，在今年泡沫消除以前，也不过 40-50 倍左右，传统产业股票还是在 16 倍以下。香港股市的市盈率通常在 20 倍以下。然而，我国股市的市盈率一般是 60 多倍，有的达到几百倍乃至上千倍。

泡沫过高的股市是风险很高的股市。消除过多的泡沫是股市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从市盈率上看，消除泡沫至少有两个办法：一是打压股票价格，即在上述等式的分子上做文章；二是提高每股盈利，即在上述等式的分母上做文章。由于打压价格涉及很多人的利益，这种作法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中国有 6000 多万个人投资者，其中有不少是下岗工人和低收入者，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把“养命钱”都押进了股市。如果以挤泡沫的名义人为地使股价大跌，这些小股民必然大受损失。泡沫过多是前些年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现在让小股东承担消除泡沫的代价是不公正的。

然而，从长远看，中国股市泡沫必须消除。既然过猛地打压股价会损

害小股民的利益，那么，就应当把消除泡沫的重点放在提高每股的盈利上，也就是说，多在分母上做文章。

我们上市公司应当是国内比较好的企业，它的盈利水平应当是比较高的。但现实很不如人意。前些年的绩优股很多已经名落孙山，有的进入了亏损行列。据 2001 年中报，亏损公司共有 98 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9.46%，其中，每股亏损最多的为 0.628 元。由于信息披露不实，亏损面会远远超出这个数。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是当务之急。

提高盈利的根本途径是上市企业要练好内功，即搞好经营管理、采用新技术，努力开拓市场等。这些虽然是老生常谈，但非做不可。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相当多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因上市而转变机制，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还远不到位。它们因袭了国有企业的不少弊端，投资失误后无人负责的现象还像过去一样。有些上市公司从股市上得到的资金，投资后收不回来，不但没有利润，反而出现巨额亏损。此外，堵住上市公司利润流失的漏洞也是当务之急。现在，上市公司的母体不仅把上市公司作为圈钱的工具，还抽走上市公司最赚钱的那一部分优质资产。大股东“抽空”上市公司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果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企业的盈利就会上升。当然，这些不是一时一日之功。因此，消除股市有泡沫也不能寄希望短期内完成，要逐步消化，平稳过渡。这样，股市才比较平稳，小股民的利益损失要小一些。

当然，我说多在分母上做文章，并不是放弃在分子上的努力。例如，国有股减持的价格就不能按照泡沫很大的市场价定价，而应当按净资产定价。

谁为数万亿元买单？

从 2001 年 7 月到 2001 年年底，半年时间，沪市从 2200 点跌到 1400 点，落差 800 多点，财富缩水数万亿元。

谁为这数万亿元买单？

股市每一次大起大落，都是一次财富在股民中的再分配。有人财源涌进，有人忍痛割肉。这一轮股市暴跌也不例外，弹冠相庆和捶胸顿足者各有其人。不过，前者是少数。

股市如海潮。涨潮时谁能站在潮头，谁就能得风气之先；退潮时谁退在最后，谁就被抛在海滩上束手待毙。为几万亿元买单的当然是被抛在海滩上的倒霉蛋儿们。

中国股市基本是政策市，潮起潮落的背后皆有政策的原因。政策市有一个特点，即信息很不对称。接近决策中心、或与决策中心有种种关系的人，最早得到信息；离决策中心越远，得到信息越晚。当信息的先知者大获全胜后忙着点钞票时，信息的后知者被牢牢地套在海滩上任人宰割。

中国股民有 6000 多万。其中股市大鳄是极少数，众多的股民不过是小鱼小虾。大鳄们不论是当官或经商，他们总是能够接近信息源，而成为信息的先知者。在决策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政策信息是按社会等级的等级分配的。社会地位越高，得到信息越早、越多。每次潮起时，能站在潮头者，当是大鳄；潮落时，被抛在海滩上的，多是小鱼小虾。股市总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中国自有股市以来，大体如此，今天也不例外。

在新近的一次股市大潮中，吃亏的还是社会阶层最低的股民，因为他们

他们是信息的后知者。是他们为这几万亿元买单。其中有一些是下岗工人

他们本来想在股市上得点小小的实惠以维持生计，没想到东拼西凑弄来的血汗钱却付之东流。

2001年9-10月，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组织了“改革形势与社会心理”问卷调查，调查覆盖28个省市自治区的55个城市，在回答居民投资股票市场盈利情况时，18.7%的人认为所有的人都亏了钱，67.8%的人认为大多数人都亏了钱，认为少数人亏钱的占7.3%，认为没有亏钱的只占0.6%。这个调查证明了我上述看法：我国股市的普通投资者大部分人都受了损失。

就每一个人的资金而言，小股民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人数众多，能够影响市场的人气。在股市上人气最为重要。所以，对小股民的伤害，是对股市最重要的伤害。

这一轮股市下跌的导火线是去年清查进入股市的违规资金。说是违规，实际上是有关部门默许进入的。没有这笔资金的进入，就没有2000年一整年的牛市。原来期望借牛市的潮头，让国有企业渡过难关，以兑现“三年脱困”的政治承诺。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新股上市数量之多、频率之高，使老牛不堪重负。舆论界对2000年牛市的过分赞美，反过来使得决策者受到“肥牛”的诱惑，又想割牛肉以补社保资金的不足。割牛者忘记了这牛是充满泡沫的，市盈率世界第一。钢刀一指，气泡即破，肥牛顷刻垮了下来。

清查违规资金是为了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使它有一个好的状态进入WTO；国有股减持是为了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使股市更符合市场规律。这两项举措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清查违规资金基本画上了句号，国有股减持还要继续进行。但是必须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前几年，把股市当作国有企业圈钱的工具，已经产生不良的后果；现在，又把股市当作社保资金圈钱的工具，还会再咽苦果。

一个又一个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或阶段性成果被推出来，一个又一个地被市场用“脚”否决。这正是中小投资者的意愿在起作用。他们深知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顽强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无论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讲，还是从保护股市人气的角度讲，中小股民的利益是万万忽视不得的。而中小

投资者的利益，目前的焦点又集中在国有股减持方案上。从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股市来看，国有股减持这一关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只有抛弃为某种用途圈钱的目的，真正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放到重要位置，才能找到真正的“多赢”方案。

刊于《科学投资》，2002年第3期

财富流动

<<<<<

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

社会分配不公平，这是现今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之一。大家在谈论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收入过高这一方面，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大多数人的收入趋于均等化。

来自各个方面的调查数据表明，最近几年，少数人的收入的确与大多数人的收入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但是，多数人之间的差距反而缩小了。据国家统计局对 48 个城市调查，去年上半年和 1985 年相比，科研单位实习研究员和研究员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 1:3 缩小到 1:2；医士与主任医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 1:3 缩小到 1:2.2；大学助教和教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 1:4.1 下降到 1:2.1；国家机关办事员和司局长工资性收入之比由 1:3.1 缩小到 1:1.6。据厦门市调查，企业新的工人工资标准本来高低相差三倍，但是加上人人有份的各种补贴，高低相差只有 1.8 倍。

人们通常对收入悬殊十分敏感，对平均主义却不在意。事实上，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一个懒汉和一位劳动模范收入一样多，或者差不多，这能说公平吗？人人收入均等意味着贡献大的人少得了收入，贡献小的人侵吞了别人应得的收入。有一位外国经济学家说过：

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剥削。这话不无道理。

收入均等化带来了消费平均化，一些高档商品，你买得起，我也买得起，大家都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这“新四件”，普及的速度是出人意料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城镇居民对“新四件”的拥有量，高收入阶层对“新四件”的拥有量与低收入阶层差别也不大。消费平均化打破了消费的层次性。有人打了一个比方，过去消费者排着纵队进入市场，现在排成了整齐的横队冲击市场。平均化的消费造成了巨大的需求冲击力，是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之一。

均等的分配挫伤了贡献大的人的积极性，抑制了创造才能，扼杀了进取精神，造就了懒惰和松懈之风，必然的结果是效率低下。这是被40年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你想追求公平吗？而貌似公平的平均分配既丧失了公平，也丧失了效率。分配上合理的差距，可以使被压抑了的社会潜能迸发出来，它能促使国民经济较快较健康地发展。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一个度量收入贫富悬殊程度的指标，人们把它叫做基尼系数。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当它等于1时，表示全社会的收入被一个人全部占有；当它等于0时，表示全社会人人收入相等。基尼系数过低，表明平均主义严重，经济效率低；基尼系数过大，表明贫富过分悬殊，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偏低的。1981—1985年间，全国城镇各年度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50、0.148、0.149、0.168、0.175，都没有达到1964年0.184的水平。作为参照的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0.315—0.372之间，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在0.418—0.519之间。当然，我国低房租等因素使基尼系数和国外有不可比之处，但大体趋势还是可以参考的。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初期的基尼系数比较大，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基尼系数开始下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这一过程。我们应该处于基尼系数大的阶段，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是令人不安的。

既然当前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均等化，为什么人们的议论中心又集中在收入悬殊上呢？这里有一个观念问题。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

统观念来看较大的收入差距，会愤慨不已。公平的观念和评价尺度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封建社会，痴呆的太子继承皇位，谁也不会说不公平；而今天，封建特权思想和行为却是众矢之的。改革和开放，已经把我们的社会推向了新的阶段，如果用以往的公平观念和尺度来看社会就会感到处处不公平。

我这里讲收入均等化是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并不否认其他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利用新旧体制交替中的漏洞大发其财，不合理的价格造成不同企业间收入悬殊，不规范的市场造成了不合理的高收入，等等。至于少数人以权谋私，敲诈索贿，贪污盗窃，大发横财，那就不是一个经济上的分配问题，而是一个违法乱纪、以至触犯刑律的问题了。少数人不合理的高收入，相对于收入均等化的另一极端，也会严重地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它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心理障碍，使合理的收入差距难以形成。

总之，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既要克服大面上的平均分配，也要防止少数人不合理的收入过高。这是一个问题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而当前和相当长一个时期需要着重解决的收入均等化的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

刊于《经济参考报》，1989年3月3日

从熵和基尼系数说起

能量过度分散就没有力量。能量分散程度是用熵来度量的，能量越分散，熵值就越大。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能量在宇宙均匀分布，即整个宇宙处处温度相等，达到熵值最大的状态，那就没有风雨雷电，没有日月星辰，没有阳光温暖，就是宇宙的死亡。这就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休斯所描述的“热死”（也有译作“热寂”）状态。

财富是一种社会能量。如果财富在整个社会平均分布，即基尼系数（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如果所有的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基尼系数就等于1，如果财富平均分布，则基尼系数等于0）等于0，那就没有工业，没有铁路，没有摩天大厦，没有现代文明，因为这些都是需要巨额的财富才能完成。财富绝对平均也失去了激励，因而也失去了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是说，如果财富绝对平均，一切社会事业、一切社会活动都将停止，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熄灭，就意味着社会的死亡。

所以，“均贫富”不仅行不通，也是极为有害的。财富还是要集中的。问题在于，第一，财富集中的程度什么样才合适？第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第三，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手段集中？

财富集中到什么程度合适？从经营上要适合经济规模。从竞争上不能造成垄断。从交易上，交易成本最低。更重要的是，不能影响社会上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些集中的“度”，可以用经济和社会标准判别。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

财富应当由谁来集中呢？国家应当集中一定量的财富，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用于救助贫困，用于补救市场失效。“公共产品”是指维护社

会安全的军队、警察；用于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设施；用于提高全民素质的教育等。这些都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那些为使财富增值的经营活动，也需要把财富集中起来，这就不一定集中在国家手里了。前苏联、中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英国工党执政时的实践已经证明，由国家来从事经营性活动是不成功的，这正是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共识。还需要强调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实践也证明，由个人支配巨额财富不仅是失败的，也是有害的。那么，经营性的财富既不宜集中在国家手里，又不宜集中在私人手里，到底集中在哪里？这里有两个原则，一是这种集中经营能保证财富增值最快，即效率高；二是能代表公众利益，保证公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共同探索，既否定了国家过度集中财富，也否定了私人集中财富，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财富集中方式，这就是社会化方式。股份制企业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现代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形式。这两种社会化的形式互相融合，互相依存。

这就是说，在早期资本主义集中财富是通过巨额财产的私人占有来实现的，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是用行政力量即国家来实现财富集中的。在现代社会，财富集中是通过社会化的手段实现的。在现代，财富的使用权集中了，但财富所有权却分散了。银行资产的所有者是成千上万家储户，股份制企业资产的所有者是成千上万位股民。但对财富进行运营的，还是那些善于使财富增值的专家们。这就可以保证公平和效率的兼有。

中国 21 世纪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财产分布结构呢？从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来看，主要财富在民间，但政府还要集中相当的财力，做好政府必须做好的事。在民间，应当造就广泛的中等富裕家庭，从数量上来看，这样的家庭应占家庭总数的 50%—60%。在中等富裕家庭的两头，收入差别不能过分悬殊。

财富用什么样的方式集中？主要是经济的方式。谁的经营效率高，谁能使财富增值得快，财富就向哪里集中。但还要辅以法律的、行政的、道德的手段。例如，反垄断法，就是防止财富过度集中。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也要通过财富的大量流动来实现集中。在这个阶段的财富集中有两种前途：一是社会化，一是私有化。社会化是相对国有化而言，高度集中在国家的财产有相当一部分要向社会分散，而经营权相对集中。私有化是对公有化而言，它是指个人(或家族)占有并支配财富。现在有些理论家把非国有化笼统称为私有化，这是不确切的，因为非国有化中相当一部分是社会化。财富也可能集中到个人(或家族)手中。向哪些个人集中？这就看谁占有集中财富的优势。在原有权力体系内的人就比体系外的人更有优势，社会地位高的人就比社会地位低的人更有优势；在国家财富向非国家主体转移时，当时谁实际掌握这部分国有财产，谁就有优势。说得通俗一点，“大锅饭”的“掌勺者”和与“掌勺者”有特殊关系的人更有优势。这就是说，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衡，财富就会依照现有的权力体系，向某些“掌勺者”和与“掌勺者”有特殊关系的人集中，这就是真正的私有化。

支持社会化，反对私有化。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7年4月9日

<<<<<

“胡雪岩热”的背后

最近几年，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胡雪岩热”。《胡雪岩》成为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衰。这当然与这本书脍炙人口的文字、曲折动人的情节有关。但是我感到，胡雪岩这个人物与当代社会某些情况相吻合，大概也是“胡雪岩热”的一个原因。

胡雪岩是晚清的一名富商。他本来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因资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龄丢掉了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成为巨富。作为一名商人，胡雪岩是很有经营才干的。但在那个权力至上、等级森严的时代，他要取得成功，只能借助官场势力。胡雪岩利用官场腐败，以精心的算计和灵活巧妙的手段，收买高官，层层投靠。同时借官场势力，叱咤商场，通达买办。商借官势大量聚敛财富，官倚商力使封建政权苟延残喘。胡雪岩则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营造庭园，收姬纳妾，邀友狎妓，生活腐化。一时灯火楼台，很快灰飞烟灭。

胡雪岩的兴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是借助官员手中的权力发财的；第二，胡雪岩和官员之间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并且和有些官员结成生死联盟，第三，他所依仗的官僚虽然有励精图治的一面，但从社会变革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效命清王朝的政治死硬派，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第四，他是失去政治权力靠山后在官僚们的权力倾轧中破败的。

胡雪岩的个人素质和人品应该说是不错的。他的商业活动本来可以为发展我国的早期资本主义作出贡献。但他在官僚机器的缝隙里生存，在腐

朽的封建土壤中发展，他只能随着封建势力的衰败而衰败。在官僚们争权夺利的倾轧中，他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度日，历史注定他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在内外交困中，他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胡雪岩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条件下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规范的商品经济交媾的怪胎。是金钱和权力的私生子。商品经济的要义在于竞争，在竞争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封建政治必然要窒息商品经济。胡雪岩这样的怪胎不可能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

现在出现“胡雪岩热”，说明当今中国还有产生这样怪胎的土壤。这土壤就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就出现了一些依靠权力发财的“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利用现有权力体系对财富重新分配的得利者。他们是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

现代“红顶商人”集中财富的手段带有封建色彩，和现代社会不相容。他们借助权力进行交易，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他们借助权力开展竞争，这种竞争不可能是平等的。不公平的交易，不平等的竞争，是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现代“红顶商人”是当今腐败潮流同时出现的。“红顶商人”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严重污染着社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和对市场经济有抵触情绪的人，把“红顶商人”的腐败活动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市场经济。“红顶商人”玷污改革，玷污市场经济。

现代“红顶商人”是分配不公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国 6000 多万还得不到温饱的老百姓当中，他们显得十分刺目。他们是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也是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现代“红顶商人”的主要目标就是“寻租”。什么叫“寻租”？概而言之，寻租就是利用行政权力大发横财。寻租理论认为，“租金”（这里和房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行政干预、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

差收入。例如，汇率并轨前，市场上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而政府控制的兑换率是5.6元人民币。谁得到了官定汇率指标，谁就得到了这个利益差额。这个差额就是“租金”。一些需要政府审批的经营活动，其中就有“租金”。现代“红顶商人”的寻租活动，使得贪污腐化越来越严重，它导致人心涣散，影响政府形象，影响政治稳定。

如果说，历史已经证明胡雪岩不能在封建土壤中造就资本主义，那么，历史必将证明，今日的“红顶商人”也不会造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红顶商人”是渐进式改革方略的产物，它应当是一种过渡产物。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使之固化，并得到畸形发展。他们既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也反对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前者使他们失去了所依赖的特权，后者使他们失去了“寻租”的物质基础。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7年4月10日

当代“红顶商人”

在财富集中的过程中，我们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社会化，不要私有化。那么是谁在搞私有化呢？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股份制的推动者，而是当代“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当今私有化的主体。他们是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因而有更大的危险性。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形式是：

利用双轨利益差(价差，利差，汇率差)。由于中国改革是采取渐进方式，必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既有市场配置资源，又有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这就出现了一种商品两种价格、一种资金两种利率、一种外币两种汇率的情况。而双轨利益差是由官员分配的，在分配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人估算过，双轨利差、双轨价差、双轨汇率差一年就是几千亿元。如果其中有百分之一漏到了私人口袋，可以造就多少百万富翁？

利用权力取得发财机会。批地皮，搞房地产；取得股票的原始股；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并在进口时取得减免税的优惠；等。一些需要审批的发财机会，一般就有权钱交易。

在对外经济活动和中外合资企业中，有些中方管理人员把国家利益让给外方，外方私下给他以补偿，国家吃亏，外商得大利，他得小利。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成为官僚买办。

企业经理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使用有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他有权决定企业工程项目的发包，并从承包方那里得到好处；他有权决定企业广告费用的支出，并从新闻界得到私下的回扣；他有权决定公关费用的支出(公关费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行贿——尽管是为企业的利益而行贿)，并用公

关费建立与他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他与亲朋好友建立的非国有企业进行经济合作(如零部件加工等)，由此将国有资产流向这些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有化很多是通过合法的合同进行的。在交易合同中，国有企业经办人和交易的另一方恶意串通，使国有企业上当受骗。1995年，国家工商部门检查了50万家企业的合同签订情况，发现不合格的合同35万份，涉及金额291亿元。被骗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得到好处的是私营企业或承包给私人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近10年国有资产流失超过5000亿元，一半以上与这类合同有关。在租赁、承包或购买企业时，压低承包基数、压低租金和价格。在建筑承包合同中故意抬高发包价格。在购物合同中，在价格、质量上让国家吃亏。还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按合同付出了资金、设备、商品，对方却不履约。1995年经济合同履行率只有40%—50%。国有企业的有些经办人员故意在合同丧失诉讼时效后再起诉，或者“自愿”败诉。国家工商总局推算，如果提高10%的履约率，国有、集体企业一年可减少100亿元的损失。国有资产通过合同流失后，国有企业内部的经办人和合同另一方私分这部分流失的国有资产。

利用政策信息上优势取得投资、经营、交易上的优势等等，以上各种私有化形式都是官商勾结、里应外合的权钱交易过程。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财富“让”给商人，商人再暗中将所得利益分一部分给官员。正如湖北省一名犯罪的商人在供词中说：“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这中间完全是“黑盒子”交易，其中奥妙外人不得而知。

这种演变结果必然出现一批私人巨富。由于他们的财富是借助权力取得的，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之为“现代红顶商人”。说他们是“红顶商人”不很确切，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红顶”，不是官员。有的虽然原来有“红顶”，现在丢掉“红顶”下海了。不管是下海的官员，还是没当过官的商人，他们始终通过各种手段和官场保持着密切的、特殊的关系。与这些商人私通的官员是分利者。

当代“红顶商人”本来是渐进式改革方略的产物，应当是一种过渡形

态。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使之固化，并得到畸形发展。他们害怕失去所依赖的权力，也怕失去“寻租”的物质基础。所以他们害怕改革向纵深发展。

然而，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现在依靠权力集中了大笔财富的“红顶商人”队伍就要发生变化。他们失去权力的依托以后，其中没有经营能力的将要失去财富。有经营能力又能应变的，将由“红顶商人”转化为真正的商人。他们所拥有的企业也将会大量吸收社会资本，从而成为社会化企业。

·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7年4月11日

财政漫谈

<<<<<

若无远虑，必有近忧

自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从1993年的3400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13380亿元，7年增长1万亿。而从1980到1993年13年间才增长2400亿。2000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为23%，远远高于GDP8%的增长幅度。预计今年的增长幅度还要超过去年。由于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近几年来，中央财政办了很多过去办不了的大事。

但是，中国财政还有更多需要解决的难题。

中央财政：静态危机和动态可持续问题

财政收入增加得快，但财政支出增加得更快。因此，中央财政年年捉襟见肘。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撑，政府该做的事不能做好。由于财政困难，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用公共权力创收，腐败之风由此盛行。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财政收支统计有所变化，财政收入不包括债务收入，财政支出不包括债务支出（即还息）。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就是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来平衡。因

此，国家财政的债务连年上升，1995年1510亿元，1997年2400亿元，2000年4000亿元，2001年5000亿元。到2000年底，内债余额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1500亿美元。内外债加起来共25000亿元人民币。

国家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债务依存度(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当年财政支出)已经超过了60%。也就是说，政府每花100元钱，其中有60多元来自借债。上述数字还只是显性债务，此外还有大量的隐性债务，如欠发工资、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养老保险欠账，等等。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所有的政府债务(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积累，已经达到了GDP的100%。欧洲国家的经验数据是，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我国财政专家认为国债余额应当控制在30%以下，加上各类隐性债务应控制在70%以下，再加上种种或然债务应控制在100%以下。

现在我们的财政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借新债，还旧债，依靠不断地发行国债滚动前进。这种状况能不能持续下去呢？

假如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银行不得不提高存款利率。这时发行国债遇到了难题：如果以高于银行利率来发债，成本太高，财政不能承受；如果不提高利率，国债就没有人买。到这个时候，财政就不能持续下去。政府对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印钞票，即恶性通货膨胀；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即政府信用破产。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不等糟糕到这种程度，群众就凭直觉做出了反映，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会提前出现。

也有专家认为，国债余额占GDP之比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两个指标：一是财政赤字对GDP之比，二是GDP的增长速度。如果财政赤字对GDP之比不超过3%，GDP的年增长速度不低于7%，中国的财政就不会出现偿付危机。2000年底，前一个指标只有2.9%(这里不包括国债利息支出600亿元)，后一个指标为8%，这组数字表明，目前不会出问题，但空间不是很大。

学界也有一些人坚持继续发行国债没有风险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是参考指标，最根本的

是看社会物质基础，有了丰厚物质基础，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现在社会上还存在着很多剩余生产要素，大量的闲置的厂房、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需要利用，粮食、资金也很充裕，发行国债带动社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经济发展了，GDP的规模越来越大，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小，财政收入规模越来越大，需要偿还的债务相对也是一个小数。只要财政每年用于国债利息支出的增长幅度小于或等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国债的发行就具有可持续性。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国债投资真正能推动GDP的有效增长。然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永明先生一项定量研究的结论是：“改革以来，我国国债发行并没有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用于建设性支出，而主要用于消费性支出。”如果宋先生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县乡财政：走不出的两难困境

地方财政比中央财政更为困难，其中最困难的是县乡级。国家法令规定，地方政府不能成为法定的借债主体，但实际上承担了沉重的债务：1. 省级政府的外债沉重。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以及各类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数额巨大。湖北省1999年3月末利用外国政府项目中，有37个发生还款拖欠，拖欠本息1.6亿美元；2. 地方政府担保的大笔债务。如宜昌市市直财政为企业提保的贷款达10.8亿元；3. 财政赤字和历史挂账不堪重负。各级地方财政许多应支未支、已支未报的支出长期积累，是一个无法统计的庞大的数字。

全国2470个县级单位，40%以上是赤字。中央财政赤字可以通过发债债券来解决，县级不能发债券，只好向其他途径借债或拖欠工资。河北省在1998年以前累计欠公教人员工资9.66亿元的基础上，1999年当年欠发3.41亿元，2000年1—8月新欠4.33亿元，共欠17.2亿元。到2000年底，安徽省有30多个县拖欠工资，累计拖欠工资总额14.4亿元。乡村级财政赤字更大，有人估计，平均每个乡有400万赤字，全国4万多个乡就

有赤字 1776 亿。平均每个村 20 万赤字，村级就有 1483 亿赤字。乡村两级财政赤字达 3259 亿。乡村债务大多是借私人的钱，利率比中央债务要高得多。乡村级财政困难最终通过各种收费落在农民头上。有关部门统计，各种向农民征收的项目达 149 项之多。中央规定的农民负担不能超过其收入的 5%，实际远远高于这个比重。据农业部不久以前对湖北荆门的一项调查，当地农民负担平均占农民收入 10% 左右，人均负担 300 元，这还不包括义务工及乡镇摊派的报刊费等费用。有的地方农村新婚夫妇登记结婚，要交纳数百元甚至两千多元的登记费，农民说，“结婚不是喜，证书领不起”。有的地方没有养牛的农民也要交黄牛配种税。农民负担过重，使农村社会矛盾尖锐，近年来因农村收费引起的突发事件日益增多。为了缓和农村的社会矛盾，国家准备实行税费改革(适当提高税负，取消各种收费)。但是，取消收费就切断了乡村财政的来源，乡村政权无法维持，基础教育也只好停顿。据安徽芜湖调查，税费改革前，村级平均收入大约 5—6 万元，税费改革后，仅为 2 万元左右，其中不足 2 万元的行政村占 36.2%。村级机构正常运转至少得 3 万元，此外还得偿还债务。因此，税费改革在安徽试点以后，不能向全国普遍推广。

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除了供养过多的公职人员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县乡财政承担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和日常开支。这些公共产品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广播电视等方面。其中，义务教育的经费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县乡财政支出中一大半是教师工资和其他教育经费。其实，这些公共产品的费用大部分应当由中央财政来承担。从上面介绍可知，中央财政如此困难，短期内要它承担这笔费用是不现实的。

看来，在今后几年内，县乡财政还得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要减轻农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乡村财政难以为继；要维持乡村财政，只好让农民承受沉重的负担。

财政问题的连带影响

熊彼特说过，“财政上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

“所有的变化都会在财政上有所反映”。中国财政的种种问题必然影响到方方面面。

财政困难会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我国80年代中期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4.4%，90年代中期达到7.5%。世界银行预计：要保持GDP的持续高增长，下一个10年中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将达到8—9%，总量将达到7400亿美元，其中2000亿美元将用于能源基础设施。这是一笔巨额的投资。从目前中央财政的状况来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如果不实行投、融资体制改革，不仅制约GDP的增长速度，也会使西部开发的宏图难以落实。

财政和银行有着密切的关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财政、银行、国有企业是一个连通器，一方面的危机必然向另外两个方面转移。国有企业的债务最终还是国家财政的债务。虽然不是像过去那样拨款扶持，但减免税负、破产基金、债转股等等扶持国有企业的手段，最终还是割国家财政的肉。此外，财政没有力量支持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亏损就向银行转移：逃废债务，人为压低利率，通过债转股方式使银行债务变成亏损企业的股份，这些都加大了银行的不良资产。

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唐龙生分析，现在可以确定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总规模至少12000亿元。此外，考虑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和其他不良贷款，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为27000亿元。考虑到可以收30%，则27000亿元的不良贷款的损失将在19860亿元。国有银行的损失最终还需国家财政补充，一旦银行出现支付危机，它的最后支撑者还是财政。如果财政力不从心，支付危机就会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

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作为银行业的重要参数——利率，就得随之提高。利率提高以后，就要引起投资收益率、企业盈利率、股指、汇率等一系列经济参数的变化。

财政出现赤字以后，不能像过去那样向银行透支，但可以向银行借债，即银行认购国债。在财政状况良好的时候，银行认购国债是一件好事。过去，国债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它的作用一直限定在财政方面。最近几年，银行的贷款放不出去，形成大量的存差。这些钱放在银行

里不能增值，还得向储户支付利息。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商业银行大量购进国债，90年代上半期，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占其总资产的比重不到1%，现在已接近7%。这样，商业银行的闲置资金找到了生息的机会，改善了银行的资产结构，增加了银行的盈利。此外，目前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最好手段，而大量的国债交易和商业银行大量持有国债是公开市场业务的重要条件。

但是，银行持有大量的国债这一事实，把银行和财政联结起来了。一旦财政失去了还债能力，财政危机就会转化为金融危机。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资本市场不仅有股票市场，还包括债券市场。国债是债券市场上信用等级最高的债券，一直受投资者青睐。股票投资者同时投资债券，可以实现收益和风险的合理的搭配，在投资组合中，国债比重较大，投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就较高。目前向个人发行的国债，利率高于银行储蓄利率，又不征收利息税，可以说是收益高、风险小的投资方式。这是投资者排长队购国债的原因。

财政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目前最直接的是国家在社会保障基金的欠债对股市的影响。马克思说过，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价格。那么，工资中就应包括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费用。但是，过去30多年来，国有企业只发给工人生活费，其余部分由国家拿走，由国家承担这些方面的费用。现在由企业保障变成社会保障以后，国家应把这部分本应属于职工的钱拿出来作为社会保障资金。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据国家体改办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的精算，如果按目前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率、退休年龄、投资回报率计算，未来30年，总共有7.6万亿元的社会保障的债务。

国有企业的债务应当用国有资产来归还。卖出一部分国有股来补充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费用不足，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就是通过国有股减持来筹集社保资金。但是国有股减持实际是股市的扩容，它会使股市的供求关系向利空方向变化。最近一个时期内股市一蹶不振的状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减少国有股减持对股市的冲击，除了控制减持的力度和速度以外，学者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过30年欠的债务，何不分30年归还？

他们建议发行为期 30 年的国债来补充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费用，这就不必短期内从股市拿走资金，从而保持股市的稳定。

解决中国财政问题的出路

要改善财政状况最根本的是发展经济。国民经济发展了，在同样的份额下，财政的总量也会随之扩大。就财政本身来看，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认为，下面三个方面是必须的。

由政府职能决定财政规模。

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央财政困难是因为中央财政的规模太小，主张提高“两个比重”来扩大中央财政规模。即，将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20%，将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 60%。我觉得这样做缺乏根据。

财政收入的规模应当由财政支出来定。财政支出是政府活动的成本，即政府为履行其职能的代价。政府的职能是市场给出的，市场无效的地方就是政府活动的地方。

中央政府必须做哪些事？做这些事要花多少钱？这是确定需要多大中央财政盘子的唯一根据。在不确定事权的前提下，提高两个比重有点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或“事权”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组成：一是提供各种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如法治环境、政策体系、社会秩序、公益性的基础设施等等；二是为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而制定的制度上的干预的安排，如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等。这两方面都是市场无力做到的。

目前我国财政支出“越位”和“缺位”的情况同时存在。也就是说，给了一些不该给的钱，该给的钱没有给到。一方面，大量向竞争性领域投资，向一些营利性、经营性领域投资。这样做落下了“与民争利”的名声，实际上由于经营不善，大量投资收不回来。另一方面，应当由政府投资的地方却没有投资，使政府的职能没有到位。

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是，按照市场发育程度，划定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边

界，并据此确定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凡是市场能办的，政府就要退出，政府只做市场做不了又必须做的事。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中央财政的盘子需要多大，解决财政越位与缺位问题。

目前我国预算内资金虽然只占 GDP 的 15%，但由于有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存在，中国政府全部资金，已接近 GDP 的 30%。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50%，考虑到不少应由中央开支的让地方和农民开支了的情况，实际已经超过了 60%。再大幅度地提高“两个比重”就有点竭泽而渔了。

如果做好了以下几项工作，不必再大幅度地提高“两个比重”，政府在应该花钱的地方就不至于囊中羞涩：1. 把政府的事权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以内，把不该投资的钱减下来；2. 减少政府投资中的失误和浪费；3. 通过有效的机构改革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低行政事业经费；4. 用好预算外资金和非算资金。

由事权划分决定财权划分。

在需要政府负责的各项事务中，哪些需要中央政府做，哪些需要地方政府做，这在政府职能转换和财政分担中，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应当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财权，即在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的基础上确定各自的支出范围。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应当是清楚的。国防、外交、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支出，宏观经济调控，义务教育，全国受益的基础设施等，都是中央政府的事。而地方公共事务、地方的社会管理和地方局部受益的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的事。各级政府要做哪些事？做这些事要花多少钱？使事权和财权一致起来。

目前，一方面有些应由地方承担的事务，如地区性银行、邮电通讯业等都由中央包揽了，另一方面，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务，如国防武警的某些费用，部队粮价补贴、建设消防营房等却要地方财政掏钱。本应由中央财政承担的国民义务教育经费也由地方财政、甚至县以下财政承担，实际是农民承担。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上解中央后，职能职责范围丝毫没有改变，地方财政承担了一部分中央的开支。当然，中央财政也承担了一些

地方政府的开支，如中央财政支出名目繁多的专项拨款中就包含着不少地方财政应当承担的费用。

就地方政府而言，省、市、县、乡四级也要合理划分事权，建立与其事权一致的财政，以保证各级地方政府机器正常运转和地方公共开支的需要。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开始的设想是，在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的基础上划分收税权。设有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和地方设两个收机构。但实行起来不彻底，结果还是“分灶吃饭”。地区分割，各级行政机构膨胀，向农民乱收费，这些不良现象，都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有关。现在应当在1994年改革的基础上把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完善起来。

由政府投资变为社会投资。

在上海，一家民间公司——爱建信公司，做了原先必须由政府做的事，承担了外环隧道的建设工程。这个隧道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投资17亿元。这在上海早已不是新闻，“十五”期间，上海要修建650公里的高速公路，总投资400亿元，其全部项目都向国内外投资者招商。

这说明，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现在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当中，有不少可以向社会转移。除了竞争性行业的建设不必政府投资以外，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非义务教育的经费等，也不一定完全要政府投资。可以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在以后的经营中给投资者相应的回报。

财政这样做不仅减轻了财政负担，还使社会闲散资金有了合理的投向，有了增值的机会。现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苦于带不动民间投资。如果向民间资金开放一些领域，就可以促进经济繁荣。

过去财政投资有很大一部分用于产业政策，即政府确定某些优先发展的行业，通过财政投资来促进其发展。“产业政策”的效果本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过去在这方面成功的日本和韩国近年来已经显现出产业政策的不良后果。今后在这方面要不要投资，还需要讨论。

刊于《群言》，2002年1期

国债这块“大饼”能吃多久？

最近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政府发行国债，政府拿卖国债的钱用于投资，从而扩大消费、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发行国债的空间有多大？如果发行国债还有很大的空间，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多持续一些时间。不过，不搞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等于今后不再发国债。所以，探讨国债发行的空间，还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所谓国债发行的空间，就是指发行国债不能达到这个地步：国债连续发行到某一天，政府的财政节余不够偿还债务，又不能通过发行新国债来偿还旧国债（因通货膨胀压力，银行利率可能高于国债利率，没有人愿意买国债；提高国债利率财政又难以承受）。这时政府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印钞票，即恶性通货膨胀；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即政府信用破产。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不等糟糕到这种程度，群众就凭直觉做出了反应，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会提前出现。

2000年，朱镕基总理跟美国的前财政部长鲁宾在新疆见面，朱总理问鲁宾对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什么意见。鲁宾反问朱总理中国的国债的余额有多少，朱总理回答说12000多亿元，这包括了过去历年借的国债，占我国GDP的14%。鲁宾很干脆地对朱总理说：“这没有任何危险，离大家公认的警戒线20%还差得很远。”朱总理并不是因为鲁宾说了这个话就放心了，而是更看重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经济界对鲁宾的回答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

不赞同者认为，我国国债实际余额远远大于12000亿这个数字。如对公务人员的欠发工资；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经处置后的损失；国家统购

商品(粮、棉等)的亏损挂账；社会保障资金的亏空；税费改革后乡村政权的财政不足；国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债券，等等。把这些隐性债务和 12000 亿的名义债务加在一起，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有人估计为 70%—80%。有关专家认为，考虑隐性债务，国债总余额占 GDP 的比重，应控制在 90% 以下，目前还有 10% 左右的空间，其数额大约有 1 万亿。但这有限的空间不能全部用完，还要为今后发行国债留下余地。

也有专家认为，国债余额占 GDP 之比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是财政赤字对 GDP 之比，二是 GDP 的增长速度。如果财政赤字对 GDP 之比不超过 3%，GDP 的年增长速度不低于 7%，中国的财政就不会出现偿付危机。中国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 1998 年以前不到 1%，这三年持续上升，2000 年已达 2.8%，接近 3% 的界限。发行国债的剩余空间是不多的。

学界也有一些人坚持继续发行国债没有风险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都是参考指标，最根本的是看社会物质基础，有了丰厚物质基础，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现在社会上还存在着很多剩余生产要素，大量的闲置的厂房、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需要利用，粮食、资金也很充裕，发行国债带动社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经济发展了，GDP 的规模越来越大，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小，财政收支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偿还的债务相对也是一个小数。只要财政每年用于国债利息支出的增长幅度小于或等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那么国债的发行就具有可持续性。他们主张，不仅要发国债，还要发省级地方公债和城市建设公债，公债不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用于义务教育。

即使存在这种乐观的情况，政府还得审慎从事，采取稳健的政策。估计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以后，短期内不会再像这三四年那样大规模发行国债。不过，国债这种政府运作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今后还会经常起用的。

刊于《经济参考报》，2001 年 9 月

凯恩斯水土不服

凯恩斯来了，他是在中国经济最需要繁荣的时候来的，正如他当年到美国的时机一样。但中国的情况没有美国当年那么糟。当然，我不是说凯恩斯这个人真的来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已经作古了 54 年，我是说他的“主义”来了。

1998 年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四年下降。人们忧心忡忡，经济学家急忙从各种教科书中寻找药方。他们想到了挽回 30 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英雄。于是，中国经济界开始大谈罗斯福新政，凯恩斯这个名字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的频率顿时高了起来。

然而，两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同他来的时候差不多。他在中国的神通也没有在美国那样大。凯恩斯在中国“水土不服”。

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

1929—1933 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大危机。那时多数经济学家迷信市场经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地把经济从低谷中拉起来。而现实并非如此。30 年代整个 10 年平均有 18% 的劳动力失业，高峰时失业率达到 25%。人们在经济危机的黑暗隧道中煎熬着，看不到尽头。

大危机是对资产阶级的传统经济理论的大冲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能为力。

1934 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来到华盛顿。其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着手采取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的政策：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最

好的政策。按这种理论，罗斯福的政策就不是好政策了。新政要求新理论的支持。凯恩斯本来就不相信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他主张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他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的通论》那时正在酝酿之中。他到美国和罗斯福一拍即合，他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新政。在推动新政的同时，他的理论也在完善。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的通论》出版时，已经有了罗斯福新政的实践依据。

凯恩斯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政府必须想办法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刺激消费；企业界没有办法扩大投资，政府必须担当起投资的责任。政府从哪里弄钱来投资呢？实行赤字财政。他认为，在出现萧条时政府应当减少税收，增加支出，有意识地使预算出现赤字；当通货膨胀加剧时，政府增加税收，紧缩财政开支，取得财政结余，偿还萧条时发出的债券。

罗斯福新政运用财政、信贷两个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医治市场经济自发机制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痼疾。政策重点是用需求带动生产。办法之一是实行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调动闲置资本用于生产和消费。办法之二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

1929年，政府的总开支约为100亿美元，1933年，增加为130亿美元，1936年增加150亿美元。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民间投资也有起色。经过政府三年“注射”之后，国民总所得额与国民总消费额上升了50%，但政府的投资计划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程度，仍有900万人失业，直到二战期间政府投资扩大到1030亿元，就业问题才得以缓解。显然，美国经济在二战以后进入了黄金时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凯恩斯学说的功劳，但凯恩斯学说的影响是深远的。

凯恩斯在中国的遭遇

1997年夏天，市场疲软，连续几次降息对刺激消费毫无成效。中国的经济学家大概想起了凯恩斯当年说过的话：为了刺激经济，货币政策作用不大，得靠财政政策，因为你能“用绳子拉动，却不能用绳子推动”。于

是，中国经济学家表示：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只能依靠财政政策”。他们拿来了凯恩斯的办法，“运用财政或‘准财政’手段加大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性投资主要靠政府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1997年10月开始，物价水平开始负增长，经济不景气度进一步增加。1998年春天，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张被政府采纳，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罗斯福新政”。

凯恩斯终于被请到中国。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扩张性财政政策已付诸实施，当年国家财政直接投资1000亿元，1999年进一步扩大了财政直接投资。为此，政府大量举债：1998年年初计划发行国债2808.5亿元，下半年又追加了1002.5亿元。1999年初计划发行国债3415亿元，后又增发600亿元。政府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1999年国家财政为增加居民收入共支出540亿元，使全国8400万人受益。

应当说，凯恩斯理论对治理中国的通货紧缩起了一定的作用，它阻止了经济继续下滑。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1999年新增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但是，国民经济还没有走出不景气的阴影。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连续26个月负增长，企业经营困难。凯恩斯的根本目标是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恰恰在这两点上效果不佳。

政府投资没有带动民间投资，投资还很不景气。投资是拉动需求最重要的力量，投资不景气说明经济还没有启动起来。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1年—1998年分别为：23.9%、44.4%、61.8%、30.4%、17.5%、14.8%、8.8%、14.1%，1999年1—8月为10.4%。1998年的14.1%是在1997年过低的基础上的增长，对启动经济拉动力太小。1999年9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包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幅度为-2.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7.3%，10月开始回升，但回升乏力，到11月，固定资产投资仅增5.9%，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仅增长0.1%。

为什么民间投资没有带动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投资者无钱可赚。所能看到的商品都过剩，往哪里投资？需求不足抑制了投资。据权威研究

部门测算：2000年内需不足缺口为1800—2000亿元。这就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逻辑怪圈：投资不景气，需求不足。二者互为因果。

凯恩斯认为，提高居民收入可以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提高居民收入，消费需求还是扩大不多。其中也有中国的具体情况，收入差别太大，少数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需求；多数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没支付能力。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相比，其差额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1997年的3070.2元。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的差额，由1978年的99.2亿元扩大到1996年的23179.5亿元。占全国人口总数29.1%的城镇居民的储蓄占全国储蓄总额的80.1%，而占全国总人口70.9%的农村居民，其储蓄仅占全国储蓄总额的19.9%。占全国总人口70.9%的农村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只有全国居民消费额的三分之一强。1978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比值为2.9:1，1985年缩小到2.4:1，1992—1993年扩大到3.5:1，1997年为3.1:1。在城市居民中，占人口20%的低收入层和占人口20%高收入层差别是很大的。就家庭年收入而言，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倍。

凯恩斯来中国已经两年了，时间不算短，政策力度也不算小，为什么效果不显著？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橘生淮北则为枳

凯恩斯在中国遭遇不佳，是因为他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的“水土”和当年美国的“水土”相差甚远，要让凯恩斯在这里大显神通，那就勉为其难了。

美国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市场制度发达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之中，无法和美国相比。同样的政策思想在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美国企业对利率非常敏感，一次调整

0.25%就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中国利率调整几个百分点也看不出明显的效果。国有企业连本都不想还，还在乎利率高低？

美国以私有经济为基础，民间有大量的资金；中国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民间资金没有美国那么多，而且大多存在国家银行中，已经为政府所用。这是政府投资没有带动中国民间投资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企业不同于美国的企业。美国以私有企业为主，企业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企业还在吃国家银行的“大锅饭”。美国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解雇工人，中国企业不能。

中国的政府不同于罗斯福的政府。罗斯福 1933 年宣誓就职时，他在白宫的助手寥寥无几。一名厨师，一个电话员，若干保镖，几名秘书，还有两位应聘前来效力的南方新闻记者。当然，随着新政的实施，政府的机构和人员多了起来。但是，在他们那里，政企不分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扩张冲动也是没有的。在中国，政府职能过于宽泛，政企不分，官员们还是以追求虚的政绩为目标，国有企业还在吃国家的大锅饭，官员和企业对投资的效果不负责任的问题还没有根除。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难以避免。

在中国这个“水土”上，凯恩斯的扩张政策效果不显著还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的政策，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 GDP 的增长。这可能会出现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地方政府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最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可能会重复前些年的“紧缩—通胀—紧缩—通胀”的循环。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不良债务比重较大。在目前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银行的资产的质量降低了。这是因为：

通货紧缩→无法还本付息的企业增多→企业对银行不良债务更加严重→银行的可收回的债权缩小；

物价下降→银行对持币者的债务放大(从反面设想一下，如果物价上

升，银行对持币者的债务会缩小，几次恶性通胀就会把持币者的债权化为乌有)→银行债务相对增加；

将以上两项综合可知，通货紧缩使得银行债务增加，债权减少。债权是储户，债务主要是国有企业。其结果是银行对储户支付能力双重减弱，金融风险加大。银行的债务越来越重，它的债权又收不回来，怎么走出困境呢？通货膨胀是消除银行债务即剥夺持币者的债权人最有效的手段。如果通货膨胀1000倍，则银行的债务就消除了99.9%，也就是说，银行的困难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消除。这说明，我们存在通货膨胀的隐患。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手中持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币。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他们会立即要兑换成外汇。中国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寻求外汇以保值，在非常情况下，可以冻结老百姓的外汇存款，但不能阻止外资企业将人民币换成美元。与此同时，银行门前会排上挤兑的长龙，金融危机就全面爆发。今日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一旦爆发金融危机，老百姓的6万亿储蓄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好在政府比较清醒。中央曾经一再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期实行。最近朱总理在形势报告中一再强调，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有这一点老百姓就放心了，就不怕落实不了。

刊于《经济参考报》，2000年1月

何时欢送“凯恩斯”？

1997年夏天，市场疲软，连续几次降息对刺激消费毫无成效。中国的经济学家拿来了凯恩斯的办法：政府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用于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实现扩大内需。1998年政府采纳了这种意见，“凯恩斯”真正来到了中国。

今天，“凯恩斯”来中国已经三年多。三年来，国家发行了3600亿长期建设债券，直接带动了各种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大约7500亿元。有了这些资金，在基础设施中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现了转机，扭转了增长幅度连续多年下降的局面。2000年GDP增长了8%。今年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1%。今年经济增长比前两年更加平稳，估计上半年GDP增长8%，全年GDP增长幅度在7.5%—8%之间。

据有关部门测算，1998、1999、2000三年，国债以及国债带动的资金，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2和1.7个百分点。从这个数字看，凯恩斯主义对中国的经济的确起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并没有预期的那么显著。

1998年，政府在接受凯恩斯主义时曾经表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期实行。政府的这种表示是有根据的：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如可能会出现财政危机，债务和赤字过大，会导致支付危机，引发严重通货膨胀，资源配置中的计划和行政色彩会增强，强化了审批制的作用，抑制了市场的作用；政府投资效益会随着时间的持续而递减。这些，不仅是经济学的逻辑，也为有些国家的教训所证实。

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经济形势有了转机，再加上对凯恩斯主义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的忧虑，北京理论界的朋友们又在讨论一个新话题：什么时候欢送“凯恩斯”？

对这个问题，经济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其分歧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二是对凯恩斯主义不良后果的估计。

多数人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指标的好转是恢复性的，不能过于乐观，它主要是受短期有利因素的刺激，而不是内在因素的推动。经济增长内在动力不足，对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结构问题、体制问题还未解决。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有两种不同的对策。一种对策是，既然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应及早放弃，另找他路；一种对策是，要继续坚持以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功亏一篑，否则，可能使启动经济增长的努力前功尽弃。目前，后一种主张占主导地位。

坚持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人引证统计资料：新增存货在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比重 1997 年为 11.6%，1998 年降为 7.3%，1999 年继续下降到 5.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 1998 年和 1999 年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更多地体现在消化产成品库存，对当期生产的拉动作用不十分明显。现在消化存货阶段已基本结束，正在发挥拉动生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停止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今年不仅不能减少国债投资，而且为了保持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下半年还需增发 500 亿元国债。

那么，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呢？如果增发国债不是源于社会资金，而是依靠增加货币发行，如果国债主要用于消费支出，而不是生产建设，就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我们不是这种情况。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增加较多，金融机构存贷款差额较大。增发国债，实际是将一部分储蓄化为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会增加货币发行。当前，粮食等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供应充裕，物价走势稳定，所以，在近两年内，通货膨胀是不会发生的。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长远之策，总有一天要终止的。什么时候终

止呢？今年不会终止，明年可能还会持续，到后年，一定要欢送“凯恩斯”了。当然，“凯恩斯”不会是说走就走，而是逐渐“淡出”的。“淡出”过程可能要二至三年。

凯恩斯在中国淡出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已经摆开的在建项目，需要继续发行国债完成。估计还需 6000 亿左右的人民币。如果再发行两年国债，加上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就能满足需要。第二，什么时候公众需求能取代政府投资造成的需求，什么时候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不靠政府出资，就可以不发国债。逐步改变近几年政府投资主导推动投资增长的状况，形成今后国债投资停止后社会投资仍有力量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第一个条件比较简单，第二个条件需要调整结构和深化改革才能实现。

目前，政府和有关方面正在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创造条件。可以这么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就进入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中国的过渡时期。在这两三年期间的政策走势应当是，第一，加速完成在建项目的续建，不搞政府投资的新的基建项目；第二，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创造的空间，加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第三，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速资本流动和周转的速度；第四，加速改革投融资体制，畅通民间融资渠道，采取多方面措施促进社会投资增长；第五，改进收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大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写于 2001 年 6 月

<<<<<<

中国财政：提高两个比重必须慎行

近年来，在不少谈论财政的文章中，主张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他们主张提高到 20%)，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主张提高到 60%)。十年以前，我同意提高两个比重。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再提高两个比重，会带来不良后果。

中国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 (%)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财政收入/GDP	12.6	11.2	10.7	10.9	11.6	12.6	13.9	15.0
中央财政收入 /全部财政收入	22.0	55.7	52.2	49.4	48.9	49.5	51.1	52.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有的学者列出了大量的外国数据，证明我国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这是他们主张提高两个比重的根据之一。问题在于，他们所引用的外国数据和中国没有可比性。

首先，我们统计年鉴上的两个比重，只计算预内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非预算收入没有包括在内。我在下面将谈到，如果用政府全部收入计算，则占 GDP 的比重高达 30%左右，这个比重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接近有些发达国家。

其次，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包括社会保障税在内，我们不包括。欧洲有些国家社会保障税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所以有的国家财政收

入占 GDP 的比重高达 50%以上。

再次，发达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比很大，中央财政虽然比例大，但其中相当多一部分用于向地方转移支付，而我们的转移支付数额很小。

实际上，我们的财政集中度已经很高，如果再提高两个比重，就可能竭泽而渔了。

财政增长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

财政收入的增长来源于国民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应当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大体同步。

但是，自 1994 年实行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幅大大高于 GDP 的增长幅度，其中，1999 年高达 3.35 倍。（见下表）

GDP(当年价)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GDP 增幅	30.0	35.0	25.1	16.1	9.7	5.2	4.75	8.9
财政收入增幅	24.8	20.0	19.6	18.7	16.8	14.2	15.9	17.0
财政弹性系数	0.82	0.57	0.78	1.16	1.73	2.73	3.35	1.91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 数据计算

我国近年来税收占财政收入的 93%以上，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财政负担重是因为税负重。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从统计数字看，我国的名义税负不高。1993 年以来，各项税收占 GDP 的比重最高为 12.3%，最低为 10.1%。但从增长率上看，税收的增长率和 GDP 的增长率之间比例不当。中国人民大学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和税收基本能力非线性分析模型测定后认为，现阶段我国人均 GDP 每增长 1%，税收应增长 0.8146%（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课题组，见《经济研究参考》2001 年 19F-3）。1996 年以来的实际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值。（见下表）

GDP 增长率(当年价)、名义税收增长率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GDP 增幅	30.0	35.0	25.0	16.1	9.7	5.2	4.75	8.9
税收增长率	29.1	20.5	17.8	14.4	19.2	12.5	15.3	17.8
税收弹性系数	0.97	0.585	0.712	0.894	1.98	2.40	3.22	2.00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 数据计算

必须指出的是,上面的数字只是预算内财政收入,这只是政府全部收入的一部分。“政府全部收入”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外财政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如各种收费等)。中国的政府全部收入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没有准确数字。财政专家们的估计,最高的达 GDP 的 30%以上(米建国,1996),较高的占 GDP 的 30%左右(刘普照,2001),最低的占 GDP 的 25%(财政部)比财政部稍高的为 26%(杨之刚,2001)。我们不取最高,也不取最低,仅按 28%的比例计算,则 2000 年政府的全部资金为 25033 亿元。

政府从社会剩余产品中抽取过多

政府全部收入只能是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产品总价值就是产出大于投入的那一部分,即在社会总产值中扣除物质消耗、职工工资和农民收入以后的剩余。如果政府全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拿走过多,就是涸泽而渔。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通过对近 10 年情况的实证分析,我国剩余产品总价值占 GDP 的比重大约在 31%~33%之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课题组,见《经济研究参考》2001 年 19F-3)

我们取剩余产品价值量占 GDP 的 22%、取政府全部资金占 GDP 的 28%计算,可列出下表:

政府全部收入占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比重

	国内 生产总值 (亿元)	剩余 产品总价值 (亿元)	预算内财政收入		政府全部收入	
			数额 (亿元)	比重 (%)	数额 (亿元)	比重 (%)
1993	34634.4	11082.88	4348.95	39.22		
1994	46759.4	14974.53	5218.10	34.8		
1995	58478.1	18712.99	6242.10	33.35		
1996	67884.6	21723.07	7407.99	34.10		
1997	74462.6	23828.032	8651.14	36.3	20849.5	87.5
1998	78345.2	25070.46	9875.95	39.4	21936.7	87.5
1999	82067.5	26261.6	11444.08	43.5	22978.9	87.5
2000	89403.6	28609.15	13395.23	46.82	25033.01	87.5

注：后两栏中的“比重”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剩余产品总价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的数字计算。

由此可见，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 87.5%，留给社会的剩余产品价值只有 12.5%，国民经济负担已经很重。

政府从社会剩余产品中抽取过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第一，社会投资能力差，居民消费能力低，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障碍。最近几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带动不大，其原因之一是社会剩余产品被政府过多地占有。

第二，削弱了社会再生产能力，影响技术进步。企业由于负担过重，有的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有的城市连设备折旧费也不提，连老本也吃光了，更没有钱花在技术进步方面。

第三，在行政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财政过度集中强化了行政垄断，缩小了市场活动空间，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第四，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现在，中央政府靠财政维持，地方政府靠收费来维持，费的负担更重。“一税轻，二税重，三费四费无底洞”，“八个大檐帽，围着一个破草帽”。有的地方采取种种强暴手段横征暴敛：牵走农民牲畜、拆房、切断照明电路、勒令子女停学、罚款、限制人身自

由、罚做劳工等，这些使矛盾激化，频频引起群体事件。

地方财政比中央财政更困难

学者们主张提高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重，把更多的资金集中到中央。实际上，地方财政比中央财政更为困难，其中最困难的是县乡两级。国家法令规定，地方政府不能成为法定的借债主体，但实际上负债累累：

1. 省级政府的外债沉重。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以及各类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数额巨大。湖北省 1999 年 3 月末利用外国政府项目中，有 37 个发生还款拖欠，拖欠本息 1.6 亿美元。

2. 地方政府担保的大笔债务。如宜昌市直属财政为企业担保的贷款达 10.8 亿元。

3. 财政赤字和历史挂账不堪重负。各级地方财政许多应支未支、已支未报的支出长期积累，是一个无法统计的庞大的数字。

全国 2470 个县级单位，40% 以上是赤字，县级不能发债券，只好向其他途径借债或拖欠工资。河北省在 1998 年以前累计欠公教人员工资 9.66 亿元的基础上，1999 年当年欠发 3.41 亿元，2000 年 1—8 月新欠 4.33 亿元，共欠 17.2 亿元。2000 年底，安徽省有 30 多个县拖欠工资，累计拖欠工资总额 14.4 亿元。乡村级财政更为困难，有人估计，平均每个乡有 400 万赤字，全国 4 万多个乡就有赤字 1776 亿。平均每个村 20 万赤字，全国村级就有 1483 亿赤字。乡村两级财政赤字达 3259 亿。乡村级财政困难最终通过各种收费落在农民头上。有关部门统计，2000 年前后，各种向农民征收的项目达 149 项之多。中央规定的农民负担不能超过其收入的 5%，但据农业部不久以前对湖北荆门的一项调查，当地农民负担平均占农民收入 10% 左右，人均负担 300 元。这还不包括义务工及乡镇摊派的报刊费用。为了缓和农村的社会矛盾，国家准备实行税费改革(适当提高税负，取消各种收费)。但是，取消收费就切断了乡村财政的来源，乡村政权无法维持，基础教育也只好停顿。据安徽芜湖调查，税费改革前，村级平均收入

大约5—6万元，税费改革后，仅为2万元左右，其中不足2万元的行政村占36.2%。村级机构正常运转至少得3万元，此外还得偿还债务。因此，税费改革在安徽试点以后，不能向全国普遍推广。

中央财政困难不在于两个比重过低

现在，中央财政的确比较困难，政府该投钱的地方没有能力投入，使得政府的功能不到位。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高达60%以上。但是，解决中央财政困难的出路不是提高两个比重，不是加大对社会的榨取力度，而是要通过发展经济和制度创新的途径来解决。

如果做好了以下几项工作，不必再大幅度地提高“两个比重”，政府在应该花钱的地方就不至于囊中羞涩：

1. 把政府的“事权”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以内，把不该投资的钱减下来。
2. 减少政府投资中的失误、浪费和漏失。
3. 通过有效的机构改革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低行政管理费用。
4. 调整政府收入结构，规范政府收入形式，用好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当前下面三个方面的工作必须尽快做好：

由政府职能决定财政规模。财政收入的规模应当由财政支出来定，而不是事先确定占GDP多大的比例。财政支出是政府活动的成本，即政府为履行其职能的代价。政府的职能是市场给出的，市场无效的地方就是政府活动的地方。

中央政府必须做哪些事？做这些事要花多少钱？这是确定需要多大中央财政盘子的唯一根据。在不确定事权的前提下提高两个比重是本末倒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或“事权”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组成：一是提供各种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如法治环境、政策体系、社会秩序、公益性的基础设施等等；二是为维护社会公平而制定的制度上的干预的安排，如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等。

目前我国财政支出“越位”和“缺位”的情况同时存在。给了一些不该给的钱，该给的钱没有给到。一方面，大量向竞争性领域投资，向一些营利性、经营性领域投资。这样做落下了“与民争利”的名声，实际上由于经营不善，大量投资收不回来。另一方面，应当由政府投资的地方却没有投资，使政府的职能没有到位。

在政府没有到位的部门，义务教育最令人关注。义务教育是再分配的果实，不是初分配的果实，在再分配中，不管富人和穷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管居住在什么地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再分配，指国家财政拿钱。教育上的不平等是最根本的不平等。现在中国教育上的不平等情况已经很严重。不平等的原因是义务教育在再分配的“筵宴”上没有应得的席位。

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是，按照市场发育程度，划定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边界，并据此确定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凡是市场能办的，政府就要退出，政府只做市场做不了又必须做的事。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中央财政的盘子需要多大，解决财政越位与缺位问题。

由事权划分决定财权划分。中央财政收占整个财政的比重，也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来决定的，不能主观地、先验地确定一个比重。在需要政府负责的各项事务中，哪些需要中央政府做，哪些需要地方政府做，这在政府职能转换和财政分担中，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应当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财权。即在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的基础上确定各自的支出范围。国防、外交、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支出，宏观经济调控，义务教育，全国受益的基础设施等，都是中央政府的事。地方公共事务、地方的社会管理和地方局部受益的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的事。

目前，一方面有些可以由地方承担的事务，如地区性银行、邮电通讯业等都由中央包揽了，另一方面，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如国民义务教育经费也由地方财政、甚至县以下财政承担，实际是农民承担，甚至连国防武警的某些费用，部队粮价补贴、建设消防营房等也要地方财政府掏钱。地

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上解中央后，职能职责范围丝毫没有改变，地方财政承担了一部分中央的开支。当然，中央财政也承担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开支，如中央财政支出名目繁多的专项拨款中就包含着不少地方财政应当承担的费用。

由政府投资变为社会投资。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现在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当中，有不少可以向社会转移。除了竞争性行业的建设不必政府投资以外，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非义务教育的经费等，也不一定完全要政府投资。可以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在以后的经营中给投资者相应的回报。

过去财政投资有很大一部分用于产业政策，即政府确定某些优先发展的行业，通过财政投资来促其发展。“产业政策”的效果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过去在这方面成功的日本和韩国近年来已经显现不良后果。政府今后在这方面要不要投资，还需要讨论。

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11月

<<<<<

凯恩斯依赖症

这里说的凯恩斯是指凯恩斯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当今中国实行的时候，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现在，凯恩斯来中国已经五年，还没有离开的势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凯恩斯依赖症。

离了凯恩斯就不行

经济常识告诉我们，积极财政政策(实际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在特殊的时期内使用的特殊的手段。道理很简单，因为积极财政政策是赤字财政，不能作为长期政策实施。

在这个政策实行之初，政府也曾明确表示，这是一个短期政策，是一种救急的办法，不会长期实行。当时人们预计为，凯恩斯在中国能呆两年到三年时间。

凯恩斯政策就是用政府投资来拉动需求。政府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发行国债。1998年到2001年底，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5100亿元，安排国债投资项目8600项，投资总规模2.4万亿元，已完成投资额1.5万亿元。2002年，又发行了1500亿元的国债，又安排了一批项目。这一措施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在1.67个百分点左右。按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总量中的比重为：20%、28%、21%和20%。

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GDP的

比例增长到 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达 65% 左右。这组数据表明，最近几年 GDP 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的，其中，国债投资又是主要推动力。

因此，人们几乎一致地说，国债投资功不可没，没有它，经济增长速度一定大幅下滑。这句话可以换成另一种说法：国民经济增长对国债投资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

然而，经济增长不可永远倚仗财政扩张。2001 年春天和 2002 年春天，财长项怀诚两次公开谈到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

但事实上难以淡出。因为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依赖太重了。一旦停止扩张性财政政策，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银行不良债权随之上升，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这种离开凯恩斯政策就会出现危险的状况，我称之为“凯恩斯依赖症”。正如人体对某种药物的依赖症一样，是一种病态。

当今所有主张继续实行凯恩斯政策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由：离开了这个政策就要出危险。这种说法，实际是承认国民经济患上了凯恩斯依赖症。例如，对中国宏观经济颇有研究的余永定先生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 GDP 增长趋缓，国债占 GDP 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这位自称“非常支持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学者，明确道出了凯恩斯依赖的症状。但他用“收敛说”来回避凯恩斯依赖症的危险。实际上“收敛”的前提条件不存在，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 3%，这还不算隐性赤字。

自主增长机能障碍

凯恩斯依赖症是因为经济机体内部没有形成自主增长机制，只能靠外力推动其增长。外部供给一停止，就会出现停滞。这个“外部”就是通过国债方式吸收的民间资金。

内部缺乏自主增长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债投资对 GDP 的拉动效应日益降低。上面列举的国债投资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国债投资在总量上的持续增加并没有带来 GDP 的相应增长幅度。国债投资所带动的 GDP 的增长幅度和国债投资本身的增长幅度相比，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同样的拉动效果，需要发行更多的国债，“瘾”越来越大了。

国债投资的增加没有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2001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 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为 8.1% 和 12.7%，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28.45%，政府投资是社会投资的主要来源。

民间资本带动不起来，既说明国债投资的乘数不高，更说明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者很难找到有可靠回报的投资领域，人们没有办法让大量闲置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压抑。国债投资一旦退出，民间资本很难填补其留下的空缺。

内需没有真正启动起来。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启动内需，但事与愿违：有关单位对 2002 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商品供求情况进行了排队分析，结果显示，600 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 82 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 13.7%，比 2001 年下半年减少了 3.4 个百分点；供大于求的有 518 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 86.3%，比 2001 年下半年增加了 3.4 个百分点。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越依赖越不能自主增长

2000 年年初，我曾发表过一篇小文，题为《凯恩斯在中国水土不服》。说的是，凯恩斯当年在美国的条件和今天在中国的条件大不一样，在中国实行凯恩斯政策，可能出现“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情况。美国的水土是民本经济，凯恩斯政策改善宏观环境，有助于民本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水土是国本经济，凯恩斯政策有可能助长政府行为的扩张，抑制民本经济的成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业已打破、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建立的情况下，只有加速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自主增长的内在机制才能形成。可

是，凯恩斯政策，是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越是依赖凯恩斯，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低；配置资源的效率越低，经济就难以自主增长，就越依赖凯恩斯。凯恩斯政策用的时间越长，对它的依赖性就越强。这种正反馈，才是凯恩斯依赖症最本质的表现。

凯恩斯政策实施几年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比例越来越提高，民间经济的活力相应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旧体制的某些方面乘机借尸还魂。凯恩斯政策的目的是调动社会闲置资本用于生产和消费，而最近四五年，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闲置状况更加严重。其中，银行存差数就达数万亿元，银行的贷款放不出去，资金不能为发展经济所用。

1998年以来发行的6600亿元的国债以及相应的配套贷款，大部分转化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资产。这些资产是民间资本转化来的。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效率，通常是低于民有经济的效率。大量资本从效率高的部门转向效率低的部门，国民经济就更难进入良性循环。

广大群众消费不足是造成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而消费不足与收入差距拉大有密切关系。富人有购买力，但其收入的消费比例低；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却助长了收入差别的扩大。少数有钱人买走了国债的大部分，他们享受国债的利息。政府投资的项目大规模增加，某些主管官员们就有了更多的取得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机会。据国家计委对427个重点国债项目的稽查，共查出挤占建设资金的项目100多个，违规招投标项目107个，存在质量隐患的项目85个。“问题项目”比例之高令人震惊。在这些“问题项目”中，多少灰色和黑色收入流进了个人口袋？

行政垄断加强，应当是实行凯恩斯政策的后果之一。目前，我国主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几乎都被行政性垄断所控制。行政垄断造就了一个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电力、通讯、铁路、民航、邮政等。这些利益集团，常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进入。他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妨碍市场力量配置资源。这些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社会和大众的利益。正是这些利益集团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和完善。

近几年来，舆论上天天喊反垄断，垄断反而更严重了。宣传报道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大增，有数字为证。但稍加分析后得知，我国企业利润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大户，多数企业状况不好。去年11月末的数字是，企业盈利的82.6%集中在22家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盈利合计占重点企业盈利总数的58%。

计划经济的权力扩张，市场经济的利益冲动，二者结合就是行政垄断的加强。在中国这种条件下，凯恩斯政策的实行，有可能集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

尽快医治凯恩斯依赖症

凯恩斯依赖症使原来阻止经济下滑的应急政策变成了中长期政策。目前这个政策结束无期。如果不尽快医治凯恩斯依赖症，会带来极大的危险。

凯恩斯依赖症将使财政赤字无限扩大。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1998—2001年则分别达到922.23亿、1743.59亿、2491.27亿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到了2001年，财政赤字已经是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到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如果让扩张性财政政策继续下去，财政赤字还会飙升。

由于国债投资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效益，使得投资难以回收，中央财政不得不举债度日，债务依存度在1998—2000年分别为60.4%、61.1%和53.5%。中央财政债务偿还压力越来越大，举债的规模也不得不越来越大。国家财政的债务连年上升，1995年1510亿元，1997年2400亿元，2000年4000亿元，2001年5000亿元。2000年底，内债余额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1500亿美元。内外债加起来共25000亿元人民币。到2001和2002年，债务余额又持续增加。

上述数字还只是显性债务，此外还有大量的隐性债务，如欠发工资、

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养老保险欠账，等等。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所有的政府债务(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积累，已经达到了GDP的100%。欧洲国家的经验数据是，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我国财政专家认为国债余额应当控制在30%以下，加上各类隐性债务应控制在70%以下，再加上种种或然债务应控制在100%以下。我们的债务也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所幸的是，由于有丰厚的居民储蓄，财政赤字可以向老百姓卖国债来弥补，不必通过银行渠道来补财政窟窿，因而不必大量印钞票从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但是，金融风险还是加大。国债投资项目，通常需要地方向银行贷款作为配套资金，银行贷款是以财政作担保的。相当一部分项目收益低或者根本没有收益，因此，还贷难就成了问题，银行坏账势必增加。五年以前，戴相农行长说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为20%，这几年，国有银行向四家资产托管公司转移了1万多亿不良债权以后，不良债权应当大幅度减少，但最近戴行长公布的不良债权的比例为26%，比几年以前还高出了6个百分点。

看来，凯恩斯依赖症不根治不行。怎样根治呢？凯恩斯依赖症的病根是“以民补国”，即将民间财富为国家所用，从而抑制了民间经济，抑制了国民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力。医治凯恩斯依赖症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以国扶民”，即政府大力扶持民间经济的发展，使民间经济能迅速填补国债撤走后的空间，成为真正的内在增长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产权制度、企业制度、银行制度、投融资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彻底的市场化改造。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凯恩斯依赖症的好转有待于内部自主增长机制的形成，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应是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但治疗措施上却不能从缓。

写于2002年5月

宏观 经济

<<<<<

上游干涸，下游泛滥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河，那么能源、原材料就是河的“上游”。按常规，上游产业的生产能力理应稍大于下游产业的生产能力。但是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却向相反的方向迅猛发展，人们形象地比喻为“上游干涸，下游泛滥”。这种“经济病”在中国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曾经表现得十分突出。

原料！原料！

原料！原料！到处都是紧急呼唤着原料。

1988年夏，21家电缆厂厂长联名写信给国家计委和物资部告急：缺铜少铝，电缆厂面临停产的威胁。

8月下旬，有3000多名职工的天津铝制品厂一片死寂，由于没有原料，机器设备停止了转动。全国94%的铝制品厂因缺铝锭被迫停产或半停产。

羊毛短缺。不仅不产羊毛的北京毛纺织行业用毛94.3%靠进口，就是我国第四大羊毛产区的甘肃所需羊毛也要进口，第三大羊毛产地青海省，计划内供应的羊毛只能满足2/3的需要。

轮胎厂缺乏橡胶，卷烟厂缺乏烟叶，纺织厂缺乏棉花，糖果厂缺乏白糖……几乎整个加工制造业都面临原材料的匮乏。

不仅仅是原料短缺，能源、交通以至整个基础产业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东南沿海因煤炭短缺发不出电，致使不少企业不得不每星期“停二开五”或“停三开四”。

寻求原料、燃料成了各企业、各城市的一项首要而艰难的任务。过去，上海市派一个科长出去就行了；现在，市长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

供求过度紧张，使原料的市场价格暴涨。1988年9月，电解铜的市场价格每吨已高出计划价格的3.27倍，为国际价格的1.38倍；铝的市场价格为计划价格的4.58倍。由于中国的进口量大，使国际市场价格上升。1987年我国进口羊毛的价格已相当于1984年的3.2倍。

原料短缺的深层：产业结构失衡

我曾到青海牧区探访羊毛紧张的根源。在青海湖附近的一个牧场，我见到的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而是不到半寸长的焦黄小草，稀疏地点缀在苍茫的原野上，瘦弱的羊群艰难地啃着地皮！据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在我国十大牧区并非个别。从60年代起，我国的可利用草场已退化1/3，退化面积约10亿亩。草原退化，牧草产量下降，羊群冬瘦春死成为普遍现象。全国的羊毛收购量从1980年的15.9万吨下降到1987年的13.6万吨。一极是羊毛减产，另一极是毛纺织业急剧膨胀。1980年全国只有毛纺锭60万只，1987年增加到199万只，一年需原羊毛60万吨，超出国内羊毛产量数倍之多！

这种两极失衡现象不仅发生在与羊毛有关的产业。有人分析了全国铝的加工能力、冶炼能力和矿山能力，发现它们之间的比例大约为1:0.75:0.5。这说明，铝加工能力大大超过冶炼能力，冶炼能力又超过了矿山能力。铝加工业却不顾这一现实，其生产能力还在继续膨胀。

1987年底，全国有棉纺锭2600万只，需棉花450万吨，当年收购棉

花仅 310 万吨；而棉纺锭预计 1988 年底将突破 2800 万锭，正在建设的还有 400 万锭。

机械行业对钢材的需求量大于轧钢能力，轧钢能力大于炼钢能力，炼钢能力又大于矿山能力。我国拥有金属切削机床 340 多万台，每台机床拥有的钢材只有日本的 1/10，美国的 1/4，苏联的 1/2。由于钢材不足，金属切削机床利用率只有一半。

1981 年到 1987 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9.4%，而能源工业平均每年仅增长 4.6%，两者比例倒挂为 2:1。

为了使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基础产业应该有一定的超前发展。经济学家用“基础产业超前系数”（即基础产业的产值增长率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之比减 1）来评价这一情况，基础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则系数为正值，反之则为负值。

我国的超前系数都是负值。以 1981—1985 年间为例：原煤为 -0.36，原油为 -0.7，发电量为 -0.42，成品钢材为 -0.43，供水为 -0.02，公路铺设为 -0.04，铁道铺设为 -0.05。专家们认为，最近 3 年超前系数离正值更远了。

不合理的比较利益：产业失衡的根源

云南省烟草公司负责人扳着指头对我算了一笔账：如果卖烤烟可得利税 1 元，则加工成烟卷卖可得利税 6 元。因此，近几年云南省卷烟工业发展很快，卷烟产量由全国第六位跃居第一。1987 年全省财政收入中，烟草公司的利税占 68.8%。

在我国，各产业之间没有形成平均利润率。加工工业产品，特别是最终产品，比基础产业的利润率高得多。烟草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是如此。轧钢行业利润率高于炼钢行业，印染行业的利润率高于纺织行业。这种不合理的利润率是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造成的。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比价不合理，使原材料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加工工业中去了。搞加工工业投资

少、见效快，投入的资金很快就能收回；而基础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十年八年内难以得到实惠。这样，人们自然就把生产要素投向在短期获得较大利益的加工产业。这是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

当然，加工工业和基础工业之间利益不合理的状况，十年以前就存在，为什么过去矛盾没有现在尖锐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过去被掩盖的矛盾强化了，表面化了。

首先，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实行财政上“分灶吃饭”，对企业也实行利润承包。这带来了两个与产业结构变动相关的后果：其一是强化了各地区、各企业的利益观念。过去产业之间利益不合理，赔钱赚钱都是国家的。现在不同了，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多少，一个企业的利润多少，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既是行政主体，又是利益主体，他们利用行政权力和地方经济力量，使加工工业奇迹般地膨胀。其二是随着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地方和企业所控制的财力相对多了，国家直接控制的财力相对减少。预算外收入过去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现在它和预算内收入平分秋色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一般是要国家投资，而国家直接控制的财力相对少了。预算外收资金是分散在各地区、各企业的，总额虽然巨大，但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资金并不多，它不可能投向需要巨额投资的基础工业，只能投向加工工业。因此，最近几年，绝大部分省份基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加工工业所占比重上升。江苏省采掘工业加上原材料工业的比重在1982年为14.3%，1987年下降到12.8%，而同期加工工业的比重由85.7%上升到87.2%。

其次，改革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改革以前，在工业系统中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比重很小，其他成分几乎没有。在国有经济内部，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对利益的差别不敏感。最近几年，集体所有制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这类企业对利益差别很敏感，绝大部分资金投向了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江苏省乡、村两级工业总产值1987年达656.45亿元，比1978年增长9.35倍，几乎全是加工工业，江苏基本不产羊毛，而乡村两级企业毛纺产值达25

亿元。现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有1/4来自乡镇企业。在乡镇工业就业的农民达数千万人，这么多的劳动大军转向加工工业，是要相应的基础工业来承担的。然而，在工业的筵宴上，事先并没有安排他们的席位。

高涨的消费热，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牵动，是加工业迅猛发展的第三个原因。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给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1987年，全国居民储蓄余额和手持现金达4400多亿元。这一购买力，需要6850多亿元的商品才能平衡。但是，全社会零售商品的货源只有6100多亿元，还有740多亿元没有着落。加工工业直接受到消费品市场强大牵动，它比基础工业反应敏锐得多。到1986年，就已形成彩电生产线113条，电冰箱生产线116条，洗衣机生产线108条。1978年全国仅生产彩电3800台，1988年达900万台，而需求量是1900万台。无论是回笼货币还是繁荣市场，都需要加工工业，尤其是消费工业的发展。

产业失衡的沉重代价

加工工业超过基础工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

代价之一，大量生产能力的闲置。上海市有关部门对该市的1700家国有企业分析，仅因原料不足，生产能力闲置1/3。如让这1/3的能力运转起来，一年可以增加200多亿产值，25亿元的财政收入。有人估计，因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全国大约有40%的工业生产能力闲置。如果让这部分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作用，一年可以多创造4000多亿元的产值，500亿左右的利润和税收。但令人不安的是，大家并没有想办法利用这部分闲置生产能力，而是在闲置生产能力的大军中，不断增加新的成员，继续增加加工业的生产能力。

代价之二：众多加工企业依靠进口原材料支撑，造成大量外汇流失。我国每年进口钢材耗外汇上百亿美元，进口净羊毛十多万吨，进口羊毛的织物3/4在国内消费。40多条易拉罐生产线，如果全部开动起来，每年需要两亿美元进口铝材。家用电器行业也需要巨额外汇进口器件维持生产。

江苏省 70% 的外汇用于进口原材料，这还不包括在江苏的中央企业进口原材料所需要的外汇。

代价之三：加剧了加工工业和基础产业之间的摩擦，也给不法分子以种种可乘之机。目前，我国的原材料实行“双轨”价格。生产原材料的企业抱怨：80% 以上的产品被国家按低于市场的计划价格调走了，差价损失太大；加工企业则抱怨：国家给的平价材料只能满足 20% 的需要，80% 的材料是以市场价购进的。供求双方所说的比例都没有错，这是产业结构失衡造成的比例错位。比如，原材料工业的生产能力是 100 吨，它的产品有 80% 按计划价格调出，则加工工业得到了 80 吨计划价格材料。由于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不是 100 吨，假定是 240 吨，这 80 吨计划价只能满足它 30% 的需要，另外 70% 的原材料需要按市场价购进。再加上“官倒”、“私倒”作乱，把一部分计划价原材料按市场价格卖出，加工工业拿到的计划内原材料就不到 30% 了。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暴涨，必然会推动加工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带动了原材料价格上涨。二者互为因果，相互推动，成为难以遏制的浪潮。产业结构失衡越严重，原材料价格缺口就越大，市场价和计划价的差距就越大，投机分子谋利的活动范围就越大，市场就越混乱。

代价之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是造成国民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因素，而产业结构不合理又是这一矛盾的深层原因。一旦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一旦加工工业膨胀到基础产业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不得不进行调整：压缩需求，对某些加工工业实行关、停、并、转。但是，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深层原因，即产业之间利益不合理的原因没有解决，膨胀暂时压抑以后，再度膨胀和趋势依然存在。膨胀，紧缩，更大的膨胀，再一次紧缩……如此循环往复，使国民经济出现周期性的震荡。

加工工业超过基础工业的过度膨胀，造成不良后果是深远的。“毛纺热”，大家都搞毛纺；“家电热”，大家都上家电；“汽车热”，一拥而上搞汽车……原材料基地将原料就地加工，加工工业基地又被迫上原材料工业。结果是，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各省都搞自己的小循环，全局的大循环受阻。这样，不仅各地区之间不能实行合理分工，生产力不能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合理布局，还造成市场分割，全国的统一市场不能形成。加上各省财力有限，各自上马的加工工业都不能达到经济规模，经济效益低下。

都来根治“产业结构失衡症”

怎样根治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失衡症”？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而复杂的问题。

应该说，我们很早就有医治“产业失衡症”的愿望，为什么经济发展的现实与我们的愿望南辕北辙呢？某省一位计委主任回答说：“我们有调整结构的愿望，没有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这话一针见血。

产业政策是一组综合政策体系。它是价格、财政、税收、外贸等各方面政策组合而成的。这些政策相互协调，形成一股合力，产生一种合理的比较利益，促进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特别是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并且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产业政策还没有制订出来。

就价格而言，目前我国铝的计划价格仅仅相当于国际市场价格的1/3，铜是44%。这样，一些品位较低的矿山开采成本较高，国家低价收购产品，企业得不到利润甚至亏损，只好放弃不采，浪费了资源。云南省计委一位同志指出，如果将铜的计划价由每吨1万元调到8000元，这个省一年可以多产1.2万吨铜。更重要的是，调整基础产业和加工产品的比价，使基础产业能获得比加工产业更多的利润，就能够把生产要素从加工工业引到基础工业中来。

税收对于扶持基础产业、抑制加工工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杠杆。当前，对国内短缺资源急需限制消费、限制出口的税收政策。铝、铜国内如此短缺，1988年1—9月出口铜和铝却分别是1987年出口量的几十倍和两倍。现在国家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已明令禁止紧俏的原材料继续出口，铜火锅、铝门窗、易拉罐急剧膨胀，是缺乏税收约束的缘故。对这类经济行为应该课以重税，使之无利可图，对基础产业减免税，使之获得较大的利

益。

产业失衡是一种综合症，需要综合治理。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要医治产业结构病，先得医治各级决策者的“近视症”。产业结构病的产生有其经济机制的原因，更有人们只顾眼前、急功近利的原因。不顾基础产业薄弱，都去搞现得利的加工工业；不顾资源短缺，大力鼓励消费，甚至搞短缺资源出口；单纯从眼前财政收入着眼，不给加工业以调整产业结构的喘息机会等都是近视症的表现。很多人只批评企业的短期行为，但也有专家认为，最根本的是国家的短期行为。不解决国家的短期行为，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就难以解决。

在当前治理经济环境工作中，要考虑到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要明确认识到，所谓经济过热，实际是加工工业过热和消费过热；所谓固定资产投资失控，实际是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失控；所谓短缺经济，最根本的是基础工业产品短缺。在治理经济环境中，如果有强烈的产业结构意识，对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加以区别，治理经济环境可成为医治“产业结构失衡”的一剂良方。否则不加分析地搞“一刀切”，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刊于《瞭望》，1988年第1期

<<<<<<

跷跷板，两头翘

有人说，物价上涨和就业不足像一个跷跷板，压下了这一头，必然跷起另一头：想降低物价，就会影响就业；想提高就业率，物价就会上涨。这种比喻反映了一定的经济现象。

1988年，我国零售物价指数达18.5%，为了把价格压下来，从1988秋天开始，就压缩基建规模，收紧银根。结果是，物价压下来了，市场也疲软了。产品卖不出去，生产下降，效益降低，大批企业开工不足，就业问题接近最严重的1979年。为了使经济复苏，从1989年11月起，国家大批注入启动资金，两年后，经济果然回升了。但随之而来的是1992年经济过热，1993年到1995年，连续三年物价大幅度上涨，1994年物价达到21.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为了把物价压下去，又是抽紧银根，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结果，物价还没有完全压下去，就造成了一大批企业开工不足，不少工人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到。

这时，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物价上涨是主要危险，还要继续抽紧银根，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另一种意见认为，就业不足是主要危险，主张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持两种意见的人玩起了跷跷板的游戏。

从经济学的常识来看，这个跷跷板有它一定的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需求超过了供给，价格必然上涨。要控制物价，就得控制需求。而银根紧了，社会上钱少了，需求也就下降。需求下降，生产必然跟着下降。生产下降，就业机会就会减少。

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抑制物价上涨和解决就业不足这两个问题确有矛盾之处。但是，如果只把就业和物价作为“跷跷板”，你高我低，我高

你低，那就有点简单化。影响就业有多种因素，影响物价也有很多种因素。近一两年的物价上涨，并不像1988年那样，是需求拉动的结果。1994年以来，90%以上消费品的供大求或供求平衡，生产资料相当一部分滞销。今年上半年，钢材需求还在萎缩。既然供大于求，为什么物价还大幅度上涨呢？原因很复杂，其中，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是一个原因。1994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价格，由5.6元一下子变为8.6元。人民币一年之内就贬值了53.4%。人民币对外贬值，可能引起输入性通货膨胀。企业经济效益差，也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这几年价格逐渐放开，同时实行了结构性调价。企业无法消化结构性调价和价格放开带来的影响。在1994年的物价上涨中，属于结构性调价和放开价格的部分，要占70%—80%，其中，因粮价上涨而带动整个食品价格上涨，要占物价上升的一半。

任何国家经济起飞，产业结构都有一个从传统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中，总要伴随着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逐步消除，也就是农产品价格由低到高。有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价格上升并没有带动物价全面上涨。这是因为他们工业经济效益好，不仅消化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还下降。而我们呢？工业不仅消化不了农产品价格上涨，还要跟着“搭车”涨价。

经济效益差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占用了70%的资金，而在新创造的财富中，国有的贡献只有20%。高投入，低产出，产品成本势必很高，价格也必然高了起来。

在经济运行中，有很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盲目追求高速度就带有相当程度的非经济原因。为了追求高速度，就拼命地高投入。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既不承担投资风险，又不考虑投资效益，也不打算归还贷款。大量的无效投入即是物价上涨的深层原因，也一轮又一轮地推动着经济过热。

经济效益差，产业结构失衡，不合理的运行机制，既造成物价上涨，又制约经济发展，限制着就业。如果说，物价上涨和就业不足是一个跷跷

板的话，那么，上述几个问题就是跷跷板中间的那个“轴”。不仅如此，我们这个“跷跷板”摇摆幅度之大，摆动频率之高，也和上述问题有关。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处于这样一个循环之中：“一放就热，一热就胀，一胀就紧，一紧就降，一降就放。”“放”，主要是放松银根；“热”，就是经济过热；“胀”，就是通货膨胀；“紧”，主要是收紧银根；“降”，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于经济效益差，不能从中得到效益，只好扩大投资规模。这些资金都是投到利润率高、见效快的加工工业上去。结果，基础产业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加工工业，出现了“瓶颈”制约，整个国民经济承受不了这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各方面的供应全面紧张。于是，不得不进行调整。每一次“过热”和调整，国民经济像闹了一次疟疾，是一次巨大的资源浪费。看来，如果我们面向现实，就应当超越跷跷板的思维方式，从更深的层次上做一些切实的工作，治好国民经济畸热畸冷的“疟疾”。

刊于《南方周末》，1995年3月

谁来解开生死结？

目前，银行和企业有一个共同的难题，这就是企业过度负债。

企业经营总是要负债的。负债和自有资产之比，称为资产负债率。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是多少呢？这里仅提供一个参考数字：欧美国家第一产业是20%左右，第二产业是50%左右，第三产业70%左右。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得惊人，第二产业高达79%。

过度负债像一个大包袱，沉沉地压在企业身上，企业的一切努力全被银行利息吃掉了。企业完全是为银行“打工”，哪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过度负债也使企业改革无法进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调整资产负债比例，过度负债就是一个拦路虎。不解决过度负债问题，股份制改组、合资、联合、兼并，也困难重重。

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1993年底，企业未偿还的贷款总量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4%。其中，呆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25%，约5300—8000亿元。在呆账中，约有一半是永远也收不回的烂账。据上述数字计算，呆账占专业银行总资产的22%—33%，烂账占专业银行总资产的12%—17%。这使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都受到严重危害。它危及着银行的正常运营，危及着银行的信用。

企业过度负债造成了一种“赖债机制”。什么叫“赖债机制”？就是俗话说的“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企业负债越多，他越不考虑还债，企业负债越多，银行越怕它破产，就不得不再向它注入资金，让它苟延残喘。这样，提高利率、降低利率，企业都不在乎了。连本都不想还，还管你利率高低？国家用利率来调控宏观经济这个手段就失灵了。

企业过度负债，对银行本身改革的影响就更大了。众所周知，专业银行的改革目标是逐步变成商业银行。如果发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它就不能保证存户随时能提取存款，就会出现信用危机。不解决呆账、烂账问题，商业银行是不可能建立的。

企业过度负债像一个绳结，同时捆住了银行和企业，使二者既难以正常经营，又不能改革。解开，二者皆活；捆住，二者皆死。这是一个生死结。

国有企业过度负债主要原因是国家财政对企业注资不足。新建的企业不给足流动资金，老企业不给钱更新改造，企业本来很低的折旧基金也集中到国家主管部门用来再铺新摊子。近些年来，财政也不给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企业的流动资金、更新改造、固定资产投资，都得向银行举债。

解决企业过度负债问题，关键是由谁来填补这几千亿元坏账的大窟窿。近来，人们提出了十多种思路，但归根结底，还是四种思路：一是由银行来补窟窿；二是由财政来补窟窿；三是由社会来补窟窿；四是上述三方面共同来补窟窿。

第一种思路是让银行把这笔债务一笔勾销。既然债权人(国有银行)和债务人(国有企业)，都是一个老板，让银行注销这笔债务从原则上讲是可以的。但是，这笔债务在账面上还是银行的资产。把它注销了，银行的资产就少了一大块。这样，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就严重恶化，银行的资本充实率就大幅度降低甚至蚀空，这就危及银行的安全运行。

第二种思路是把银行的债权变成股权，也就是银行由债主变成股东。企业欠银行多少钱，银行就占有这个企业多少股份。这种思路最大的问题是增加了银行资产的风险。股票是不能保证归还的，这些连债都还不起的企业，它的股票风险就更大了。这种思路说穿了还是让银行补窟窿。和第一种思路不同的是，在银行的账面上这资产没有注销，而是以风险较大的形态存在。

第三种思路是让国家财政来补这个窟窿。这又有两种补法。一种补法

是财政把这笔钱补给企业，企业再还给银行。第二种补法是财政把这笔钱直接拨给银行，银行用来补充资本金，再去注销企业的债务。这种思路的困难是，财政哪里能拿得出几千亿元资金？那只好向银行透支或加大财政赤字。这会诱发通货膨胀。

第四种思路是从上述第二、第三种思路中引出来的。这种思路还是使银行从债权人变成股东，把债权变成股票。为了降低银行持股的风险，国家还是要给银行以补贴，以提高银行资产的质量等级。但这种补贴不要财政掏钱，而是国家向银行分配股权认购券，由银行购买一部分优绩企业的股票。这样，银行既是那些呆账企业、烂账企业的股东，又是优绩企业的股东，它就能以丰补歉。

还有不少人提出把企业对银行的债务转化为企业对社会的债务。其办法是由财政向社会发行专用债券，用这种债券建立专用基金来填补窟窿。债券到期再发新债券来偿还，不断地借下去。

看来，任何一种思路都不能圆满地解开这个生死结。需要对企业区分情况，针对不同的债务类别和企业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债务重组办法。

刊于《天津日报》，1995年5月2日

<<<<<

北方怕热，南方怕冷

北方怕热，南方怕冷。这是现今中国南方和北方经济不同之处。

北方怕经济过热。经济一过热起来，生产资料供不应求，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物价就要大幅度上涨。北方人不会利用经济升温的机会把经济搞上去，反而受经济过热的危害。一刮起“跃进风”，官员们只顾追求“政绩”，不顾一切地“大干快上”。没有效益的投资，用尽了有限的财力，强迫银行贷款，使企业负债累累。经济过热一次，留下一批无穷的后患。

南方怕经济过冷。经济一收缩，那些靠经济过热势头膨胀起来的房地产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叫苦不迭。经济一冷，资本收益率就降低，外资流入就减少。经济一冷，资金就紧张起来，企业间支付困难，连环债就多起来。1989到1991年的治理整顿，使1988年过热的经济冷了下来，广东人纷纷叫喊冷得受不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才给广东救了驾，广东经济又乘机上了一个台阶。1993年以后的宏观调控，经济又冷了下来，1994年我到广东，到处看到停工的建筑工地，看到卖不出去的楼房、别墅。

中国的改革开放东南沿海先行一步。在八十年代，政策向东南沿海倾斜，外资首先大量流向东南沿海，东南沿海的改革速度也比北方快。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东南沿海造就了一个经济发达、体制灵活的经济带。九十年代，东南沿海的政策优势逐渐消失了，但经济实力加强了，体制优势建立起来了。改革开放使南北差距拉大了。

当今的中国南北，不仅经济活跃程度不同，经济实力不同，市场化程度不同，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北方口号多，南方广告多；北方权力

的作用大，南方金钱的作用大；北方行政力量强，南方市场力量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了几次冷和热的交替，经济学家说这是“经济周期”。其实，这种周期和西方的经济周期大不相同。西方的经济周期是经济运行中的现象，中国的“周期”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造成的。如果一定要说“周期”的话，也只能称之为“中国周期”，以示和通常说的“经济周期”相别。在这几次经济的过冷和过热中，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效果。在经济过热中，南方市场的力量借机推动经济上一个台阶；北方在经济过热中计划经济体制旧病复发，留下一些后患。经济冷却时，消减了南方的经济泡沫，也损伤了南方的经济肌体；医治了北方的膨胀病，也使北方失去了一次发展时机。

北方怕热，南方怕冷。南北各有不同，宏观政策应当南北有别。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不管你怕热还是怕冷，都穿一样厚薄的衣裳，都开一样的药方，恐怕是不行的。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这是一句老话。今天，这句老话还很有现实意义。

刊于《方法》，1997年第3期

话说“软着陆”

“软着陆”来之不易

“软着陆”是指国民经济从“过热”状态降到适当的“温度”，并且在“降温”过程中震动很小。

大家一定记得，1992年上半年到1993年，出现了“四高、四热”的经济现象：高投资规模，高工业增长，高货币投放，高物价上涨。同时出现了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由1992年的5.4%上升到1993年的13.2%。

1992年8月，中央就开始采取措施阻止“四高、四热”，1993年7月实施以16条措施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这16条政策重点整顿金融秩序的混乱。但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1994年继续执行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希望能控制总需求以实现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1993年回落了31个百分点，但1994年通货膨胀率仍高达21.7%，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

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使人震惊。要不要再加大紧缩力度？这时在经济学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通货膨胀不完全是需求拉动引起的。再加大紧缩力度就可能造成经济大幅度滑坡。

这时，八十年代末的三年治理整顿的经验起了作用。1988年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使全国上下恐慌。当时采取了力度很大的紧缩政策，1989年通货膨胀率降到17.8%，但人们惊魂未定，继续加大紧缩力度，1990年到1992年，通货膨胀率为2.1%、2.9%、5.4%。通货膨胀降下来了，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1989年和1990年，GDP增长率猛跌到

4.1%、3.8%。

“软着陆”就是从三年治理整顿的经验而来的。当时另一种说法是“点刹车”，这是针对“急刹车”而言的。“软着陆”、“点刹车”，在政策上的体现就是“适度从紧”。所谓“适度”，就是在不造成经济滑坡的情况下，解决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从紧”，主要是控制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1996年能否实现“软着陆”？人们心里并没有底。1995年通货膨胀率由21.7%降到14.8%，提出了1996年降到10%的目标。在1996年年初的形势分析会上，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个目标难以达到。

由于国家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软着陆”终于实现了：通货膨胀率在6%左右，GDP仍然保持了近10%的增长速度。据预测，1993年到1997年，五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4%，最大振幅在3.5个百分点左右。

从1977年到1996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四次波动，第一次波动(1977—1981)振幅为6.5个百分点，第二次波动(1982—1986)振幅为6.4个百分点，第三次波动(1987—1990)振幅为7.8个百分点，第四次波动(1991—1996)振幅为4.5个百分点。在这四次调整中，第一次通货膨胀率由6.0%降到1.5%，降低了4.5个百分点；第二次8.8%降到6.6%，降低了2.2个百分点；第三次由18.5%降到2.1%，降低了16.4个百分点；这次由21.7%降到6.1%，降低了15.6个百分点。这次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效果很大，而经济振幅最小，是真正的“软着陆”。见下表：

	第一周期	第二周期	第三周期	第四周期
GDP 波动幅度	6.5 个百分点	6.4 个百分点	7.8 个百分点	4.5 个百分点
通胀降低幅度	4.5 个百分点	2.2 个百分点	16.4 个百分点	15.6 个百分点

这次能实现“软着陆”，说明我们政府驾驭经济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次宏观调控和过去历次相比，有很多新的内容。其中令人称道的是在有些方面比较成功地运用经济手段，其中主要是金融手段。

已经“软着陆”，为何还“适度从紧”？

一般认为，“适度从紧”的目标就是实现“软着陆”。目标达到了，“适度从紧”的政策是不是该结束了？这样提出问题是希望在货币供应上能更宽松一些，认为应当致力于“启动”经济。相当多的企业开工不足是这一看法的论据。

但是，经济界相当多的人士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认为，通货膨胀虽然被遏制住了，但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通货膨胀压力主要表现在货币供应量上。为了向非经济专业的读者说清这个问题，需要介绍一点货币知识。金融学者把现金称之为 M0，M0 加活期存款称之为 M1，M1 再加上各类定期存款称之为 M2，又称之为广义货币。M0、M1 是可以立即变成需求的，M2 是潜在需求。M0、M1 是造成现实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因素，M2 是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因素。最近两年，尽管 M0 和 M1 的增长率有明显回落，但 M2 的增长率却居高不下。在八五期间，M2 平均每年增长 29.7%，1995 年降到 29.5%，1996 年要求降到 25%，但从 1 月到 7 月还是 27%。有的学者把 M2 的增长幅度(代表总需求增长幅度)和 GDP 的增长幅度(“八五”期间平均 12%，代表总供给增长幅度)相比，总需求超过总供给 15 个百分点以上，这是了不得的通货膨胀压力。

在这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对 M0、M1、M2，三者之间的结构进行分析，认为 M2 大一些并不可怕。提高存款利率，定期存款就多了，M2 就上升了；降低存款利率，定期存款就少了，M2 就下来了。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M0 和 M1 下降得很快，这是社会对商品和劳务需求衰减的征兆。今年取消保值储蓄和两次降低利率，扭转了 M0 和 M1 下降的势头。有的专家认为，要使 M2 增长率降到 25%，唯一的办法是再进一步降低利率，而降低利率又会增加现实通货膨胀压力。这一悖论表明，把 M2 增长率作为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并不一定合理。同时 M2 的增长与我国货币化过程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用货币的领域，现在都需要货币了，对货币的需求量自然就大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放松银根再提高增长速度是有风险的。从1991年到1995年GDP平均年增长11.9%，1996年又有近10%的增长率。我国经济的问题不在增长速度，而在增长质量。适度从紧，就是不要再追求增长速度，而致力于增长质量的提高。如果放松总量控制，经济就要升温，国民经济中很多旧病又要复发。

在现有的行政格局和管理体制下，本来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行政性的投资冲动。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和召开党的十五大两个重大政治事件，更容易激发行政性的投资冲动，很可能出现“大干快上”，使经济再度过热。同时，在目前的情况下，扩大资金投放以后，资金不是用于企业急需的地方，而是进入投机领域。1996年1到9月，银行信贷资金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22.4%，高于同期工业增加值的12.9%。据银行调查，有一些企业用信贷资金去股市进行投机。

1994年1月1日，实行汇率并轨，汇率由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变为8.7元人民币，人民币过度贬值，有力地促进了出口。与此同时，企业的外汇通过结算集中到国家手中，外资也大量进入。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了保护出口，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外汇，以阻止人民币升值。这就使得外汇储备挤压了大量资金(近3000亿元)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为了减少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只好抽紧银根，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

“适度从紧”并不是一味从紧。我们不要追求增长速度，但也不能让速度滑坡。这就要灵活地掌握“从紧”的力度，根据情况适时微调。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要加大技术改造的投资强度，促进技术更新换代。对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适当提高投资。在启动消费方面，要大力开拓农村市场，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促进房地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要大力开拓国外市场，使一般外贸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软着陆”不等于经济已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完成了“软着陆”的任务，并不是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

道路。国民经济中很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

国有经济改革滞后是当前一切问题的焦点。说国有经济改革滞后是指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改革滞后。把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重点喊了好几年，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全国关注并寄以期望的试点企业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明文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只能是极少数，而现在试点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独资公司，实际是原来国有企业的翻牌。国有企业改革停步不前，使部分企业陷入困境，也紧紧拖住了银行。银行改革因国有企业的拖累不能前进，还把国有经济中的矛盾几乎完全转移到银行身上，加剧了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实际是老百姓存款的风险，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最容易引起社会震动。所以，金融风险是影响社会安定最危险的因素。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把宝贵的70%资金投进了国有企业，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比重只有2%。国有企业问题不解决，整个国民经济就不能进入良性循环。

国有经济怎样才能走出困境？第一，要缩小摊子，国有企业的摊子有多大，一是从国有企业的职能出发，和其职能不相关的行业、产品要放手交给社会；二是从财政注资能力出发，财政背不起就应当主动放包袱，放手吸收其他经济成分注资。如果不自觉地缩短国有企业的战线，它也会自发地萎缩。自发的萎缩后果更糟。战线缩小以后，集中力量搞好必须由国家办的那部分企业。第二要减轻负担。现在国有企业负担太重，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30%左右，GDP只占40%左右，而上交财政却占财政收入的70%以上。我们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津津乐道，说国有企业贡献大。必须加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税收征管工作，提高非国有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相应减轻国有企业的财政负担，使其有能力进行技术更新。三要转换机制。转换机制包括资本注入机制，改变非财政即银行的注资思路，有效地利用资本市场。从资本注入机制的改革，引发企业产权结构、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增长方式等一系列方面的改革。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又一深层次问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低下，企业经营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目前多数企业经营困难不是注入资金不足，而是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要。现在大批生产为闲

置，是因为这部分生产能力和社会需求脱节。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效益，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我们不能期望在一两年内经济结构调整会有明显的效果。因为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问题，又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解决产业结构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深化改革，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宏观上，要改变地区分割、行业分割的状况，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为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创造条件。在微观上促进企业主动适应市场。产品结构的调整，应当是企业自己的事，只要企业真正转换了经营机制，企业就会主动适应市场需要。政府在结构调整中也应积极发挥作用。代表宏观调控的产业政策虽然不能像过去那样“截长补短”，但还可以通过金融、税收、财政等多种手段，引导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合理流动。农业是天然的弱质产业，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农业就很难在同其他产业的竞争中得到必要的生产要素。一些社会效益高于企业效益的产业，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的基础产业，高投入、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政府大力扶持。

由于国民经济并没有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虽然实现了“软着陆”，但国民经济还可能波动。“适度从紧”，“适度”一是指“紧”的强度，二上指“紧”的时间。如果这两方面的“度”掌握不好，又可能走上1989年的老路：经济过热以后出现经济疲软，即经济大幅度滑坡。

国民经济中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影响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了“软着陆”以后，利用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把改革向深入推进。这样，有可能使长期困扰我们的深层次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刊于《经济参考报》，1987年1月5日

注：1987年1月7日，即本文发表后的第三天，《人民日报》第9版登出了刘国光、刘树成的《论软着陆》一文。该文主调是歌颂成绩和总结成功经验。朱镕基十分高兴，说这篇文章要评大奖。后来，果然评上了当年经济学最高奖。然而，对软着陆的赞扬声还没有平息，国民经济就开始下滑。政府采取了种种启动措施，都没有效果，1998年不得不采用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政府投资来启动内需。

<<<<<<

经济“大三角”透视

这里说的经济“大三角”是指“企业—银行—居民”。居民把手中的钱存入银行，银行把居民的存款贷给企业。这是我们社会经济生活迄今为止的格局。这一格局近年来隐忧重重，今年似乎有了良性转机的希望。

居民储蓄——国家银行日益加重的债务

到目前为止，城镇居民储蓄余额达 4.5 万亿元；居民手持现金 6000 多亿元，外币美元个人存款 300 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2500—3000 亿元。以上三项是国家银行欠居民的债务，共计 54000 亿元。

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它相当于 1996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 7366.6 亿元的 7.33 倍。如果扣除 1967.4 亿债务收入，则相当于财政收入的 10 倍。

它相当于 1995 年底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中所有者权益 16230.09 亿的 3.33 倍，相当于同年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净值 17474.11 亿元的 3.09 倍。

它相当于国家银行黄金储备 1267 万盎司(按最近价格折合人民币 467 亿元)价值的 114.8 倍。

以上是和国有资产的家底比较，说明国家欠居民的债务远远超过了国家的家底。

居民储蓄余额和手持现金还相当于全社会两年多的消费(它相当于 1996 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614.3 亿元的 2.19 倍)；它也相当于全国职工近六年的工资收入(它相当于 1996 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 9080 亿元的 5.95 倍)。

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改革开始的 1979 年，全国居民储蓄余额不到 300 亿元。10 年以后的 1989 年达 5000 亿元，当时人们觉得这

个数字太大，说它是“笼中虎”。谁也没想到，四年以后的1992年就突破了1万亿元。接着，仅过两年，到1994年，又突破了2万亿元。1995年底，接近3万亿，1996年底，接近4万亿。居民储蓄余额突破第一个一万亿用了40多年，第二个一万亿用了两年，第三个一万亿仅用了一年。以后几乎每年增长一万亿元，可见加速度之高。居民储蓄多当然是好事，这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这是一笔低成本的资金。

居民存款这么多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奈的。多年来，大多数年份储蓄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但储蓄还是上升。他们不得不把钱存进银行，因为没有别的投资渠道。

居民存这些钱干什么？用于养老，用于看病，用于子女教育，用于买房。据寿险部门统计，发达国家寿险人均1500美元，发展中国家寿险平均400美元，我国人均寿险只有1.4美元(1993年)。我们过去没有买保险的习惯，存在银行里的钱就是保险金。

保险金是生命钱。对这笔钱，他们希望安全，希望保值，希望增值。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有一个可靠的、回报率高的投资渠道。长期以来，投资渠道只有一个：银行。把钱存在商业银行里，由银行帮助居民投资。商业银行是唯一的投资中介。这笔钱存在银行里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得再看一看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唯一的投资中介

银行越赚钱，居民的储蓄越安全。但是，我们的银行并不怎么赚钱。

一是银行要付出大量的利息。居民储蓄4.5万亿，按今年利率计，一年要支付利息3000多亿元。

二是存贷利率差很小，银行没有多大的赚钱空间。银行贷款利率多年来只比存款利率高出不到两个百分点。

三是金融资本利用率不高。居民存在这里的钱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贷出去，银行白付利息。1991—1996年，居民储蓄平均增长32.4%，而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只有26.2%。存差连年增加。1995年存差3468亿元，1996

年存差高达 7439 亿元。当然，银行也不会让这笔钱白放着，买国债是补偿利息损失的一个办法。但是，为了追求利润，国家银行的一些分支机构近几年来大量向企业投资、参股，有的甚至进入股市。为了逃避监督，这些国有银行还大力发展账外业务。账外业务管理和约束不严，经营漏洞较多，是国有银行违法经营的防空洞。一旦出现亏空，最终还是危及国家银行的资产，也就是危及居民的储蓄。

更为重要的是，银行贷出去的钱相当大一部分不能按期还本付息。银行的资产质量受到影响，公布的不良债权为 20%，按 20% 计算，也有 8000 多亿元不良债权。实际的不良债权比公布的大得多。银行对储户，必须保证还本付息、保证随时提取；企业对银行，不能按期还本付息，有些成为死账。银行对储户必须讲信用，企业对银行却赖账。

目前，银行在计划和市场的夹缝中艰难地挣扎。一方面，银行也是企业，应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还是通过行政、计划手段分配。过去，财政通过透支的方式挤银行，现在不让透支，却通过另外两个渠道挤银行。一是通过国有企业这个渠道，二是通过地方政府这个渠道。国有企业，本应由财政注入资本，现在却由银行注入资本。本应流动性很强的银行资金却变成了长期性垫资，信贷资金财政化。地方政府也常常压银行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用来发工资，这样的贷款基本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地方要上项目，地方财政没有钱，也压银行贷款。过去说银行和财政“穿连裆裤”，现在“布连裆裤”变成了“铁连裆裤”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迫使信贷财政化，加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风险。

目前，国家银行的信贷资产流失情况严重。流失的渠道很多，贷出去的钱收不回来是重要的流失渠道；有的银行经营亏损，又没有自有资金冲销，用信贷资金垫付也是一条渠道。

银行的资金 70% 贷给了十分困难的国有企业，这就把国有企业的全部风险都转移到银行里来了。

国有企业：巨大的资金黑洞

国有企业是吸引银行资金的黑洞。现在，国有企业几乎完全靠银行维持。投资靠银行，流动资金靠银行，生产、经营靠贷款，还贷靠举债。企业完全躺在银行身上，银行完全决定企业的生死。“银行感冒，企业发烧”。

在1996年以前，由于多数年份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是负的，居民储蓄实际是通过银行对国有企业实行“暗补”。以1995年为例，这一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17.1%，一年期存款利率按10.98%，利率差为6.12%。这一年居民存款平均余额按2万亿计，则居民交给银行的“税”（暂且用这一不确切的称呼）为1200多亿元。银行以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贷款利率贷给了国有企业，这笔“税”转给了国有企业。1995年，工业品出厂价上涨了14.9%，而当年流动资金一年期贷款利率为10.98%，工业企业得到利率好处是3.92%。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当年末的总负债为31241.9亿元，若按70%的贷款来自银行，即21869.33亿元，则国有企业从负利率得到的好处为857亿元，相当于这些企业这一年利润总额的1.29倍。

尽管国有企业享受了储户的这份“暗补”，贷给国有企业的资金效益还是很差。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的70%以上投给了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增长部分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只占20%。国有企业有一半是亏损的，而且亏损额逐年增加：1980年亏34.3亿元，1989年亏180.19亿元，1991年亏367亿元，1994年亏482.59亿元，1995年亏损额为540.61亿元。到1996年一季度末，全国6.8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净亏损的局面，盈亏相抵，净亏34.1亿元，经过努力，全年仍亏损726.69亿元。

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资产负债率太高，利息负担过重，是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有关部门调查，1995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77.1%，若扣除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实际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5.15%。企业负债，90%的债权是银行。

负债多，利息也就多了。1996年国有企业贷款余额达45500亿元，需要支付利息4680亿元，实际支出利息1341.66亿元。1997年贷款余额将

达到 62730 亿元，利息将为 7527 亿元。问题在于，银行的贷款利率高于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企业赚的钱不够还银行的利息。企业技术落后，不改造，就缺乏竞争能力。但是，一些技术改革项目的收益抵不上贷款的利息，越改造，越亏损。“不改造等死，改造找死”。

企业过度负债造成了一种“赖债机制”。什么叫“赖债机制”？就是俗话说的“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企业负债越多，他越不考虑还债；企业负债越多，银行越怕它破产，就不得不再向它注入资金，让它苟延残喘。国有企业能对银行赖账，银行对储户是不能赖账的。这中间就隐含着巨大的危机。

让“大三角”走出锁定状态

近年来，经济“大三角”进入了锁定状态：企业还不了贷款，银行就难以正常运营，更无法商业化；银行不能商业化，就没有真正的银行；没有真正的商业银行，资金供给机制就麻痹了企业的机制，影响了企业改革；没有真正的企业，企业对利率就不敏感，银行就难以运用利率杠杆。国家用利率来调控宏观经济这个手段就失灵了。

一方面，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需要数以万亿的资金。另一方面，居民储蓄的 5 万多亿资金需要保值增值。

由于居民—银行—企业这个大三角进入了锁定状态，银行这条单一的渠道已经很不合理，很不安全。

“大三角”的锁定状态非解开不可。

怎样解开呢？企业的过度负债是锁定三者的一个“结”，过度负债是历史留下的一个窟窿。人们提出了十多种填补这个窟窿思路。但归根结底，还是三种思路：一是由银行来补窟窿；二是由财政来补窟窿；三是由社会来补窟窿。

第一种思路是让银行把这笔债务一笔勾销。既然债权人(国有银行)和债务人(国有企业)，都是一个老板，都姓“国”，让银行注销这笔债务从原则上讲是可以的。但是，这笔债务实际上是广大储户资产，如果把它注

销了，就危及居民储蓄的安全。

第二种思路是把银行的债权变成股权。也就是银行由债主变成股东。企业欠银行多少钱，银行就占有这个企业多少股份。这种思路最大的问题是增加了银行资产的风险。股票是不能保证归还的。这些连债都还不起的企业，它的股票风险就更大了。这让居民储蓄以风险最大的状态存在。

第三种思路是让国家财政来补这个窟窿。财政哪里能拿得出成千上万亿元资金？那只好向银行透支或加大财政赤字。这会诱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使居民储蓄贬值，还是危及居民财产的安全。

在上述三种办法中，第一和第三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二种债权转股权的办法很有希望，即把国有企业的欠债变为债权人的持股。债权人是银行，最终债权人是储户。由此人们还提出了债权转股权的种种方案。但是，这种债权转股权的方案遇到一个共同的难题：债权人的资产风险没有保证。这些国有企业连债都还不起，它的股权还有什么用？

这就需要对企业进行选择。只有那些经济效益好，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才能保证股权人的权益。如果这样的话，这就和国际上通行的作法相通：那些效益好、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主要不是向银行借债来筹集资金，而是向社会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这就是股份制。

股份制对上市公司进行严格的选择，只有那些能保证股民权益的公司才能够上市。股民在买股票时又进行严格的选择，他们只买那些收益大、风险小的股票。股份制使企业有了经常的低成本的筹资渠道。有了好的发展机遇，它还可以通过配股等形式加速企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股民每天都通过买卖股票来对企业进行“投票”，企业经营不好，股民就不投它的票，这就迫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

这样，被锁定的“大三角”通过资本市场连通起来了。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同志认为股份制是私有制。最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重要突破。股份制已经当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正是按这个思路发展。今年的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步伐已经大大加快。

历史将证明，这一认识和实践的突破对于中国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要加强对资本市场风险的防范

资本市场对银行储蓄进行分流以后，原来的居民—银行—企业这一个“大三角”变成了两个“大三角”。新出来的“大三角”是：居民—资本市场—企业。这一分流，银行的风险就减小了，但居民财产的风险并不一定减小。

在“拨改贷”（注：拨改贷即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八十年代后期改为由企业向银行贷款）之前，企业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拨改贷”之后，企业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资本市场发展以后，上市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股民。在企业资金来源的变化过程中，企业投资风险，由财政转向银行，又由银行转向股民。

企业从银行贷款要受到利息和还款期限的制约。而在股市上筹集的资金失去了这两种制约。所以，上市公司可以把股市变成企业的“提款机”。有一个讽刺国有企业的顺口溜：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吃外行。外行是指股民。

这就需要加强市场制约、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来填补这个制约空缺。对股市的监管最根本的还是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是保证居民财产安全的首要问题。不能把公司上市当作对国有企业的“解困”、“扶贫”的手段。不能让那些经营业绩不好，经过“包装”的公司混入股市。上市公司必须定期如实公布收益和财务状况，绝对不能提供虚假报表。严格规范中介机构的行为，对和上市公司联手欺骗股民的中介机构要严加惩治。

对企业来说，资金来源当然不能完全靠股市，间接融资还要占较大的比重。商业银行还将是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企业要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居民也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家庭财产形式要多样化：储蓄、债券、股票、保险、不动产。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7年8月6日，《方法》，1997年7-8期合刊

经济增长要有“限速器”

蒸汽机的发明者当年曾遇到一个难题，蒸汽推动活塞往复运动，活塞通过四连杆机构带动飞轮旋转，飞轮就越转越快，快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出现“飞车”：机件断裂，飞轮甩出。不仅机器损坏，还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后来，他们发明了限速器，使飞轮速度保持在安全的限度以内，蒸汽机才得以问世。限速器，是蒸汽机最为重要的部件。

从蒸汽机我想到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有三个动力：消费、投资、出口。这三个动力实际是一个动力——消费。投资是未来的消费，出口是外国人的消费。这样，消费推动增长，增长促进消费，消费再推动增长，增长再促进消费。人类消费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了汽车，还想有飞机；有了飞机，还想到宇宙去旅游一番。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为了增值，千方百计地促进消费；企业为了生存，变着法儿创造新的消费；银行为了利息，利用信用卡鼓励人超前消费；政府为了扩大需求、创造就业，也用种种政策推动消费。主观上无止境的欲望，客观上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使人类的消费加速，再加速。“消费—增长”互相推动，不断加速，这是一个正反馈，这个正反馈以加速度的运动方式无限进行下去。

增长加速就是消费加速。消费的加速就是资源枯竭的加速，就是环境破坏的加速。市场经济就像一架没有限速器的发动机，总有一天会出现“飞车”：资源枯竭，水源断流，植被秃化，物种灭绝，海洋污染，臭氧层空洞加大，温室效应增强，最终“机毁人亡”。不仅现实已经有了这种危机的迹象，也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结局。上述“消费—增长”相互加速的

这种正反馈的最终结局，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热死”状态，即“熵”值达到最大值的状态。

当然，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以封闭的孤立体系为条件的，能否把宇宙看成一个封闭的孤立体系还有争论。即使能把宇宙看成封闭的孤立体系，这个体系也是无限大的。在无限大的体系中，能否达到“热死”状态也有争论。这种热力学上的争论，在世界观上，表现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市场放任主义和自然保护主义。

我虽然不是市场放任主义者，但我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因为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活动自然演变的结果。我主张自然保护，但不是极端的自然保护。我的看法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保证人类的幸福为目的，要以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为条件。这就要限制过度消费。

过度消费会不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不一定，有时会带来不幸。无节制的欲望扩张，紧张的生活节奏，无休止的激烈竞争，使人们失去了往日的情趣。人类被置于这个“高增长——高消费”的传送带上，就身不由己，想下也下不来。

实际上，当今社会，人们追求过度消费不是为了追求幸福，而是“扩大需求”。是市场力量推着人们去消费；是地位攀比的虚荣心推着人们去消费；是技术垄断逼着你去消费。你不消费不行。过度消费是市场经济逼出来的，不是幸福引诱的。

人类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一是身体健康，二是精神快乐。什么叫幸福？无非是这两者齐备。发展经济应当以满足这两个目标为限，超过了这个目标的消费就是过度消费。过度消费并不会带来健康和快乐，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实。

看来，过度消费不仅与大自然相悖，也与人的本性相悖。

因此，我们在接受市场经济体制时，不要忘记它的另一面：它推动人类过度消费，从而带来反人性、反自然的后果。因此，对市场经济这架发动机，必须装上“限速器”。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限速器”？它是由新观念、新政策、新制度构成的。

观念上，树立合乎人性的幸福观。克服相互攀比的虚荣心，以追求健康、快乐为目标。在这种幸福观的基础上，确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消费、高幸福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应当是，以最少的消耗求得最大的幸福。这句话看起来似乎很平常，实际上它将改变人们的衣食住行，它将从各个方面刷新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生活方式必须改变。

在政策上，不能以追求GDP的无限扩大为发展目标。在制定发展政策时，要考虑人性对幸福的要求，要考虑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现在，人们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方面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一方面依靠科学技术，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并且开辟资源新天地。但是，如果不停止国家之间的GDP竞赛，就不会有可持续发展。

在制度上，要建立一个能够驾驭资本、使资本为人类造福的理性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资本为人类所用，而不是人类沦为资本的奴隶；在这个制度下，不会出现资本驱使人类追求过度消费。

刊于《科学投资》，2003年第1期

<<<<<<

鞋帮鞋底同时破

如果你买了一双鞋，鞋底还是新的，鞋帮却早早地破了，或者鞋帮还很结实，鞋底却断裂了。你一定会为剩下的鞋底或鞋帮可惜。人们希望最好的情况是，鞋帮鞋底同时破，这样资源才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在机械设计中有一个原则，叫等强原则。其意思是，在设计一个机器零件时要使每一个部分强度相等。这样，机器零件的各部分会同时达到使用寿命，不会因一个部分先报废而使其他完好的部分浪费。例如一个汽车曲轴，几个承受力的部位应当强度相等，不能这个部位磨损得很严重，另一部位却完好无损。

近来有人说要避免产品质量过剩。其实，过剩和不足是同时发生的。因为产品的这个部分不足，才显出产品的另一部分过剩。如果在产品设计中坚持等强原则，就不会有过剩和不足的问题了。

经济学上有一个短板原理。说的是一个长短不齐的木板圈成的木桶，它的容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其他的木板再长也没有用。这和机械设计中的等强原则相通：机器的寿命是由最薄弱的部位决定的，最薄弱的部位坏了，其他部位再好也没有用。机械设计中有等强原则，在木桶制造中也应有“等长原则”。

这个道理看来很简单，但很多厂家做不到。最近我花 200 多元买了一个电热水瓶，接上电源后几分钟水就开了，一按瓶盖上的手触开关，水就可以流到杯子里，是很方便的。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再按手触开关就不灵了。瓶是封闭的，满瓶的开水倒不出来。原来，手触开关的寿命和热水瓶其他部

位寿命不匹配。手触开关的寿命是一万次，接一杯水要按几次，几个月就寿终正寝了。而这时的不锈钢瓶胆、漂亮的外壳还是很新的呢！

等强设计的实质要求机器的各部分资源配置合理。哪一部分也不会过剩，哪一部分也不会短缺。目的是不会造成资源浪费。这在产品设计中很重要，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重要，宏观产业布局上也同样重要。

一家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等等各个方面如同一个水桶的木板，它们的“长度”也应是相等的。如果一家销售能力只有3万辆的汽车厂，它的厂房，它的生产线，它的水、电、气、汽都是按15万辆设计的，那么，这多余的12万辆的生产能力不仅浪费了，而且它的贷款利息，它的折旧费，它的维护管理费，都得摊到这3万辆车中去。汽车的成本必然很高，市场竞争力必然很低，这家汽车厂必然要走入困境。这种情况一般在追求经济规模时发生的。理论上算出汽车厂的经济规模是15万辆，工厂设计和建设都按15万辆进行的，但建成后才知市场容量3万辆，企业不得不吞咽苦果。如果用滚动发展的方式来实现经济规模，即企业生产规模随着销售量的增长而扩大，就不会造成上述苦果。

企业中的“短板”是哪一块？各家企业是不一样的。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多数企业的“短板”还是销售。“卖”是当今天下第一难。由这块“短板”决定了企业一切。然而如果把“卖”当作一个整体，其中也有“短板”，可能是销售队伍太弱，也可能是产品开发力量太弱，以致产品和市场不对路。由于某个部位的“强度”太低，其他强大的部位，就难以发挥作用。有必要将自己的企业诊断一下，看企业的各个部分是不是“等强”，哪个部位太弱，哪个部位过强。然后在企业内部进行资产重组，达到各个部分“等强”。

国民经济也是如此。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之间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如果比例失调，有的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有的行业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过去是靠行政力量的调整去“截长补短”，但行政力量总是赶不上客观情况的变化。所以，一次一次的调整只不过是“水多加面，

面多加水”，经济关系越调越乱。现在进行的资产重组应当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但是，由于各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所以资产重组不能过分强调行政手段，不能通过搞运动的方式来突击，而是应当运用法制由产权市场来随时解决。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9年6月24日，
发表时题为《遵循等强原则》，以后多家报纸转载，采用《鞋帮鞋底同时破》的题目

市场， 市场

<<<<<

市场，魂兮归来

如今，消费者进入市场，常存几分戒备：怕买到了伪劣商品，怕在价格上当了“冤大头”。面对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欺诈行为，也有人摇头叹息，他们断言：“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毛病！”

这种断言是不对的。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买卖中的欺诈行为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毛病，而是市场经济不发达、不完善的毛病。

近来，培育市场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不过，人们在培育市场时，较多地注重市场的物质方面，较少注意市场的非物质方面。市场的物质方面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消费品市场和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市场竞争规则(市场法规、市场管理制度等)是市场的非物质方面，这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非物质方面——市场灵魂，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这是说的市场灵魂是指市场观念、市场道德、市场心理等。如果把通常意义上的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称为市场的“硬件”，那么，市场竞争规则和市场灵魂则是市场的“软件”。市场规则和市场灵魂不同的是，前者是

靠外在强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后者是内心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市场灵魂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它比市场规则的影响更为深远，更为广泛。对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灵魂的建设是一项根本性的建设，也是难度很大的建设。

市场观念，不仅仅是指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组织商品，而是有很广泛的内涵。例如，等价交换观念就是其中之一。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表现在观念上，我得到了对方多少，就应当付出多少；我付出了多少，就只能索取多少。这就是“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巧取豪夺和等价交换观念就不相容。权利观念也是重要的市场观念。在市场交换中，一方的义务是另一方的权利；一方的权利要靠另一方履行义务来实现。买卖双方有严格的责任制约。

市场道德包括职业道德、商业信誉、遵纪守法等。市场道德并不要求进入市场的人作无私的奉献，而是要求在利人的前提下利己，通过利人来实现利己，绝不允许通过损人来实现利己。市场心理应当包括对违反市场规范和市场道德者的排斥心理，对市场风险的承受心理。市场有了这样健康的灵魂，就能潜移默化地约束人们的行为，协调他们的相互关系。

面对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欺诈行为，还有另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在市场发育的初期，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可以不必去管它，等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这种现象就可以自动消失。对这种看法我不同意。正如躯壳不能没有灵魂一样，没有健康的市场灵魂，就没有健康的市场。市场灵魂的培育和市场其他方面的培育应当同步进行。在市场发育的初期就应当旗帜鲜明地清除市场灵魂中的毒素，大力培育正确的市场观念，优良的市场道德，良好的市场心理。否则，毒素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发展，那时候，想消灭它就很难了。

市场，魂兮归来！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2年7月3日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计划经济国家，大都放弃了计划经济，搞起市场经济来了。这几乎成了一股国际潮流。这股潮流的出现有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呢？怎样看待二十世纪国际性的计划经济实践呢？社会主义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对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人们期待着明确的回答。

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使得一些天才的头脑进行深沉的思索。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批判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寻求社会公正、社会平等之路。其中，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其严密的逻辑力量掌握了很多群众。共产党人主张，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这个体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几十年的实践以后，这个体制一些不可克服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因此，各国纷纷探寻改革之路。

矛盾之一——技术上的不可行性

要把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亿人都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经济机体，在技术上能不能行得通呢？让我们先进行一番可行性

分析。

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一系列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千百种产品之间也要互相衔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上各种比例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瞬息万变的动态体系。谁要控制这架大机器，使它正常运转，谁就得认识这个动态体系，并且根据这个动态体系的客观规律制定详尽的计划，准确而及时地实施这个计划。

这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首先，人们不可能认识这个动态体系。要掌握千万种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必须掌握必要的信息：每种产品生产多少？库存多少？市场需求多少？由此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里所需要的信息来自于每一个工厂、车间、商店……信息从车间、商店传到中央计划机关要耗费时日，中央计划机关接到这些信息时，动态体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央得到的信息已经成了过时的东西。此外，基层的统计工作不准，不全，信息经过层层管理机构向上反映，层层加工，层层筛选，加工筛选过程中加进了很多主观的东西。一旦信息和利益结合，信息在加工和传输过程中就必然失真。中央计划机关得到的信息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失真的。用过时的、失真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作出的计划必然是错误的计划。

其次，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央计划机关及时得到了没有失真的信息，他们也很难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一个中央计划机关，不管它多么庞大，多么精明，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从这浩如烟海，瞬息万变的信息中找出客观的比例关系，从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哪些增产，哪些减产。

能否把成千上万种产品的相互关系列成数学方程，并把这些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也考虑到方程中去，然后用计算机进行随机分析？能否用现代系统工程的方法来制订经济计划？我曾为此访问过一些数学家和系统工程专家，他们认为，体系太大，参数太多，没有明确的边界，还有种种难以确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干扰，用系统工程和数学方法也很难制订出周密而正确的计划。

再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央计划机关能够得到准确及时的信息，也能及时做出正确判断的决策，还及时制订了周密而正确的计划，这种正确的计划也难及时贯彻执行。现代化生产是复杂的，生产还有一定的周期性。你想增加某产品的产量，不是一时就能增加上去，你想减少某产品的产量，不是马上就能减下来，如果硬要一刀砍下去，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

由于技术上不可行，不管计划机关多么庞大，不管计划长官多么英明，不管计划工作人员多么精明强干和悉心尽职，也不可能避免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策。计划不周，比例失调也是难以避免的。

技术上不可行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让我们回顾一下从“一五”到“五五”以来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计划。在当时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它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1952年8月提出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1953—1957)轮廓方针》和《五年计划的任务》是“一五”头三年的执行依据。但是这个依据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基建规模安排过大，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因此，在执行了两年半以后不得不在1955年7月进行了较多的修改和补充。正式的“一五”计划是在时间过了一半以后才拿出来的。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失误。1956年比例失调，1957年进行“调整”。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出现了“以钢为纲”和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被迫进行了五年经济调整(1961—1965)。这期间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和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是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实质上是以国防、大小三线为中心的备战计划。把几千亿资金投入了大山沟，损失和浪费是惊人的。1970年又出现了冒进，这个五年计划毫无客观可言，毫无科学可言。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出现了两次大起大落，上下折腾。这个计划完全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例如，计划钢产量3500—4000万吨，唯一的依据是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讲过的15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四五”执行的结果是，计划表上的51种主要经济指标，有25种没有完成计

划，当时力保的 30 多种重工业产品指标，有 18 种没有完成计划。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9-1980)又出现了“洋跃进”，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大量生产能力闲置。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年经济调整。1980 年 12 月，又决定实行进一步调整。

中国人记不清进行了多少次经济冒进和经济调整。每一次冒进是一次资源的大浪费，每一次调整又是一次经济大衰退。广大群众节衣缩食，巨额财富因计划失误而付之东流。1958-1978 年 20 年间，用于基建投资达 6000 亿元，其中三分之一因决策失误而浪费了，三分之一没有达到设计能力，仅有三分之一达到设计能力。只要这个体制不改变，这种浪费就不可避免。1986 年，建设银行对 1981-1985 年 4 年间基建投资效果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有四分之一的投资浪费了，四分之一达不到设计能力。

矛盾之二——扼杀了直接生产者和 管理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

尽管人们千百次地咒骂“私”字给社会带来了不平和罪恶，一旦真正剥夺人们的个人利益的动机以后，又出现了一个社会弊病：惰性十足，效率低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管理者都是一部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性。工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来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利用资源来发挥优势。这种体制使经济机体中的每个细胞和每个器官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能力。个个捧着铁饭碗，人人都吃大锅饭。懒惰之风盛行，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受到限制。这样，经济机体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只能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生产热情和施加政治压力。“抓革命，促生产”正是这种常用的手法。但是，不管你从外部使尽了千方百计，到头来还是避免不了生产效率低下，科技进步停滞——国民经济被市场经济国家远远

抛在后面。

矛盾之三——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必然造就不合理的政治体制

国民经济是一架听命于最高当局指令运行的大机器，政治极权主义就有着深厚的经济土壤。

既然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权力也必然高度集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是金钱的奴隶，在这里，人们是权力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成功者不得食，在这里，不服从者不得食；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在这里，权力至上。

既然政治、经济，只能听从一个指令，那就容不得其他声音。不同的意见都被当作“杂音”、“噪音”加以消除。舆论一律正是这高度集中体制的必需品。

极权制像一个密封的铁桶，把社会矛盾紧紧的压在里面，又深深地激化社会矛盾。社会没有微调机制，只有爆炸式的突变才能解决矛盾。所以，社会必然出现周期性的振荡，“七八年一次”，实乃必然。

既然舆论一律，那就没有新闻自由，群众没有了解事实真相的自由。既然要有统一的意志，那就没有真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自由。新闻只是权力的宣传工具，其职责是让群众相信权力所希望相信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是为了论证“最高指示”，为“最高指示”盖上科学的图章。那些企图真正研究科学的人，弄不好就成为“异端”而被这架大机器碾碎。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是腐败的经济基础。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舆论监督，公有制就成了权力所有制，以权谋私成了不断蔓延的瘟疫。权力和利益紧密相连，官员们的第一任务就是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对事业漠不关心、对上级吹拍逢迎、卖身投靠的情况也就难以避免了。那些有真才实学、有独立见解、而不会迎合上级的人，常常报国无门。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我们美好的理想变成

了难堪的现实：我们的理想是劳动者当家做主，现实却是领导人的意志高于群众的意志；我们的理想是消灭贫困，而贫困的某些地区比革命前还严重；我们的理想是消灭城乡差别，而城乡差别却越来越大……

怎么看社会主义理想

计划经济的基本设想把复杂的经济生活作了简单化静态化的理解。因此，它只适用于以下情况：1. 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小；2. 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简单；3. 发展目标单一；4. 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在苏联和新中国建国初期，计划经济充分显示了它的作用：苏联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国，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比较强大的工业基础。

我们不能抹杀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计划经济在集中力量加强国力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在以知识和信息为生产力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计划经济必然要走向市场经济。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不是。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了解社会主义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是什么。

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早期。在19世纪，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对当时的社会作过深刻的批判，他们呼唤社会公正、社会平等。到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使整个社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因此改造社会的呼声十分强烈。人们提出了种种社会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彻底。他们提出了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它。

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弊端，社会主义就有存在的必要，社会主义理想就有生命力。

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却是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劳动人民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实行计划经济，国民经济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按比例发展；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

这些年来，改革的实践使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上面几条作了修正：在所有制方面，用公有制为主体代替纯粹公有制，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在分配方面，用按劳分配为主代替纯粹的按劳分配，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

改革进一步深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又有了进一步的修正。实行计划经济这一条被放弃了，只保留“两个为主”，即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

对于这“两个为主”目前还是争论。先说以公有制为主的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股份制空前发展，在国有企业中也有集体股份和私人股份，在私人企业中也有国家股份，外国人的股份也会参与到各类企业之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各种经济成分的混合体。由于产权进入市场，在任何一个企业中，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也是变动的。当然，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企业，国家和集体所占的股份会多一些。但是，从总体来说，国有经济占的比重不一定很大，而是一种混合经济。

对按劳分配争论更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天天喊按劳分配，可从来没有实行过按劳分配。这不是我们不愿意实行，而是在技术上很难实行。首先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是，什么是“劳”？管理是不是“劳”？经营是不是“劳”？按过去的概念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剥削性质，不能百分之百的算“劳”。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如何能装在一个“筐”里、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加以区分？“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马克思语）这种模糊的概念怎能界定它们之间的量的关系？按劳分配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计量“劳”？除了简单的计件劳动外，其他各种劳动都很难实现合理的公平的计量。在脑力劳动占比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劳”的计量更加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是

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按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技术、土地等)对收入的贡献进行分配。劳动力仅是一种生产要素，它的价格(工资)只能由市场来决定。单纯的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

确切地说，我们只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不清楚，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基本目标还是清楚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最根本目标是社会公正，社会平等。

社会主义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只要资本主义还有弊端，只要社会上还有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存在，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想就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以及其他种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标。目标是第一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今天我们认为“两个为主”是最好的手段，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有可能发现更好的手段。过去，我们把手段放在目标之上，真是本末倒置。

社会主义理想既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怎样才能把它变成现实呢？通过近百年的探索，现在终于找到了一条现实的道路：现代市场经济之路。

这里说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它保留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和一般特征。例如，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保持高效的竞争机制。因而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它还吸收了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兼顾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它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克服了昔日市场经济那种“事后调节”和盲目性的缺陷。

第二、现代市场经济不是昔日那种无政府主义经济，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同时不排除政府必要的干预。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兼顾公平和效率。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场经济效率高的一面，又防止金钱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使社会保持适度的平等。

第四、现代市场经济是开放式的经济。从理论上说，它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最优配置，商品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工业产品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选优配套。

现代市场经济强烈的世界性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上战争连绵不断的欧洲，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下，成了休戚相关的欧洲共同体。设想一下，如果苏联民族之间实行了市场经济，苏联还会解体吗？

过去我们有一个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能够探索社会主义之路。实际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样在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他们努力改变金钱社会的腐朽。看来，全世界人民，不分东方和西方，都在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不管这个国家现在贴着什么标签。

刊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4期

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十多年来曾有过多种不同的提法，几经争论，几经反复，现在统一了认识，即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什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呢？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今世界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资产阶级创造生产力的这种空前强大的力量，就是市场机制的力量。

二战以后的历史更是充分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无穷活力。一些较好地利用市场机制的国家，生产力就发展得快；而一些排斥市场机制的国家，生产力发展就相对缓慢。有些后进国家通过搞市场经济，日益发达起来；有些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国家，由于排斥了市场机制，因而停滞落后，这样对比的事例俯首可拾。

中国的实践更有说服力。过去 20 多年排斥了市场机制，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不利影响。最近十多年引进了市场机制，经济空前活跃起来。14 年改革的实践证明，市场取向比较明显、市场调节比重大的地区或部门，经济发展就快；与此相反的地区或部门，经济发展就慢。

竞争是提高效率保证繁荣的手段。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性很强的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效率高，这是因为，第一，它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市场竞争以严酷的损益，激励劳动者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效率，迫使经营者不断地采用最新技术和改进管理。这种激励作用使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较好地发挥。第二，市场是一架自动传递信息的机器。供求变动和价格涨落的信息，使千百万人在趋利避害中促进生产要素向高效率流动，从而使生产要素实现高效率的配置，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市场经济使千百万人千方百计地去填补社会需求空白，不会让社会有任何短缺；它让千百万人千方百计地寻求利用一切资源的办法，不让任何资源闲置。所以，市场经济会造成繁荣和丰盛。市场经济有严酷的淘汰机制，高效者生存、发展，低效者失败、废弃。所以，市场经济是高效率的经济。

过去，我们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看到它有效率，却不敢承认，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邓小平同志以共产党人的革命胆略和科学远见突破了这一禁区。早在改革之初他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就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这完全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0年12月至1991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同志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他还尖锐地指出，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就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这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成果。采取封闭态度，排斥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民族，必然走下坡路。而对人类文明成果有极大的兼容性和吸收能力的民族，必然兴旺发达。中华民族既然能吸收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也必然能吸收来自欧美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今世界是超越国界的经济竞争世界，经济竞争就是效率的竞争。要想在这场竞争中不落后、不挨打，搞市场经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2年10月7日

<<<<<

平等和效率的适度选择

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解释。

有的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市场经济。这是同义反复，等于没有解释。

有的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已经不是昔日那种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了。在今天，为了补偿市场无能为力之处，矫正市场本身缺陷，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国家的宏观调控，都有政府的干预。宏观调控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

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现代的市场经济已经不是昔日那种盲目发展的经济，社会化大生产越来越要求严密的计划。当然，这也是在矫正市场的“事后调节”和盲目性的缺陷中逐步形成的做法。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计划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属性。计划，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

还有人说，在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和特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便于多数人接受，能“祛除误会”、“防止曲解”。这里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争取群众的策略，或者作为抵御“搞资本主义”诘难的“挡箭牌”，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没有作任何界定。显然，这个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认为，用平等和效率的适度选择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有说服力。

今日世界，不管是哪个国家，有一个最基本、最普遍的选择，一直困扰着千百万个精明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学者，这就是对平等和效率的选择。

有人认为，平等和效率是“熊掌”和“鱼”，二者不可兼得。要想得到效率，就得牺牲一部分平等；要想保持平等，就要牺牲一部分效率。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偏颇之处，但是，在不少方面，这两个目标的确是有冲突的。平等，就意味着收入差别不能过大，要求更多的按人头分配的社会福利，不能因财产的差别造成人们地位的过大差别。把人从商品单上解放出来，不至于成为货币的奴隶，让匍匐在财富阶梯的人们站立起来，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尊卑。但是，根据这种平等观念所制定的规则往往和高效率的市场机制相悖。市场是一部使财富向高效率处转移的加速器。如果让这个加速器无限制地运转，则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市场经济会把金钱当作衡量一切的尺度，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一切行为的动力。这样，社会就可能变成一架靠金钱推动的冷酷机器，金钱可能变成统治世界的“暴君”。

社会主义的概念很复杂，但其最终的目标就是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主义可以对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不公平实行必要的限制。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既有效地利用市场经济效率高的一面，又防止金钱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使社会保持适度的平等。

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如社会福利保障、对低收入者的救济、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发挥工会的作用等。这些社会主义的措施，在缓和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矛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西方国家毕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引进了只不过是某些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

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为了防止不平等，除了采用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等通常措施外，还有两项最为根本的措施，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主要是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而造成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就基本上防止了少数人凭借他所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来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从而堵住了两极分化的主要根源。

为了保持市场经济的活力，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共同竞争。坚持按劳分配就可以防止收入过分悬殊。但是，纯粹的按劳分配，又会排斥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从而妨碍市场效率的发挥。所以，我们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允许按照生产要素和经营风险等进行分配。我们灵活把握所有制和分配这两个方面，既是对市场不平等趋势的制约，其程度的掌握，又是使平等和效率适度平衡的天平。

然而，平等和效率这架天平的平衡点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这个平衡点是不同的。在有些情况下，需要突出效率，让社会“忍受”一些不平等；在另一些情况下，要适当牺牲效率，多注重一些平等。像我们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效率是首要问题，因而应当让市场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但是，平等和效率这架天平是不能无限度地倾斜的。这架天平的砝码在适当的时候要作出适当的调整。过度的不平等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就无从谈效率。而保证社会平等的过激政策，不仅损失效率，而且造成严重的不平等。一个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所有人都仰仗权力分配工作、分配食品、分配一切一切。人们虽然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却沦为权力奴隶。总之，在平等和效率这架天平的两端都有奴役人们的“暴君”——一端是金钱“暴君”，一端是权力“暴君”。所以，这架天平需要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架平衡的天平，它把两个“暴君”都排除在外。既有足够的效率，又有适度的平等。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2年10月8日

注：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原时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说，这篇文章中的“平等”应当改为“公平”。我回答说：这里说的就是平等(Quality)，不是说的公平。因为公平包括公正(Justice)和平等两个方面。而公正是任何社会的最高价值，是不能放在天平上进行选择的。

权力不能进入市场

据统计，靠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共有干部三四千万人，其中党政官员有 1000 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财政拿钱的“自费干部”。这么多官员是老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也会造成对企业经营的不断干扰。所以，很多人认为，精简机构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事。

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精简机构的任务就包含在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之中。令人棘手的是，职能转换了，机构精简了，多余的干部往哪里安置？

从历史上看，一个政府很难自己解决自己的冗员问题。这好像一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道理很简单，利益是刚性的，在正常情况下，政府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官员利益减少、地位下降。有人会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计较个人利益，能自愿地从官员变成老百姓。我想，这只能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做到，大多数干部还是行不通的。要不，为什么我们多次精简机构，反而官员越来越多了呢？

还是改革年代的群众有创造力，过去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现在找到了办法。我记得这个办法最早是卓资县创造的。这个办法是具体介绍要千言万语，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先造一个“金饭碗”，用“金饭碗”换国家干部手上的“铁饭碗”。所谓造“金饭碗”，就是让党政官员出来办各种经济实体，这些在经济实体里工作的官员很多人开始是一身二任，逐渐和政府脱离关系，最后完全变成了商人。既精简了机构，又活跃了经济。

官员们在“换饭碗”过程中，有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利用政府的权力经商。过去的物资局变成了物资公司，它既有管理权力，又有赚钱的目标，这就很容易用手上的权力来实现经营目标。“下海”的官员也

会很方便地找到领导人为他批条子，要到种种优惠，或无偿得到地皮等短缺的资源。这样，权力也就进了市场。

“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然而，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主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主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哨子一边去踢球，球场会乱成一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权力进入交换领域的现象，不仅仅表现在官员们“换饭碗”过程之中，也不是现在才有，四五年前我就写文章抨击过。那时权钱交换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双轨价格进行“官倒”。我在文章中说：“物资短缺加上双轨价格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藪。”由于价格的放开，市场供求状况的改善，双轨价格带来的问题比过去少了。但是，权钱交换的情况没有好转，甚至还有发展之势。进出口许可证、批文、免税指标、低息贷款、紧缺的地皮、甚至官帽子，都可以进入交换领域。只要权力进入交换领域，权力就会成为最稀缺的商品。逐利者就像苍蝇追逐臭肉一样追逐权力。这样，权力也就变味，权力的行使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应该说，官员们拿手中的权力直接进行交换还是极少的，权钱交换还是极少的。权钱交易一般是通过接近各级权力中心的人作中介。这些人都是权力交易的掮客。干部子弟、领导人的秘书、接近上层的新闻界人士、离退休干部等，都有条件干这种事情。当然，真正干这种事的是他们当中的极少数人。

有了权钱交易的大背景，官员们在“换饭碗”的过程中走这条赚钱的捷径也就很自然了。而权钱交易又使“换饭碗”走上了邪路。

另外，官员们“换饭碗”时，脚踏两只船，既有“铁饭碗”的安全，又有“金饭碗”的实惠，“下海”失败还可以回到“岸”上来重新掌权。我们担心，如果没有必要的制约，政府的大门可以自由进出，恐怕付出了

深重的社会代价，却达不到裁剪冗员的目的，到那时，就很难向群众交代了。

看来，用“换饭碗”的办法来精简机构，必须严防权力进入交换领域；要保证中国改革大业成功，必须严防权力进入交换领域；要保证社会长治久安，也必须严防权力进入交换领域。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5年2月11日

<<<<<

发展市场经济，防止拜金主义

有些同志把市场经济和道德视同冰炭，认为二者不可相容。由此，有的人得出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结论；也有的人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道德就可以抛到九霄云外。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相伴而行的。没有精神文明，就没有物质文明。没有道德的制约，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道德不仅是社会的灵魂，更是市场的灵魂。如果说，市场法规，市场管理制度是作为外在的强制来规范人们行为的话，那么，市场道德则是通过内在的自觉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建立在每人的心灵深处，它比外在的强制影响更深远、更广泛。

市场经济是按照价值规律运行的。价值规律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也就是说，我付出了多少，就只能向对方索取多少；我得到了对方多少，就必须付出多少。索取过多和付出过少都是不应当的。巧取豪夺和等价交换就不相容。

市场道德并不要求进入市场的人毫不利己，而是要求在利人的前提下利己，通过利人来实现利己，绝不能用损人的手段来达到利己的目的。以邻为整，坑蒙拐骗是对市场经济的玷污。

在市场交换中，一方的义务是另一方的权利；一方的权利要靠另一方履行义务来实现。言必信，行必果，交换双方的利益才有保证。因此，商业信誉是市场交换能够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欺诈行为不仅葬送欺诈者的信誉，也破坏了市场交换的秩序。

市场经济的要义在于竞争。在竞争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竞争没有国界，是天生的国际主义者；商品是科学技术的结晶，它必

须遵循科学的法则。这些新的道德规范、新的精神文明将在市场经济中确立。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尊严和饥饿很难友好相处，没有物质文明，就很难实现精神文明。市场经济造就一个丰裕社会，也就造成了实践道德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最根本的方面来说，把市场经济和道德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拜金主义。拜金主义，把金钱看作高于一切的主宰，当作无所不能的神灵。“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只要一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为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莎士比亚剧本中的这段台词深刻地讽刺了金钱万能，也是拜金主义的生动写照。如果听任拜金主义的发展，人将变成金钱的奴隶，社会将变成冰冷的点钱机，人性的火花将在物欲中泯灭。

既然市场道德以等价交换为基础，斤斤计较物质利益不是市场道德所允许的吗？对金钱的追求不也是合理的吗？是的，在市场道德这个层面上，这些都是应有之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道”就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道德。然而，这些是以“经济人”假设推导出来的市场道德。实际上，大家都是“社会人”。因此，必须有一种比市场道德层次更高的道德约束，这就是社会道德。市场道德，仅仅是调整、控制市场交换行为，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调整、控制人们的社会行为，维持社会秩序，仅靠商业原则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道德。社会道德可以对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起制约作用。

如果说，市场经济原则，可以激励人的创造性，提高经济效益；那么，社会道德原则，则可以限制人的劣根性，保证社会公平。

尽管我们承认经济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但是，经济活动不能代替一切社会活动，国民生产总值不是评论社会的唯一指标，经济原则也不是维系社会的唯一原则。不能把社会上的一切都换算成美元、英镑、人

民币，很多东西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标明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的一种方法，不能广泛地推行于现实社会。

对人们来说，还有比金钱更宝贵、更崇高的东西。人不是经济动物，人更有高层次的追求。人们不仅需要经济的实惠，更需要理想的阳光，需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温情。因此，作为市场道德的等价交换原则不能无条件地推广到人际关系中去，在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冷酷无情的斤斤计较会失去友爱与温馨。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还是应当提倡无私的奉献，还需要献身精神。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3年3月23日

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

苏哈托下台了。他留下了一个金权王国，留下了一个腐败不堪的王国，也留下了很多让世人深思的问题。

苏哈托执政 32 年，他和他的亲属利用权力大量聚敛财富。据海外报刊估计，苏哈托本人拥有资产 160 亿美元，其家族拥有资产 400 亿美元。如果他拿出个人财产，印尼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求援助，就能渡过目前的金融危机。

苏哈托家族在全国 1247 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 20 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他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无孔不入，无利不爭。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66 年的 70 美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1160 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

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外部的漂亮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旦权力市场经济形成，就积重难返，想改变局面很难。印尼就是一例。

在印尼，当官的工资不高，但灰色收入很多。不论是中央大员，还是乡村小吏，都可以利用权力谋私。海外报刊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贪赃枉法、拥有不义之财大有人在。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污？退一步讲，即使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清污运动难以开展。真要开展，也要以天下大乱为代价。这些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一度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在印尼急需恢复经济元气的时刻，是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的。

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印尼的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这对于急需引进外资的国家来说，其负面影响是很严重的。

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苏哈托家族成为印尼首富，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权力参与竞争的产物。只要权力参与竞争，竞争就不可能平等。没有平等竞争，市场经济就失去了自身的秩序，就扭曲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引起社会动荡，那就国无宁日。

印尼是讲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制，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比法制更为重要。

苏哈托和其家族的行为使世人明白了不少道理。一些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最近几年，我曾发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的呼喊，但回音渺渺。现在有了苏哈托这个活生生的实例，麻木的人们也许会清醒起来。

刊于《方法》，1998年第8期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现在中国有一个基本矛盾：市场化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现代红顶商人”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由这一基本矛盾派生出很多矛盾：

一是政治高度集中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矛盾。国家过去的一个利益主体发展为中央财政、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个利益主体。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再实行中央政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政治体制，必然问题丛生。中央政权必须由过去包揽一切、统管一切的职能，向协调、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寻求最佳利益结合点的职能转变。

二是日益弱化的中央调控力量再也不能实行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央调控能力削弱首先表现在财政上。预算外收入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比例：1978年是31.0%，现在接近100%。所谓预算外收入，就是中央政府不能控制的财政收入。与预算外收入增加相关联的是，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力分散了，事权还没有相应分散。国家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而一些本来必须由政府办的事却没有力量去办好。

三是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冗员使社会无法承受。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过多次机构精简，而每一次精简过后，必然带来更加严重的膨胀，膨胀—精简—更膨胀—再精简……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由此急剧增加。实际上，仅靠国家财政提供的行政管理费是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主要是利用权力

创造收入。

四是政治改革滞后，权力缺乏制衡，公务活动不透明，舆论监督软弱无力，使得原有的权力结构和新的市场关系的恶性结合，权力和金钱的交换肆无忌惮，社会不满情绪加剧。

五是信息全球化和封闭政治体制的矛盾。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NP的45%，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了20万家。经济交流伴随着信息交流，每年接待的500多万外国游客也带进带出大量的信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通过计算机互联网，参与了全球信息共享。信息全球化的洪流冲击着意识形态的藩篱，扫荡着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带有相当强的封闭性，和信息全球化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六是经济改革继续深入和现行政治体制的矛盾。邓小平1986年9月说过：“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十九年以后，面临的种种困难，几乎都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这是当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有人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今中国正待开采的“富矿”，开采这个“富矿”，可以大有收获。这话有理。其理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缓解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有利社会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开辟道路，解决经济改革中一直难以解决的难题；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一点新的成果，都可以增加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权威，成为进一步开拓前进的政治实力。

然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方面的国际实践：一是苏东因政治体制改革而诱发天下大乱的教训；二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巴西先搞经济市场化，经过若干年后，再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经验。一正一反的经验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踟蹰不前。其实，我们的情况和苏东不同。他们在政治改革前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亚及巴西的经验恰恰证明，经济市场化以后迟早要实现政治民主化。

毫无疑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但是，将政治体制改革无限期地拖下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长期不相适应，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累，到时候会出现更大的风险。

现在的问题是要讨论出一种办法，一种既能保证社会安定、又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组织力量研究这个课题刻不容缓。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改革。前者比后者的代价要小得多。对原有利益集团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要有利得多。想百分之百地保留利益，顽固地反对改革，结果会百分之百地失去利益，利益集团就和维系它的制度同归于尽，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英王室主动变革，保留了王室很多特权；法国被动变革，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日本搞明治维新，社会矛盾解决了，王室的名义也保留下来了。清末如果按光绪帝的主张，搞君主立宪，君主的名义还可以保留，王室的既得利益也可以部分保留。顽固派害怕失去王室的利益，反对主动变革，使矛盾积累，最后是被迫变革。不仅社会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王室的名义和利益也完全丧失。

苏联到六十年代，体制的矛盾已很尖锐。如果主动变革，这些矛盾有可能缓解，苏共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在政治上起作用。勃列日涅夫反对自觉变革，十八年的统治使矛盾进一步积累，最后还是被迫变革，苏共下台，苏联解体。

此文写于1995年春，1997年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权力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交易

在市场经济社会，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是市场准入必须平等。进入市场的企业和个人，只要他们具备法定的条件，都应当有进入各个行业市场的机会，如果用行政办法或其他手段使某些企业可以进入、某些企业不能进入，就不可能有公平交易和竞争。

其次是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必须平等。企业经营必须有各种社会资源，如土地、资金、技术、经营权力、上市资格等等，企业应当以平等的身份，以同等的机会，通过公平交易和平等竞争得到这些资源。

第三是交易双方信息必须对称。交易各方对有关这笔交易的信息，必须同时完全知晓。

第四是企业的税赋必须平等。税收对各种经济成分、各类市场参与者应当一视同仁。

第五是必须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环境。

现今中国的市场环境不具备上述条件。

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出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情况：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各种生产要素快速资本化，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停止，原有的权力结构更加强化。这两种情况造就了“权力市场经济”。

即以权力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只能是一种梦想。

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极力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1993年2月11日，我在《经济参考报》的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的评论，力陈权力进入市场的危害。很不幸，现实发展和我的期待相反，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和资本联姻，成为市场上的强势。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中的“势能”。“势能”大小依在“场”中所处的地位呈梯度分布：离权力核心越近，“势能”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势能”越弱。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一旦进行市场交易，“势能”就变成了“动能”。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为此，市场上的人们就千方百计地接近权力、收买权力；官场上的人们也不择手段地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挤入高能位置。有这样一个传说：某项专利技术长期无人问津，一个聪明的商人得到这项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发明，很快订单如潮。这位商人把同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放到了“权力场”的高能位置，交易状况立即发生了变化。买者意不在技术，而是把买技术当作高攀的梯子，提高自己在“权力场”上的“势能”。

“权力场”上高能位的人群就是当今人们说的权势集团。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经著文称他们为“红顶商人”，并说“红顶商人”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权势集团利用改革中的每一个机会、在每一次交易中大量聚敛财富。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他们聚敛财富有几个高潮：

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进口商品赚钱、出口商品亏损,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就这么一张薄纸,价值千金。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1吨钢材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500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3569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拿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以市场价格转手,很快成为富翁。

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权势集团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价格时得到的财富。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权势集团巨大的敛财空间;土地的批租,银行贷款的取得,城市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权势集团大有作为的机会。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一场持续几年的大规模的“民有化”。它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民主,当然不会公正。国有资产重组制造了大批亿万富翁。国企改革中“管理层收购”,实际是企业领导人自卖自买,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勾结,在“管理层收购”中瓜分国有资产。

新世纪以后的公司并购,是权势集团侵吞国有财富的盛宴。2006年5月,有权力背景的两家私人公司以37.3亿元收购了价值738.05亿的鲁能集团。此事经媒体曝光,舆论大哗。中国证监会不得不宣布此项收购违法。2008年2月,这两家有权力背景的私人公司,以总价83.22亿元,将持有的鲁能集团的股份卖给山东的国有电力公司。仅持股一年多时间,一进一出,就赚了数十亿的差价。

权势集团在以上各个时期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更高明。除几次敛财高潮以外，“寻租”活动一直贯穿整个改革过程之中。通过行政管制造成的利益差称为“租金”，双轨价格是一种租金，各种行政许可中有“租金”，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更有巨额的“租金”。吴敬琏先生说，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5万亿元。政府官员手中掌握这笔“租金”，商人就“寻租”（即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利益差）。掌握“租金”的官员同寻租的商人大获其利。

美林和凯捷集团联合发布的2008年度《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名富裕人士（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不包括自住的房地产），较2006年增加20.3%。2007年中国富裕人士拥有的财富总值达2.12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22.5%，平均资产为510万美元。报告还说，中国共有6038位超级富裕人士，其拥有的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

不公平交易一方面制造富翁，另一方面制造贫困。处在“权力场”低能位置的群体，在一系列的改革中没有谈判地位，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损害：在“减员增效”中，4000多万国企职工被赶出了工作多年的企业；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4000多万失地农民。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活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工，工资压得很低，这点血汗钱有时还被拖欠。

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贫富差距之大使社会难以容忍。不公平交易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刊于《中国改革》，2009年第2期

对 外 开 放

<<<<<

围墙，围墙，围墙

不久前，我参加一个经济考察团访问了美国、墨西哥、巴西三国。在途中，除了思考一些经济问题外，有两个字反复在我脑海里闪现：围墙，围墙，围墙。

我们在美国没有看到围墙。

美国总统办公和生活的白宫也只是用铁栏杆隔离。草坪上活蹦乱跳的小松鼠，夹着公文包的政府官员进进出出，从栏杆外面清晰可见。白宫是对外开放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到里面去参观。

美国的国会大厦门前没有岗哨。人们可以到里面去参观、拍照，可以在各个会议厅穿行。

联合国大厦向全世界的游人开放，各个会议厅和各种工艺品任人参观，任人照相。我们看到各种肤色的游人毫无拘束地在这里进进出出。文质彬彬的讲解员不厌其烦地向游人介绍这里的一切。

美国 NBC 广播公司总部，就在纽约繁华的市中心。临街的墙是玻璃的。街上来往行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里面广播员、主持人的一切活动。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之音”大楼，只要在门口登个记，就可以到各个办公室走动。如果

你高兴的话，也可以坐在广播员的位子上照一张相。

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在加州伯克莱分校，我们都没有看到围墙。我们的汽车自由进出，没有人阻挡。

不仅是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就是在墨西哥，重要机关也不是用高墙隔离。在墨西哥城，总统接待外宾和办公的国民宫，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游人，都可以进去游览。在庄严的大法官办公室里，我们还坐在大法官席上照了一张相。

对资金而言，美国也是没有围墙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围墙里的人的确有点为他们担忧。现在，外国银行在美国设立了大量的分支机构。这些外国银行对美国工商企业的贷款占美国工商贷款总额的25%，在有些城市更高，如纽约占53%，加州占43%。外国银行进入美国以后，大量兼并或收购美国的企业和资产。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哈迪公司，被外国人兼并了。美国高级法院大楼、联邦通讯委员会大楼被外国人买走了。纽约埃克森大厦、花旗公司总部大厦也被外国人买走了一半产权。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资本也大量流出，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也持续增长。当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在国外看到这些，我们总是想到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机关、学校、企业，总是紧锁在高高的砖墙里，使人们有一种“侯门深似海”的感觉。

我记得七八年前，还是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当市长的时候，他提倡各单位拆掉高墙，用透明的铁栏杆或花墙来代替。果然天津城市面貌变化了不少。被高墙分割的城市贯通了，各单位院墙里的花草树木成了城市的公共景观。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对天津的做法赞扬了一番。

当然，拆除围墙的意义不在于改善城市景观，而在于破除围墙意识。

围墙意识是一种保护意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胸有城府”。这些“国粹”，在人际关系之间建了高高的“围墙”。

刘先生在美国生活了八年。我问他在人际关系方面美国和中国有什么不同。他说，中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坏人，美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好人。中国

人先把别人看成坏人加以防范，通过交往，逐步建立信任，逐步减少防范，最后才成为朋友。美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好人，对你信任，一旦你的行为失去了他的信任，你在他的头脑里就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坏印象。他举了一个例子：八十年代初到美国的中国人，美国的银行很信任他们，每人不交钱就可以办 5000 美元的信用卡。但是，有少数中国人回国前拼命采购，把 5000 美元花光后一走了之。从此以后，美国的银行对所有的中国人改变了态度：交多少钱，就办多少钱的信用卡。

“围墙”在保护自身的同时，也禁锢了自身。它禁锢了墙内人的视野，禁锢了墙内人的思维。

和“围墙”意识相对应的是开放意识。自然资源在地球上的富聚，人文资源在社会上的聚集，是不平衡的。只有扩大资源的配置空间，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围墙”意识必然造就“围墙”经济，只能在“围墙”内配置资源。围墙意识必然造就“围墙”政治，只有“围墙”内的人才有知情权和决策权。很多重要政治决策对“围墙”以外的人秘而不宣。开放意识就是全球意识，就是民主意识。

和围墙意识相伴随的是窥视意识。围墙里到底有什么？“重门深锁无寻处，疑有碧桃千树花”，围墙里面是一个可以激发人好奇心的未知王国。有人封闭必定有人想突破封闭。于是，打听别人的事、关心别人的事，就成为中国人的一大心理特点。张家长，李家短，是茶余饭后最开心的话题。由关心别人的事到干涉别人的事，而干涉别人的事常常引发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美国长期居住的华人告诉我，不关心别人的事，不干涉别人的事，不看别人的热闹，不议论别人，是美国人的一大特点。美国人，只埋头干自己的事情，只是拼命地为自己赚钱。这并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有些美国人还是乐意助人的。当你站在街头犯难时，就会有人过来问：“需要我帮助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为之写稿的《方法》杂志的宗旨：一本“专门评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在对待围墙的态度上，是美国人聪明呢，还是中国人聪明？我在《方法》发表上述文字，正是为了向诸位同仁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刊于《方法》，1995年12期

用好外资，也要用好内资

多年来，国家采取信贷额度分配的办法来控制信贷规模。银行的信贷资金像一块大蛋糕，切成一块一块地分下去，这“一块”的大小就是“额度”。各专业银行总想自己分得的蛋糕块儿大一点，年年月月叫喊信贷额度不够，千方百计地向中央银行要信贷额度。可是，近几个月来，我国金融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商业银行不仅不要信贷额度，反而把大笔已经分配给它的额度退给了中央银行，把分到了手的蛋糕退了回去。

这一奇特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第一个原因是，专业银行找不到可以贷款的项目，信贷额度花不出去。对专业银行来说，一方面存款在不断增加，每天必须向储户付利息，另一方面却找不到理想的贷款对象，钱没有生息的去处。银行的存款比贷款多出的差额叫“存差”。存差是“赔本赚吆喝”的傻事儿。1995年存差3468亿元，1996年存差高达7439亿元。今年的存差还会很大。为了补偿利息损失，银行剩余资金从以下几个渠道找出路：一是买国库券。今年的债券大部分没有卖给老百姓，银行自己买了。银行持有国库券，是图债券利息，比钱白放着强。这一条渠道数量有限。二是流向股市，这是今年二季度股市过热的重要原因。今年国务院不让银行资金进入股市，这条渠道堵住了。三是通过账外账变着法儿拆借或转贷出去，结果是金融秩序混乱。这一条道1993年以后就堵住了。剩下的是一条最简单的办法，把信贷额度退给中央银行，今年就是这么做的。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退还贷款额度，该贷的额度没有贷出去。今天1至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8%，大大低于常年的增长幅度（“八五”赶上三年治理整顿，

平均增幅也有 16.5%)。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降说明经济景气度不高,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有形成。

今年投资增幅下降不是货币当局的主观意愿,不是行政行为,而是市场行为。这种行为的决定因素是投资收益率不高于(甚至低于)贷款利率,投资者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现在到处可以看到过剩,各种商品都是愁卖不愁买,连政府当作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住房和汽车也大量积压。把资金投入产品过剩的领域,赚钱的可能性很小。钱还能往哪里投资呢?当然,这种过剩是结构性的。在基础产业,在农业,在技术进步方面,还是需要投资的。不过,在这些需要投资的领域,需要的资金都是巨额的,回收期也是很长的。目前还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融资方式,把分散资金集结为巨额资金,把长期收益化为近期收益。这种方式是有的,但是没有利用它的政策——例如关于发放重点项目债券的政策。

投资增幅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发收缩,也说明金融改革已经出现了成效。从银行这方面看,银行商业化有了进展,资金“大锅饭”问题有所好转,风险约束增强。宁可不贷,也不愿出现坏账。专业银行开始认真地算账了:把钱放在中央银行,利率是 7.92%,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存贷利率差,何必再冒着风险贷款呢?从企业来看,盲目贷款的情况大大减少,借钱时考虑还债了(过去国有企业厂长借钱是不想还的),对利率敏感了,投资收益率不高于银行利率,企业决不投资。多年来,我们用行政办法把信贷资金切块下达。这种额度管理的办法是违背金融规律的,理论界多有批评。但是,在银行不怕坏账、企业不想还钱的情况下,额度管理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今年出现的信贷额度过剩的情况说明,取消信贷额度管理已经为时不远了。

银行的钱贷不出去,是钱太多了吗?不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这方面需要的钱很多。我们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高,技术改造也需要很多钱。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资金是稀缺资源。我们还需要引进外资。从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吸引外资逐年大幅度增加,到 1993 年就成为全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 389.6 亿美

元，1996年实际利用达到548.4亿美元。

引进外资是必要的。今后我们还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考虑：为什么一方面大量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内资花不出去呢？这中间恐怕有一个体制问题。举一个例子：有的地方修公路没有钱，就把已经修好、正在收益的公路抵押给外方，从外方那儿换取外汇，再拿外汇换成人民币修路。名义上是利用外资修路，实际上外资在这里只是一种利用内资的“中介”。通过外资转换一下，还是用国内的资金修路。现在老百姓手中的金融资产已有几万亿元，正苦于没有增值之路。为什么不通过某种方式用公路的收益权换老百姓手中的钱，却舍近求远、去用外资作中介呢？

我们要引进外资，我们更要用好内资。现在缺钱的地方很多，银行手中的钱却花不出去。这说明用好内资大有文章可做。短期投资的机会少了，长期投资有机会；在加工产业投资机会少了，在基础产业大有机会。但是，在这些有机会的投资领域，内资没有外资那么灵活。外资的活动空间比内资大得多，自由得多。

要用好内资，需要有灵活的政策。要把内资、外资、外汇储备综合考虑，以求得最佳综合效益。要把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综合考虑，找到最恰当的调节杠杆。要把银行信贷、股票、各类债券综合考虑，为内资找到合适的金融工具。当然，这些都是金融家考虑的事了，笔者不敢妄评。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7年9月23日

<<<<<

立足内需也要放眼世界

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有的同志由此提问：这是不是让我们的企业只关注国内市场，不参与国际竞争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说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并不是让企业眼睛只盯在国内，而是以国内市场为立足点，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们一直提倡企业走出国门，放眼世界，我们在建立开放型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 1993 年开始，我们连续六年成了除美国以外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按当年汇率计算，1978 年中国出口额仅有 97.5 亿美元，1997 年达到 1872 亿美元，增长了 17.7 倍。开放前完全依赖进口的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组合音响等产品也大量出口。过去，中国是技术引进国，现在既引进技术，又出口技术。

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经济开放度”。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的经济开放度逐年提高：1978 年不到 10%，1994 年超过了 40%，最近几年略有下降，也接近 40%。

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联成一体。今天的企业再也不可能眼睛只看到国内，现在说“把扩大国内需求当作立足点”和 20 年以前的“立足国内市场”有着全然不同的内涵。过去讲立足国内市场是一种万事不求人的封闭观念，今天讲立足国内市场，是用世界眼光来看国内市场，是脚踏实地参与国际竞争。

今天的中国市场是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不少跨国公

司已经进入中国，他们都想在中国市场中争得更多的份额。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就是国际竞争。我们说立足于国内市场，就是在中国市场上开展国际竞争。没有国际眼光、没有国际竞争能力，就是中国的本土企业，也难在中国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更谈不上开拓国外市场了。只有在国内市场打胜仗，才能在国外市场上打胜仗。

在这方面，天津药业公司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有一种地塞米松的药品，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用行政手段，使国产地塞米松替代了进口。开放以后，法国罗素公司的地塞米松很快垄断了中国市场。由此在中国市场上展开了一场持续 20 多年的“地塞米松之战”。天津药业公司经过不懈的努力，使国产地塞米松的质量达到了国际上最高的水平，成本也大幅度下降。罗素公司为了在中国市场上站住脚，多次大幅度降价，企图用价格挤垮天津生产的地塞米松。由于天津药业公司占有技术上的优势，你降我也降，我降价的幅度比你还要大，逼得罗素公司不得不退出了中国市场。到 1998 年，天津药业公司的地塞米松完全独占了国内市场，他们还把“地塞米松之战”打到了罗素公司的门前，打到了塞纳河畔。

出口商品总额和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美国、日本都在 10% 以下，很少有国家超过 20%，而我们却高达 20% 以上。从这个侧面也说明，我们的国内市场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口比过去困难了，把过去没有挖掘出来的内需潜力挖掘出来，是缓解当前困难的一个出路。但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并不只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短暂之计，在国际经济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立足于国内需求，可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当作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特别是在国内需求不旺的情况下，困难更多一些，它需要方方面面做出努力：

它为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出了新课题：怎样加大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力度？怎样让居民把更多的存款变成现实的有效需求？

它为我们的工业部门提出了新课题：我们的机电行业、医药行业、食

品行业、日用工业品行业等各行各业，怎样生产出满足国内需要的产品？也就是说，怎样在国内市场上和外国产品决一雌雄？在钢铁行业，国内需要的关键高档品种和高档板材，只能满足 1/3 到 2/3，国内机电设备 53% 靠进口，对这些行业来说，立足于国内市场，有着广阔的天地，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它为我们的商业部门提出了新课题：在平等竞争的原则下，怎样尽可能用国内生产的产品满足国内的需要？怎样扶持国内商品，使之满足国内需要？怎样在你的柜台上让国产商品和外国产品平等竞争？

它也为我们的消费者和用户提出了新课题：在同样的性能价格比情况下，少一份崇洋心理，多一点爱国热情，尽可能为国产货多投一些货币“选票”。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9 年 2 月 5 日

全球化不是霸权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

全球化的趋势将是影响二十一世纪的重要因素：

生产和贸易全球化。工厂为全球各地生产，零部件在全球择优配套，用户在全球范围内择优选购。谁的商品最优，谁就可以在全球得到用户。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资源优化配置，在世界范围内分工协作，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买到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商品。商品的洪流不仅跨越重洋和关山，而且最终会把一切国界的围墙夷为平地。

金融全球化。资金以光的传播速度在全球流动。今天，纽约银行的外汇交易业务员在电脑的键盘上轻轻一敲，东京和伦敦之间的巨额外汇买卖就立即完成。在当今世界，资金已经没有国界，哪里增值最快它就流向哪里。

信息全球化正在冲击着意识形态的藩篱。信息高速公路延伸到了每个国家、每个单位、每个学校和越来越多的家庭。计算机网络几乎网罗了全球的一切信息，网罗了各种不同看法、不同信仰的人共享这些信息。从此，全球每个遥远的角落“鸡犬之声相闻”。这为全人类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条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术彻底失效。

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哥伦布 70 多天的行程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地球变得太小了，人类相互的距离缩短了。人员、物资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交流，交流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一切自然的或人为的边界轻而易举地被越过、被冲垮。地球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很快影响、波及另一个角落。

核武器结束了靠武力征服他国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从而失去了通过战争取胜的动机。核武器时代，世界大战就是世界毁灭。防止自我毁灭是人类应有的理智。联合国大厦前面“化剑为犁”的巨型雕塑，正是这种理智的象征。今后的战争只能是局部战争。当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是理智的产物，至今也没有人断言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也没有人否认人类的理智的作用，没有人断言一定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全球化，不仅有“利”，而且有“害”。在全球范围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的利害关系把人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延缓地球资源枯竭，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需要全人类共同行动。“救救地球”是人类共同呼声，也必须由人类共同行动。生存危机又把人类活动联结在一起了。新技术革命已经把人类活动推向了宇宙空间。为了逃避将来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地球灾难，人们共同走向宇宙，向外星进军。对宇宙来说，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向外星进军的人类，就像过去地球的一个部落向新的生存空间进军一样，无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国家利益：与全球化相反的力量

不过，我们对全球化也不能抱着过于天真、过于乐观的态度，还有一种与全球化相反的力量。

当今世界有强国，也有弱国；有富国，也有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已经太大。在资源分配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占有很大优势。如果按目前的全球化原则（即单纯市场原则）行事，就会使两极差距拉得更大。而全球化种种规则的制定，强国富国的发言权实际上要大于弱国和穷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证，发展中国家当然不会甘心受强国的主宰。所以，全球化必然伴随着一个利益摩擦过程。一方面，发达国家可能利用全球化的趋势扩大本国利益，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抵制全球化原则（贸易自由，资本流动自由，信息传播自由等）。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霸权主义者借全球化的

理由企图成为全球的霸主，强制推行有利于本国的原则；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有些专制政权，借维护国家主权的理由，强化专制统治。发展中国家用民族主义来保卫自己，发达国家用世界主义来压制民族主义。全球化是大趋势，而霸权主义是不可逾越的现实，用维护主权的名义来维护专制也是不可逾越的现实。

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地发问：

难道全球化就是开除发展中国家的“球籍”吗？

难道全球化就是让发达国家“吃掉”发展中国家吗？

难道只能由发达国家来支配人类的命运吗？

是“主权至上”还是“人权至上”，也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争论。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这首先表现在经济上对全球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

发达国家要求商品在全球自由流动，发展中国家要求劳动力在全球自由流动；

商品自由流动使发展中国家工业无法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影响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结果还是按发达国家的意志办：商品自由，劳动力不自由！

劳动力也是商品，为什么发达国家把它排除在商品之外？

这种不同态度的极端表现为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中描述了这一冲突：

许多高科技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动机。他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使人费解。形成对照的是，民族主义者也无法理解有些国家怎么竟然允许其他国家侵犯其神圣的独立。然而第三次浪潮推动的商业和金融的“全球化”，经常穿透新民族主义者视为无上神圣的国家“主权”。……当经济落后地区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在创造国歌的时候，第三次浪潮国家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已在讴歌“无国界世界”和“星球意识”的理念了。……在未来世界里，这一冲突可能会招致最坏的流血事件（《创造一个新的文

明》，陈峰译，上海三联书店，第19页）。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问题基本解决；而南北问题解决起来，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南北问题不解决，全球化就难以真正实现。东西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南北问题是贫富差距问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比意识形态问题需要更长的时间。

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抑制民族主义情绪

全球化是人类几千年以来的理想。世界大同也好，共产主义也好，虽然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希望消灭人类互相残杀的战斗，消灭国界对发展生产力的约束，消灭国界对人的创造力的约束。但是，世界大同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不能实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力水平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国家之间经济差距太大，就难以平等联合。当国家之间经济差距缩小了，各国以平等的资格进行合作，矛盾就小了。欧洲能实现“一体化”，是因为欧洲国家之间经济差距很小。“全球化”，是不是要等南北差距缩小了才能谈起？现在谈全球化是不是有点太超前？这倒不一定。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的过程，是一个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冲突和消融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之间协作和摩擦此消彼长的过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过程。二十一世纪这个过程将会加速。

全球化必须在各国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这是个自愿的联合过程。某些拥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强国，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统一”世界。靠军事力量来征服、靠经济力量来控制，把全球都“化”到自己的名下，这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不可能“统一世界”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霸权主义不仅影响世界安定，也会阻碍全球化进程。在霸权主义的威逼下，民族主义的出现是难免的。对一个受霸权主义凌辱的国家来说，它有两项任务，要实现民族解放，也要现代化。而民族解放的紧迫性高于现代化的紧迫性，民族解放是第一位的。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全球化的障碍。但这二者不是半斤八两，霸权主义是主导方面。霸权主义

消失了，民族主义才会消失。因此，站在历史大趋势的角度，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也不应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想利用民族主义来维护专制统治的人，小心伤了自己，伤了本国的人民。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将起积极作用。中国已经汇入了全球化的潮流。就经济而言，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当年 GNP 总额已突破了 40%。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已经打开的大门再不可能重新关上。中国一定会加入世界经贸组织(这是一个推进经济全球化的组织)，但中国也不会牺牲民族利益加入这个组织。由于中国和世界已经不可分割，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霸权主义有损全球化，所以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会有损中国利益，所以中国不会片面地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会积极推动全球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中国的存在，就可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发言的分量，从而抵制某些国家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推行霸权主义。也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时，中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都有利于加速全球化进程。

刊于《方法》，1997 年 6 期，《新时代》，1999 年第 6 期

用对内开放迎接对外开放

WTO的大门已经向我们敞开。中国经济将更深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近日就这个话题与京城的经济界朋友交谈，交谈中形成了这么一个看法：要用对内开放迎接对外开放。

这个看法的提出，是因为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不够协调。

例如，我们十分注重利用外资，但却有大量内资找不到出路。居民储蓄近7万亿元人民币，还有手持现金一万亿元，私人外汇存款近800亿美元。这一大笔资本在国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有相当一部分逃到境外。我们唯恐吸引外资不足，但每年外逃资本相当于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的60%以上。在外逃的资本中，除了一小部分非法所得以外，主要原因是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出路。所以，有一部分资本逃出以后，在境外改头换面，再以“外资”的身份流回国内。为什么要改头换面呢？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上，外资比内资享受更多的优惠。外资在市场准入、税收、外汇管理、产业政策等多方面享受到“超国民待遇”，而中国国民的资本（内资）连基本的国民待遇也得不到。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资金不足，出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而改革开放20多年以后的今天，在我们加入WTO以后，如果还继续维持这种情况，那将会对我们的国民经济造成危害。因此，我们必须搞好对内开放，创造内外资平等竞争的条件，形成内外资兼收并用的机制。

又如，我们的汽车、电讯、石化等很多重要行业已经广泛地与外资联姻，而对国内的民间资本却大门紧闭。我们很多产业对外资开放，却不对中国的民间资本开放。这也是对内和对外不协调的一个方面。我们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时，希望政府投资能够带动民间投资，但是，不少行业不对民间资本开放，你叫民间资本投向何方？

对内开放不够还表现在地区封锁上。地方政府通过种种行政手段，设立商品进入壁垒，以保护当地产品。有的以红头文件硬性规定不准外地商品进入；有的限制外省商品进入比例；有的以技术标准或卫生检疫的名义增加进入难度；有的收取各种费用，以增加进入成本。这些手段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如出一辙，它却发生在中国这个统一大国之内！

行业垄断也阻碍着对内开放。举一个例子：作为制造业的主要用户，如电力、铁路行业有一个特点，供应商是分散的，用户是垄断的。这些具有垄断力的用户，肥水不流外人田，将自己的修造厂发展为设备制造企业，并用内部补贴的办法压低设备的价格，从而使国内专业制造业的产品不能进入。这对我国电力设备、机车车辆等行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阻碍了我国的电力设备和机车车辆行业发展，这类重大设备还得从国外引进。

如果在以上诸多方面搞好了对内开放，实现了内资和外资平等竞争，资金、商品、人力资源，在地区和行业间畅通无阻，那么，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生机勃勃，企业和行业的竞争实力就会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就能够用好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国际分工中就能更好地趋利避害。

弱势群体看汇率

中国已经全方位开放，外贸依存度已达 40%，汇率的变动对所有人的利益都有影响。但是，汇率的变动对不同利益群体的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汇率的变动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引起财富的再分配。

有这样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对出口产品依赖性较强。人民币贬值对这样的群体收益大于损失。农民就是属于这样的群体，因为农产品出口对农民的利益影响很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工人，也属于这样的群体，出口产品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就增加。而这两个群体恰恰是当今中国的弱势群体。

据 2001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中国出口商品金额，从商品类别中挑出来自农业的产品，就可以算出：2000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约 240 亿美元，按 8.3 的汇率换算，为 1992 亿元。如果人民币贬值 5%，即汇率为 8.8，则农业出口收入为 2112 亿元，农民增收 120 亿元。这仅是次要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民币贬值会提高我们农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扩大农产品出口，由此给农民带来的利益是无法算出来的。当然，中国农业问题主要不是汇率问题，但汇率对农民利益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近来报刊上所说“新东北现象”，是指入世后我国农业尤其是东北农业面临的困境。原来出口的农产品出不去，大量的外国农产品涌入中国。摆脱困境的主要办法不在汇率，但是，汇率变动也是摆脱这一困境可以运用的手段之一。人民币币值居高不下，对“新东北现象”只能是火上浇油。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和国外低价粮食的冲击，传统的“北粮南运”的流通格局将被打破，很有可能出现“南进北不出”的情况。汇率对这一情况能否出现有着重要影响。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的忍耐力。但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币值相对抬高，中国弱势群体的劳动力价格也就相应高估。在当今世界，产品可以在国际流动，但劳动力不能在国际流动。但是，如果把劳动力物化为产品出口，即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就是变相向国外输出劳动力。人民币币值相对抬高以后，就阻断了中国通过变相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口压力的通道，减少了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机会和工资上涨的可能。

和上述弱势群体相对应的还有另一些群体，他们的利益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性强。对这样的群体来说，人民币升值收益大于损失。买进口汽车的人，消费洋货的人，如果人民币升值，他们的洋消费就更便宜。人民币一升值，原来20万元才能买到的汽车15万元就能买到，他们当然会很高兴。人民币的坚挺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刺激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从而进一步带动进口商品的增加。但是，这样一来，那些在中国工厂里生产同样产品的工人就会失业。这些工人不能享受这些进口商品，却为这些商品的大量进口付出代价。人民币的坚挺还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和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有利，比如电信、航空等垄断行业。人民币坚挺，他们进口设备的成本就会降低，他们偿还外债的负担就会减轻。而这样的群体恰恰是当今中国的强势群体。

当今人们谈到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只看到财富的分配不均，却很少注意到汇率变动的因素。在中国当前这种利益格局下，人民币币值过高也会使贫富差距拉大。

通常说来，汇率是同由外汇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这是对的。不过，外汇的供求关系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供求关系。它不是由于一时外汇的多寡来决定的。诚然，外汇储备多少和国际资本流入多少会影响外汇的供求关系，但比这两项更重要的是持币者的信心。信心动摇，一夜之间供求关系就会发生急剧变化。不管有多少外汇储备，也经不起对本币信心动摇者的

抢购。在国家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银行的信用主要靠稳定的政府来担保，一旦政府发生危机，本币会迅速崩溃，很快就会掀起抢购外汇的风潮。而弱势阶层的最低生活保障，是政治稳定的重要方面。

所以，分析预测汇率的变化时，要把弱势阶层的利益考虑进去，不要过分看重 2200 亿的外汇储备。一旦弱势群体对决策者的压力超过了一定的程度，人民币贬值也许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显然，这种选择的政治考虑多于经济考虑。

刊于《科学投资》杂志，2002 年第 5 期

两队“外国人”在中国舞台上打架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面对开放现实中的经验教训，对西方国家，不仅看到它的长处，也看到了它的问题。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重新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

“西化”，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追赶西方的生产力水平；在体制层面上，不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实行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制度。“西化”，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直在发生的现实。《共产党宣言》就揭示了这一现象：“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反对“西化”，就是本世纪初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三十年代提出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反对“西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

“中体西用”是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它只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在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坚持中国的传统。这对于全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来说是个进步。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和“中体西用”相对立的是“西化”（包括“欧化”、“新化”的提法），他们批评洋务派仅仅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主张在制度层次和文化层面上也学习西方。“西化”和反对“西化”各执一端的争论到二十

年代演化为“中西互补”论。实际上，那时的“中西互补论”骨子里还是“用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用“孔化”代替“欧化”。到三十年代，又出现了“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之争。“中国本位论”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授意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中提的。其本意是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为了冲击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强大而顽固的传统力量，这个时期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观点。“全盘西化”只是表示一种西化的决心和冲击力，是矫枉过正的意思，它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因为西方的东西也不全是好的，中国的传统也不全是坏的，由于传统力量的根深蒂固，想“全盘”也“全盘”不了。这是属于常识范围的事。曾经说过“全盘西化”的胡适也觉得不够科学，自己又改为“充分西化”。最早提出“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后来也没有坚持这个提法。

在四十年代，中国学者用“现代化”代替“西化”的概念。冯友兰说：“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新事论》）为什么“近代底”、“现代底”就优越呢？因为它进化的时间长，对人类优秀成果积累得最多，对过去的弊端淘汰得最多。

在“西化”反对“西化”的争论过程中，“西化”论中又忽视中国的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的倾向。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工具，特别是用来反对民主、维护专政的理论工具。著名哲学家艾思奇1939年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一个特殊传统……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

在清代末年，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要坚持“孔化”。他们的争论是“西化”和“孔化”之争。近半个世纪以来，“孔化”和“西化”本身也发生了分化。“孔化”分为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西化”分为“苏式西化”和“资式西化”。到二十世纪中期，“苏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一种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打倒了，另一种西方文化（资本主义）由于近百年来在中国人感情上没有留下好印象，被推上了对

立面。在“苏式西化”的过程中，倒真有一种“全盘西化”的味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继承论”，批判“清官”，提倡“厚今薄古”（即厚马列主义之今，薄中国文化之古），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教育体制，连苏联的一些名词也生吞活剥地拿过来了，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等。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没有“全盘西化”。这说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又出现了“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不过这时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坚持“苏式西化”。这时的“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实际是“资式西化”和“苏式西化”之争。也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二十世纪末，不是接受西方文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用一个“西化”代替另一个“西化”的问题。这时的冲突是两个“西化”之间的冲突——两队“外国人”在中国舞台上打仗。台下的中国人一部分为“苏式西化”鼓掌，另一部分为“资式西化”鼓掌。这两部分中国人自己又对立起来。

二十世纪末空前发展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得到了真正了解世界各国的机会，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空前丰富的思想资料。与此同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又为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经验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所以，这期间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深化程度，远远胜过了一个世纪。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冲突（“孔化”和“西化”的冲突），也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冲突（“苏式西化”和“资式西化”的冲突）。这两对冲突的结局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而应当是在相互撞击中消除弊端，在相互融合中提炼升华。对两对冲突的四个方面都要进行扬弃，最后在器物层面、体制层面、文化层面都充分吸收方方面面的优秀部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中国当代的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必经之路，它不再是李鸿章时代的洋务运动了。

经济与社会

<<<<<

从“全民皆师”所想到的

几位朋友在一起闲谈，一位朋友说：“现在是全民皆师了。”他见大家不解其意，就解释说：“80年代初恢复工程师评聘时，大家十分认真，评上的工程师都是够水平的。评到后来，够年头的都评上工程师了，不够条件的也变法儿当上了工程师。现在又有经济师、政工师……在工厂的科室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个什么师的头衔。”另一位朋友深有同感地说：“我上大学时，学校里共有108位正副教授，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现在这所大学里正副教授两千多，在这所学校里评不上教授的，调到名气小一点的大学也评上了。教授不值钱了。”在座的有一位在军队里工作的朋友，看着他金晃晃的大校肩章，有人说：“还是军队里比较正规，不像地方这样乱了章法。”大校听了哈哈大笑，说：“你把军队看得太理想化了。最近一次评军衔和50年代无法相比。你看看马路上有多少校官？几乎是全军皆校了。”

回家后我苦思良久。如果某项政策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人们就千方百计地利用它去求得利益，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种

种管理松懈的情况下，各方面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各行其是，这项政策执行的结果就和它的初衷大相径庭，它的效果就使人失望。在改革中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

你想扶持某个行业，给这个行业一些优惠政策，其他一些不应当优惠的行业也千方百计地得到了这一优惠；你想扶持科技产业，规定经营技术成果可以减、免税，于是一大批经营普通商品的公司打起了科技公司的招牌，享受经营科技成果的优惠政策；你想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一大批不学无术的人都戴上了教授、工程师的桂冠。仔细想一想，十多年来出台的各种政策，其中有相当多一部分在利益攀比中变形走样。利益均沾，该鼓励的得不到鼓励，该限制的没有受到限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识大体、顾大局者以外，很多人是不愿意失去一丁点利益的。他们都想在利益调整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千方百计地钻政策的漏洞。这种利益攀比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在改革过程中，单位、部门甚至地方政府都从维护各自的利益出发，不断地攀比、争夺、钻营。最后，大家都登上了利益阶梯的最高层，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人人在数量上似乎多得了一些，实际上谁也没有多得。结果，调整利益格局的改革目标不仅没有达到，还造成了新的混乱。

在这一场场利益的攀比、争夺、钻营中，不少单位把安排职务、晋升级别、评比职称、出国考察，甚至评选先进分子，都当作分配、平衡利益的手段。人们也把这一切当作取得利益的机会。于是，一切都被扭曲，一切都在贬值，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过去认为神圣的东西失去了光环，过去认为崇高的东西黯然失色。

由此，我想起了儿时读过一则童话。这则童话的大概意思是，在一个很小的岛国上，国王宣布，凡是有 11 个指头的人都可以享受特别优待。过了不久，这个岛上所有的人都是 11 个指头。国王只好又下了一道命令，对以假乱真都处以重刑。结果，绝大多数人又变成 10 个指头。

结合今天的情况，我想到这则童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项政策法规，如果没有强硬的约束条件，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变形走样。

在今天的改革中，很多改革方案、很多政策，正是缺乏完善的、强硬的约束条件。这个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这项改革出台以后会出现哪些漏洞考虑得不周到，因而制订的约束条件不完善，不切合实际；二是即使这些约束条件是完善的，但没有强有力的落实办法，没有权威的执行部门，使约束条件成为一纸空文。

必须指出的是，腐败现象已经渗入改革过程之中，正在侵蚀着神圣的改革事业。改革方案、改革政策在执行中变形走样，是与改革方案的实施者们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争取新的利益分不开的。改革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矛盾状态：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部门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方案的执行者。如果实施者不出以公心，就很难把事情办好，如果在实施者中有了腐败现象，事情就一定办糟。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4年4月9日

按劳分配，难道是皇帝的新衣？

有一个人们熟悉的故事，其大意是，一个聪明人为了愚弄皇帝，声称送给皇帝一件新衣，并煞有介事地帮助皇帝穿上。而且说，道德不高尚的人看不见这件高贵的衣服。其实，他根本没给皇帝穿什么衣服。但是，皇帝、大臣以及周围的人，都怕自己是“道德不高尚的人”，明明看到皇帝没穿衣服，却连声称赞“漂亮极了”。最后，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点破了这场荒唐的闹剧。

我们不要嘲笑别人的荒唐，有时我们也很荒唐。我们成天叫喊的按劳分配，是否也有一点“荒唐”的味道？

我们从来没有实行过按劳分配

我们天天喊按劳分配，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按劳分配。当然，这是指整体而言。这里也不是指“不劳动者不得食”那种泛论，而是指一种分配制度。

改革以前，严重的平均主义加上种种不合理的因素，使得多劳者不多得，少劳者不少得。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当时，我到几家大工厂搞过调查发现，在生产第一线，70%的工人是二级工，工资都是41.5元。工厂职工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住房的分配，和劳动贡献几乎没有关系，而和权力的大小联系更为密切。

如果说，改革以前，由于左的干扰把按劳分配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愿实行的话，那么，改革已经进行了14年的今天，情况怎样呢？事实证明，现在的情况依然和按劳分配相去甚远。

如果将整个经济分为计划内部分(国营企业,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和计划外部分(个体及私营企业, 三资企业等)的话, 那么, 在计划内部分平均主义日益严重, 在计划外部分, 差别过大也日益严重。这两种情况都和按劳分配背道而驰。

在计划内部分, 且不谈工资是否反映了劳动者所付出“劳”的多少, 从人们的总收入来说, 工资外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工资以外部分, 如补贴、发放的实物, 甚至奖金, 基本是平均分配的。因此, 在计划系统内, 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比改革前没有多大变化。在计划系统以外, 市场规则还没有形成, 分配极为混乱, 基本没有做到“按劳分配”。

今天, 下面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

同一劳动者在不同地区付出同样的劳动, 所得的报酬差异很大;

同一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出售”给不同的企业, 得到的报酬大不相同,

由于农民合同工、临时工和正式工同工不同酬, 同一企业“购买”同质、同量的劳动, 支付不同的报酬;

同样的劳动者, 付出同样的劳动, 因他所在的企业不同, 所得到的住房、福利大不相同。

总之, 在我们国家, 除了依靠体力的搬运工和手工操作计件工资这类个别情况下, 在广大的范围内, 在整体上, 按劳分配仅是一种口号, 一种旗帜。几十年来, 劳动者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按劳分配。

为什么按劳分配实行不了?

按劳分配并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来的。早在 1839 年,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弗兰西斯·布雷, 在他的《对劳动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中, 就提出了“按劳取酬”。马克思吸收了这一思想, 提出对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品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马克思这个分配原则的前提条件是: 消灭私有制, 没有商品经济, 没有货币, 劳动者的劳动是直接劳动。在这种

情况下，马克思设想，用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不必通过“价值转换”过程。

我们的社会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分配中必须经过价值转换过程。价值转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影响因素很多。这些因素是不规范的，是人们难以把握的。它会使“劳”和“酬”之间的关系扭曲、模糊。此外，每个劳动者都是在某一个企业中劳动，他和社会的联系是通过企业去实现的。“劳”的实现好坏，决定于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所以，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企业的经营条件不同，企业的经营水平不同，劳动者付出同等的劳动，在不同的企业，报酬会有很大的差别。等量劳动不可能换取等量报酬。

从实际操作来说，按劳分配面临着技术上难以克服的困难。第一，什么是“劳”？现代生产过程十分复杂，有生产第一线的直接劳动，有第二线的间接劳动，有生产劳动，有经营劳动……这些劳动的性质、内容、功能、效果，差异很大，相互之间很难比较，更难用一个“劳”字来界定它。由于观念上的原因，过去还不承认某些活动是“劳”，例如经营活动和商业中介活动，就认为其中有剥削成分。第二，怎样计量“劳”？除了“一麻袋一麻袋地扛大个儿”，除了能够计件的手工操作以外，在生产中，很难公平计量每一个人的劳动。简单劳动（即体力劳动）如此，复杂劳动（即智力劳动）就更难计算了。马克思说过“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然而，复杂劳动转化为若干倍简单劳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倍加”二字，是无法操作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在生产中智力劳动的比重日益上升，在有些行业，智力劳动创造的产值在总产值中占70%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计量“劳”？

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能兼容吗？

原来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劳动者所能“分”到的只能是实物形态的消费资料。劳动者没有选择资产收入的机会和权利。劳动者只有在个人生活资料的范围内作决策。其他各种社会经济决策，都在著名的“六项扣除”

中，由政府统一去考虑了(关于“六项扣除”，详见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制度。完全的按劳分配，纯粹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三者在理论上是不可分的。这就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三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在改革已进行了十四年的今天，人们开始对这三个原则进行反思。前面已经说过，即使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也难以实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能实行按劳分配吗？

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的经济，除了每一个经济法人独自决策以外，掌握资产的个人，不仅可以在他消费品范围内作决策，也可以通过投资行为对社会经济决策施加影响。劳动者不仅可以有劳动收入，也可以有资产收入。也就是说，不仅有按劳分配，也会有按资分配。

市场经济，其关键之点是把市场的力量作配置资源的基础。这要求生产要素根据价格信号的变动而自由流动。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企业产权等。如果仅仅按劳分配，各种生产要素不能参加分配，这些生产要素就不能进入市场，生产要素就流动不起来，市场也就无法配制资源。市场经济何从谈起？

按贡献分配，让市场去执行

看来，还是按贡献分配比较合理，比较可行。所谓按贡献分配，是指根据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创造这笔财富中所作出的贡献多少，向各要素的所有者支付报酬。当然，这种分配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不是行政长官直接分配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仅仅靠劳动不可能创造财富。只有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才能创造财富。形象而简单的说法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劳动力的生产活动，劳动力和土地都是生产要素。“父”、“母”都同等地享受财富之果，不能厚此薄彼。

运用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可以计算出各种生产要素对财富的贡献。我们暂且抛开这个技术问题不谈。实际上，各种要素对财富的贡献大小，各种要素能够得到多少报酬，是一复杂的市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规律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工资，作为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价格，其数值应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格也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只要市场上形成了平均利润率，只要有充分竞争，各种要素所得的报酬就能够与其所作的贡献大体一致。当然，平均利润率也只是一种理想。

按贡献分配是一杆秤，它可以判断分配是否公平。依照按劳分配原则，除了劳动收入以外，其他收入都是不公平收入。有了这杆新的秤，要素收入，经营收入，风险收入，只要和其贡献对称，也就是公平的了。在贡献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争取多作贡献。这样，不仅贡献多的人先富起来，社会也会越来越丰裕。

上面说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是指各种要素之间的“地位公平”，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公平。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初次分配中，没有考虑人的天赋差别，没有考虑不同人的不同机会和条件。不同的人掌握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土地这些关键要素)的多少是大不相同的，这样分配的结果，贫富差距拉大是难免的。

因此，在初次分配之后，还需要二次分配。这里说的第二次分配是指：政府和各种社会机构为主体的分配，如所得税、遗产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资、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通过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别，体现社会公平。

刊于《开发报》，1993年2月15日；《市场观察》，1993年第3期；《南方周末》，1993年4月

交通启示录

坐在汽车上或骑在自行车上，我常常产生一些联想。发现在交通中简单得连儿童都能理解的事情，在经济工作中却是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在交通中通行多年的老规则，却成为经济学家们攻关的新课题。我们在管理交通上很聪明，而在经济工作中有时却很愚蠢。交通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条马路上只能实行一种交通规则

在长安街上，汽车像一条河，向同一个方向流动，不同流向的汽车，被隔栏挡在另一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国是右行规则，汽车只能靠右边走。有的国家是左行规则，汽车只能左行。如果两种不同的规则同时在一条马路上实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条马路只能有一种交通规则”，这是儿童都能理解的道理。这个道理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也应当适用。在同样条件下处理相同的问题，只应当有一种规则，否则，就会造成混乱。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事却违背了这个道理：例如，同样一种产品，有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两种价格相差悬殊；同样是资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却有着不同的利率；在同一国家的统一市场上，却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等等。

在改革过程中，采用双重规则有时是出于无奈。我们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略更是不得不如此。一下子把计划价格全部放开，成为市场价格，一定会物价飞涨。只好放一块，留一块，等群众的承受能力有所提高时再放一块，再留一块。这就形成了双轨价格，“双轨价”实际是“双规价”。

社会经济中的双重规则必然造成不公，造成混乱。银行的贷款有两种不同的利率，而低利率的资金分配权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为了争得这低

利率的资金，必然会出现权力和金钱的交换。这是出现腐败现象的原因之一。有人计算过，双轨价格、双轨利率等造成的利益差一年就是几千亿元。这几千亿没有规范的分配办法，而是掌握在有审批权的官员手中。如果其中百分之一漏到私人口袋里，会造就多少百万富翁？这是近年来少数人暴富的原因之一。

从交通中得到的启示是，必须创造条件，尽快结束双重规则。然而，既然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双重规则是渐进式的改革方略造成的，一下子变成单一的规则也很难。不过，有一点应当明确：必须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并轨。汇率不是并轨了吗？也不是像原来想象的那么难。当前值得注意的是，改革的过程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双重规则的受益者），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持当前利益格局的现状，阻碍改革向纵深发展，阻碍双轨向单轨过渡。这是需要警惕的。

仄桥原理：在劣势上做文章

一条马路，各段宽窄不一。怎样加大这条马路的通过能力？修路工人不会这样愚蠢：把整个一条马路全部加宽。他们只去加宽那些最窄的地段。这里有一个仄桥原理：道路的通过能力是由最窄的部分决定的。

窄桥原理就是在劣势上做文章。我记得三年以前，贵州省长陈士能在北京一个会上讲贵州有六大优势：水火互补的能源优势（指水电和煤），矿冶结合的资源优势，军民结合的机电优势，以名酒名烟为代表的轻工业优势，就地取材的煤化工和磷化工优势，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相结合的旅游优势。正当大家听得十分振奋的时候，他话锋一转，说：贵州有一个劣势，仅这一个劣势就使其他各种优势大打折扣，使贵州处于“富饶的贫困”。他说的劣势就是交通不便。所以，他在北京四处奔走，为的是修建地方铁路。

陈士能是在劣势上做文章，这样可以花较少的力气取得较大的效果。他是聪明的。

但是，在经济工作中说得最多的是发挥优势。而“发挥优势”又常被

人片面理解为“躲避劣势”。只干眼前能见效益的事，不顾长远的效益。“油水快流”就是这种“发挥优势”最典型的作法。由此造成对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其恶果至今还令人头疼。

躲避劣势实际是急功近利，这和官员考核和晋升制度有关。如果要求某级官员在任职期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多少，利税增长多少，他当然会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基础好、见效快的地方。

“躲避劣势”，劣势就会不断扩大，优势也会变成劣势。

不能做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

我每天上班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沿复兴门外大街向东走，一条是从木樨地沿小河向东走。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小河边路窄，车辆行人一定很少，我就选择了小河边这条路。谁知我走上这条路后，这里的行人和车辆比我预想的要多得多。我想，大家都走到这边来了，另一条路人一定比较少。但是，当我走另一条路时，这里的人又多了起来。

多次行路的经验告诉我，你觉得这条路上车少，走上以后一定车很多。因为大家都作出同样的判断。这个经验也使我明白，在作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当时的客观环境，更要考虑众多的人怎样对待当时的环境。了解众人的决策以后，才能够作出超出众人的决策。

由此我想到企业的经营。日本企业家堤义明先生说：“‘董事会全体成员赞成时最危险’是我父亲的遗训。而我确信，只有董事会全体成员反对时，才是正确的。”他这话说得未免有点绝对。但是，与众多的人有相同的思维，在企业决策中是很危险的。你认为开发什么产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等你开发出来以后，一定是供大于求。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大多数企业也会和你有同样的想法、会作出和你同样的决策。

还是一位日本企业家说得对：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就可以考虑去做，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要坚决去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时倒不一定去做了，因为你认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先觉者早就动作起来了，等你出了产品，市场早被他占领了。

企业决策要冒一定的风险。当然，风险不是盲目，关键是全面掌握信

息，特别是要掌握众多的人的思想方法，了解众多的人对现实的判断和决策，从而作出超出众人的判断和决策。这是对决策者胆识和魄力的考验。

小警察可以管大部长

我的一位同学是副部长。有一次他乘车外出开会，因司机违反交通规则，被一位年轻的交警罚了款。这位大部长在小警察面前毫无办法，只好连连认错。

为什么小警察能管住大部长？因为在马路上没有官职大小之分，这里最高的权威是交通规则。

由此我联想到喊了多年的精简机构问题。为什么越精简越膨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机构升格和临时机构太多。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一升格，该机构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除了常设机构以外，还有大量的临时机构。这些临时机构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为什么临时机构这么多？为什么要求机构升格？原因之一，是为了提高机构的权威。例如，绿化河山本来是林业部门的工作，但这项工作还涉及相关的部门。林业部和这些相关部门级别差不多，林业部门说话其他部门不听，所以成立一个“绿化委员会”，找一个地位更高的官员当主任。机构升格是怕自己部门的级别低，有关部门不听，提高规格以后就可以“上指挥下”，“以大压小”。这是单纯用行政权力来管理所出现的现象。如果用法律来管理，就不必“上指挥下”，“以大压小”了。

交通警察的级别比部长不知低多少级，但是，小警察可以管住大部长。这是因为小警察是执法的，法大于官，在法律面前警察和部长是平等的。

机构膨胀是制度和法律失效的结果。如果我们更多地采用法制管理，临时机构就会减少，机构升格的问题也好解决。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4年10月

提高城市的厂商控制力

近年来不少城市想成为经济中心，提出了种种宏伟设想。怎样使城市真正成为经济中心呢？有两种城市发展理论可供借鉴：一种是“比较资源吸引力”理论，另一种是“厂商控制力”理论。

“比较资源吸引力”理论认为，城市经济的兴衰，地位的升降，主要决定于这个城市对外部资源(人力、资金、物资、信息等)的吸引能力与其他城市的比较。如果这个城市吸引资源的能力比另一个城市弱，资源就会流向另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衰落，另一个城市就会兴盛。比较资源吸引力是由政治中心的建立与迁移、重大工业项目的摆布与原有主导产业的兴衰、交通枢纽的形成和位移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一理论中国古代城镇兴衰历史足以证明。(杨继绳：《繁荣不能永恒 辉煌需要再造》，《天津日报》1994年8月23日)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城市要想成为经济中心，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比较资源吸引力。

19世纪以来，有两个相关的事实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航海事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一个城市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吸引资源，而与航海事业相关的港口则成为国际资源的重要集散地。所以，19世纪以来，有港口的地方就会形成城市。港为城用，城以港兴。港口的辐射面越广，以港口为依托的城市就越发达。

比较资源吸引力理论是强调通过资源集中的方式来提高城市的经济实力。这一理论不仅适合于过去的城市发展，也适合于今天正在发展的中小城市。而今天的特大城市，再扩大资源集中规模，就可能超出城市的承载能力，种种“城市病”就会突出起来。你能在上海再摆几个大的钢铁、化工、建材企业吗？别说环境污染，巨大的物流就难以承受。

对于特大现代城市来说，“厂商控制力”理论是合适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金融、信息、会计、法律、技术开发、产品营销等，逐渐从企业内部分离出来，在社会上成为独立的为厂商服务的机构。这些厂商服务机构在大城市集中起来。大城市通过这些厂商服务机构来为城市以外的工商业服务，也通过这些厂商服务机构来控制城市以外的工商业，进而控制城市以外的经济活动。这种对城市以外的厂商和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称为城市的“厂商控制力”。厂商控制力越强，这个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就越强，这个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就越强。

厂商控制力有别于行政控制力。前者的作用没有区划界限，后者的作用只限于一定的行政区划之内；前者是自愿的、平等的、互利的，后者是强制的、自上而下的；前者是服务性的，后者是领导性的。经济中心不是行政力量能够造就的，它是市场运行的结果。现代城市不一定摆那么多工厂，但必须把工厂的“头脑”集中起来。这些服务业实际是工商企业的“头脑”。

所谓中心城市就是上述服务机构高度集中的城市。城市当局的任务就是管理好这些服务业，为这些服务业提供良好的环境，通过这些服务来发挥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也正是这些服务业才使城市成为中心城市。如果各种服务业比较齐全，这个城市就是大的经济中心。如果这个城市某一种服务业比较发达，就是某一种中心。例如，这个城市金融业比较集中，就可以称为金融中心。

纽约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其厂商服务业很强大；香港之所以成为远东经济中心，也是服务业强大。纽约和香港的工业不仅不强大，反而工业逐步向城市以外转移，形成“空心化”。我这里不是反对城市搞工业，不是提倡工业“空心化”，而是认为，作为一个中心城市，厂商服务业比工业更为重要。

怎样提高一个城市的厂商控制力呢？人们会说，要有好的基础设施来吸引厂商服务业。例如，要有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在国家甚至全球信息网络中，能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对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不仅要有好的物

质环境，更要有好的制度环境、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从经济学上说，提高城市的厂商控制力的关键在于这个城市有比较低的交易成本。据经济学理论，当每单位商品交易成本上升时，该商品的交易数量就下降。当交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该商品的交易市场就会停止活动。而交易成本低，交易就比较容易实现，交易量就会扩大，厂商服务业就可以发展起来。反过来，厂商服务业越发达，交易成本就越低。低交易成本和厂商服务业形成良性互动。

城市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交易集中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现代交易不仅是交易双方的事，需要种种中介(很多厂商服务机构也是中介)给予帮助，需要政府提供条件。中介的收费、政府的税收是交易成本的主要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交易难易程度对交易成本起决定性作用，交易畅通无阻交易成本就低，交易困难重重，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交易成本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开放性，也就是取决于自由贸易程度。如果这个城市自设壁垒，各个交易环节关卡重重，交易成本就会很高，各种服务机构处境就很困难。

城市，城市，如果真的有“城”，那就没有“市”了。要想市场繁荣，就得拆除“城墙”，拆除制度的“城墙”，拆除政策的“城墙”，拆除观念的“城墙”。你想真的成为经济中心吗？首先就得有开放思想，有自由贸易思想。并且按照自由贸易思想来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

刊于《天津日报》，1994年12月14日；《新华每日电讯》，2002年5月16日

小政府，强政府

前几年，理论界围绕“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的问题进行过讨论。论者的分歧集中在“政府管事多好？还是管事少好？”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就今天政府的现状而言，仅用“大”和“小”还不足以说清。还应当论及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政府是强还是弱。我的主张是，政府要小，但要强。

政府要小，是指政府的机构很精干，冗员很少；政府不包揽一切，只把政府必须管的事管好。政府要强，是指政令畅通四海，宏观调控有力，有权有威，令行禁止，该由政府做的事，政府能做得很漂亮。

现在政府太大。全国总人口和官府吏治人员数的比例：唐代 3900 比 1；明代 2900 : 1；解放初期为 297 : 1；1994 年为 29 : 1。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目前政府机构的庞大。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公共事务不断增多，官员逐渐增多有其合理性。但是，目前已经远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造成冗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管的事太多：管分钱分物，管企业经营，管盖房修路……政府管了不少不该管的事，效果就适得其反。政企不分就是政府包揽一切的不良后果。

现在政府太弱。南方某县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中央的政策到基层很少不变形走样的。中央一项政策下来以后，省、地、县级不少干部在琢磨中央政策上狠下工夫。不过，他们不是琢磨如何落实这些政策，而是琢磨如何钻空子，谋取地方和个人利益。如果地方政府都去研究如何钻中央政策的空子，政令能畅通吗？我说政府太弱除了政令不很畅通以外，

还有另一方面：很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力量去干。政府该干的事没干好，就会影响政府的权威。

政府太大、太弱。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有政治体制问题，有人事制度问题，有廉政建设问题。在这篇小文中，我只从财政这个角度谈一点看法。

在中南海的不少办公室，墙皮剥落。我问这里的朋友为什么不修缮，回答是国家财政困难；在工资改革实行将近半年以后，国务院某部门还没有到位。问其原因，答案也是财政困难。不管走到哪个“吃财政饭”的单位，都可以听到叫苦声。

改革十六年，有十五年是财政赤字，而且赤字不断加大。财政如此困难，是不是国家很穷呢？不是。相反，改革以来，我国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国力比过去雄厚多了。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1978年的9.78倍。既然国家比过去富了，为什么财政日益艰难呢？

原因在于财力过于分散。这表现在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1978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7.2%，现在不到2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前接近70%，现在为28%。

这两个比重下降也有合理的一方面。因为有些投资主体已经由政府转向了企业，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也是应该的。但是，下降的幅度过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控制，大量的财政流失。一方面，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公款消费一掷千金。

财政弱必然政府弱。本来应当由政府开支的经费不能给足，这就造成了大家经常抱怨的一些现象：

教育经费不能按期支付，一些教师不能按期拿到工资；公安经费不能给足，警力、装备不能满足社会治安的需要；要求出版社自负盈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无法问世；基础研究经费不足，一些科研人员无事可做……

中央财政困难，影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也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所以，一位权威人士说：“中央财政收入如果不占整个财政收入的

60%，就难以号令‘诸侯’。”

要在财政方面成为“强政府”，除了适当集中财力以外(分税制正是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让政府成为“小政府”。也就是说，不应当由政府花钱的事政府不必花钱。这就要划分政府的事权：凡是民间可以做好的事，政府就不要去做；凡是地方政府可以做好的事，中央政府就不必去做。这样，既可以精兵简政，又可以集中力量做好政府必须做的事。这样的政府，既是“小政府”，又是“强政府”。

刊于《天津日报》，1995年2月21日

<<<<<<

私人轿车：无可奈何的选择

未来中国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轿车吗？要不要鼓励轿车进入家庭？面对这些十分现实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在人们当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兴高采烈地谈论“轿车进入家庭是历史的必然”、“轿车文明会给我们带来丰硕的成果”。他们举起双手，欢呼轿车文明的来临。另一部分人针锋相对，断然指出“中国不适宜大量发展私人轿车”。他们问道：“我们能不能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寻找一条比私人轿车更理想的交通方式呢？”

在日益强烈的批评声中迅猛发展

一百年以前汽车刚刚问世时，人们只把它当作一项技术发明，谁也不会想到它对社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汽车刷新了社会面貌。它使人的活动范围加大，使社会交往更加频繁，使人们之间关系更加紧密。飞转的车轮，改变了城乡关系，改变了城市格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和思维。

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汽车不仅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生活必需品，人们一旦拥有它，就很难离开；作为生活方式，人们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进入轿车文明的人们，不可能再回到马车时代。这不仅仅是人们留恋汽车的舒适，而是因为信息时代需要速度。在发展中国家，不少人也渴望早日能享受私人轿车的便捷。

但是，汽车在施惠于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家家有车之日，寸步难行之时。道路的拓宽总是赶不上车辆的增加。

运送同样人数的乘客，私人轿车比公共交通要多占用几倍的道路。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塞车成了人们最头疼的问题。汽车给人们以速度，过多的汽车又使人们像乌龟一样地在公路上爬行。在中国，千人轿车拥有量仅为0.6辆，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和世界平均水平78辆相差很远。现在交通堵塞已经很严重了，难道还要加剧交通堵塞吗？

汽车给人以舒适，汽车也给人以死亡。据联合国统计署资料，1979年，96个国家汽车车祸死亡人数为255212人，其中不包括中国、印度、前苏联。根据这个数字推测，全世界一年死于汽车轮下的不少于35万人。对中国来说，汽车车祸死亡率高得多。据公安部办公厅统计，1997年，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73861人，受伤人数为190128人，直接损失18.46亿元（《公安研究》1998年第3期）。

汽车使蓝色的天空蒙上了阴影，在清新的空气中加进了一氧化碳、四乙基铅、氮化物和硫化物，使宁静的环境增加了五十分贝的噪音。有人认为，心脏病和癌症患者剧增，同汽车排放有一定的关系。

汽车的快捷舒适是以高能耗为代价的。据兰德公司一位专家推算，美国的汽车每年消耗全部能耗的四分之一。中国的人均能源拥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七分之一，只有美国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是石油纯进口国。我们能“养活”3000万辆轿车吗（一种预测，2005年左右我国轿车千人保有量为25辆，全国保有量为3000万辆）？

还有，私人轿车的发展，会加剧社会不公，公路、停车场会占用大量的土地，等等。

鉴于轿车的急剧增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二、三十年前，未来学家、城市专家、交通专家、生态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出了同样的呼喊：要限制私人轿车的发展。随着现代工业带来的问题与日俱增，这个呼喊声越来越强烈。

那么，为什么近20年来，在反对私人轿车的强烈呼声中，轿车反而发展更快了呢？一位西方汽车工业专家一语道破：“汽车工业的收缩比它的膨胀迅速带来的社会问题更为紧迫。”

推动轿车加速发展的是经济力量

汽车工业的收缩会带来什么样紧迫的社会问题呢？是汽车工业以及与汽车相关行业的兴衰。它关系到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一大批人的就业与生存。

汽车这种东西，天生就是办特大型企业的商品。在正常情况下，产量低于某一数量，就没有国际竞争力。这个数量称为“最小有效经济规模”。据国外专家反复研究，汽车工业的最小有效规模是 200 万辆。

这么大规模的生产，就需要大规模的市场。

从国外看，在汽车保有量中，75%以上是轿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汽车工业主要是轿车工业。

哪里去找这么大规模的轿车市场呢？任何一种商品，如果不进入家庭，市场就不会广阔。如果不成为生活必需品，市场就不会稳定。因此，从汽车工业界来说，最希望轿车进入家庭，最希望轿车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众所周知，汽车产业是关联度很大的产业。每辆汽车有 25000 个零件，需要 600 多种钢材，还有品种繁多的非金属材料。汽车工业的发展必然要带动钢铁、材料、机械、电子等一大批产业的发展。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消费美国 20%的钢材、12%的铝、10%的铜、51%的铅、95%的镍、35%的锌和 60%的橡胶。汽车的产品开发、原料采购、零部件生产、整车装配、销售、售后服务、维修、油料供应……这一系列的环节，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人口。美国和日本在与汽车相关产业中的就业人口，超过了总就业人口的 10%（也有人说美国的就业人口中，有六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同汽车业有关系）。所以有人形象地说，发展汽车工业就是给国民经济安上了四个轮子。

然而，国民经济一旦架在四个轮子之上，就得听任这四个轮子摆布。汽车工业一旦不景气，就要引起一大批产业不景气，就要把大批员工抛进失业大军。所以，在四个轮子上的政府官员们，为了保持经济繁荣，就得使四个轮子加速、再加速。

1900年世界汽车产量不足一万辆。到1990年，世界汽车年产量达5000万辆，90年间增长5000多倍。今天，世界上每出生一个婴儿的同时就要生产出0.56辆汽车。汽车的生产还在加速。从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里，世界汽车产量净增2000万辆。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内，世界汽车产量将净增2500万辆。到那时，汽车年产量将达7500万辆。

今日的汽车及其相关的产业，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这股势力是由汽车业及与汽车相关产业的厂商、这些产业的就业员工、主要汽车生产国的政府构成的。对这股势力来说，控制私人轿车发展，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厂商要利润，工会要维护员工的利益，政府官员要选票，都要大力推销轿车。总统的选票和向国外推销多少辆车密切相关。

另外，汽车已经造就了一大批人的生活方式，要他们放弃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那些还没有进入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们，也渴望着享受私人轿车的便捷。汽车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都不愿意改变业已形成的汽车文明。这种势力，这种惯性，压倒了日益强烈的控制私人轿车的呼声，使轿车成为更多家庭的宠物。

我们不能构筑世外桃源

中国的社会还没有架在汽车四个轮子之上。趁这个机会，我们能不能在污浊的汽车尾气之外保留一块净土？能不能在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中保留一个宁静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狠下决心，对日益逼近的轿车浪潮置之不理，不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不就避免了轿车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吗？

这个问题不能关起门来回答。汽车工业是一种跨国工业，在全球生产，在全球销售，在全球竞争。争夺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是竞争的焦点。汽车市场的竞争没有国界。国际汽车业这股强大的势力，它的触角伸向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不断地开辟自己的新“领地”。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构筑一个世外桃源。

发达国家的汽车市场已经饱和。为了挤占发达国家的汽车市场份额，它们之间的汽车商战从来没有停息。日美汽车贸易大战剑拔弩张，相持不

下。北美、西欧、日本三个地区占世界汽车产量的85%以上，而人口只有世界的16%。不出口就没有活路。要维持西方汽车大国庞大的汽车工业，开辟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市场是一个希望。中国是一个规模十分庞大的汽车市场，也是目前唯一没有被瓜分的市场。中国汽车市场这块肥肉，各国汽车厂商覬覦已久。

近几年来，外国各大汽车公司的要员频频来华，国际汽车展销会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外国大公司还展出了专门为中国人设计的轿车。他们为占领中国这个庞大的汽车市场，已经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一家又一家外国汽车公司，像一批灌足了油、已经启动的汽车，正向中国市场开进。

事情已经是这样地明显，如果中国自己不发展轿车工业，就要把市场拱手让给外人。中国人害怕自己的汽车堵塞道路、污染环境，外国汽车照样会到中国来堵塞道路、污染环境。中国人不主动地进入轿车文明，也会被人裹胁到轿车文明中去。

中国不发展轿车工业，这是外国汽车厂商求之不得的。西方一个汽车工业研究机构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要求汽车市场平衡，“最简捷的是淘汰无竞争力的厂家和民族汽车工业，让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汽车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能不能关起门来，不让外国轿车进来呢？做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口汽车花了200多亿美元，比中国汽车工业的总投资高出三四倍。合资以后，进口CKD件（即进口外国汽车零件到中国组装），又是二、三十亿美元。合资以后的汽车工业的产值中有三分之一是外汇换来的。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更没有理由阻挡进口汽车的浪潮。

与其被动裹胁，不如主动迎接

在轿车文明日益逼近的时候，我们之间的种种争论，归结起来是三个问题：

一是我们能不能选择一条比轿车更清洁、更节能的交通方式？也就是

说，我们去参与分享私人轿车的便利，还是放弃这种弊端丛生的便利，另辟新路？

二是如果一时不能另辟新路，我们是被裹胁、被动进入轿车文明，还是主动进入轿车文明？

三是我们中国的经济能不能架在四个轮子上面？也就是说，中国能不能主动发展轿车工业，在世界汽车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我们需要寻找比私人轿车更安全、更清洁、更节能的交通方式。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是整个人类的探索，我们中国不可能超越这个阶段，不可能凭空地独自探索出一条新路来。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们不可能倒退到马车时代。

过去百年，汽车改变了社会；今后百年，社会将要改变汽车。科学技术正在按照社会的需要不断地改造汽车。科学家们正在努力解决汽车排放污染问题、能源问题。这些方面已有进展。例如，由于道路安全的改善，运行每亿辆公里伤亡人数，美国从1923-1927年的11.3下降到1968年的3.3；日本从1964年的18下降到1969年的11.2。据对21个发达国家统计，汽车交通死亡人数，1981年比1970年下降了19.3%。

我们面临的最糟糕的选择是，被外国轿车裹胁到轿车文明中去。中国轿车工业还不发达，外国轿车大量进入我们的家庭。如果被被动地裹胁到轿车社会里，将会出现比预料的社会问题还要严重。所以，我们如果找不到比私人轿车更好的交通路线，又不能在轿车文明之外建立“世外桃源”，我们就要尽力避免被人裹胁到轿车文明中去。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主动迎接轿车文明。

主动迎接轿车文明，就是在政策配置、道路建设、城市规划等一系列有关的问题上，针对私人轿车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事先采取措施，尽最大的可能存利除弊。

我们主动迎接轿车文明，还要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充分吸收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不必大力鼓励轿车进入家庭，而是放弃原来的过度限制政策，听其自然。这样，一些高收入家庭会自动购买轿车。随着道路等设施的发展，再逐步提高千人轿车拥有量。在大城市内，还是以公共交通为

主，发展地铁、轻轨交通。在人流密集的市中心，限制私人轿车进入。

主动迎接轿车文明，最关键的是集中国力加速发展我们自己的轿车工业。用我们自己的轿车来装备我们的家庭，用我们的家庭市场来哺育自己的轿车工业。

在汽车工业已经国际化的今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要发展汽车工业，就得立足于国际市场。不立足于国际市场，我们的汽车比人家贵，质量比人家的差，就挡不住外国汽车进来。所以，我们的汽车没有国际竞争能力，就保不住国内市场。

中国汽车的总产量不到世界汽车总产量的 2.5%，在国际上无足轻重，在国内也没有真正成为主导产业。中国的汽车工业能不能挤进世界市场呢？有可能，但很困难。今天，世界汽车工业的格局和市场划分大体已定。这种格局是多年优胜劣汰的产物。今日汽车工业的主要成员是七十年代以前竞争的幸存者。中国要挤进国际汽车市场、并与西方汽车相抗衡是很难的。

但是，世界上也有后进者成功的先例。日本也是汽车后起国。现在可以和美国抗衡；韩国汽车工业发展更晚，现在也成了气候。当然，能否成功，关键在战略、在政策、在组织。关于这些，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了。

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国发展汽车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庞大的国内市场的支撑和培育，是提高本国的汽车工业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利条件。市场本身也是资源，而且是重要的资源。拿出部分市场资源换技术、换资金，也是发展国内汽车工业的重要手段。

刊于《天津日报》，1995年7月24日

歌厅酒楼：一掷千金何处来？

现在，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歌舞厅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酒楼如雨后春笋，越来越“贵族”。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是什么财源支持这种奢靡的繁华？我一直在寻求答案。

奢靡之风的财源是不是来自私营企业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工商联 1993 年下半年对 1700 户私营企业主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平均每户每月生活费开支为 1400 元。其中，伙食费占 42%，交际应酬费占 21.4%，服装费占 16.8%，文化娱乐费占 3.6%。他们的人均生活费支出，在城市，是其他居民的 2.2 倍；在农村，是其他居民的 3.3 倍。每月交际应酬费 1000 元以上者占被调查户的 24.4%。只有 6.4% 的调查户每月在娱乐场所消费千元以上。三分之一的企业主无暇光顾娱乐场所。从这个材料看，私营企业主的消费水平是要高一些，但他们不足以成为奢靡之风的主要财源。不久前，一位私营老板对我说：“我们赚钱很不容易，真是‘囊中毫厘皆辛苦’。除非是疯子，才会千金一掷玩心跳。”这是实话。那么，奢靡之风的财源主要来自哪里？

最近看到一个材料，使我明白了几分。原来，在歌厅酒楼花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公费。据有关部门分析，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大中型饭店的收入中，60% 以上来自公款请客；进口香烟 40% 是公款购买；各种名酒 60% 用于公款消费；国内旅游收入中，三分之一为公费旅游。至于近来时兴的公费出国旅游的耗费，那是无法统计的。

国家统计局提供过一个数据：1980 年全国公款消费 186 亿元，1990 年

为 741.2 亿元，1993 年猛升到 1283.5 亿元。我想，这个数字恐怕还不是公款消费的全部。

好事者算了一笔账，按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3 年公款消费的钱如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建 2.5 座三峡工程(按最初的概算)，可以造 60 艘航空母舰，可以建 130 个装机容量为 50 万千瓦的火电站……如果用来扶贫，按 1993 年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 942 元计算，当于 1.36 亿农民一年的收入。

这些公款是从哪里漏出来的呢？主要是来自国有企业和按企业经营的事业单位。政府机关虽然也参与公款消费，钱还是要企业掏。因为政府机关没有这项开支名目。常常有这种情况：政府请客，企业掏钱。企业的上级让企业请客人吃一顿饭，企业敢顶回去吗？何况结识了上级官员，说不定对企业经营还有好处，在一般情况下，企业也是愿意掏这笔钱的。还有不少会议，也要企业赞助。这类用企业赞助的钱召开的会议，照例有一半时间是进行旅游。

还有一些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办企业，实际是这些单位的“小钱柜”，是公款消费的财源之一。主管单位的公款消费，都由这些企业开支。这类企业由于是政府机关办的，带有权力经商的性质，钱来得比一般企业要容易。

企业的钱是怎样进入公款消费领域的？可以用很多名目。例如，按规定，企业可以按销售额的千分之三作招待费。如果销售额 1 亿元，就可以提出 300 万元。一个销售额 1000 亿元的城市，至少有 3 亿元投入歌厅酒楼。这个千分之三还可以突破。如果突破了，照章纳税就行了。企业还可以用其他名目报销招待费，例如，明明是在酒楼里的消费，发票上却写买材料的费用，或其他可以进入成本的费用。成本是个无底洞，可以容纳很多公款消费的开支。至于政府机关办的企业，花起钱来就更方便了。

企业经营中，来往业务活动较多，花一定的招待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需要弄清的是，第一，这种招待是在合理的限度之内，还是过分铺张；第二，这些招待费的花销是真正用于经营业务，还是用在不当用的

地方。我想，如果企业真正是自负盈亏，这些忧虑是多余的。问题就出在企业还在吃国家的“大锅饭”，吃银行的“大锅饭”，经理对资产经营的效果不承担责任，经理的行为又缺乏必要的监督。这样，企业就成了一个没有闸门的大漏斗，成了社会上奢靡之风的财源。

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有些私有企业为了“买”得各级政府设立的种种经营“通道”，也不得不在歌厅酒楼“搞定”政府官员。“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政策一“宽”，财源滚滚。只要官员网开一面，企业花多少钱也是可以加倍收回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常常是在歌厅酒楼里进行的或从歌厅酒楼里开始的。

如何堵住日益蔓延的奢靡之风的财源呢？这是深化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干预过多，事事设限、处处设卡，那么，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还得不停地向政府官员烧香上供，歌厅酒楼的生意还会越来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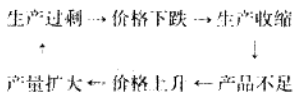
刊于《天津日报》，1995年5月7日

<<<<<<

机制泛谈

近年来报刊上有一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机制。市场机制，经济运行机制，企业经营机制，干部选拔机制，等等。什么叫机制呢？《辞海》上解释说：“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我在清华大学攻读了六年的机械，从机械学里还没有听到这个词。但是我从生物学上却读到了这个词。机制是指生物机体的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并由这种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形成一种自我生长、自我调节的功能。我们分析机制，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从现象的描述进入到本质的分析。一分析机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认识就深刻了，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就准确了。

现在，经济学从生物学那里类比借用这个词。例如，分析一个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从企业的经营机制上找原因；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也要分析经济运行机制。机制，它应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调节的循环，例如，我们说价格机制，它在调节生产的过程中，是一个自动调节的封闭循环：



在这篇小文里，我想把机制这个词的用途再扩展一下，用它来分析一下今天人们所深恶痛绝的一些社会现象。

腐败机制：什么叫腐败？腐败就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是权力和权力

的交换。腐败是和权力相关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可能产生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一定会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吴敬琏先生首先从国外引进了“寻租”这个概念。他们把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价格差、计划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利差等，称为“租金”。“寻租”，就是那些想发财的人们千方百计地获取这些“租金”。计划内产品、计划内贷款，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员掌握的。贿赂掌握“租金”的官员，是“寻租”最简便的途径。如果赚钱的机会(包括非法的和合法的)需要政府官员审批，掌握审批权的官员就是“寻租”对象。我采访过的一个案犯有一段精彩的自述：“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这说明，权钱交易是一个双向激励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封闭循环，这就是一种腐败机制。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衡，在这个封闭循环的自我激励下，权钱交易会愈演愈烈。行政权力干预经济的范围越广，“寻租”的现象就越普遍，制止“寻租”的成本就越高，腐败就越难制止。

假话机制：近来，浮夸风又喧嚣尘上。虽说不能和1958年农业“放卫星”那阵子相比，但其严重程度也够令人瞠目的。为什么假话屡禁不止呢？这里也有一个机制问题。据我在采访中得知，北方某省有的地、市政府向乡镇干部许诺，凡是达到一亿元产值的乡，乡长按副县级待遇，所以，乡长们千方百计地让各村多报产值。现在强调提拔干部要看政绩。什么是政绩？是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指标完成得越好，提拔得越快。这就是“数字出官”，上级对数字满意，官就升得快。如果这数字真正能反映政绩，那当然是好事，但不全是如此，其中不少数字是官员们根据升官的需要拼凑出来的，这就是“官出数字”。既然假数字能够成为升官的阶梯，小官为了当大官就更加大胆地出假数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也是一个不断激励的封闭循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纠正措施，也会根据“正反馈”原理，越来越严重。

拍马屁机制：拍马屁是人们所不齿的，但是拍马屁的现象却司空见惯。为什么呢？原来拍马屁现象的出现也有一种机制。如果干部的升降荣

辱由人民来决定，就会出现人民公仆；如果干部的升迁荣辱由顶头上司决定，就会出现人身依附。汉代哲学家王充说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王充《逢遇》）什么叫“遇”呢？在缺乏民主的、科学的选贤任能制度的社会，“遇”，就是得到有权势人物的赏识。如果有权势的人物本身“才高行洁”，真正出以公心选贤任能，那些想寻求报国之门的人们，就会努力做到“才高行洁”。如果有权势的人本身不是“才高行洁”，那些“能薄操浊”的人们，就会投其所好。拍马，是求“遇”的最好方式。所以，在那些“能薄操浊”的权势者周围，必然有一批“能薄操浊”的拍马屁者。这批拍马屁者很快就会“处尊居显”，在他下面又会有一批拍马屁者。这样层层向下扩展，拍马屁就成为风气。

我在上面说了这么多不好的机制，其目的在于从较深的层次上寻求解决这些社会弊端的办法，也就是要从制度的结构和运行机理这个层次来根除社会弊端。

刊于《天津日报》，1995年5月16日

首钢，还首都以绿色！

最近，首钢党委书记罗冰生向新闻界宣布，首钢正在跳出钢铁圈子，严格控制钢铁的生产规模，大力发展非钢产业。到2000年，非钢铁收入将超过50%。罗冰生还告诉新闻界，首钢正在加强环境治理，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

这一信息使新闻界十分高兴，我相信所有的首都人都都会高兴。

钢铁行业，是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业。首都钢铁公司(简称“首钢”)位处北京的上风口、上水源，距市中心仅20公里。在这里建设一个全国钢产量最多的企业，成为首都的重要污染源，这一直是首都人的心病。当最近环境监测报告显示首都空气经常接近重度污染时，这块心病就更重了。

首钢主厂区靠近西山。从城市气体循环的角度来看，西山应当是首都的“肺”。西山林木繁茂，是北京面积最大、植物品种最多的绿色区域。这里又处在北京的上风方向。空气经过这一大片绿地以后进入首都，就清新多了。这是首都人的一大福分。然而，在首都的“肺”上却有了首钢这样一个日夜排放硫、磷和其他有害气体的大污染源。这个污染源有损“肺”的健康，有损首都人民的健康。

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提出了四项方针。按这一方针，首钢不应是全国第一大钢铁厂。那时，首钢的钢产量只有100多万吨，中央书记处这四项方针提出后，首钢就放弃了原定向300万吨发展的目标，准备向非钢产业发展。但是，后来还是发展到了800多万吨，还计划向1000万吨挺进。当然，这样的发展多是出于北京市的财政压力，而且首钢的确为北京市的财政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首钢很重视环境治理。仅在“八五”期间，就投入了8.12亿元，完成了环保治理项目238项。1996年和1997年又投入了2.2亿元，完成了85项治理工程。这说明，首钢人对首都的环境有高度的责任感，这些治理措施也的确使污染减少了一些。但是，钢铁行业毕竟是重污染行业。现代科学技术也不能使钢铁生产不排放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粉尘。要减少首钢的有害排放，代价越来越昂贵。

现在罗冰生宣布首钢向非钢产业发展，这是自1980年来首钢向社会的第二次承诺。这一郑重承诺表明，首钢将还首都以绿色，将还首都以健康的“肺”。这是首都人的大幸。

首钢提出发展非钢产业，什么非钢产业？1980年在贯彻中央书记处的四项方针时，提出发展洗衣机、钢木家具以及饼干、面包、汽水等，供应职工和首都市场（见《瞭望》1981年第5期）。但是，这些都没发展起来，首钢却成了全国钢产量最多的企业。如果不是原首钢负责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话，那就是当时对非钢产业的选择不大对头。

现在首钢选择了哪些非钢产业？据《首钢集团三年发展纲要》称：“要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和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积极发展房地产和服务业，……进一步发展海外事业。”

在知识经济时代，首钢致力于发展高技术产业是应当的。不过，对首钢来说，还有一个很好的非钢产业：把西山建设成首都的旅游度假区。

西山有崇山峻岭，潺潺流水。这里不仅风光秀丽，还有很可贵的人文景观。这里有八大处风景区、香山风景区和其他著名风景区，集中了大量的名胜古迹。但是，由于服务设施落后，服务业还不发达，西山离旅游度假区还有很大的距离。

现代城市生活需要绿色。居家时，挤在钢铁和水泥构筑的灰色空间里，出行时，血肉之躯被裹挟在钢铁洪流之中，呼吸着被工业和汽车尾气污染的空气。这一切，使得绿色的山野成了人们向往的乐园。把西山建成北京的旅游度假区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地处西山的首钢在建设西山度假区中能作出、也应当作出特殊贡献。

首钢《发展纲要》提出发展第三产业和房地产业，这是不是指致力于把西山建成旅游度假区？如果真是这样，首钢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过，那时钢铁不是主要产业，可以不叫“首钢”而叫“寿岗”，因为西山成了使首都人长寿之岗。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8年7月2日

注：罗冰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是宣布首钢即将上市，希望借新闻界造势，把它的股票价格抬上去。我借罗冰生讲的“首钢正在跳出钢铁圈子，严格控制钢铁的生产规模，大力发展非钢产业”这一句话，发表了这一篇文章。可能罗冰生觉得这篇文章会影响首钢的股票价格，几天以后又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重申“首钢还是以钢铁业为主业”。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不让我参加。不过，几年以后，首钢决定迁往河北省曹妃甸。

<<<<<

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

当今，民生可能是媒体上出现得较多的一个词。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十分重视民生。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政府不可能包揽民生。改善民生，还得靠民众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还得靠提高民众与强势群体的博弈能力。这就涉及民生与民主的关系。

改善民生，政府的作用很重要。但是，如果把政府的作用强调过了头，改善民生的资金由政府掌握，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改善民生，国家行政权力就会过于扩张，社会就没有活力，民众的创造力就会枯竭，社会生产就会停滞不前，哪还有好的民生？

没有民主，政府改善民生的良好愿望可能会造成相反的效果。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不能说没有良好的愿望，他们舍生忘死，流血奋斗，最终建立了一个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并想通过行政权力来改善民生。但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怎么样呢？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1979年公布的数字)。1983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采访了一位三十年代从大别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说，1979年，他回老家看了看，没想到，比他参加革命时还穷。他对此感慨不已。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十分艰难。1977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生产第一线的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19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

简而言之，没有民主，就没有民生。1958—1961年的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人数以千万计。现在都公认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人祸”。说得确切一点应当是制度之祸，即没有民主造成的灾祸。造成大饥荒的重大政策失误是压制不同意见的结果。出现重大政策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也是因为打击了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彭德怀在内的数百万名干部，因为指出了政策中的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样才使得饿死人的错误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更重要的是，在缺乏民主的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垄断了一切生产条件，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所幸的是，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极度贫困甚至饿死的经济制度得到了改变。但是，政治上还基本上保持高度集中的状态。最近两年，国家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这当然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但是，政府的民生投入大多是靠行政手段、行政机构实施的。在民意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不畅通、行政权力缺乏必要监督的制度环境下，民生投入一部分会挪用到非民生方面，一部分会进入各级官员的私囊。民生投入只有最广泛的公共参与和严格的民主监督，才能够使民众真正受惠。回想1998年开始的、实行了五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一政策对国民经济持续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其消极效果不能忘记。我当时发表的《凯恩斯水土不服》、《凯恩斯依赖症》等文章揭露了种种问题：政府投资对GDP的拉动效应日益降低；政府投资的增加没有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内需没有真正启动起来；大批投资装进了个人的口袋。当时国家计委对427个重点国债项目进行稽查，共查出挤占建设资金的项目100多个，违规招投标项目107个，存在质量隐患的项目85个。“问题项目”比例之高令人震惊。“问题项目”造就了大批贪官。当时全国有十多个省市的交通厅、公路局长因贪污受贿进了牢房。今天的腐败情况比那时更严重，这一轮政府的财政扩张会不会造成更多的贪污犯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没有民主，社会财富的分配就不可能顾及民生，这个问题在财政预算方面最为明显。预算民主是现代国家通行的民主原则。所谓预算民主，至

少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政府拥有对预算的控制权；第二，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行为必须公开透明，完全置于广大群众或人民代表大会的控制、监督之下；第三，人民代表必须是人民选举出来的，要代表纳税人的意愿；第四，政府向人代会提供的预算报告必须准确、细致、完整，不允许有预算之外的公共开支。显然，我们是没有预算民主的。

由于缺乏预算民主，我们各级政府花钱是很随便的。财政预算过多用于政府公务消费和政府的形象工程。很多县政府的办公楼比美国总统办公的白宫还要豪华气派。为官员服务的楼馆所越来越奢侈，越来越讲究。公费出国旅游、公费吃喝玩乐的现象非常普遍。国家行政管理费支出出现了极不合理的增长，而民生投入相对很少。2006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这三项涉及民生的开支总额为10457.6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5.87%。（《中国统计摘要2008》，第66页）。而国有经济很少的美国，2007年上述三项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陈志武：《政府规模有多大》）。国家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增长：1995年为11.22%，2000年16.01%，2005年增长到21.23%，2007年略有下降，但还高达19.86%。（据《中国统计摘要2008年》第19页、第67页数据计算）与此相对应的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六五”时期这个比重为51.7%，“九五”时期这个比重降到45.8%，2007年降到35.3%。（《中国统计摘要2008年》，第35页）

要搞好民生，必须使普通民众在国民经济这块大蛋糕中享有合理的份额，这就需要社会公正。民主是各阶层平等表达利益诉求、寻求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我们一再强调把蛋糕做大，认为只要蛋糕做大了，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确使蛋糕做大了，令人遗憾的是，为改革支付成本最多的工农群众得到的份额较小，而对改革支付成本较小的权势阶层却占有了蛋糕最大份额和最甜美的部分。官商勾结占农民土地，4000万失地农民；国有企业改革使4000多万职工离开了工作岗位，

很多没有得到新的就业机会。底层群众的利益之所以受到侵害，是因为在改革过程中，他们的表达权、参与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民生不是靠政府施舍能够改善的，最根本的还是要为老百姓提供争取更好生存的制度环境。最好的制度环境就是民主，当然还有法制。法制和民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民主，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民生，是公民的经济权利。作为公民，这两种权利都不可缺少。首先有政治权利，才有可能得到依靠自身力量改善生活的权利。没有政治权利的社会成员只不过是匍匐在权力阶梯上的“臣民”，他只能期待政治权力慈悲为怀，仰仗政治权力施舍“民生”。“臣民”既不能参与经济决策，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不管政策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他只能顺从。“臣民”不可能有像样的“民生”。

改善民生和发展民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民生不可缺，民主更不可缺。在着力改善民生的时候，要着力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民生和民主不能分割，千万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

刊于《中国改革》，2009年第6期

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然而，社会是否和谐，关键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会产生矛盾，就可能使社会不和谐。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建设和谐社会不是在忽视矛盾或绕开矛盾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要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其中，关键是正确处理好阶层间的矛盾。

社会公正

社会各阶层之间，不仅存在矛盾，也存在可协调性。有效地协调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而协调的原则就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原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社会公正要求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均衡，社会各阶层各分享多少利益，各应承担什么义务，应当是均衡的，每一个阶层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称的。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加突出。

改革期间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社会不公正必然引起不和谐，不和谐的突出表现是阶层间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是主要的表现形式。

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但是，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随着经济迅速市场化，而行政权力几乎没有大的触动。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原有的权力体系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更加强化。从此形成了“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是最不公正的市场经济。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改变为“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保证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和制度的保证。这就需要加速实现民主政治。

社会流动

社会阶层是社会报酬(财富、权力、声望)分配不平等的标志，是社会地位排列顺序的构造。但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代代不变的。社会阶层像公共汽车，它永远是运行的，但其乘客是不断更新的。这就是社会流动的形象比喻。

社会流动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进入上等阶层的机会。这是化解阶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然而，不同社会状况的流动性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差。在这样的社会里，上等阶层

的人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制度演进，使得处于下层的人们很难向上层流动。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中国改革以前的那种身份社会流动性很差，改革开放以后大有改善，但还是有很多阻碍社会流动的因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僵死的人事体制，使一些优秀人才得不到上升机会。职务升迁是社会流动的一个方面，这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现今的干部人事体制是任命制。从名义上讲，这种任命制也有一个考察、选拔的过程，也有集体讨论。但在实际上，很多单位的一把手的意见占主导地位。一把手“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1979年2月，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一封写给一位美国人的信中曾说，“除非我们改变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否则“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教育不公平使低阶层的后代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在中国，农民的儿子要脱离农村，上大学是一条最主要的渠道；工人的儿子要当干部，上大学也是一条重要渠道。既然受教育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因素，教育机会均等，是最重要的机会均等。改革以来，我们的教育机会均等情况是比较差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校大学生中，城镇居民子弟约占70%，农民子弟约占30%；而在全国总人口中，这一比例恰好相反，农民子弟占70%，城镇居民子女占30%。农民子弟即使大学毕业，但由于权势阶层的种种形式的阻拦，他们也很难进入职业声望较高的工作岗位。《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报道，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刘伟父亲是农民，举债为她上学。她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上大学，家里只好让弟弟辍学。我欠弟弟很多，以后再偿还给他。”为此，她一上大学，就为找工作担忧。她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应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她最后一篇日记只有6个字：“为什么这么难。”迫使刘伟自杀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阻止低阶层向高阶层流动的强大力量。这种阻力来自缺乏制度和法律制约的权势阶层。

政府作为

改革以前，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政府，政府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现在，原来集中于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政府不再是支撑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社会中间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也对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在政府是社会稳定的唯一支撑力量的时候，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两手：一手是权力强制和武装镇压；另一手是统一认识，压制不同思想。这就是传统社会安邦定国的“文武之道”：笔杆子和枪杆子。也就是说，那时的稳定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对各种社会势力和各种不同意见的控制力强，社会就能稳定，控制力削弱，就可能不稳定。30年的改革，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看不到这一变化，还是靠控制舆论和迷信警力来维持稳定，不仅适得其反，还是很危险的事。

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多元化以后，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要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无能和市场失效的环节发挥政府的作用。

当前政府要做的是：一要建立沟通渠道，让各阶层的意见得到表达；二要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建立风险和冲突的缓冲带；三要强化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改革三十年来，国家重视经济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前，社会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国家的社会政策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防止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加强权力制衡和法制建设，阻止上等阶层侵害下等阶层的利益；通过再分配，从上层取得收入，用于扶助下层，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刊于《中国改革》，2009年第7期

大声呼唤 教育公正

在中国，农民的儿子要脱离农村，摆脱农民身份，上大学是一条最主要的渠道；工人的儿子要当干部，上大学也是一条重要渠道。人们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也必须有相应的学历。总之，一个人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上学是一条重要途径。

进行社会阶层分析的社会学家们虽然有很多争论，但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受教育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教育机会均等，就是最重要的机会均等。令人遗憾的是，在今日的中国，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大大低于城市职工子女。教育机会不均等就是教育不公正，教育不公正是最基本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不合理造成的。

义务教育成了农民的义务

我们成天讲义务教育，但有一个基本概念没弄清楚：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其实这个问题很明白，义务教育是政府的义务。这个概念西方国家十分清楚，例如，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央政府无一例外地承担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经费的职责。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义务教育是再分配的果实，不是初次分配的果实。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不管富人和穷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管居住在什么地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再分配，是国家财政拿钱，用来修正初次分配中不公正的重要手段。义务教育是体现教育公正，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义务教育在再分配

的“筵宴”上没有应得的席位。名为义务教育，实际上还要已经纳过税的、处境相当贫困的农民自己掏钱。义务教育成了民办教育。

中国的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乡镇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义务教育投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中，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里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很少。（苏明：《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2002年第25期）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但不负担义务教育的经费，乡镇财力十分薄弱，却要负担绝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乡镇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从农民那里来。在农民所交的“三提五统”之中，就包括“教育费附加”，这“教育费附加”是强制征收的，不管有没有子女上学，都得交。除了交教育费附加以外，上学的孩子还得交学杂费。农民负担重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缓和农村的社会矛盾，国家准备实行税费改革（适当提高税负，取消各种收费）。但是，由于基础教育经费来自收费，取消收费，乡村基础教育只好停顿。

义务教育本来是不应当收学费的，但国家允许收杂费。据中央调查组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调查，一个小学生一年收费在300—500之间，初中高达千元以上。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农村初中生辍学率在20%以上。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调查，贫困地区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占60%左右（张力：《面对贫困——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背景、现状、对策》第155页）。

流动民工在城里虽然依法纳税，但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比城市居民的子女少得多。有人估计，2000年末，仅北京市就有9.5万流动民工的子女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刘天时：《成长，在城市边缘》，载2000年12月27日《南方周末》）。

不记得哪位学者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多建几所学校就可以少建几所监狱。但是，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学龄儿童就学率的提高速度不如犯罪率的提高速度。

教育不公平是由教育财政制度决定的。《教育法》第57条规定：“农村乡统筹中的教育附加费，由乡人民政府组织征收，由县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代为管理或由乡人民政府管理，用于本乡范围内乡村两级教育事业。”

第 59 条规定：“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根据自愿量力的原则，可以在本行政区内集资办学，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危房改造和修缮、新建校舍，不得挪作他用。”这两条规定，将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推给了本来已经相当贫困的农民，而城市居民不承担教育附加费，也没有教育集资的义务。城乡财政制度不平等，使得城乡教学条件差别很大。1998 年，全国初中生均预算内经费城镇为 813 元，农村只有 486 元(袁连生：《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探讨》，载《教育与经济》2001 年第 4 期)。

中国城乡差距本来很大，国家财政把有限的教育经费集中到城市，把乡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推给农民，这会使城乡差别越来越大。

不同地区间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省、地、县(市)、乡分级管理的职责如何划分，由省级政府决定。《义务教育法》第 8 条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义务教育实施细则》第 5 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城市以市或市辖区为单位组织进行，农村以县为单位组织进行，并落实到乡(镇)。”第 28 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事业费和基本建设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中央和地方财政视具体情况，对经济困难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给予适当补助。”中国幅员辽阔，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财力差别很大。上述规定，将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各省市也效法中央，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推到乡(镇)一级。而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是越到下层越困难。这样，必然造成不同地区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如：1998 年小学生均经费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河南的 9.7 倍。初中生均经费西藏最高，但初中入学率不到 20%；第二位是上海，相当于最低省份贵州的 6.8 倍，但贵州初中入学率不到 60%，如果按每一学龄人口经费计算，级差在 10 倍以上。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必然造成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1998年各地区生均教育资源比较表

地区	小学				初中			
	生均预算 经费 (元)	生均固定 资产 (元)	生均仪器 (元)	生均图书 (册)	生均预算 经费 (元)	生均固定 资产 (元)	生均仪器 (元)	生均图书 (册)
全国	378	1201	87	9	625	2078	184	12
北京	1313	2886	286	21	2016	5178	614	26
天津	854	1478	186	9	1268	2258	373	13
河北	249	1036	78	10	453	1606	158	15
山西	337	1328	154	9	523	2445	166	12
内蒙	508	1051	92	6	675	1534	177	9
辽宁	530	1044	98	12	835	1911	207	12
吉林	472	1193	92	11	764	1670	161	14
黑龙江	524	1079	61	7	624	1192	121	7
上海	1957	2390	325	17	2543	4960	700	30
江苏	501	1201	113	11	815	2558	260	17
浙江	593	1425	128	11	779	2632	245	15
安徽	297	971	52	9	435	1466	106	13
福建	518	1491	78	12	690	1929	180	13
江西	292	739	35	8	397	1135	74	10
山东	311	1323	77	7	548	2072	134	10
河南	202	917	65	10	429	1618	151	14
湖北	219	1463	113	9	507	2483	229	14
湖南	235	1234	92	9	393	2077	192	14
广东	558	2589	177	11	848	3843	355	16
广西	299	1057	49	7	410	1951	102	10
海南	408	1334	92	5	671	2364	222	8
重庆	358	1046	72	7	617	2213	169	10
四川	310	878	62	6	537	2045	150	9
贵州	235	491	25	2	375	980	76	5
云南	553	1037	57	5	962	2611	165	8
西藏	892	1088	21	7	3053	7157	133	32
陕西	223	841	68	10	466	1809	168	14
甘肃	303	789	62	6	544	1118	127	8
青海	580	982	4	4	987	1686	100	8
宁夏	504	825	53	6	617	1462	152	8
新疆	644	1301	63	4	917	1435	197	7

资料来源：袁连生：《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探讨》，载《教育与经济》2001年第4期

不仅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就是在同一个地区，学校教育质量差别很大。重点中学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升学率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孩子能进入这样的学校，上大学的可能性就大。这些重点中学为了平衡供求关系，不得不用收费来设“门槛”。有的城市的一些名牌中学(大学升学率90%以上)高中入学收费数万元之多，穷人子女只好望洋兴叹。而那些权力地位高的人的子女，不交钱也可以进入。那些所谓“贵族学校”要交几十万元才能够就读。

升学的门槛高低不同

在2001年“黑色的七月”，气温高达40多度的湖北农村，为了降温 and 减少蚊虫叮咬，家长出了一个土办法：考生复习功课时双脚放在水桶里，父母定期更换凉 water 并在一旁打扇。在同一时间内，北京的考生在有空调的家里，喝着冷饮复习功课。两地的孩子同样考了550分。结果湖北农民的孩子名落孙山，北京的孩子进入重点大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湖北省的分数线是555分，北京的分数线只有488分。

中国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但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分别划线录取的办法。而各地招生定额并不是按考生数量分配的，由各高教资源多少而定。因此，同一所大学，在各省录取分数线差别很大(见下表)。那些生均教育资源比较高的大城市的录取分数线，却远远低于生均教育资源比较少的省份。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教育资源比较多的大城市，其分数线比湖北、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要低几十分甚至100多分。

2003年8月23日，三名青岛女学生来到北京，向教育部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教育部“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侵犯了她们的受教育权。2001年，青岛文科一般本科提档线是493分，重点本科是575分，而北京重点本科提档线才456分，整整低了119分！这件事引发了关于教育不公的讨论，讨论从高考分数线到受教育机会的方方面面。在讨论中有人著文指出：“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不公平。其面积之大，程度之深，受害者之多无不让人胆战心惊。”

部分地区高考理科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分)

地区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地区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湖北	566	559	555	四川	511	530	537
河北	546	543	572	重庆	508	529	540
江苏	546	505	540	内蒙	499	508	523
江西	542	532	568	天津	488	488	508
浙江	540	525	569	甘肃	487	506	512
湖南	537	535	551	宁夏	480	476	490
山西	535	496	543	贵州	482	471	471
安徽	533	534	538	北京	470	476	488
吉林	525	490	525	新疆	460	478	478
辽宁	525	515	529	云南	440	435	435
黑龙江	520	515	528	青海	420	420	400

资料来源：新华社2002年3月8日发稿

显然，受害者多是弱势阶层。今日的中国，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弱势阶层的下一代还是弱势阶层，使社会地位更不平等因素继续和发展。

教育经费本来不多，却用于锦上添花。

我们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太低。而这点教育经费的大部分又没有义务教育之中。

国外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1990年数)：中等收入国家为4.4%，高收入国家为5.7%，世界平均水平为3.6%(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而我国近二十年来，这个比重一直徘徊在2%—2.5%之间，而这有限的财政投入大部分放在城市和非义务教育上。1998年，我国义务教育的学生数超过1.9亿，非义务教育学生2435万人，但当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的为52.9%，其中，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中用于义务教育的只占49.9%。农村义务教育的学生为1.23亿，占当年全国义务教育学生的65%。而农村基础教育的拨款只占全国整个教育拨款的27.5%(苏明：《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2002年第25期)。

我国的教育经费向高等教育过度倾斜，有限的经费向高等教育集中。以1999年为例，如果全国普通小学生均经费为1，那么全国初中生均经费为1.62，全国高中生均经费3.36，全国普通高校则高达18.31。而经合国家(OECD国家)初等教育为1，中等教育为1.41，高等教育为2.97，(同上)他们的初等教育投入的比重比我们高得多。

有限的教育经费未大量集中到农村，而是集中到少数重点大学。少数重点大学不停地锦上添花，动辄投入几亿、几十亿，大量的乡村学校急需雪中送炭，却望眼欲穿而不得。重点大学里建一座假山、修一个花坛的费用，足够几所农村学校一年的开支，足够偿还上百名教师被拖欠的工资。教育投入本末倒置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刊于《中国投资》，2002年第8期

媒体怎样丧失公正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比“文革”期间有了明显的好转。

“文革”中一时盛行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作法遭到唾弃。尊重事实的多了，弄虚作假的少了；主观武断的少了，客观报道的多了。

舆论监督加强了。出现了一批鞭挞邪恶、揭露腐败、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涌现了一批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

很多记者在采访中敢冒风险，甚至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些记者为新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多数记者改变了“文革”时以“紧跟”、“看风”为主要工作方式，能够独立思考、积极进取地从事新闻事业，记者的责任心、事业心加强了。

这些好转使得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了明显长进。新闻更贴近群众，更贴近实际。“文革”期间那种千报一面、千篇一律的情况没有了，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些好转是根本性的好转。从这些根本方面来把握，我们的新闻职业道德比改革前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新闻界的这些进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民主化程度提高的结果。

但是，在金钱可以交换一切的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新闻界出现了很多使社会各界厌恶、憎恨的现象，出现了很多使新闻从业者感到惭愧、感到羞耻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媒体腐败现象。

媒体腐败是以社会影响谋私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新闻界的腐败现象呢？它的

特点是以稿谋私。一些权威新闻单位，还以“牌子”谋私，即打着这块“金字招牌”去为小单位“创收”。稿子也好，牌子也好，都可以借它产生公众效应，可以产生社会影响。所以媒体腐败的特点是以公众效应谋私，也就是以社会影响谋私。

社会影响、公众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新闻单位的权威，发布新闻的单位越有权威，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越大；二是新闻单位的社会形象，它的形象越公正，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越大。新闻单位的权威是权力赋予的，而权力是人民给的，所以，新闻单位的权威是人民给的。新闻单位的形象是这个新闻单位的新闻工作者共同创造的，它是这个新闻单位几代人职业道德的结晶。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单位的权威和形象，是全体人民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效应、社会影响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一个企业花数千万元做广告，就是为了取得公众效应。有了良好的公众效应，就可以得到市场，财源就滚滚而来。而由权威新闻单位就某企业发布的新闻稿件，要比自吹自擂的公众效应好得多。从企业角度来说，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花钱发稿子。一块版面的广告一般都在10万元以上，而和记者私下交易发一版稿子，花的钱就少多了。

企业从记者的稿中得到社会影响，并从社会影响中得到巨额财富以后，将其中一部分分给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这样，企业、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都得到了好处。

最近几年，有的记者还参与官场干部的职位竞争。例如，两位县委书记争夺省里一个职位，记者通过发表批评或表扬的稿件，从而影响竞争者的胜负。这样的稿件当然不会公正。竞争的胜利者会给支持他的记者以丰厚的回报，胜利者和记者都得到了好处。

谁受损失了呢？是新闻单位的权威，是新闻事业的形象。如前所述，正是这两个因素决定着发布新闻的公众效应和社会影响。它的权威消失了，形象坏了，不仅不能产生正面社会影响，反而要产生负面影响。不能产生社会影响的报纸，相当于死亡的报纸。产生负面影响的报纸，不如没有这张报纸。新闻单位的权威和形象是无形的财富，这一财富归谁所有？

不是总编辑的，不是记者的。对党报和政报来说，这一无形的财富是国家的，是党的，是人民的。对非党报来说，是这个单位全体成员的。可以套用一句经济术语，这是“国有资产”。像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样，国家新闻单位的宝贵的“国有资产”也在不断地腐蚀，不断地转化为某些个人口袋的财富。和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同的是，企业的资产流失净了，企业就垮了，而新闻单位的“国有资产”流失净了，也就是报纸的形象彻底坏了，它必然还要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和公众效应。如果这张报纸天天代表党和政府说话，它就在天天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媒体腐败的表现形式

媒体腐败最根本的表现是不说真话、不讲真理，失去了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基本属性。不客观公正有两个原因：一是强权的压制；二是金钱的收买。“文革”中的报纸属于前一种情况；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属于后一种情况。我在《试论新闻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新闻记者》1988年第3期）一文中，分析了前一种情况。现在这篇文章只研究后一种情况。

新闻媒体是怎样沦为金钱的奴隶呢？方式很多。一是收取新闻的刊播费用。即新闻单位和企业事先定好的协议，新闻单位向要刊播新闻的企业提供有偿“服务”，企业向新闻单位支付多少报酬。所谓“服务”就是按照企业的要求，在什么时候发出什么内容的稿件。二是出卖版面。即整版明码标价，刊出吹捧企业的稿件。三是企业和记者私下交易。记者发稿，企业向记者支付高额酬金。记者拿到钱后，拿出一部分“打点”有发稿权的编辑。前两种情况是公开的，收益归新闻单位集体所有，后一种是“黑箱子”交易，收益归个人所有。前两种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但还有各种变相形式。后一种目前有泛滥之势。在一些采编合一的报纸，记者自己写稿，自己发稿，其中漏洞很多。一些包给个人的专版和电视栏目，最容易进行私下交易。过去《人民日报》对专版管理很严，专业部做好专版以后交给总编室，发表权集中在总编室。那时，整个专版被“枪毙”的情况是常

有的。现在有些报纸不是这样管理，交给个人后，采访、排版、发稿全由专版编辑一个人管，总编只看看大样的标题，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通过。

当然，有些交易并不都是一手发稿，一手交钱，而是发稿人和被宣传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只要发了稿子，好处总会有的。即使不给明显的经济补偿，日后总有用得着人家的时候。所以，现在有的报纸“关系稿”特别多。这样的报纸，其客观公正也就要打折扣，更谈不上报纸的质量了。这是“国有资产”流失、腐蚀最常见的情形。

以上种种形式发出的稿子必定带有浓厚的“广告味”。

当然，还有大量带“广告味”的稿子不能说是腐败造成的，而是属于采访作风所致。但这种作风也会影响新闻的客观公正，从而影响新闻的形象，和上述腐败起到同样的恶果。现在经济记者通行的采访方式大体有以下儿种：

一是企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企业经过充分准备，或请公关公司帮助，约请记者到某大饭店，由厂长介绍情况，并向记者散发写好的新闻稿。会后有宴请，一般都以交通费名义，给记者发“红包”。

二是企业邀请一批记者到企业所在地采访，企业承担来回飞机票和食宿费用。这种采访活动一般两三天左右，其中一多半时间消耗在宴会和旅游之中。参与采访的所有记者都听同样的汇报，拿到同样的文字材料，每个记者没有独立采访的时间，这样的活动一般也给记者发“红包”。

三是某公关策划单位或个人，让企业出一大笔钱，他作为“穴头”，组织一批记者到这家出钱的企业采访，写一批吹捧企业的稿子。“穴头”组织交通(通常是把飞机票送到记者家里)及一切事务。“穴头”赚到一大笔钱，“走穴”的记者可以得到“红包”。

四是地方政府出面邀请一批记者到当地采访一批企业，也是旅游式的走马观花的采访。都是集体采访，个人采访机会不多。被采访的企业一般都会给记者“好处”。

上述这些采访方式写出来的稿件不能不带“广告味”。你享受了人家的盛情招待，又拿了人家的“红包”。“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你的稿件还能客观吗？就是你吃了拿了想黑下脸来不认人，可你拿

不到客观报道的材料，你没有抓到真正的新闻，你只能根据人家提供的材料写稿，还是免不了“广告味”。

道德制衡弱化是媒体腐败的重要原因

真善美，是崇高的道德境界。其中，真是第一位的。没有真的“善”是“伪善”，没有真的“美”是“溢美”、“媚美”。社会道德要求真，新闻道德更要求真。一是求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二是求真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追求真理是新闻的职责，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媒体虽然不能保证他们所说的话都是真理，但媒体必须追求真理。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操节，有的人不惜殉之以生命。我国最早的报刊评论家王韬在《论日报渐进于中土》中强调，报人要品德高尚，记事持论“其居心务期诚正”。近代报刊政论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日报》中说：“执笔者务期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唯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

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马克思认为，敢于宣传真理、坚持真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毫不动摇、绝不屈服，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品质。马克思把那些在恶势力和金钱面前摇摆不定以至无原则的妥协的报刊撰稿人斥之为“最无气节、最软弱、最糊涂的作家”，是一个“可怜的两栖动物和两重人格的人”。他把迎合反动势力写文章看作是在做“政治投机生意”，而这样的人是“出卖灵魂的报人”。马克思认为那些在政治上看风使舵、在宣传上左右逢源的报刊是“既没有自己的理性，又没有自己的观点，也没有自己的良心”，这样的报刊因为有“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的约束，而失去了职业道德。列宁把“男盗、女娼、卖身的文丐、出卖自己的报纸”归为一类加以痛斥。

近年职业道德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报纸的社会功能的神圣性认识**

不足。改革前把报纸片面地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把“客观公正”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用主观的价值判断来扼杀对事件的客观描述，用虚幻的“总体真实”来否定具体真实，用抽象的“本质真实”来否定现实的真实。“文革”期间，新闻媒体又扮演了可悲、可恨的角色。人们走出文革的阴影以后，像从暗室走到阳光底下，眼睛看不到东西了，连报纸“开启民智，抨击时弊、导向国民”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也丢了，连马克思说的报纸是“促进人民的文化和智育发展的强大杠杆”这句话也忘了。报纸的社会责任、社会功能使新闻工作是一种全社会最为关注的工作。新闻工作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新闻工作者失去了职业的自豪。在市场经济还不规范的情况下，由于发财的诱惑，一个又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脖子上被套上了“黄金的链条”。

媒体腐败的体制原因

现在，为党和国家说话的报纸，国家并没有给足经费，而是让报社自己去“创收”。承担社会责任的新闻单位要自负盈亏，要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作为一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他面对最大的压力是经费问题，所以他不得不把“创收”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新闻单位的奖金高低和“创收”多少挂钩，“创收”越多，单位职工得到的好处越多，编辑、记者也就把“创收”放到重要位置。虽然上面强调“创收”和新闻业务要分开，但真正分开的单位不多。新闻单位没有什么创收手段，要自负盈亏，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而利用版面创收又最方便。有的经费十分困难的新闻单位不得不鼓励记者去向企业要钱。为了提高要钱的积极性，要来的钱，个人可以拿到20%—30%甚至比例更高的回扣。

带有“广告味”的稿件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却很容易地通过了层层“关口”，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对于把关的总编辑来说，经济压力的紧迫性远远大于维护报纸质量的紧迫性，他明明知道这篇稿子有“广告味”，从收入上考虑，他只好放行。

我不是主张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依靠国家供给经费。但是，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新闻单位，应当给足经费，不要让它去“创收”。新闻单位是有收入的，广告应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广告就是广告，稿子就是稿子。广告是纯商业性的，稿子不能有一点商业味。其实，党和政府直属的新闻单位的广告收入是很可观的，多数单位可以抵上报社的开支，不少单位还有巨额利润。即使是这样，也应当收支两条线，不能搞收支挂钩，更不能搞利润承包。新闻单位的领导人主要精力应放在新闻业务上，不应放在“创收”上。

对多数新闻单位，可以让它自己收支挂钩。也就是靠广告来养活报纸。这些非政府的报纸要求得生存，就得有广告；要有广告，就得有发行量；要有发行量，就得有客观公正的好形象。形象很坏的报纸，公众不承认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报纸的竞争，关键是报道质量的竞争。报道质量又取决于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所以，从根本上说，报纸的竞争是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的竞争。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广告加强管理。有一个城市有 300 多家报纸，每家发行量都只有一两千份。这些报纸的目标很明确，不是为了新闻事业，只是为了赚钱。广告客户不知道它的发行量，报社雇一批广告员，以 50% 的回扣揽广告。企业都有一笔广告费开支，这笔开支掌握在企业某人手中。这个掌握广告费的人就是大批广告员的“公关”对象。广告员私下和他谈条件，这条件就是回扣比例。企业里掌握广告费的人常常不从广告效果出发，谁的回扣比例高，广告就给谁，这中间有大量的“黑箱子”交易。这也是媒体腐败的一个方面。

对广告的管理要抓住一条，这就是公开所有报纸的发行量(对电视来说，就是公布收视率)。广告的效果和报纸的发行量是直接相关的。报纸的发行量越大，广告的效果就越好，广告客户就越多。报纸的发行量又是由报纸的质量决定的。谁的报纸质量高，谁就拥有读者。我前几年提出过办报要抓“三发”：发稿，发行，发财。发稿是基础，稿子好，发行就好办。发行取决于发稿(也就是报纸的质量)，但发行也有其主观能动性。发行上去了，发财(广告)也就容易了。如果所有的报纸的发行量都是公开的，就

可以防止广告业务中的“黑盒子”交易。这样，报纸就可以公开平等地竞争，报纸就会按照“三发”的逻辑走下去。编辑部门专心致志地办发报纸，就不愁经济来源。我看到有些国家在报纸一角印出今天本报开印份数。这个办法我们能否借鉴？

最近几年，在报纸发行中也有大量的不正当竞争。这种不正当竞争中，是以报纸的质量为代价的。你订我多少份报纸，我给你多少版面。用版面换取当年的发行量，这种换取发行量的版面，也是一种变相广告。这种作法使近期发行量暂时上升，却使报纸质量下降，从根本上造成发行量下降。这是报纸太多了的原因。如果公开了每家报纸的发行量，那些发行量很小的报纸没有广告，它也就办不下去了。公开报纸发行量，也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

刊于《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

依靠产品打天下

最近两年，全国毛纺行业销售困难，苦不堪言，而兰州第三毛纺厂却一枝独秀，经济效益大幅度上升。为什么？因为三毛的产品受欢迎，生产多少就卖出多少。

近两年来，“三角债”困扰着千万家企业，而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却没有“三角债”。为什么？因为金川的镍很紧俏，拿现钱都难买，当然不会有人拖欠。

看来，企业有了真正的好产品，在困难的市场环境中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兰州第三毛纺厂厂长任俊亭谈了自己经营之道：“依靠产品打天下。”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依靠产品打天下，就要竭尽全力地搞出好产品。这个“好”，不是某个评委会评出来的，也不是某个领导机关“颁发”的什么金牌，而是在市场上较量出来的。金牌、银牌不如柜台。在柜台上畅销，销售量大，就是好产品。

畅销产品能使企业兴旺，滞销产品会使企业倒闭。马克思说：“从商品到货币是惊险的一跳。”这两年，很多厂长才真正体验到这种“惊险”。然而，只要有了市场急需的好产品，这“一跳”也就不那么“惊险”了。

企业改革

Q
T
Y
H
G
A
I
G
H

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今年的畅销产品，明年可能滞销。产品本身也有个生命周期，不可能绝对地“经久不衰”。依靠产品打天下，首先就得研究市场，根据市场趋势作出正确的产品决策。产品决策是企业的根本性决策，这种决策要力争有预见性，但也要敢于冒一定的风险。成功的经营者有这样一条经验：有50%的把握就可以考虑去做，有70%的把握就要下决心去做，而有100%的把握时倒不一定去做了。因为你认为有100%把握的事，先觉的人早就动作起来了，等你出了产品，市场早被他占领了。当然，风险不等于盲目。要在这种风险决策中避免失误，关键在于决策者全面掌握市场信息，看准市场的变化规律，也在于决策者的胆识和魄力。

要有好的产品，首先得抓技术进步。新产品是新技术的结晶。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产品更新换代，最根本的是工艺革新、产品设计。而做好这些工作，关键在于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要靠产品要天下，就必须重视发挥科技人员的创造性作用。对那些确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要让他有相应的高收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企业，不可能什么技术都自己开发，这就要善于利用国内、国际的技术市场，吸收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技术成果。谁先把试验室的成果和好的设想变为畅销产品，谁就可能在市场上独领风骚。

依靠产品打天下，必须深化企业内部改革。企业调整产品结构的应变能力，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能适应市场的灵活机制。企业的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用工制度、奖惩制度等等都要围绕这个目标进行改革，也要围绕这个目标确立产品销售战略。企业领导和职工日夜忙碌，最终还是为了把更多、更好的产品推向社会。产品是企业的中心。抓好了这个中心，企业就能称雄天下。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1年9月22日

谁来解开“九连环”？

《红楼梦》第七回，林黛玉在贾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作戏。九连环，是一种智力玩具，属今日的魔方一类，不得要领是解不开的。最近我突发奇想，觉得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解九连环有类似之处。

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它是传统体制捆绑的重点，它们承担的指令性计划产品最多，它们的财政上缴任务最重，它们还有安排劳动力就业的责任。身遭五花大绑，肩挑三副重担，纵有天大本事，也难施展手脚，此其一。有了第一个原因，国有企业也就不可能自负盈亏，是赔是赚有国家兜着。这样，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像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那样去吃尽千辛万苦，使出千方百计去求生存、求发展，此其二。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厂长中不乏能人。有了这两条，就是日本的电器大亨松下幸之助，就是美国的石油大王哈默，也难当好厂长。从这两个重要原因出发，不少有识之士早就开好了治疗国企病的药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二自”的基础上，才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所以，自主经营是最关键的。

自主经营，是指政府部门不干预企业的经营事务，视市场的供求情况，产品能上能下，价格能高能低，职工能进能出。

然而，有关自主经营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难以解开的“九连环”。请看：

产品能上能下，就是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就得减少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为什么减少不了。因为有些产品短缺。众所周知，我们的指令性计划实际是“短线”产品计划。为什么有些产品长期短缺？因为产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赔钱的产品当然没有人去

多生产。为什么不合理的比价得不到解决？因为有些产品太短缺。你让比价合理，就是让短缺产品大涨价，这就可能诱发通货膨胀。问题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结成了一个连环扣。

要让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产品价格高低，就得放开计划价格。但是，计划价格，特别是基础产品的价格普遍偏低，有的连成本也不能补偿，与平均利润相比差得更多。从全社会来看，这个差额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放开价格，首先就面临着谁来补偿的问题。联邦德国1948年放开价格主要是靠剥夺富人来补偿的，在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货币改革，旧马克只能6%兑换新马克，其余的存款和手持货币都被政府没收了。所以放开价格并没有造成物价暴涨。我国由谁来补偿呢？国家补偿，财政有困难；居民补偿（任物价上涨），居民很多是拿工资的，只涨物价不涨工资是不行的。涨工资还是要财政拿钱。于是，又形成了一个连环扣：价格不放开，企业就不活；企业不活，经济效益低，企业经济效益低，财政就困难；财政困难，价格就无法放开。

劳动力只进不出，冗员过多，企业就很难提高经济效益。要裁减冗员，使被裁的人不至于挨饿，就得有社会保障。然而，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财源不旺，国家哪有钱建立社会保障？这又是一个连环扣。

国有企业上缴利税过重，减轻税负企业才能够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放水养鱼”。但是，财政连年赤字，处处捉襟见肘，国家哪有“水”可放？然而，作为财政支柱的国有企业没有活力，又哪里有“水源”？

类似上述的“连环扣”还有很多，比如干部能上能下，工资收入能多能少，等等。实际情况也比上面说的更为复杂。每一件事情都有多种因素制约，这一个“连环”又和另一个“连环”缠绕在一起，形成了纵横交织、以各种难点为纽结的网络，又像是一个很难走出去的“迷宫”。

不得要领的人觉得九连环无法解开。得法者也必须上下穿插81次，才能将连接的九个环套入一柱，再穿插81次才能将九连环全部解下。搞好国有大中企业也得有这种韧性。

不能期望“一放就活”、“一包就灵”。没有方方面面的配套改革，简单的放权只能带来混乱，承包也是困难重重。也不能指望给少数企业“吃偏饭”。能把企业搞活，这种做法反而会增加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关键是转化企业的经营机制，而企业的经营机制又和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密不可分，在旧的体制管理下的企业很难建立新的机制。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大小，是和整个经济改革目标的实施进度相关的。这个目标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市场要有效运转，就要有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的大环境，要有灵活的价格形成机制，要有严密的市场竞争规则，要有相对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市场就运转不灵，企业也就活不起来。而这些条件全部具备，新体制、新机制也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说，国有大中型企业搞好之日，就是新体制、新机制确立之时。因此，不能把搞好企业和整个改革目标割裂开来。要搞好企业，就要抓住时机，全面推进改革。既要深化企业改革，又要推进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还要积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显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不能单项突破，一步到位，只能相互关联，逐步推进。改革的关键性突破还需要一定的财政积累为条件。因此，改革是渐进的，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在办公室里、在书斋里束手无策的难题，常常在群众实践中解决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等改革中杰出的成功之作，都是群众实践的创造。现在，改革的空气又浓了起来，各省市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根据实际，采取各种办法推进改革。改革的种种难点将在这些实践中突破。谁来解开“九连环”？还是改革实践中的亿万群众。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1年12月8日

厂长应当是商人

某人当了厂长，人们就说他当了官儿。几十年来，政企不分，在干部管理上，厂长和行政官员没有区别。某人今天当厂长，明天就可能到政府里当官；今天政府的处长，明天可能是厂长。直到改革13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工厂还分局级、处级、科级。厂长也就是局长级、处长级、科长级的官员。

我认为，厂长应当从官员变成商人，厂长应当是商人。有人认为这种说法贬低了厂长，我认为，反对我的看法的人，是真正地贬低了商人。

在我们这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度里，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千百年来，“士农工商”，商人是“四民”之末，有时人们还在商人前面加一个“奸”字，称为“奸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商人又和剥削的罪名相连。

在给商人正名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社会之大，无奇不有；人数之多，无所不需。社会上各色人等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怎样得到满足？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难题。不管多么庞大的政府机构，不管有多少精明的政府官员，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商人，只有商人，才能够解决这个社会难题。

商人是千方百计地满足社会多种需要的人，是不让市场留有需求空白的人，是全心全意去迎合用户的人，也是敢冒风险、善于利用机会和创造机会的人。商人不仅满足社会需求，还不断创造新的需求。

商人并不是任何时候不犯错误。可能这批产品生产太多，那种产品生产太少。但是，他们自己承担这些错误带来的后果：轻则遭受损失，重则倾家荡产。所以，他必须朝思暮想地研究市场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必须

殚精竭虑地研究用什么方式生产成本最低、质量最好。

说厂长应当是商人，这不仅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和当前的改革目标一致的。既然工厂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厂长就不能不是商人。工厂是市场这个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市场就是商品竞争的战场。如果厂长没有商人的头脑，他所领导的工厂怎能参与市场竞争？厂长是商人，工厂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当然，如果工厂不是真正的企业，厂长也不可能是商人。

商人要把社会作为经营活动的舞台。他要在社会上筹措资金，他要其他工厂为他提供原料和配件。真正的“奸商”得不到社会的信任，他不可能得到他所必须的生产要素。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因此，他必须诚信待人。

作为商人的厂长和作为官员的厂长，二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官员的厂长，一般只对他的上级负责，把上级满意与否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作为商人的厂长，则以市场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企业的盈利最大化作为归宿。

作为商人的厂长和作为工程师的厂长的思维和行为也不同。工程师常把提高技术水平作为最高目标，以达到“国家水平”、“国际水平”而满足。作为商人的厂长也重视技术，然而，他之所以重视技术，是因为技术可以为他带来更多的利润。所以，他不会让技术成果成为“样品、展品、礼品”。

我国的厂长有一部分是从党政官员中转过来的，有一部分工程师也走上了厂长的岗位。他们中的成功者，都把官员的头脑、工程师的头脑，换成了商人的头脑。还停留在过去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人，在经营中大多遭受挫折。我们称外国工厂的领导人为“厂商”，而对国内工厂的领导人依旧称“厂长”。称呼不同反映观念上的差距：我们还是怕“商”，还是看不起“商”！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2年9月3日

<<<<<

麦当劳、饺子和汽车

在京城的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里，巧遇刚从国外回来的一位老朋友。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就座，一边吃着，一边聊了起来。他晃了晃手中的汉堡包说：“这东西哪有中国的饺子好吃！”我吃惊地问他：“你在国外多年，还这么认为？”他说：“连外国人也认为饺子比汉堡包好吃。”

这句话使我震动。外国人就靠这汉堡包，在全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 14000 多家麦当劳分店，每天有 2200 万顾客在这些分店就餐，年营业额超过 219 亿美元。不如饺子好吃的汉堡包，却办成了这样一个大型跨国公司。而我们的饺子呢？不要说办什么跨国公司，目前有一个像样的大型饺子企业吗？

中国人看成小商品的东西，外国人则办成了巨型跨国公司；而真正应办成大型企业的商品，中国人却当成小商品来经营。汽车就是一例。

汽车这种东西，天生就是办特大型企业的商品。在正常情况下，产量低于某一数量，企业就要亏损。这个数量称为“最小有效经济规模”。据国外专家反复研究，汽车企业最小有效经济规模是 200 万辆。低于这个数，就没有国际竞争能力。而目前我国只有一家汽车厂的年产量刚刚超过 20 万辆。我国目前有 120 多家汽车厂，数量之多是世界之最，其规模之小也是世界之最。大多数厂家一年只生产几千辆汽车，有的地方还把这样的小汽车厂当作支柱产业。

奇怪的是，世界汽车工业越来越集中，而中国汽车工业越来越分散。汽车工业的集中程度通常用“三厂集中度”来评价。所谓“三厂集中度”，就是产量最大的三家汽车厂的产量，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比重。发达国家这个指标在 80% 以上。我国的“三厂集中度”是：1965 年为 96%，1975 年为 62%，1983 年为 58%，1985 年为 42%，1989 年为 33.6%，1993 年有所上升，但还是 39%。

当然，汽车和饺子有着不同的经营规律。我国大多数商品没有达到经济规模，各有各的原因。例如汽车工业过于分散主要原因在政策。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缺乏现代企业观念，是一个共同原因。

首先，不少经营者缺乏做大生意的观念。多少年来，有哪一个中国人想到把饺子办成跨国公司呢？小本经营，小富即安。靠饺子这样的小商品，维持温饱足矣，何必扩大规模？我国一百多位汽车厂的厂长，有几个人把经济规模作为企业的发展目标？有几个人想到让自己的产品，在国际汽车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我不排除这些厂长的思维有受客观条件的制约的因素，但我敢肯定，农民意识，小生产观念，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有多少钱，就做多大买卖，不积极利用社会资本，这也不是现代企业观念。要扩大企业规模，就必须有足够的资本。企业发展不能靠国家给钱，这一点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但是，不能单靠企业自身的积累来发展企业，不是所有的人都已认识到。要打破有多少钱做多大买卖的静态观念，在遇到良好的发展机会时，要大胆按市场规则，灵活运用各种融资工具(贷款、股票、债券等，国外的融资工具有上千种之多)，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抢在市场变化的前面，把规模搞上去。

市场占有率是企业的一个重要经营目标。没有市场占有率，就没有规模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谁的商品占有的市场份额大，谁就占有竞争的优势，谁就占有更多的财富。从市场竞争角度而言，只把利润作为经营目标是不够的。必须让自己的商品在市场总量中占有更大的份额作为企业的奋斗目标。这个市场总量，不是指国内的，而是指全世界的。最近，韩国的汽车工业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到2000年，大宇、起亚、现代三家汽车公司，在市场占有率方面，要进入世界前十名之列。可惜，我们的汽车工业，还没有这样的目标。这里有没有观念的因素呢？

现代企业观念还有很多，我不一一列举。我只想说的是，我们在忙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要注重观念的建设。有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才有现代企业。用小生产观念是建不成现代企业制度的。

刊于《天津日报》，1995年2月7日

“三不”启示录：用现代信用规范企业关系

企业间的不良债务(有时称“三角债”、“多角债”)一直困扰着经济界。最近,本报开辟了《“三不”启示录》专栏,希望对这个问题进行较深入的讨论。这个专栏连续报道了一些行业、企业“不给钱不发货,不给汇票不发货,不还清欠款不发货”的做法。发表的文章见仁见智,使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深入了一步。

我认为,对于解决企业间不良债务问题,“三不”也许是一个应急的办法。这次讨论也仅仅是对这个问题的破题。“不给钱不发货”毕竟是很原始的办法,而且只有那些很紧俏的产品才能做到。对于供求平衡的产品,大概不会有人先付钱的。在买方市场,“三不”是很难普遍推广的。

解决企业间不良债务的根本办法是重建企业间的信用。什么叫信用?就是借贷活动的总称。以延期付款或预收货款的方式买卖商品,称为商业信用,银行将集中起来的闲散货币资本和社会游资贷给工商企业,称为银行信用,企业或银行对个人消费提供分期付款售货及消费贷款,称为消费信用。此外还有信托、租赁、保险等等信用形式。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有信用。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市场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市场。

信用市场是一种跨时交易市场。这种跨时交易,避免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呆板做法,能够灵活地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既然是跨时交易,则对资金的使用时间要给予补偿,这种补偿就是利息。

企业间的债务问题实际上是商业信用问题。由于各个企业在生产和流通上时间不一致,有的企业产品已经生产出来等待销售,有的企业需要产品又缺乏资金。这样,借助商业信用,可以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为了促进销售，商业信用常常和消费信用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商业信用基本实现了票据化，并且纳入了银行信用的轨道。

中国人用“信用”这个词语来翻译“Credit”，真是恰当不过了。它说明了这种借贷活动的基础——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中国人做人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当然，作为借贷活动的“信用”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它是用完善的法律保障的经济关系。它要求在协议时间内必须执行协议，如果有违背协议的，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近几年来，在我国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种既违背道德又违背法律的现象——赖债，而且形成了一股风——赖债风。这种不良风气的形成，有比道德、法律更深层次的原因。

改革深入到今天，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信用关系已解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信用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企业间的借贷关系无所遵循。有人说目前的赖债风是“信用崩溃”，我看，说“信用空白”比信用崩溃更为恰当。新旧体制交替的借贷关系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是赖债风形成的原因之一。

现在政企不分的情况还相当严重。一方面，政府还在干预企业的投资活动；另一方面，政府对投资的后果不负责任。一旦投资失效，企业尽管不应当承担责任，但不得不承担债务，所以企业觉得“赖债有理”。一家赖债，通过连锁反应，造成千家赖债。“有理赖债”和“无理赖债”搅在一起，道德和法律都无法起作用，这也是出现赖债风的一个原因。

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信用关系，是解决赖债问题的根本途径。而要建立这样的信用关系，一要企业的财产关系明晰，二要有完善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三要有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当然，重建企业间的信用关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深化改革的过程。本报所报道的“三不”应当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5年5月4日

国有企业的病态:过度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并存

当前,国有企业同时存在截然相反的两个问题:既缺乏必要的经营自主权,又存在着经营者权力严重失控。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目前还有很多重大问题自己不能做主,大的投资项目必须由政府决策,但决策失误的苦果却要企业吞咽。企业不能根据经营的需要,自主地吞吐劳动力,市场对企业的产品需求减少了,生产规模缩小了,还得养一批闲人,等等。这些问题,企业界和新闻媒体已经说得很多了。

对企业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即经营者权力失控问题,人们还谈论得不多。自从武汉的一位颇有名气的经营者将国家资产转到国外据为己有,并且叛逃以后,这个问题才引起人们注意。这个名叫于志安的人,原来是武汉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长江动力集团下属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实有资产4.2亿元,按规定应报国务院才能参与股权转让。于志安却私下出让48%的股权给香港某公司,实收8610万元。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厂里的设备、产品、技术、市场被于志安卖掉了。长江动力集团在菲律宾有一个电站,于志安私下用自己个人的名字注册。这部分实际被他控制的财产,就此办理了合法拥有的手续。他还花7.5万美金为自己买了绿卡。1995年6月,于志安出逃,去享受他转移到海外的财产去了。令人惊异的是,于志安这样胡作非为,企业党委成员和副厂长都不知道。他这样一个人,还骗取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企业家等多种荣誉。

像于志安这样严重犯罪的人是少数,但对经营者的权力缺乏制衡、经营者权力失控,在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是个别现象。

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后，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就很可能对经营者的权力失控，经济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就是企业所有者权力的失落，经营者实际控制了企业的财产。我们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相当严重，名义是国有企业，实际上，在很多国有企业，国家丧失了财产的控制权。

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权是怎样丧失的呢？改革以来，国家不断地对企业放权让利。这对于过去企业没有自主权来说，是必要的，应该的。但是，当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国家放权只是放到经营者手里，而没有放到企业里。这样，国有资产的安全就完全取决于经营者的个人品质。个人品质好的经营者，国有资产就可以保值、增值。然而，没有制度的制衡，仅靠个人品质毕竟是靠不住的。于是，一系列挖国有企业墙脚的现象就产生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现在用公款到国外旅游成风)、公款行贿，都可以在企业里报销；有的经营者还通过种种方式将自己实际控制的财产变为个人的合法财产。

有趣的是，过度的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这两个表面看来相反的现象，却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这就是所有者(国家)和企业的财产关系没有划清。国家没有找到如何在企业里行使所有权、并取得应有收益的有效方式。企业还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经济主体。国家没有找到行使所有权的方式，不得不采用行政干预的老办法。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它就想办法吃国家的“大锅饭”，以致挖国家的墙脚。“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越严重，行政干预越强；行政干预越强，企业就越强化自己的利益意识。这两种不良现象互相推进。

目前通行的说法是，要解决过度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就得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当然是对的。不过，对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美好的期待我还不甚了了。例如，对学者们一再宣传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我就有两个疑问：第一，一家企业股权高度分散以后，所有者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已经模糊，同改革前的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全

民”和企业领导集体的关系没有多大差别。我们正在通过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就又重现了吗？第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能解决经营者的人选问题。在一些大企业里，不可能任人唯贤。内部权力斗争是“内部人”获得控制权最有效的手段。

看来，企业改革还是一个很大、很艰难的题目。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6年6月3日

品牌不是空手道

三个闲散人员在街上闲逛。一个姓万，一个姓年，一个姓常。老万从他们三人的姓氏中悟出了一条生财之路：他们可以打出一个新品牌的保健食品，名叫“万年常寿丸”，一定能发财。老年不解地问：“什么万年常寿丸？我们见过吗？”老万说：“你真是死心眼。先打名气，后出产品。我们把‘万年常’的牌子打响了，何愁产品生产？”还是小常心眼灵活，极力支持老万的想法。他们借了一笔资金，在电视上大做广告：“万年常寿丸让老年人万年长寿。”十多天以后，果然收到了一大批要求购买万年常寿丸的来信。于是，他们找了几味不冷不热、不香不臭、无益无害的中草药，用几口大缸熬了起来。“万年常寿丸”终于制成了，很快销售一空。他们进一步通过广告揽来了更多的订单，生产规模由一口大缸发展成几十口大缸。

这是一个冷笑话。不幸的是，这种笑话在经济生活中确实是存在的。

最近几年，企业经营上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就是把市场需要放在第一位，再没有人不顾市场关门生产了。然而，真理多走一步就成谬误。“市场第一，生产第二”是真理。“先造市场，后造工厂”大概是多走了半步，“先造名气，再造产品”就是多走一步了。

一种商品有名气，或是因为它价廉物美，或是售后服务周到。连商品都没有生产出来，靠什么出名？

有人认为，多做广告，就有名气；有了名气，就有了品牌。

品牌不是靠广告打出来的。品牌是生产这一商品的企业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它是产品质量信誉的标志，也是企业管理水平的标志。品牌是企

业的无形资产，这一无形资产是通过注册商标来保护的。驰名商标是消费者对这一商品多年信誉的积累。质量信誉(包括服务质量)是这一无形资产价值的本质部分。对购买者来说，带这种商标的商品可以信赖。所以，商标的信誉越高，这种商品的市场越大。

品牌，这一口头语，大概是指名牌而言。名牌是不能速成的。据有关方面对 100 家世界级的名牌调查，截至 1996 年，其中 36% 的世界名牌企业，其历史在 100 年以上；28% 的世界名牌企业，其历史在 80 年至 100 年之间；25% 的世界名牌企业，其历史在 50 年至 80 年之间；历史在 50 年以下的世界名牌企业只占 16%。可见创造一个名牌是几代人苦心经营的结晶。创造和保持名牌，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灵活的促销手段、企业文化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结果。靠铺天盖地的广告，只能造出短期的名气，不可能造出名牌。

一位朋友举出国外一个例子来反驳我的上述看法：国外某鞋商，只靠一个商标，让别人用这个商标生产鞋，自己不生产，却坐收红利。他想用这个例子说明，不制造产品也可以靠牌子吃饭。但是，他没有讲这家鞋商的牌子是怎么来的。

我没有调查过这家外国鞋商的情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家鞋商的牌子不会是凭空靠广告打出来的。他们开始一定生产鞋，一定是靠自己生产的鞋闯出了牌子。牌子响了以后，他们让别的厂家用这个牌子生产。这就是通行的“商标许可转让”。所谓“商标许可转让”，就是允许别人用他的商标生产，他再按销售额提成。在使用商标时有一套严格的质量标准，不合格的，绝对不能打上自己的商标销售。这样的企业表面看是靠商标吃饭，归根到底是靠质量吃饭。如果不把好质量关，不用多少时间，就要砸牌子。牌子砸了，市场就丢了。有位企业家说：“一把火烧了厂子，可以找保险公司；而牌子一倒，企业的生命也就完了。”

无中生有的所谓“品牌”只不过是一种骗局。这种骗局之所以能畅通

无阻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口多。这部分人吃了“增力丸”，没有增长力气，不再吃了；没有吃过的人还经不住广告的诱惑，还是要吃的。二是有些商品的使用效果在短时期内难以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心理感受。只要有益无害，消费者就不会有人找你算账。保健品、化妆品这个特点尤其突出。所以，这类产品常常是“先造名气，再造产品”的行当。就是在这些行当，我们考察一下，那些靠广告造出名气的商品，寿命能有多长？

不是靠商品的质量(包括服务质量)在市场上取得信誉，只是靠广告造名气，这样“造”出的只能是虚名。图虚名，必招实祸。商家通过虚名骗得了利益，而得实祸的却是消费者。这种急功近利、没有根基的商家也不可能成大气候。更大的实祸是国家的经济受损失。如果大家都玩起了“空手道”，我们还有真正的名牌商品吗？我们的商品还能在国际市场上找到立足之地吗？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向我们的广告业说两句话。作为社会主义的广告业，应当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应当促进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应当为玩空手道的人提供条件。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7年7月5日

<<<<<<

企业管理还是管理企业？

企业管理是有效地利用企业内部资源、提高投入产出率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管理企业是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使它进行公平竞争，使它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企业管理是企业自己的事，管理企业是政府和社会的事。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出于自身的利益，本身就应当有改善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内在动力。企业管理是企业的本能，是不需要政府从外部督促的。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企业管理除了有一般的规律以外，还有企业的个性。在企业之外的政府是很难进行企业管理的。

这个很明确的道理在现实中有时糊涂起来。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管理，政府为企业管理操透了心。不少地方把加强企业管理当作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市长责任制中不少内容是厂长应有的责任，如企业扭亏，也是市长(甚至省长)的责任制一项内容。让市长为一家家企业扭亏，还要厂长干什么？

一个事实必须承认，现在有不少企业管理削弱了，管理中的漏洞很多。可以列出很多企业管理削弱的数字，也可以举出很多企业不注重管理的事例。

为什么企业不注重内部管理？这是因为企业从管理以外的工作中得到的效益比从管理中得到的效益大得多，而且容易得多。反过来，如果企业忽视了外面这些，从外部这些方面失去的，从内部管理上很难弥补回来；如果别的企业都争取外部这些好处，不争取这些好处的企业就相对吃亏。

当利用外部资源的成本远远低于内部资源的成本时，企业就把力量更

多地投向外部。这大概是近年来放松企业管理的原因之一。

企业经营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管理，二是外部交易。前者是企业如何有效地利用企业内部资源，后者是企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

企业之所以能从灰色渠道中得到好处，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租金”。前几年有人估算过，仅利率差、价格差、汇率差，一年就是几千亿元。这几千亿元诱人的“大蛋糕”，使得企业削弱甚至放弃内部管理。企业既然可以得到“租金”，就可以不必增加生产，不必节约资源，不必进行合理合法经营，把主要精力用在“寻租”上就行了。近年来“法人行贿”多了起来，就是企业通过灰色渠道取得外部资源的明证。

企业管理不善的问题与其说是企业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宏观环境问题。引诱企业“寻租”的宏观环境是改革不到位的结果。

只有加强市场约束，完善市场法规，改善宏观调控，才能够减少和防止企业不合法、不合理地利用外部资源。只有杜绝企业能够轻易得利的外部灰色渠道，逼得企业非得从企业内部挖掘潜能，企业才会加强内部管理。

与其在外部督促企业加强管理，不如创造一个使企业非加强管理不可的外部经营环境，而这些正是政府管理企业的主要内容。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8年2月27日

“拿了不该拿的”和“该拿的没让拿”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褚时健涉嫌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历时近两年的特大经济案件已经水落石出。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由此在企业界引出了新话题。

褚时健被送进了监狱，多数人认为他罪有应得，也有人抱以同情。说他罪有应得，是因为他拿了不该拿的钱，触犯了刑律。有人同情他，是因为他该拿的钱没有拿到，他的收入和他对企业的贡献不对称。

褚时健就任企业领导期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褚时健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95年，上级决定让他退休，他将从一个支配巨额财产的大老板变成一个普通人。巨大的地位落差使褚时健心理失衡：“我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么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将来想想。”于是，他向国家财产伸出了手，拿了一大笔不该拿的钱。

如果只发生一起褚时健这类事件可以说是事出偶然，然而，近几年来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类事情：

武汉市长江动力总公司董事长于志安，他把一个不知名的小厂变成了一家实力雄厚的大集团，他为此获得了全国优秀企业家、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等多种光荣称号。然而，在将要退休之前，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他把几千万元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昔日为企业作出贡献的功臣变成了盗窃国家财产的罪人。

上海安字异型铆钉联合集团的杜春芳，他把原来只能生产插销、资产只有80万元的小厂，发展为固定资产达3000多万元的企业，结果也是因为拿了不该拿的钱而锒铛入狱。

同类事件多次重复的现象说明，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有某种规律在起作用，问题的产生必有制度上的原因。解决这类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从制度上下工夫。

他们拿了不该拿的钱，说明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他们该拿的钱没有拿到，说明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缺乏约束机制，经营者个人权力就会无限膨胀。企业财产就很容易变为他个人的财产。缺乏激励机制，就难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企业就难以发展。因此，建立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是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靠什么来约束企业家的权力？从企业内部，要靠现代企业制度；从企业外部，要靠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

改革以来，国家不断地对企业放权让利，这对于长期没有自主权的企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当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国家放权只是放到经营者手里，而没有放到企业法人手里。法人应当是一个由完善制度保证的组织结构，而经营者是一个自然人。在企业里，“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削弱了，“新三会”（董事会，监事会，工会）的监督作用还没有建立起来。“新三会”和“老三会”的摩擦又使本来微弱的监督功能更加微弱，经营者这个“自然人”很容易成为“土皇帝”。

在企业外部，监督制度很薄弱。随着市场化的进展，计划经济时代监督企业的那一套办法已经不管用了，但新的监督办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中介机构发育缓慢，企业经营活动透明度很低，不少企业是暗箱操作。

经营者的权力在企业内缺乏制衡，在外部缺乏监督，他可以随意支配企业的财产。这样，国有资产的安全就完全取决于经营者的个人品质。

靠什么来激励企业经营者？根本办法是企业市场化。靠市场的力量来评价他的经营业绩，靠市场的力量对他的业绩作出回报。例如，他能使

企业资产一年增值一个亿，他拿增值的百分之一，就是年薪100万，他的身价也就显示出来了。如果他接连经营了几家企业，都能使这些企业资产大幅度增值，他就声名鹊起，身价就越来越高。相反，他搞得企业连年亏损，他就身价大跌，甚至没有人再聘用他。

给经营者以期权是激励经营者的有效办法之一。如果他任期五年，允许上任时约定，他五年以后按上任时的价格买该企业一定数量的股票。五年以后，如果该企业股价上升，差价就是对他的回报。差价越大，回报越高。如果股价和他上任时持平，他就没有差价收入，这就激励他努力使企业资产升值。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报是企业资产增量的一小部分，增量的大部分归股东所有。

于志安，褚时健，一个又一个功臣成为罪人。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应当成为推进企业改革的教材。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9年1月19日

沉重的脚印：中国企业家五十年

在新中国，“企业家”这个称谓最早出现于80年代中期。在这以前，工厂里的负责人称为厂长，商店里的负责人称为经理。厂长也好，经理也好，今天人们通称为企业家。严格说来，改革以前，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当然也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然而，作为这个群体的人，他们以经营工商业为职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把他们称为企业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中国企业家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有幸的是，在这50年中，有32年我一直从事经济采访，其中，更多的是采访工厂。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写下了这篇文章。

企业领导制度的变化

如果一个企业很小，是自己家庭开办的，所有者自己经营，盈亏都是自己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一旦企业做大了，所有者自己直接经营就很难，就得聘请能人帮助经营。这就出现了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的根本问题是：企业经营者既能够有完全的权力和高度积极性使资产增值，他又要受到所有者监督和制约。这中间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授权与负责，所有者向经营者授权要完全，经营者的责任要明确。二是激励，激励一要充分，二要对称，“充分”的目的就是使经营者有足够的动力，“充分”的标准就是和经营者的贡献对称。三是监督，监督是防止经营者损害所有者的既得利益，监督要有效但不干扰经营。

中国企业家的命运是和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企业领导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出资办企业，国家对企业的债务负无限责任，国家直接派官员管理。派出的官员对国家负责。厂长就是国家任命的官员。厂长负责制就是国家官员负责制。在这方面也有一个探索过程。1951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了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这个决定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执行。1954年4月8日，中共中央华北局也做出了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这时的厂长负责制实际就是苏联的“一长制”，其理论根据就是列宁的《论一长制》。1955年8月，中央第3办公室（即工业办公室）向中央提出报告，明确提出在全国企业中建立严格的“一长制”，中央批准了这个文件。但是，“一长制”并没有在全国全面推开。这算是第一阶段。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废除一长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从1956年到1966算第二阶段。在这期间和以后，不断批判“一长制”，认为“一长制”削弱了党的领导，否定了群众路线。这一批判长达20年，一直到文革结束。

1966—1977年，“文革”期间，实行革命委员会主任负责制或军代表负责制。企业管理制度受到冲击。企业党组织恢复以后，强调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的提法：“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这是第三阶段。

1978年以后，有的企业搞“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的搞“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最后还是重新确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在以上三个阶段，企业领导人不管怎么变化，都是政府派出的官员，他们都是对政府负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情况发生了变化。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厂长（经理）负责制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企业制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出资者和出资者的责任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所有者，而是由多个股东出资，形成法人财产。股东选出董事会代表所有者行使权力。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他们对公司的债务只以投入的资本为限。二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不再由所有者直接经营，而是由董事会聘请专家担任总经理，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企业

制度进入了第四阶段。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三种制度：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决策，厂长执行，党委对厂长进行监督。

厂长负责制——厂长决策，厂长执行，“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对厂长进行监督。

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决策，总经理执行，“新三会”（董事会、监事会、工会）对总经理进行监督。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决策机构不是经济机构，政企不分，党政不分，它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党委决策，厂长负责，决策者不负责，负责者不决策，权责不对称。所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际是无人负责。

厂长负责制解决了无人负责的局面。但它是一人决策，一人负责，厂长可以完全控制企业，所有者的利益无法保证，这就是所谓“内部人控制”。

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是经济机构，由股东选举产生（一股一票），对企业关心程度胜过党委。总经理是聘任制，不是官员。“新三会”的监督力强于“老三会”。社会中介机构参与企业监督（如账目由会计师事务所做）。

在每一种领导体制下，厂长（经理）的地位和处境各不相同。

无权负责 无力负责

老朱是一家大型拖拉机厂的厂长，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和他有过几年的交往。他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副师长，1964年转业到了这个岗位。他在新的岗位工作了多年，却还保持着军人风度：腰板挺直，说话干脆，做事果断。

那时国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老朱在企业里是第二把

手，除了生产调度以外，凡带决策性的事都得提交党委讨论。党委决策，厂长执行。

他虽然是 5000 名职工的厂长，手中的权力小得可怜。他老家托他买一台拖拉机，他也没办法帮忙，老家的人骂他没有人情。厂里每年生产 5000 台拖拉机，全是国家的指令，出厂一台国家调走一台，钢材和配套零部件由国家指定的工厂供应；工厂赚的钱全部交给国家财政，要花钱向国家财政申请。工人全是国家劳动管理部门分配来的，厂里既不能自己招工，也不能辞退。铸钢车间的电炉是“电老虎”，1965 年建厂时就搞好了设计，向上级打了报告，申请 160 万元投资，换下“电老虎”，一年就可以节省电费 50 万元。这个报告送到上级，一直到 1980 年还没有批下来，为了等 160 万元投资，这 14 年多耗电费 700 万元。厂里 80% 的工人都是二级工，不管干好干坏都拿 42 元，老朱明知不合理也无法解决。工人积极性不高，拖拉机的质量一直过不了关，生产计划经常完不成，这使老朱很苦恼。

苦恼归苦恼，但老朱还是一个不小的官儿，如果平平稳稳地工作，他还有到政府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机会。他的前任就调到一个省里当上了机械工业厅副厅长。然而，一件事情改变了老朱的仕途。

70 年代中期，上级决定，对这个厂的铸造车间进行技术改造。计划投资 1000 万元，将生产能力由 5000 台扩大到 20000 台。老朱是这个项目的总指挥。他责成总工程师办公室对国内外的技术情况进行了资料调查，提出了 3 个方案。一个是最先进的方案：从砂型制造到浇铸、清砂全部机械化，型砂封闭运行，基本消灭了粉尘污染，工人可以穿白大褂工作。另两个方案技术水平低一些，但风险要小得多。这 3 个方案提交厂党委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采用最先进的方案。但是，建设中才发现按这个方案投资超过了 1000 万元的计划，资金不足，有些需要花大钱的地方只好求其次，新车间不能开工。群众气愤地说：“这么大的失误得打屁股！”打谁的屁股？这项决策失误由党委集体负责。老朱是按党的组织原则行事的，打板子也不能打在他的身上。不过，这件事还是影响了他的仕途，他再也没有升上去。

老朱这个人有能力，对工业也比较熟悉，但是工厂却搞得不好。他看

到了工厂的问题，想负起责来，但他无权负责、无力负责、无法负责。他有时在我面前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

那时我认识不少像老朱这样“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厂长，这都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造成的。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政企不分，党政不分，其决策机构(党委)不是经济机构，它很难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党委决策，厂长负责，决策者不负责，负责者不决策，权责不对称。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

“乔厂长”大显身手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提出了质疑：“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如果今后继续实行这个制度，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党小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0页）据曾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回忆，邓小平那时曾下决心实行“厂长负责制”，但考虑到取消“党委领导下”几个字党内难以接受，就作了妥协。那时正在编辑《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对胡乔木说：“我本来意思是实行厂长负责制，大家接受不了，我妥协一下。”所以，文选中没有提厂长负责制。但是，他在同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由于厂长负责制(一长制)多年受到批判，一时还难以推行，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条例》还是规定：“工厂实行党委(独立核算工厂的总支部、支部)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厂长负责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专家们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为厂长负责制提供了理论根据。我记得影响最大的是王梦奎发表在《经济参考》上的文章：《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好》。

认识逐渐统一，198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正

式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明确在全国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这个条例指出：“企业法人代表为厂长，负责代表法人行使职权。厂长依照本条例规定，对本企业的生产指挥和经济管理工作统一领导，全面负责。”

其实，在80年代初期，有些企业虽然没有明确实行厂长负责制，但企业党委放手支持厂长，这些企业的厂长已经在企业处于中心地位。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在1986年以前，不少城市已经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

厂长(经理)负责制最敏感的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政治上—有风吹草动，厂长负责制就要受到批评。1986年年底反自由化时，重庆市有几十家工厂在一夜之间把厂长负责制变成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尽管有曲折，但厂长负责制还是逐步推开。

1988年4月1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企业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负有全面责任。从此，厂长负责制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

为了使厂长有权负责、有力负责，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国家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放权是逐步进行的，到90年代初期，企业的权力已经不小了，除了受社会制衡较大(如解雇工人)的方面以外，厂长几乎拥有支配企业财力、物力、人力的一切权力。

在整个80年代，“乔厂长”不断在各地涌现出来。厂长手中有权、有钱，一些有能力、有事业心的厂长，大刀阔斧，干得轰轰烈烈。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他们所领导的企业也发展很快。那时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还不很严重，利用手中权力谋私的厂长很少。报刊上不断报道厂长的改革创新的事迹，步鑫生、马胜利、张兴让、周冠武等一大批厂长成了知名度很高的明星。不少厂长得到“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我采访过一位厂长，他领导的是一家农场办的小酒厂。有了自主权以后，他引进外国技术、聘请外国专家生产葡萄酒。他从葡萄园开始抓起，从葡萄的品种改良、季节控制、收购把关、酿造工艺每一道工序，到酒瓶

及包装，各个环节都要求质量最好，从而创造出了一家名牌葡萄酒。与此同时，他又建立了销售网络，把这一名牌酒送上了全国各家星级酒店。不到10年，这家酒厂的资产由几百万元上升到几亿元。

在1987年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作为承包人的厂长，在企业的地位又有相应的提高，这时职工开始称他们为“老板”。当然，这种称呼只表示他们在企业里说一不二的地位，他们还不是真正的老板。

在厂长(经理)负责制充分显示其优越性时，它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厂长个人决策、独断专行，失误情况越来越多；二是厂长的权力缺乏监督，经营者开始侵犯所有者的利益。

谁来监督厂长？

如果某单位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一个人，则这个人在这个单位就至高无上，即使厂内设有监督机构，这个机构也是有名无实。

到90年代，厂长(经理)负责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企业内部，“老三会”的监督职能削弱了，“新三会”的监督作用还没有建立起来，“新三会”和“老三会”的摩擦又使本来微弱的监督功能更加微弱，大事小事厂长说了算。厂长这个“自然人”在一些单位变成了“土皇帝”。在企业外部，计划经济时代监督企业的那一套办法已经不管用了，新的监督办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中介机构发育缓慢，企业经营活动透明度很低，不少企业是暗箱操作。企业资产所有者——国家被排除在企业之外，部分国有资产变成了私人的资产。

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容易腐败，一些80年代名噪一时的企业家成了罪犯。武汉市长江动力集团董事长于志安就是一例。90年代，一个又一个像于志安这样的人被揭露出来：玉溪烟厂的褚时健，上海安字异型铆钉联合集团的杜春芳，在1985年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企业家，有相当比例的人成了罪犯，有一批人因经营失误而下台。

企业的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后，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就很可能

对经营者的权力失控，经济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就是企业所有者权力的失落，经营者实际控制了企业的财产。我们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相当严重。

有些企业“厂长负责”变成了厂长一人独断专行，造成严重决策失误，如盲目扩大企业规模，盲目跨行业投资，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好端端的企业走上了困境。石家庄寰宇电视机厂本来是一家很不错的企业，寰宇牌电视机质量也不错，企业处于上升时期，但厂长头脑发热、好大喜功，在全国各地投资，一系列决策失误，最终导致企业破产。

1986年实行厂长负责制时，中共中央书处的一个通知中说：“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企业党委不干预生产经营，真正树立厂长的权威。”当时只提党委起保证监督作用，后来因为厂长的权力缺乏监督，出了些问题，到九十年代才在厂长这个“中心”之外再强调党委是“核心”，两“心”并立，显然不是好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

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企业家——一个新阶层

从一长制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厂长负责制，有两个根本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一是如何使经营者有足够的权力搞好企业，而没有权力侵犯所有者的利益；二是如何让经营者能大胆果断决策，又要防止重大事情个人独断。与这两个问题相关的是，如何对经营者进行激励和监督。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出资办企业，国家对企业的债务负无限责任，国家直接派官员经营管理，派出的官员对国家负责。厂长和党委书记都是国家任命的官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都是国家官员负责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出资者和出资者的责任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国家一个所有者，而是由多个股东出资，形成法人财产，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即他们对公司的债务只以投入的资本为限。二是股东选出董事会代表所有者行使权力，而不是政府主管部门代表

所有者(国家)行使权力。三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不再由所有者直接经营,而是由董事会聘请专家担任总经理。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受聘的经营者对其经营的资产保证增值,对员工统一领导。

然而,股份高度分散的大公司和国有企业有一个相同之处:所有者模糊化。全民所有,谁代表全民?100万家股东所有,谁代表股东?所以,国有企业和高度分散的股份制企业都会出现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企业的经营者不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而更多地为自己和内部职工着想。

现代企业制度用法人治理结构来解决上述问题。现代公司的领导体制不再是某个自然人(厂长或党委书记),而是一个法人治理结构。什么是法人治理结构呢?它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及一整套制度组成的,它是确保所有者对企业控制的一种组织。

股东大会不同于过去的职工代表大会,股东对企业经营活动有知情权、收益权、通过股东大会在作决定时的投票权(一股一票,不是一人一票)、对董事的选举权。每一票都代表一份财产要求增值的意志,有明确的利害关系。选出董事会后,股东将公司财产信托给董事会,董事会集体承担受托责任。通过董事会监督和控制高层管理人员的经营行为,以保证所有者的利益。

董事会不同于过去的企业党委:第一,党委是企业的“内部人”,在企业内部拿工资,和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完全一致;董事站在股东的立场,不应是企业“内部人”,为了确保股东和其利害关系者的利益,董事会中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外部董事(不是本公司雇员),还要有一些法律专家、财务专家、技术专家、管理专家作为专业独立董事。第二,党委政企不分,董事会只管经营大事。第三,党委和董事会都是集体决策,但党委会是集体负责,而董事会是个人负责。董事会在决策投票时,每人是赞成还是反对记录在案,你投票的决策错了,就要对你的投票负责。如果你几次投票失误,就说明你决策能力差,就要退出决策层。第四,任何股东认为董事会某项决议有负受托责任、有意损害部分股东利益,都可以提起诉讼。当法庭判定董事会败诉时,所有在作这项决议时未投反对票的董事都负有连带责任,这在党委制度下是做不到的。

今后的企业家就是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总经理(也包括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经理再不是政府系列的官员,而是善于使企业资产增值的专家。他们和官员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他们不由政府任命,不由政府考核、评价,而是董事会聘任,由市场来评价。第二,在企业的经营的管理方面,他有足够的决断权,但涉及资产的重组、并购、出卖、重大投资、借贷,他没有权力。一些重大决策,他可以提出意见,但只有董事会批准后,他才能够执行。第三,他们遵守政府法令,但不政府对政府负责,只对公司董事会负责。

今后的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有经营和管理企业的专门技能,这是一种高级技能,在社会上具有稀缺性,因而受到社会的珍惜和重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真的市场主体,而这些市场主体是由企业家运作的。企业家是市场大海中真正的搏击者,勇敢的弄潮儿。从社会分层的三个要素(权力地位、财富地位、声望地位)来看,他们都处于优势:他们指挥着数量不等(少则几十人,多则几万人)的员工,有相当高的权力地位;他们的收入比官员高,有很高的财富地位;他们是社会上引人注目的人物,有相当高的声望地位。因此,企业家阶层应当属于中上等阶层,其中部分人属于上等阶层。但是,这个阶层的流动性是很大的,他们的身价,他们的地位,由其经营业绩决定。如果他们连续在几个企业中取得了好的业绩,他们的名声就越来越大,身价就越来越高;他经营失误,就身价大跌;连连失误,就没有人聘他,地位就一落千丈。这种流动性正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企业家迅速崛起的机会。

企业家,市场经济的骄子。

刊于《中国企业家》,1999年第5期

关注企业的社会资本

经营企业不能没有资本。人们通常关注的有金融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种资本，这就是社会资本。

什么是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社会关系网络。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企业行为都是社会行为，离开了社会舞台，企业就不能生存。每一家企业都活动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企业社会网络的辐射越广，层次越高，它的发展机会就越多，交易成本就越低，就更容易得到所需要的种种资源。

然而，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情况。

在封建残余比较严重、法制很不健全的社会，社会资本更多是由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同学、同事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在权力至上、“审批经济”起重要作用的社会，社会资本常常是由权钱交换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社会资本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资本是前两种情况的混合物。

在“审批经济”的条件下，寻租不仅是得到额外收入的主要手段，有时是企业正常经营所必需。要寻租就得和官员建立非正常的关系，在购销活动中，在争取项目的活动中，在争取短缺的生产要素时，寻租活动都比较普遍。前些年是双轨利率，银行计划内的贷款利率比市场利率低得多，得到了银行的贷款，就相当于得到了一笔意外收入。那时资金十分紧缺，

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贷款的私有企业主一般是有较高层次社会关系的人。一份调查显示了得到过贷款的私有企业主的社会背景情况，其中，亲戚是干部的占 63.7%，朋友是干部的占 81.0%(李路路，1997)。近几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大部分基本建设项目为各级官员所掌握。想在这些项目中分得一杯羹，就得用金钱开路。最近公布的对国债项目稽查情况表明，在 427 个重点稽查项目中，就有 107 个违规招投标。国家重点项目如此，中小型项目的招投标，只不过是一种遮人耳目的形式，真正的交易在黑幕之中进行。

大量的反腐败案例表明，在一个贪官后面总有一批向他行贿的私有企业主。在当前制度环境下，官商合伙谋私是一条发财的“捷径”。这是一条极具诱惑力的发财捷径。因此，在私有企业中，行贿不是个别现象。私有企业主寻求权力靠山，政府官员“傍大款”像瘟疫一样蔓延。如果不迅速遏制权力和金钱私下结盟，中国有可能跌入黑金政治的深渊。

社会良知呼唤遏制这种不健康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将起着主导作用。然而，这种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所有企业共有的，是平等的，是企业竞争的共同起点，它不能是某家企业的竞争优势。

以上是就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而言。就企业本身而言的，能够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社会资本有两种相反的情况：一是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二是金钱拉拢手段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后一种社会关系网络是法律不健全的条件才有的。用金钱收买的竞争优势是不正当竞争，是市场经济所反对的，行贿受贿毕竟是十分危险的游戏。只有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才具有永远的竞争力。在市场交换中，一方的义务是另一方的权利；一方的权利要靠另一方履行义务来实现。只有诚实守信，市场交换才能够进行下去。所以，市场经济最需要诚信。企业的诚信除了公众心中的良好印象以外，还凝结在商标之中，记录在权威单位的资信记录和信用等级评定之中。

商标是企业牌子的法律认定。权威的资信记录和信用等级评定，是对

企业诚信的监督 and 公示，也是社会对企业创牌子成果的确证。企业的牌子是多年诚信积累的结晶。企业遭了火灾，一切都毁了，只要有了牌子，银行里可以贷款，合作伙伴还可以提供生产要素，企业的营销会继续进行。有了凭借牌子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烧毁了的企业很快就可以重建起来。如果牌子倒了，社会关系网络就会中断，企业就永远地倒了。一家企业的诚信形象，需要多年诚信行为的积累。而只要有一两次不诚信的行为，多年的积累就毁于一旦。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是易毁难立的。企业的诚信形象是最为珍贵的社会资本。

刊于《科学投资》，2002年第7期

买不断，管还乱

近一两年来，有些企业因“买断工龄”引起了工人的不满，个别企业甚至发生了群体性事件。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着火点。

所谓“买断工龄”，就是按工龄长短，一次性地补偿下岗工人一笔钱，从此以后，他和企业脱离关系，医疗、养老、教育、住房以及其他一切都与企业无关。每一年工龄补多少钱，与企业的现状和支付能力有关。效益好的企业多一些，效益差的企业少一些。一般情况下，有10年工龄的工人，可以拿到两万元左右。

长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冗员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以制造业为例，我国1998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064美元，只相当美国(1995年)的3.7%，日本(1994年)的3.5%，德国(1994年)的4.2%，韩国(1994年)的6.2%，也只有马来西亚的五分之一和印尼的三分之一。这样的企业，是无法参与国际竞争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必不可少的措施。

从企业角度看，买断工龄是减员增效的一个比较简单可行的办法，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买断”的价格是多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人得到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从理论上讲，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也就是维持工人本人及其家庭物质文化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应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当然，这是在一定劳动生产率条件下的社会平均数，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伸缩性也是很大的。在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下，本应属于工资的一部分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都由国家扣下了，再由国家对他们进行终身保障。但是，由于

当时国家经济效率太低，政府说是包下来，事实上又包不下来，多年来工人的生活质量很差。在企业干了一辈子，连一个像样的住房都没有。现在要工人和企业脱离关系，就得把过去由国家集中起来的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那部分钱退还给工人。买断工龄，“买断”的价格，就是工人在职期间理论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差额总和，这笔钱的数额巨大。由于多年国家投资效益差，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这笔理论上集中起来的工资差额，实际是不存在的。国家只能从现有财政中拿钱，也就是用今天的财政偿还历史旧账。今天的财政没有能力拿出这笔钱来补偿工人，通常的办法是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变现作为补偿资金，但多数国有企业拿不出可以变现的资产。企业效益不好，买断时工人所得甚少，会引起工人不满；企业效益好，减员以后企业效益更好，也会引起离开企业的工人不满。如果在岗工人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了他一次“买断”时所得，他们会说：这企业是我们多年劳动的结晶，这么好的效益我们不能没有份！群体性事件相当多是在效益好的企业里发生的。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如果采取不当的管理办法，就会引发更大的乱子。

买断工龄，把多年来和他息息相关的企业一刀切断，感情上也难以承受。所以，有人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略改两字，表述买断工龄的情况：

买不断，管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是啊，几十年来，老工人和企业的命运已经联成一体，他们一直“以厂为家”。现在要他们和“家”彻底脱离关系，除了生活保障的忧虑以外，“离愁”的滋味也是很难受的。看来，想通过买断工龄这类办法，让冗员一次性地脱离企业，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不把工人安置好，简单地将工人推向社会是不行的。改革的成本不能只让工人承担，企业、政府、社会各方面分担改革成本，社会才能安定。

减员增效，应当是企业行为，政府提出减员增效的口号是一种行为错位。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才是政府应有的职责，哪有政府号召企业裁员呢？这种错位的政府行为是双重角色的尴尬。对国有企业来说，政府

既是社会管理者，又是企业所有者。作为所有者，就必须减员增效；作为社会管理者，就应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企业改革已经深化，政府应当做政府应做的事。企业减员增效，政府尽可能多地为减下来的人创造就业机会。政府修渠，企业放水，渠成水到。渠道没有修好就放水，必然泛滥成灾。

企业在减员增效过程中，必须发扬民主，改革方案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后才能实施，不能由少数经营者来决定工人的命运。

中国的工人是有觉悟的，国家有困难，他们会通情达理地为国分忧。明明知道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硬逼着国家拿，这不是明智之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把局面搞乱了，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我们相信，只要各方面处理得好，工作做到家，工人是会自觉地维护社会安定的。

刊于《中国投资》，2002年第9期，《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2日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的私有化过程剖析

二十世纪末，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不少企业国有资产全部退出，国有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过程有加快之势。这是国有企业大规模的民营化潮流，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世界少有。这个民营化潮流的具体情况如何？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背景

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有一种山羊，名叫阿尔巴斯白山羊。这种山羊的羊绒，英国人称之为“纤维之冠”，日本人称之为“纤维宝石”，美国人称之为“白色金子”。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前，这里的羊绒就成了一宗重要出口商品，伊盟羊绒加工厂虽然规模不大，天津土畜产进出口公司却对它倍加关注。

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外贸部门和伊盟纺织公司决定通过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国外山羊绒加工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这个项目1979年5月25日才正式签约，总投资3355万元，引进217台设备。生产的羊绒衫除了归还补偿贸易以外，产品全部由外贸公司出口。1980年10月，中日合作扩建东胜绒毛厂项目竣工，按设计，生产能力为500吨无毛绒和30万件羊绒衫。

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担任安装工程副总指挥的是一位30岁的青年，他叫王林祥，初中毕业，四级工。七十年代后期他因非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坐了四年大牢。这件事为他打造了很好的政治背景。1980年3月，公司党委从上百名工人中挑选了他，让他带领55名青年到上海学习。

半年的学习，他不仅掌握了技术，也粗通管理。回来不久就担任安装工程副总指挥。

新项目投产后，毛绒一等品率达 100%，羊绒衫一等品率达 97%，一年利润 3460 万元。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外贸体制的限制，羊绒产品出口困难，三个新车间一年间断续停产 3 个月。他们决定，不在外贸公司一棵树上吊死，自己努力开拓市场。

此时王林祥担任了厂长。面对销售困难，王林祥的商业才能得到了发挥。他带领一批人背着大包大包的羊绒衫，上北京，闯大连，把他们的商品摆上了一些大城市友谊商店(那时是专供外宾的购物商店)的柜台，终于打开了销路。从 1980 年到 1985 年，这个厂为国家创汇 1 亿多美元，实现利润 1.005 亿元。伊盟羊绒衫厂在国内的名气越来越大。

从 1986 年开始，伊盟羊绒衫厂又进行了三年的技术改造，投入 1.5 亿元，使生产能力由 30 万件扩大到 60 万件，技术水平也提高了一个档次。进入 90 年代，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1997 年，已完成了从计量、染色、设计和各道生产工序的电脑控制。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全自动“施道尔”电脑横机 100 台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脑设计系统三套，建成了中国羊绒技术中心和实验楼一座。

1991 年，伊盟羊绒衫厂利用国有资产重组的机会，吸收了一批企业，组建了鄂尔多斯集团公司。在以后的发展中，集团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以羊绒产品为拳头，集毛纺、建陶、电子、石油、制药、房地产、商贸旅游和通讯服务为一体的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区、跨国度的大型集团公司。截止 1999 年底，集团公司总资产 32.88 亿元，净资产 20.85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36.58%。公司被工商银行评定为 AAA 级信用单位，资产运营一直呈良好状态。截止民营化以前，集团有成员企业 48 家，其中控股企业 17 家，全资企业 15 家，参股企业 16 家。

鄂尔多斯绒衫 3 次获得国家金奖、7 次获得部优质产品奖、13 次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优质产品奖。在 1995 年世界第 50 届统计大会上，国家统计局、中国技术进步评价中心授予鄂尔多斯集团公司“中国羊绒制品大王”

的称号。1996年又获中国优质产品金桥奖，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另一拳头产品KVSS牌无毛绒18年来一直保持100%的一等品，被国际市场公认为“中国一号无毛绒”，在羊绒行业中，产品规模、产品质量、市场占有率、出口创汇、经济效益均为全国第一。

集团公司建立了全球销售体系。据《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年度报告》，截止到2001年12月31日，公司营销网点已达1431个，其中商场百货店专卖厅580个，自营专卖店128个，特许加盟店215个，其他客户508个，辐射全国359个大中城市及15个县。集团公司在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香港建有7个销售分公司和21家专卖店；在马达加斯加和蒙古国设立羊绒制品加工厂。“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成为现实。

作为集团公司董事长的王林祥也获得了“中国企业经营管理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名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好企业的优秀党政工领导干部”等荣誉。

2000年集团实现销售收入20.7亿元，出口创汇11229万美元，实现利税4.4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9.9%、28%和31.3%。

集团公司中的母公司1995年B股上市，2001年A股上市，两次上市后，母公司拥有流通A股8000万股，流通B股2.1亿股，不流通的国家股2.26亿股，股份总数为5.16亿股。每股净资产5.67元。

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也逐年提高：1999年经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评出的“1999中国最有价值品牌”中，鄂尔多斯品牌价值达27.55亿元，是中国纺织行业第一名牌。同一资产评估事务所发布的2000中国最有价值品牌中，鄂尔多斯品牌价值达34.16亿元，还是中国纺织行业最有价值品牌。2001年，还是这家评估公司评定，“鄂尔多斯”品牌价值为37.55亿元。

但是，进入90年代末，企业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80年代国内仅有几家的羊绒企业已增加到2600多家，90年代初仅有几个品牌，现在有影响的品牌企业就达58家。羊绒市场群雄四起，以压价为代价的“内战”，使羊绒行业利润下降。为了应付挑战，企业决定改制。

改制

2000年，集团公司进行了一次改制，将母公司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家控股67.5%，“职工持股会”占股32.5%。在这次改制中，按照不同的级别，从王林祥到普通职工都得到了相应的股份。职工股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有权股，二是要素股。要素股占净资产的20%，只有管理者持有(总共500多人)，按职务高低不同持有不同的份额。所有权股既有分红权，又有所有权；要素股只有分红权，没有所有权。要素股又称岗位股，离开这个岗位就失去这个岗位的股份。所有权股全体职工都享有，王林祥拥250万股所有权股，250万股要素股，总共500万股。企业总股本为5.16亿股，王林祥持股不到1%，虽然绝对比重不大，但相对比重很大，他的股份是一般职工的160倍，是副职的7倍。王林祥在“职工持股会”中有绝对的发言权。

不久，企业经营者提出增资扩股，但政府没有钱增资，只有“职工持股会”增资扩股。结果，职工持股会占企业股份的54%，国家股占46%。由政府控股变成了“职工持股会”控股。当然，这是指2.26亿不流通股而言。

进入新世纪，鄂尔多斯市对中小型企业按照“四个一”的思路进行改制。“四个一”是：1.国有资产一次性买断。经过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得出资产数，扣除转制成本(其中包括职工转身份支出：国有企业职工变成民营企业职工，每个职工支付5000元+800元×工龄)，再扣除社会保障资金。扣除后，谁买这家企业，谁就支付现金，可分三年支付。2.债务一次清算。转制企业的银行贷款，外欠款，内欠职工款，该还的还，该补的补。用银行呆账准备金核销债务2-3亿元。3.职工一次安置。每名国有企业职工支付5000元+800元×工龄，一次转变身份。留在企业的，拿这一笔钱入股；离开企业的职工拿走这笔钱，和企业脱离关系，自谋职业。4.改革一步到位。国有资产退出，职工身份转变。

在这个背景下，鄂尔多斯集团公司进一步改制，彻底由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由职工持股会出资全部买下国家占有的股份。据鄂尔多斯市体改办介绍，扣除B股和A股的流通股所占的资本，再扣除职工转变身份所需要支出的1.2亿元和社会保障基金，每股净资产1.64元。2.26亿不流通的国有股合为4亿元。

这4亿元国有资产卖给职工持股会。职工持股会从哪里拿到这笔钱？一个来源是职工买断工龄的钱，继续留在企业里的工人拿这笔钱买到相应的一份股权，另一个来源是经营者出的钱，经营者当中，又按职务高低进行分配，职务越高，买的股份越多。随着国有股的全部退出，鄂尔多斯集团也退出国有企业行列，成为A股、B股和职工持股的上市公司。

按道理，国家资本退出企业以后，这4亿元应当上交国家财政。但是，国家财政一分钱也没有拿到。为什么？原来，在鄂尔多斯集团公司中有两家企业的所有制另有变更。一个是鄂尔多斯市煤炭公司，独立出来成为民营企业；另一个是蒙西水泥公司，独立出来成为国有独资企业。同在鄂尔多斯在集团公司时，伊煤曾向蒙西水泥投资3.4亿元。现在各自独立，蒙西水泥应还给伊煤这笔投资。既然蒙西水泥是国有全资，它自己又拿不出3.4亿元，就在鄂尔多斯民营化过程中交给国家的4亿元中划拨。剩下的6000万元也投进了国有独资企业蒙西水泥公司。现在蒙西水泥总资产10亿元，是内蒙最大的水泥厂。

国有股完全退出以后，由于王林祥等经营者收购了4亿元国有股中的一部分，王林祥的股份在企业总股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具体多少不得而知，估计不会超过3%，即使绝对比重不高，但由于相对比重高，他在企业里有绝对的发言权，对企业的资产实际全权支配。王林祥成为企业真正的老板，他个人也拥有巨额的财富，成为当今时代的骄子。

职工通过买断工龄，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国有企业职工。一部分人拿走(5000元+800元×工龄)钱离开企业，和企业一刀两断，另谋生路。留下来的职工，成为小股东兼雇佣劳动者。他们将应得的那份钱(5000元+800元×工龄)交给企业，以此买到企业相应的股份，每年按这个股份分红。由于股份很小，分红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主要靠工资为生。据了解，留下的

职工每天要工作 10 小时，一个月可以拿到 800—1000 元的工资。

争议

对鄂尔多斯民有化，社会上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看法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职工和经营者的利益分配上。

第一，国家的利益是不是受到损害？

主持改革者认为，国家最初投入不到 1000 万元，这些年上缴给国家的税收和利润，已经超过这个数的几十倍。改制中，又向国有独资企业蒙西水泥厂投资 4 亿元，使这个厂成为内蒙最大的国有独资水泥厂。国家是没有吃亏的。

质疑者从多方面提出问题：

1. 对不流通的国有股价格的计算上，是按净资产计算还是按市值计算？如果按 2001 年上半年每股市值 23 元(2001 年 6 月市价)计算，2.26 亿股市值总额为 51 亿元。如果按目前 14 元(2002 年 8 月市价)市价计算，市值总额也有 32 亿元。就是按净资产算，每股净资产 5.67 元，2.26 亿股净资产总值应为 12.81 亿元，从中扣除 1.2 亿元转制成本，还有 11.08 亿元怎么只剩下 4 亿元？

2. 企业的品牌价值 37.55 亿元无偿转给了“职工持股会”，实际上是无偿转让给了改制后的控股者。由于品牌效应，销售收入中 20% 属于品牌的贡献，现在已经进入了品牌高产期，这是一笔很重要的财富。

这家企业到底值多少钱？2001 年 12 月 19 日，王林祥在答《中国企业家》记者问时有一个说法。

“好多人想买鄂尔多斯！”王林祥很健谈，“我去香港，新鸿基想 51% 控股，我没有同意。现在我的资产是 50 个亿，加上品牌价值 34.16 亿，一共是 80 多个亿，上市公司有 5 亿 7000 股，最近的股价下来了，在 20 块左右的时候，市值有 100 多个亿。按国外的赢利水平，如果卖的话，我应该最起码卖到 150 亿。如果以净资产来考虑的话，大概有 100 个亿。我想，

现在100个亿我是不卖这个企业的，这是绝对的。”（边杰：《王林祥（鄂尔多斯集团）：抢占半壁江山》，见鄂尔多斯集团网）

但是，王林祥等却仅用4亿元从国家手中买走了！

3.即使是4亿元，国家也没有拿到，而是地方政府自主地投向了另一家国有企业。当然，这是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关系，不完全是企业改制的问题。

第二，职工在身份置换中，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受到损害？

主持改制者认为，改制以后，职工由虚化主人翁意识变成了实化的主人翁意识，由劳动者转变为劳动力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由职工变成了股东。他们既拿工资，又按股分红，是合算的。由于是股东，其劳动自觉性大大提高。让部分职工离开企业是执行国家“减员增效”的政策，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必要的措施，离开企业的职工也通过“买断工龄”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虽然钱不很多，但比有些企业要好得多。

质疑者分析，职工身份置换后分两种情况：一是继续留在企业里就业，将身份置换得到的那部分资金留在企业买股份。从表面看来，这部分职工成了股东，但是，他的股份是微不足道的，对企业的经营构不成发言权，他的工资多少，分红多少，全由经营者决定，他的资金，他的劳动，都由经营者支配，他的命运由经营者安排。二是不留在企业里的职工黄金年龄已经奉献给企业，现在已40岁以上，进入社会后，另谋生路比较困难。20年工龄的职工只能拿到2.1万元的补偿，对今后漫长的生活来说，仅是杯水车薪。

第三，经营者是不是大占便宜？

主持改革者认为，且不说将一个小企业发展成几十亿资产的大企业他作出的重大贡献，就是企业改制以后，企业经营者只是得到了他应得的一部分。改革并没有使国有资产流进私人手里。国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经营者持大股对企业发展有利，企业发展了，国家对职工都有好处。企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经营者持大股，正是为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

质疑者认为，由于A股和B股的股权高度分散，普通职工的持股比例

也很低，王林祥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大股东，成为控股股东，成了公司事实上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他拥有对公司绝对的控制权和决策权。由于职工用身份置换资金买到的股份是不流通股，职工在退出企业时只能返给他原认购的金额，职工的股份不会随企业的发展而放大。由于王林祥同时又是控股股东，除了自己辞职以外，不可能被公司解聘。他拥有了公司这种绝对的和永久的控制权以后，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随时将资产扩大，并转换成现金资产。

思考

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国家、职工、经营者，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否合理，关键在于他们的谈判地位是否对称，而谈判地位是每个利益主体的资源地位、信息地位、权力地位、组织地位决定的。实际上，在这几个方面，三个利益主体的地位是极不对称的。

国家和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

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经营状况，企业前景，经营者有最大的发言权，国家发言权不多。所以，在国有股作价时，经营者掌握主动权。

掌握资源不对称：除了信息资源以外，还有销售渠道，技术秘密，人事系统，都是经营者多年建立起来的，带有很强的个性特点。一个在企业多年的经营者，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离开了他，企业经营就会很困难。所以，在国家和经营者的博弈中，为了企业的发展，国家只能让步。

企业改制的过程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起主导作用，谁就占有利益分配上的优势。企业改制，应当是所有者起主导作用。但是，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却是经营者起主导作用。经营者的主导作用是多年形成的，是难以改变的。

职工和经营者之间更多方面不对称。

除了上述两个不对称都存在以外，还有权力不对称、组织不对称。经营者手中有权力、而职工受权力主宰；经营者掌握企业的组织，而职工只

是单独的个人。工会也在经营者掌握之下，不仅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反而成为经营者说服职工的工具。由于政府已经失去了企业改制中的主导地位，不能成为社会公正的代表，经营者就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经营者占主导地位，政府处于被动地位，职工处于被宰割地位。这种地位关系表现在资产评估、股份分配、冗余职工处置等一系列博弈过程之中。博弈的结果总是经营者取胜。

在改制过程中还有地方政府参与。经营者和地方官员有着种种关系，在与国家和职工的博弈中，地方政府通常是站在经营者一边，这更加强了经营者的主导地位。

以经营者为主导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其结果必然是经营者获大利，国有资产难免流失，职工利益受到损害。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民营化，而在于民营化的制度和规则，这制度和规则的关键是保证三个利益主体获得同等的谈判地位。其中，民主、公开、透明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工会要成为真正的工会，要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政府作为所有者，要保卫所有者的利益；作为社会管理者，还要保护公民的利益。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制普遍不具备这个条件。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反对私有化，实际上，中国不仅正在发生大规模的私有化，而且中国的私有化过程最不公正。

刊于《中国投资》，2002年第11期

注：这篇调查报告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办的刊物《中国投资》上发表后，这家企业的民营化被叫停。

当代老板

>>>>>

为民营经济正名

民营经济，是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民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同。民有是指所有权，民营是指经营权。国有经济也可以交给民间经营，这样的民营经济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实际上，现在人们所说的民营经济，其中大部分是民有经济。由于种种原因，不敢堂而皇之地说出“民有”这个词儿。

其实，民有这个词儿并不犯什么忌讳。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党中央一直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就是“民有”，所以，民有经济的存在既合理，又合法，它不犯什么忌讳。

现在人们所说的民营经济，其中很多是私有经济。把私有说成民有，是为了回避一个“私”字。党的十三大就没有回避这个“私”字，明确指出“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然而党的十三大并没有改变多年造就的传统观念，一提取“私有”就感到浑身不自在，总想用别的说法来取代它。就像用“驾崩”代替“死了”，用“欠安”代替“生病”一样。

党的十三大以来，之所以没有回避“民营经济”，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有经

DANGDAI LAOBAN

济并不是坏东西。不仅不坏，还很有好处。好就好在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增长国力，对改善人民生活，对解决就业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着重要作用。1996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705万人，其中在个体、民有经济中就业的近300万人，超过了在国有经济单位新增就业人数。199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614.3亿元，其中个体、私人经济超过了1万亿元，远远超过了国有经济。民有经济在浙江、福建、广东的一些地区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面对这样的现实，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早就说过：“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发展没有多少年，是我国经济的构成部分。有委员说非公有经济是国有、集体经济的补充。谁补充谁呢？一张桌子四条腿，哪条腿补充哪条腿很难说。”（《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3月11日）

然而，真正的归一家一户所有的民有经济只能经营小企业。现代市场经济是激烈竞争的经济，没有一定的规模，是很难站得住的。要扩大规模，仅靠本身积累是不行的，必须吸收社会资本。这样，一家一户的小企业就变成了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不是国家所有，但不是私有。马克思说：股份公司的成立，使“那些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 and 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接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还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股份制应当是社会所有制。没有国家或外资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应当是民有企业。

民有经济在数量上已占主体

与国有经济这个概念相对应的民有经济，不应当仅仅是指私有经济，合作经济、股份经济、集体经济，都应当划入民有经济之列。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外资所有，那就是民间所有了。

如果把民营经济定义为国家所有和外资所有以外的经济成分，那么，民营经济减去私有经济，其内涵和公有经济减去国有经济是重合的。所以，民营经济和公有经济两个概念不是对立的，而是互含的。发展民营经济不仅不妨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有助于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十五大提出要寻找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种寻找，在民营经济之中大有文章可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至少有四种：国有制；集体所有制；非私人控股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国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其他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是民营经济。从数量而言，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大部分（目前已占GDP的60%以上）。

目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正处于发展、变动之中。民营经济可以在国有经济中参股（除了极少数不能进入的行业以外），国有经济也可以到民营经济中参股，其他各种经济成分都可以互相参股。这样，凡是没有国有经济和外资参股的经济，都可以称之为民营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在新的财产所有结构中，从数量而言，民营经济将占主体部分。

“民营”由来已久

我这里说民营经济并不是什么新创造，“民营”这个词儿100多年前就有了。

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于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讲话中，把“民营”和“民治、民享”放在一起。这个演说译成中文不到600字，民营、民治、民享是其中最后一句话。他当时说：“今天在这里的讲话，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然而，世界却永远记住了这次讲话。

81年以后，毛泽东重复了这次讲话。1945年9月，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向当时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提出了12个问题。其中第十个问题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其解说如何？”毛泽东

回答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独立、团结、统一，与各民主强国合作。”（《毛泽东同志回答路透社记者我国需要和平建国》，载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

122年以后，江泽民重复了这次讲话。1986年12月18日下午，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回到他的母校交通大学，同闹学潮的学生们对话，他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民有，民治，民享’……”学生们打断他的讲话问：“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镇定自若地说：“这是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在场的同学们，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江泽民抑扬顿挫地背出了全文，学生们开始目瞪口呆，继而心悦诚服。

不要怕私人老板有钱

钱这个东西，对没钱的人很有用，对有钱的人来说没有多大用。巨额财产，对没有社会责任的人来说没有用，或用不好，或者有害；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就有用，就能用好，对社会就有利。财富过分集中于一个家族，而且处置不当，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不幸的。在家族内部冷冰冰的财富争夺将代替温情脉脉的血缘亲情。子女因坐享其成而失去奋发向上的斗志。而且，种种社会矛盾将集中于这个家族。

搞企业就得赚钱。赚钱为什么？个人消费是有限的，而那些真正干事业的人常常不是高消费者。如果不是苟且偷安的人，他总想对社会产生些有益的影响。依据其对社会影响范围的大小和影响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庸人、能人、强人、伟人。古今中外的有志者通常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影响社会：权力、财富、知识。掌握一定的权力可以为社会做好事，知识分子可以用他的学识来影响社会。搞企业就是为了创造就业岗位，繁荣社会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如果能集中到巨额财富，还可以运用这些财富对社会施加更大更良好的影响。所以，企业家素质高低最根本的表现是，他是

为社会而经营财富还是为个人或家族聚敛财富。高素质的企业家应以服务社会、改造社会为己任，不为个人和家族谋一己之利。

企业家的素质是在市场中不断提高的。市场是优秀的教师，它随时随地地帮助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市场是严厉的考官，它无情地把那些不合格的企业家淘汰出局。今天，我们不必对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担心，市场会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掌握了巨额财富的高素质企业家，对社会是好事，不是坏事。

回避“民有”危害很大

把实际上的“民营企业”称为“民营企业”不仅仅是词语上的不当。它还带来政策上的不当，即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如民营企业贷款很难)。由于舆论压力和政策压力，很多私有企业不得不戴上“红帽子”。本来产权关系很清晰的企业，“红帽子”一戴，产权关系就模糊了。“红帽子”企业的尴尬境地对它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不良后果。由于不承认“民有”这一现实，一些私有企业心里没有安全感，稍有规模，就赶紧把资金调到国外，在国外注册一家公司，为自己开一个“太平门”。仅这一项，不知有多少美元流到了国外。由于不承认“民有”这一现实，私有企业宁可把钱挥霍掉，也不敢继续投资。他们引导花天酒地的消费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无奈。

民营经济是客观存在，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们不要回避这个词儿。我们把“国营经济”这个词儿已经改成了“国有经济”，为什么不能把“民营经济”改成“民有经济”呢？当初把“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说明国有不一定国营，为国有经济改革打开了一条新出路。现在如果把民营经济改为民有经济，说明我们承认现实，并将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刊于《光彩》，1997年第5期

九十年代新老板

我住在珠江三角洲一家宾馆里，一位年青的民有企业家到房间来看我。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情况。广播员说，人民代表中有40多位是民有企业家。民有企业家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了我们两人的议论话题。他说，十五大以前，传说这个万言书，那个万言书，批评民有经济发展太多，他的心里像悬着一个铅块。十五大使如释重负，现在更放心了。

珠江三角洲是民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以南海市为例，1997年民有企业的注册资本比上一年增长了331%，注册资金100万元到500万元的企业增长了123%，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增长386%，规模大的民有企业数增长更快，民有企业的税收比上年增长了23%。这里的民有企业成为职工的主要就业渠道。南海，一个县级市，在民有企业就业的就有40多万人。

30多岁的黄国权是佛山市科信达公司总经理。他先上电视大学，又到西安交大进修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他的公司制造陶瓷生产设备。在普遍感到市场不足的情况下，他不仅开足了马力，每月还要加5天班。他1992年3万元起家，走了不少弯路，1995年11月才转向这个行业，现在有几千万元资产。他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纳为“四个基本点”：一是讲信誉；二是把企业经营成为员工生存和发展的乐园；三是给员工、合作者和贸易伙伴丰厚的回报；四是员工不得妨碍企业的发展，企业也不能影响员工的发展。黄国权说话慢条斯理，一双大眼睛总是像在思考。他说：大浪淘沙，八十年代的民有企业家现在还在发展的已经不多了。九十年代的民有企业多数是新起来的。八十年代的民有企业家相当多是“洗脚上田”的农民，九十年代的成功者大多是有文化的实干家。这两代企业家在思想方法、经营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黄国权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这是八十年代的情况。地上本来就有的

路，走的人太多了也就没有路，这是九十年代的情况。现在选行业要有理性，要在试探中找新路。

九十年代新老板有着新的风貌。我接触了一些老板，绝大多数是30岁左右的人。他们关注东南亚金融风暴，读哈佛商业教材，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字里行间寻找商业机会。向我问的都是要害问题：人民币会贬值吗？利率还降不降？

罗启坤，看样子不出30岁，高高的身材，白净的面孔，是一个标准的靓仔。他在康有为家乡附近的小塘镇开了两个玻璃制品厂，生产灯饰，出口美国。他领我参观了他的工厂。这个厂占地70亩，厂房全是新的，雇员900多人，雇员月收入600元到2500元。他指着远处的工地说，那是正在新建的厂房。对自己事业的发展，对自己能解决900多人的就业问题，他脸上露出自豪神色。罗启坤的父亲原是广州一家玻璃厂的老职工，八十年代离开工厂与几个朋友合伙搞企业，但发展缓慢。罗启坤觉得父亲经营理念陈旧，毅然离开父亲自己另起炉灶，业绩很快超过了父亲。他告诉记者，东南亚货币贬值以后，他的订单有一半转向了东南亚。他正在开辟新的市场，已经有很大的进展。在谈话中我发现，他不仅对亚洲金融风暴很了解，而且能把风暴中的一波一折与自己的经营联系起来。

小塘镇党委副书记吴魁俊为我召集了一个民营企业企业家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一个个朝气蓬勃，信心十足，没有抱怨市场疲软，没有抱怨资金困难。他们谈泰铢贬值，谈美国行情，谈经营策略，谈营造市场。他们的话题很“现代”，视野很开阔。他们用“满天星斗，缺乏一轮明月”来比喻珠三角的民营经济。他们说，一家一户很难做大，在国际市场难以立足。要联合起来，又没有好的法律环境，联合起来谁当家？钱怎么管理？出现财产纠纷怎么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对自己的财产心里没有底，搞资本联合就很难放心。现在虽然开始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但真正规范的不多。

珠江三角洲向我们展示，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但是，民营企业要自立于世界企业之林，必须在产权、规模、管理、产品结构方面跨上一个新台阶。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8年4月2日

历史的旋梯：中国民有经济的沉重轨迹

在当今中国，民有经济是一个富有吸引力又富有刺激性的字眼。

说它富吸引力，是因为它意味着财富，意味着冒险，也意味着拼搏。一些私有企业主在几年之内“发”起来了，有人羡慕不已，有人忿忿不平，有人跃跃欲试又怕血本无归。说它富有刺激性，是因为它的出现和过去多年奉行的教科书是那样的不协调，它每发展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批评、无穷的指摘和深深的忧虑。

在锣鼓声中消灭

在奴隶社会就出现了私有财产。在几千年的发展，在欧洲出现了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它以富有激励的机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但是，这种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制度既创造了财富，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危机、贫富悬殊、金钱至上，良心和人格都成了商品。这些社会问题，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深深忧虑。这些忧虑充分反映在那个时期的一些文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传世之作中。《太阳城》、《乌托邦》、《资本论》，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私有制，在这些著作中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

1516年，英国人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中指出：“假如私有制存在，假如金钱是衡量一切的

标准，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如果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财产，幸福是不能达到的。当每个人可以假借法律去拼命捞钱，而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财富，所有的财富总是落在少数人手里，其余的人变成贫困不堪。”莫尔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和消灭商品交换，实行共产主义，才是根治利己主义的唯一良方。在他之后，圣西门、欧文、傅立叶都接受了莫尔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商品交换的想法，并进行了局部的社会试验。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还是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进一步分析：由一个中央机构来计划全国的经济活动是否可能，消灭私有经济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上述理想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接收大城市时，已经没收了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最初部分。1949年，在微薄的工业基础上，国营工业的比重为26.2%，集体工业占0.5%，公私合营占1.6%，私营工业占48.7%，个体手工业占23%（1986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49页）。

1949年以后，国营企业向私有企业加工、订货，或包销、收购私有企业的产品，把私有企业逐步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也同时控制了私有企业。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对私有企业的控制。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到41.5%，集体工业占3.2%，公私合营占4.0%，私营工业下降到30.6%，个体手工业为20.6%。（1986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49页）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国营占34.4%，公私合营占0.4%，个体占60.9%，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4.3%（1986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89页）。

在此期间，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以及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实行了“统购统销”，私有企业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当时的私有企业中，有三分之二是纺织工业，“统购统销”从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两头卡住了他们，使他们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同时在政治上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连子女也感到不光彩。

私有企业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因此，国家一号召公私合营，他们就积极响应。对于私有企业家来说，公私合营是唯一的选择，但他们的心里是痛苦的。有的人白天在街上敲锣打鼓，庆祝进入了社会主义，晚上和老婆抱头痛哭。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0%，公私合营工业占26.3%，私营工业只占0.1%，城乡个体手工业占0.8%（1986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49页）。

在以后的年月，国有经济进一步扩大，私有经济进一步缩小。改革前的1978年，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80.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2%。二者囊括了所有的工业。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占90.5%，集体所有制占7.4%，个体只占0.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2.0%（1986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89页）。

对于长期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广大群众来说，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所以，每一次公有制的胜利，总是敲锣打鼓，进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在疑虑中回归

在经济基数比较小、经济结构比较简单时，计划经济能够集中国力干成一些大事，所以，在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初期，都有比较快的发展速

度。但是，随着经济规模扩大，经济结构复杂，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其根本问题在于，没有任何“超人”能够把握经济运行态势，并根据这种态势去“计划”它。也就是说，靠一个中央计划机关来决定每一家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这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所以，苏联、东欧的一些国家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计划经济不搞了，国家所有制也得改弦更张。所以，这些国家出现了民有经济大回归。

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是被严峻就业问题逼出来的。

在“文革”中，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粉碎，过去被压抑的愿望奔腾而出。知识青年回城，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但是，城市没有这么多工作岗位接纳这么多人。矛盾就出现了。有些地方就出现了对抗，上海知青的抗议活动最为激烈。他们高呼“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饭吃”的口号，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

在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

就业，就业，这是当时全社会极为紧迫的问题。

按过去的作法，就业，就是由政府的劳动部门分配工作。当时人们选择工作的标准第一是国营工厂，第二是国营商业，第三是集体工厂。但是，数以千万计青年一下子涌回城市，政府没有办法在国营和集体工商业中安置他们。于是，政府一方面发动各单位兴办集体企业，安排本单位的回城子女；另一方面，号召回城青年们自谋职业。所谓自谋职业，就是让他们从事个体工、商业。那时，工商管理部门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各级政府还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条件，报纸上大力宣传个体户对社会的贡献。在短短两三年内，个体户蓬勃发展。除了回城青年以外，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排挤出国营企业的人(如开除公职的人、劳改释放人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这支队伍中最大胆、最活跃分子。

在成千上万的个体户中，大多数人虽然只能有个温饱，但有不少人比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要丰厚多了。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几年之内“发”起来了。随着营业的扩大，人手越来越紧张，他们开始雇工，由个体户变

成了私人企业主。

这种情况给城市职工以很大的精神冲击。过去他们看不起职业，现在收入比他们要高得多；过去被视为“不三不四”的人，现在耀武扬威起来了。他们心理上很不平衡。

现实使理论尴尬。1980年，北京的一个权威经济研究机构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十个理论难题：第一，从传统理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私人不能占有生产资料。现在，私人开始占有生产资料了。对这一新情况是限制还是鼓励？第二，从传统理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私人雇工。现在私人雇工现象大量出现了。这种现象怎样解释？第三，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剥削。现在剥削现象也出现了，是允许还是取缔？如果允许，以多大限度为宜？第四，有的地方群众集资办厂，实行按股金分红。从传统理论看，这是按资分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不允许这种分配形式存在？第五，过去我们把私人老板当资本家。过去的资本家已经没有了，现在又开始出现私人老板。怎样看现阶段私人老板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等等。一连串的问题，既抨击现实，又质疑理论。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对这些和传统理论相违背的敏感问题的政策也是很微妙的。关于雇工问题，1981年国务院颁发的《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和1983年的《城镇非农村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中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为什么可以雇七个人呢？说来很可笑，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这个界限。经过一百多年，企业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这句话不可能回答今天的企业雇多少人才算合理的问题。可见，当时人们一面在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在马克思那里为这种超越寻找根据。因为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字的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

一颗瓜子千斤重

邓小平和胡耀邦利用一个典型打破了人们的重重顾虑，这个典型就是“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叫年广久，安徽芜湖人。他很早就是一个个体商贩，开始贩卖水果，后改营炒货。他和两个儿子在家里炒制西瓜子，或提篮叫卖，或摆摊兜售。他悉心钻研瓜子的炒制技巧，创造出“傻子瓜子”这一名牌食品。加上他很会经营，生意越做越大。瓜子的日产量由原来的几十斤增加到200多斤，月营业额达万元。在当时个体户中成为“冒尖户”。年广久要继续扩大经营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向个体经济联合体发展；一是雇工。年广久也曾想过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但处理各方的经济利益关系比较复杂。走私有企业的道路相对简单一些。他从1981年9月开始雇工。当时他只雇了4个帮手，主要劳动力还是他父子三人。这时人们心里还可以勉强接受。随着经营的发展，雇工人数逐渐增多，1983年初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共140多人。日产瓜子一万多斤，月营业额达60多万元。从一家个体户发展到这样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私有企业，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年广久发展这么快，除了私营经济有强大的活力以外，还得力于他选择的这个行业。瓜子不关系国计民生，是计划经济管不着的空间，也是公有经济的空隙。尽管如此，他的迅速发迹，引起了各方面议论和指摘。当时很多人看了不舒服，主张对他采取措施。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年广久。

一颗瓜子千斤重。邓小平等对“傻子瓜子”的支持，使得一些不拘泥于原来思维方式的人们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马克思说的资本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而年广久财富的积累并没有使人贫困，相反，他雇佣的工人的收入比国营企业工人的收入要高得多；年广久并没有全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以1982年为例，这一年“傻子瓜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

资、上缴国家税费分别为 44.6%、12.0%和 43.33%。

年广久开办私有企业对社会不仅没带来什么害处，却带来了很多好处。由于他的经济实力，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的挑战和带动下，芜湖一下子涌现出近 60 家瓜子企业，瓜子销售量达 3000 万斤，被誉为“瓜子城”。全国各地也兴起了瓜子加工热，从南到北，涌现出“迎春瓜子”、“口不离”、“好吃来”、“阿凡提”等数不清的新品种，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事实告诉人们，私有经济并不是像过去说的那么危险。

一颗小小的瓜子，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人们从中央对傻子瓜子的态度得到了胆量，私有企业蓬勃发展起来。

在曲折中发展

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由个人承包或租赁集体企业而逐步演变为私有企业。在承包之初，有些地方把当时经营很困难的集体企业“一脚踢”式地包给个人。承包者向集体交纳定额的积累、折旧费或管理费后，剩下利润全归自己。承包者可以雇工，可以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向和经营方式。几年以后，企业中个人的财产占绝对优势，成为事实上的私有企业，但名义上还是集体企业。

二是个人或家庭独资经营的企业。这类企业是城乡个体工商户或家庭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三是合伙经营的企业。两人以上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这类企业一般都列入合作经济之中。

四是集股经营的私有企业。由企业主个人互相参股，或在社会上集股，或亲朋好友出资入股。由董事会推举经营人员或由大股东负责经营。福建的晋江和浙江的温州这类企业比较多。

五是中外合资的私有企业。境外资金和国内的私人资本相结合而开办

的企业。这类企业多分布在沿海或华侨较多的地区。

六是依技术成果起家的私有企业。如珠海的巨人集团就是它的总经理在攻读研究生时发明的一项成果，自筹几千元资金制成了产品，并迅速占领了市场，从而成为一家很有影响的企业。

在私有企业出现的初期，大部分从事手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后来发展到工业、交通运输、食品加工、高科技、金融、采矿、建筑材料等各行各业。

私有企业中，出现了一大批百万富翁。这些富翁之中，有不少人过去是社会的弃儿。开始政府让他们“自谋出路”。所谓“自谋出路”，就是在旧体制内没有他们的出路，仅靠共产主义的宽容，他们才在国营经济顾及不到的小角落里，得到了可怜的一席谋生之地。开始他们是多么希望迈进堂皇的国营企业的大门啊，但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很不情愿地摆起了小摊，叫卖街头。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意外地得到了一次淘金的大好机会。

这个机会是商品经济的不毛之地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为是不毛之地，他们是先行者，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先发优势和广阔的空间；因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他们得到了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旧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他们不受旧体制的约束，却在旧体制正在崩溃的混乱中大占便宜。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从事私营经济的政治风险已经很小了。发财机会的诱惑，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使得不少人抛弃国营企业或国家机关的“铁饭碗”，自愿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一批人和早期进入这个领域里的人不同，他们有充足的经济和一定的社会关系，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其中有的人还有种种权力背景。那些有背景的人一“下海”，就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中国民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几个高潮，这几个高潮都是政治松动的结果。第一次高潮是1985年，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商品经济，为过去长期争论的“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作了政治结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壮了胆；第二次高潮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姓

资姓社”的请难受到压抑，为民办经济发展造就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第三次是中共十五大在公有制改革方面有所松动，为民办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接之而来的是大量下岗工人需要再就业，为发展民办经济提出了必要性。

中国到底有多少私有企业？据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数，1997年共有960726家。由于坚持传统理论的人不断造就的舆论压力，私有企业在政治上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也由于传统理论的影响，在贷款、税收等方面，和国有企业还不能平起平坐。所以，很多私有企业戴上了“红帽子”（国营、集体）、“洋帽子”（三资企业）、“小帽子”（个体企业），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六假”企业（假国营、假集体、假外资、假校办、假残病、假知青）。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欣欣介绍，据各省一致反映和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六假”企业比实际注册的私人企业要多3—10倍。另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抽样调查，我国乡镇企业中，有83%是私有企业（1994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第71页）。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羿远铮介绍，据工商局和工商联分别在不同地区调查，注册私有企业和非注册私有企业之比从1比2到1比10不等。以乡镇企业名义注册的私有企业占乡镇企业总数的83%—86%（1996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第112页）。

1997年登记注册的私有企业96万户，按保守的估计，把这个数字放大5倍也许有可能接近真实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私有企业大约有500万家。当然，这500万家不都是大亨，据《中国私营企研究课题组》对中国私有企业的第三次抽样查（1997年底到1998年）数据，被调查企业平均实有资本为293.5万元。企业资本10万元以下的占调查总户数的7.6%，10万元至50万元的占45.0%，50万元至100万元的占17.6%，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占25.6%，1000万元以上的占4.3%。如果把这个比例推广到全国，则，资本规模在10万元以下的有38万户，10—50万的有225万户，50—100万的有87.5万户，100万—1000万的有128万户，1000万元以上的有21.5万户。也就是说，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有149.5万户。

“为主”两字让出大空间

有心人会察觉到，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提法中，随着实践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微妙的变化。

1981年全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到所有制改革问题：“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请注意，这里在“一定范围”所允许的仅仅是“劳动者个体经济”，也就是相对于集体经济的个体劳动者。

1982年4月2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再一次肯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指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这里的提法还是“个体劳动者经济”。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问题”。又一次强调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还指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要鼓励个体劳动者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这里第一次提出“鼓励适当发展”。

1984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还说，“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决定》还提出“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请注意，这个《决定》在所有制问题上和过去相比，有几处突破。一是个体经济可以和全民经济、集体经济进行联合。如果全民经济和个体经济联合了，全民经济也就不是单纯的全民经济了。这对过去那种追求“纯之又纯”的全民所有制来说，不能不说是突破。二是小型全民企业可以租赁或承包给个人经营，这也是和传统理论相悖的。三是把全民、集体、个人、三资企业都看成社会主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决策已具雏形。四是除了允许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外，还允许发展多种经营形式。这主要是指国有经济。过去一直称为国营经济，现在可以国有民营。过去一直提“国营经济”为主导，从此以后，就改为“国有经济”为主导了。也就是说，国有民营经济也是主导经济。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现在公有制占90%以上，与此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这些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7页）邓小平这里在公有制后面加上了“为主体”三个字，就不是百分之百的了。这就为非公有制经济让出了发展空间。

一直到198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所允许发展的还是“个体经济”，还没有开“民有经济”这个口子。其实，这时社会上已经有很多有相当规模的私有企业。个体经济和民有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在雇工在7人以下，在而后者雇工在7人以上。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民有经济上终于有了突破。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太多了，而是发展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民有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

经济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民有经济”、“私营经济”，长期被共产主义者视为罪恶的渊藪，在共产党的决议中成为鼓励发展的对象。在国家宪法中也确认了其地位。对这种与过去一贯说法相矛盾的现象，“十三大”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解释。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直到今天还是沿用这个说法。

从“补充”到平等

民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在1997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经济(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其他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私营个体成分)实现18096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2%。1997年在各产业的增加值中，非公有经济的比重是：批发零售业、餐饮业中占53.8%，农林牧渔业中占27.5%，工业中占21.2%。不少私有企业开始和国有经济交汇，涉足国家重点工程。1994年全国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或雇工500人以上的私有企业中，与国有、集体企业联营、合作的有83家，占13%。

个体私有企业不仅成了“再就业工程”的主角，也是今后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出路。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1996年和1992年相比，城镇从业人员增加了2574万人，其中，国有经济新增从业人员只有355万人，私营、个体经济新增从业人员为1491万人，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2倍。到1997年底，个体与私有企业解决就业岗位8600万个。1996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705万人，其中在个体民有经济中就业的近300万人，超过了在国有经济单位新增就业人数。仅1997年，全国个体私有企业就吸纳了下岗职工350万人以上。

私有企业不仅是“再就业工程”的主角，在国民经济中也举足轻重。民有经济在浙江、福建、广东的一些地区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面对这样的现实，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早就说过：“非公有制经济在我

国发展没有多少年，是我国经济的构成部分。有委员说非公有经济是国有、集体经济的补充。谁补充谁呢？一张桌子四条腿，哪条腿补充哪条腿很难说。”（《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3月11日）。私营经济事实上不再是“补充”，而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之一。然而，在党的文件上，在国家宪法中，它还是补充角色。这使私有企业家心存疑虑。为政治安全起见，不少私有企业不得不戴上了“红帽子”。“红帽子”一戴，本来很清晰的产权关系就模糊了，由此引出了很多产权纠纷，阻碍了私有企业的发展。由于缺乏安全感，私有企业稍有规模，就赶紧把资金调到国外，在国外注册一家公司，为自己开一个“太平门”。仅这一项，不知有多少美元流到了国外。由于缺乏安全感，有些私有企业宁可把钱挥霍掉，也不敢继续投资。

为什么私有企业缺乏安全感？名实不符是一个重要原因。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名分上还是“补充”角色。为什么名实不符呢？还是民有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在起作用。

面对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不少省、市相继推出了种种让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平起平坐的政策。但是，在国家这个层面还没有突破，这不能不使私有企业主疑虑。

突破终于来了。1999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在宪法第十一条，删去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句话，加上了“在法定范围内的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十分重要的话。

这一改动，字字千钧，它为姓资姓社之争隆重地画上了句号。

从国有化到社会化

《太阳城》、《乌托邦》、《资本论》，这些传世之作对私有制的批判是不是错了呢？不是。先哲们指出私有制的弊端确实实地存在的。不过，经过20世纪的实践，人类找到了消除这些弊端的途径。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能量在宇宙均匀分布，即整个宇宙处处温度相等，那就是宇宙的死亡：没有风雨雷电，没有日月星辰，没有阳光温暖。这是一个熵值最大的状态，这就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休斯所描述的“热死”状态。财富是一种社会能量，财富绝对平均也失去了激励，因而也失去了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是说，如果财富绝对平均，一切社会事业、一切社会活动都将停止，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熄灭，就意味着社会的死亡。

所以，“均贫富”不仅行不通，也是极为有害的。财富还是要集中的。

财富应当由谁来集中呢？国家应当集中一批财富，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用于救助贫困，用于补救市场失效。“公共产品”是指维护社会安全的军队、警察、公众服务设施、教育等，这些都不以盈利为目的。那些为使财富增值的经营活动(主要是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也需要把财富集中到经营规模，这就不一定集中在国家手里了，民间经营比国家经营的效率更高。苏联、中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英国工党执政时的实践已经证明，由国家来从事经营性活动是不成功的。这正是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早期资本主义的实践也证明，由个人支配巨额财富不仅是失败的，也是有害的。不集中在国家手里，又不集中在私人手里，到底集中在哪里？这里有两个原则，一是这种集中经营能保证财富增值最快，即效率高；二是不能损害公众利益，保证公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共同探索，既否定了国家过度集中财富，也否定了私人集中财富，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财富集中方式，这就是社会化方式。股份制企业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现代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形式。当今，这两种社会化的形式已经互相融合、互相依存。

这就是说，在早期资本主义集中财富是通过巨额财产的私人占有来实现的；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是用行政力量即国家来实现财富集中的；在现代社会，财富集中是通过社会化的手段实现的。在现代，财富的使用权集中了，但财富所有权却分散了。银行资产的所有者是成千上万个储户，股份制企业资产的所有者是成千上万个股民；但对财富进行运营的，还是那些善于使财富增值的专家们。这就可以保证公平和效率的兼有。

私有制企业也得向社会所有制发展。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还将是私有独资或合作投资形式。当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都得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制企业发展。国有资本、外资和其他社会资本也会和私有企业参股、融合。一些大型企业的股权会越来越分散。这时，企业的财产不再归个别所有者，而是社会所有。经理阶层的作用会更重要，而所有者的角色会逐渐淡化。

20 世纪的实践是所有制不断发展的实践。对计划经济国家来说，从私有制，发展到国家所有制，再由国家所有制，发展到社会所有制。这正如一个历史大旋梯，人类的认识正沿着这个旋梯回旋、上升。

刊于《半月谈》，1999 年第 3 期

注：本文发表后，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2007 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为 1396.5 万人，他们的注册资本为 93873.1 亿元。雇佣工人 5856.6 万人，经营着 5513 家企业。私营企业主当中，共产党员所占比重为 33.5%。

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当今中国的民营企业不少是家族式管理。在私有企业里，通常是丈夫当老板，妻子管财务，兄弟管生产，妻弟管销售。有些乡镇企业、小型国有企业被承包或被租赁给私人以后，高层管理人员也是经营者的亲属。

近两年来，理论界对家族式管理提出了种种批评。只有1999年第8期《中国企业家》王军武的文章看法不同，他认为“家族企业不是落后的代名词”。王先生还列举了一些数字证明“在当前世界上，家族企业是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企业组织之一”，可惜他没有注明这些数字的出处，不知道他列举的数字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无法做出进一步分析。

我们暂且抛开社会上的不同看法，分析一下家族企业存在的理由和它的弊端。

家族管理有哪些好处？第一，家族本来就有着共同的利益纽带，更容易建立共同的利益目标，因而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家族成员之间比较容易合作，出现意见分歧比较容易统一；第三，由血缘关系造成了较高的信任程度，财产的安全度较高，即使管理人员侵占了企业的利益，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第四，成本低，不必花高价从外部聘请经营管理人员。

它有哪些弊端？第一，它不可能从社会上选出优秀的管理者，而管理者的素质和水平是决定企业成败的重要方面；第二，企业中的非家族员工对企业有距离感、疏远感，影响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企业里，常常感情高于制度，在企业内部很难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第四，家族企业一般和社会的关系不融洽，在中国这个环境下，社会舆论有时对家族企业存有敌意。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家族管理的优越性是有条件的。在企业初创时期，规模小，利润不多，企业内部管理简单，同一个家族的人比较齐心协力。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渐扩大，企业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家族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也有门户之分，也有不同的利益主体。面对巨额的财富，兄弟之间，妯娌之间也会考虑到这笔财富中多少是属于自己的。在家族内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产权不清晰，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随着家族公共财富的增多，内部的利益矛盾会逐渐显现出来，亲情也会产生裂痕，家族的内部凝聚力开始消失。“豪门恩怨”不可解，富贵家庭逆子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仅家族企业的优越性逐渐丧失，它固有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家族企业会觉得力不从心。国外一些大私有企业不把经营权传给子女，而从社会上高薪聘用能人，这种现象说明家族企业的局限性。

可以这么说，创业之初的小企业，家族管理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少小企业是靠家族管理起家的。当它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如果不改变家族管理，就可能在竞争中失败。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为什么中国有一些民营企业规模已经很大还实行家族式管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经理市场。要改变家族管理就得在社会上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即把家族成员的管理权力让渡给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至少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忠诚可靠，不会侵害企业的利益；第二是经营水平高，能够保证企业资产快速增值。要选好委托代理人必须有完善的经理市场。经理人员的忠诚和水平由市场评价。不忠诚的人会被市场淘汰，水平较低的人，市场只给他较低的价格。现在中国没有经理市场，选择委托代理人只好碰运气，如果把企业委托给不忠诚的人经营，就可能毁于一旦。面对选择委托代理人的极大风险，从财产安全考虑，在忠诚和水平二者之间，宁肯选择忠诚，也不选择水平。何况，由于没有市场评价，从外面选择的人是不是真正水平高也很难说，在家族中经过多年培养和考察的管理者，即使不是社会上的拔尖人物，至少不会是笨蛋。

目前，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而要摆脱这一危机又受到中国市场环境的制约，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尴尬。看来，在委托代理人的市场环境完善以前，家族企业还得继续存在下去。既然如此，那就得清醒地认识家族企业的弊端，自觉地采取措施减小这些弊端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例如，在家族内部的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做到亲兄弟，明算账，使产权清晰；在亲情和管理原则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把管理原则放在亲情之上；平等对待非家族员工，或给他们以相应的股权，消除他们对企业的疏远感，等等。

家族企业是与其产权单一相关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股权会多元化。股权分散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法人治理结构，家族管理也就不可能存在了。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这篇小文无力涉及。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9年11月

不当“流星”，也不要当“明星”

近年来，私有企业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今日是明星企业，过一两年就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明星成了流星。另一种说法是，私有企业大多是“开关厂”，今日开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关门了。开开关关，很不稳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生生死死是正常现象。只有长久的产品，没有永久的企业。汽车这种产品已经存在了100年，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当然，它在不断地改进)。但企业没有这样幸运，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每年都有相当大的比例被淘汰出局。《财富》杂志从1945年开始搞世界500强排名，回过头来看，在500强中，80%的企业维持3年，10%的企业维持8年，只有2%的企业维持40年以上。过去的500强今日不复存在的有相当大的比例。

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寿命是太短了一些。太短了就不正常了，我们要从失败的企业中总结教训，从失败中学习不败的经验。

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企业寿命不长呢？

一是投资失误。这是企业死亡的主要原因。现在处于经济体制和社会转轨时期，不确定因素太多，稍不谨慎就会投资失误，血本无归。现在又是买方市场，大多数行业都生产能力过剩，找不到投资方向，如果太急躁，勉强投资，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可能付之东流。

二是企业内讧。企业内部的合作者出现纠纷，或各奔东西，使资本分散，或陷入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企业内讧的根本原因是从一开始就产权不明晰，创业时共患难，以为关系好，不是“亲兄弟，明算账”，以后也

没有抓住机会明晰起来。企业做大了，矛盾就出现了。

三是很难渡过管理青春期。开业时是家庭企业或合伙企业，管理是作坊或家族式的。干了几年以后，企业发展了，业务广泛了，规模扩大了，管理幅度不够，需要把原来独揽的管理权力授予别人。这就有用人是否恰当的问题，有授权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时企业的组织机构也要变化。企业规模扩大以后，管理方式发生变化。新管理方式是不是合理，能不能平稳转换，是有风险的。这正如人的青春期一样，青春期是不稳定的时期，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期，是一个“坎”。人能不能成才，这个时期是个关键，企业能不能发展，这个时期也是个关键。

四是私有企业的财富地位高、而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低。财富地位和声望地位、权力地位错位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受欺负，四面八方向他伸手，企业成了大家都想吃的“唐僧肉”，企业被吃光分尽；或者收买权力，行贿(当今官员也是权力地位和财富地位错位，也有以权力换财富的意向)。二者都是死路。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真正决定成败的主要是企业的内因。我们不少私有企业基础太差，主营业(主产品)的基础不扎实、不深厚，没有持久的竞争力，一旦主营业的市场有了危机，又盲目跨行业经营，在不熟悉的行业找出路，投资就很容易失误。自身的阵脚没有稳住就四面出击，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现在有些企业搞“流寇式”的经营。没有根据地，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流寇式企业很难成大气候。

巨人集团主营业是计算机软件，属IT产业，靠的是史玉柱读研究生时开发的一个产品。软件行业更新很快，几个月就更新一次，巨人没有下力气(也可能是有心而无力)在软件行业(在它这个产品上)继续保持优势，在主营业没有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却全力进军陌生的医药行业和房地产行业。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株集团也只有一种主产品——三株口服液。严格说来，这种产品本身效果(使用价值)并没有可信的科学依据和可靠的实验基础，主要靠轰炸式的销售手段打开市场。一旦这种产品的信誉受到负面影响(一场官司，报

纸上发表一封用户批评信)，它的市场就雪崩式地垮台。

以商贸为主营业的南德公司，既没有自己的特色商品，又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谈不上在哪个行业有自己的市场份额，仅靠领导人的聪明和胆量搞几次特种商品的大额交易，赚一笔，是一笔。没有根基(牟其中从来没有想到建立根基)的大厦，一笔生意失误就足以土崩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根基不牢或没有根基的企业，没有稳住阵脚的企业，都是名噪一时的明星企业。这些明星企业很看重宣传，他们不时制造出种种轰动效应，使其知名度越来越高。他们把“打知名度”放在打基础之上，有的甚至提出“先打名气，后出产品”的经营思想。结果，出名快，消失也快。

有些企业错误地认为知名度就是无形资产，把出名放在重要位置。为了出名，他们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不看效果，大量投入广告(秦池酒厂，一个县办小厂竟花两三亿元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为了出名，他们紧跟潮流，不计企业得失，什么流行就干什么，以求得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一些企业不顾自己的能力搞兼并、跨省投资)。这样的明星，迟早要成为流星。

要不当流星，就不必急于当明星，首先要把阵脚稳住，在企业的长远发展上，下大力气做些基础工作。企业基础打好了，市场份额稳定地增长，在社会上有信誉，实力增强了，最后会实至而名归。这样的企业寿命就会长。

刊于《中国企业家》，2000年，第9期

中国私有企业的道德偏差

中国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解决城乡就业问题，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私有企业还是一个不明不暗的角色，人们对它还有种种猜测和疑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私有企业本身的道德偏差。

长期以来，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20世纪的实践已经给这种看法画上了一个沉重的问号。这一说法比较符合经济学逻辑：“凡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都是道德的，……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了商业社会，才造成了今天丰富的物质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有制不是万恶之源，而且是道德之神。”（茅于軾，1997）因此，我说道德偏差，而不说是道德缺陷，这些道德问题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偏差，而不是私有经济本身固有的缺陷。偏差是可以校正的。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是人们对某种行为的道德评价。然而，道德是历史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应当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呢？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必要的：

等价交换。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在道德上，我得到了多少，就必须付出多少；我付出了多少，就只能索取多少。索取过多和付出过少都是不道德的。巧取豪夺和等价交换不相容，和道德更是南辕北辙。

诚实守信。在市场交换中，一方的义务是另一方的权利；一方的权利

要靠另一方履行义务来实现。只有诚实守信，市场交换才能够进行下去。尔虞我诈是不道德的。

市场道德并不要求进入市场的人毫不利己，而是要求在利人的前提下利己，通过利人来实现利己，绝不能用损人的手段来达到利己的目的。以邻为壑是不道德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什么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换的，公共权力绝对不能当作商品来交换。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换领域，市场就失去了公正，平等交换就不复存在。这里涉及金钱的作用范围：在市场交换中不能说金钱万能有什么不对，而在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金钱万能就要受到谴责，因为它会使社会失衡，使政治腐败。

中国的私有企业正是在这些方面出现了道德偏差。当然，有这种道德偏差的不仅仅是私有企业，但在私有企业中表现得相当严重，会引起社会不满。它使私有企业上面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光辉。前些年，我一直写文章为压抑中的私有企业开路，今天，私有企业发展起来了，我不得不批评它的某些作为了。

财富积累中的道德偏移——权钱交易

私有企业是怎样发财的？从大量的个案调查中得知，大多数私有企业都经历了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他们的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也得益于个人的胆识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更得益于命运之神，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他们是极少的幸运儿。

中国工商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两次(1993年和1995年)抽样调查报告认为，绝大多数私有企业主财富来源主要是正当的经营收入。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开办时资金来源主要是自己的劳动积累和经营积累：

私有企业开办时资金来源(1995年调查) (%)

资金来源	继承家业	原来劳动积累	股票房地产收益	海外投资	亲友借款	向集体借款	银行贷款	信用社贷款	个人借款	其他	合计
主要来源	6.2	56.3	0.4	1.8	16.3	1.6	5.1	6.7	4.7	0.8	100.0
次要来源	3.0	20.0	1.3	1.8	36.9	3.5	8.8	11.3	12.3	0.9	100.0
第三来源	3.0	14.1	1.5	1.3	17.4	7.1	11.5	12.2	30.9	1.0	100.0
合计	12.2	90.6	3.2	4.9	70.0	12.2	25.2	30.2	47.9	2.7	
位次	6	1	9	8	2	6	5	4	3	10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年版)》第146页

1993年的调查结果与1995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不过,从上表中得知,有超过55.5%的企业开办时得到过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银行计划内的贷款利率比市场利率低得多,得到了银行的贷款,就得到了一笔意外收入。那时资金十分紧缺,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贷款的私有企业主一般是有较高层次社会关系的人(1993年调查时只有25%的企业得到过银行和信用社的支持,因为那时私有企业主来自干部的比重比1995年小)。有的私有企业借款长期不还,把银行的资产变成了私人财产。显然,能这样做的不会是势单力薄的小私有企业主。也就是说,获得银行贷款的手段不是很公正,这其中就有道德偏差。下表显示了得到过贷款的私有企业主的社会背景情况,其中,亲戚是干部的占63.7%,朋友是干部的占81.0%。

获得过贷款的私有企业主与其亲戚朋友不同地位背景分布 (%)

	城镇国有, 集体单位干部	农村干部	非国有集体 单位干部	工人	农民	其他
亲戚地位	41.7	3.1	18.9	9.1	20.1	7.1
朋友地位	52.8	1.8	26.4	5.2	3.6	10.3

资料来源:李路路:《私有企业背景与企业“成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私有企业不仅在开办时的资金来源上有道德偏差，在经营过程中也有道德偏差。从理论上说，私有企业主的收入可以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是指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报酬，这种经营管理是复杂劳动，其收入比简单劳动高得多。国家规定，私有企业主的工资可以在工人工资10倍以内确定。非劳动收入是凭借资产取得的收入，即通过资产得到的工人剩余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讲，这是剥削收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承认并保护这部分剥削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非劳动收入中还有一部分非法收入，如相当多的企业存在着偷漏税行为；还有一部分收入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可称为“灰色收入”。在审批经济的条件下，寻租是得到灰色收入的主要手段。而寻租就得和官员建立非正常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购销活动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

私有企业购销活动的主要方式 (%)

购销方式	纳入国家计划	正式交易市场	利用人际关系	利用互惠手段打通渠道
户数 (%)	2.1	39.4	26.8	31.7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年版)》第155页

这个表中的数据说明，正式市场交易所占比重较高，但不占主导地位，人际关系和互惠手段占58.5%。这中间存在着大量的权钱交易，也说明权力在配置资源中还起着相当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不规范的，为金钱和权力的交换留下了很大空间。

调查表明，政策和政府部门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刁难对私有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私有企业主对政策的关注程度胜过国有企业厂长。他们必须和政府官员保持联系，从而争取较早得到政策变动的信息。他们也要和政府官员建立较密切的关系，以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减少部门的刁难。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和私有企业主来往最多的朋友是机关干部，在私有企业主的关系网中干部是核心（见《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年版)》第160页）。

要和政府官员保持较好的关系，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在私有企业主的利润分配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这方面。

1994年私有企业利润分配结构 (%)

利润分配	再生产	公益金	公积金	摊派	捐赠	所有者权益	应酬	其他
%	68.3	3.8	5.3	1.9	2.5	7.7	5.5	1.8
位次	1	5	4	7	6	2	3	8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年版)》第152页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私有企业将68.3%的利润投入了再生产，占第二位的是所有者权益。令人吃惊的是，5.5%的利润用于应酬，占利润分配的第三位(1997年、1998年全国私营经济调查显示，应酬开支为8.6%，年平均4.3万元)，这说明私有企业要靠金钱去打通各种关系。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社会资本是私有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亲戚、朋友、同学等。一个人的社会网络辐射越广，层次越高，他的发展机会就越多，办事越容易，更容易得到所需要的资源。私有企业主营造和利用社会资本无可指摘，但必须有一个界限：不行贿，不用金钱收买权力。然而，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私有企业很容易走拉拢官员、官商合伙谋私这条发财的“捷径”。这是一条极具诱惑力的发财捷径，在私有企业中，行贿不是个别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对私有企业的抽样调查只是反映一些普通的私有企业的情况。而那些有权力背景的私有企业不可能列入、也不会接受调查。那些有权力背景的私有企业，主要是靠权力发财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类人称为“红顶商人”。在中国当今的私有企业主当中，从数量上看“红顶商人”是极少数，但他们掌握的财富数额巨大，社会影响巨大。

“红顶商人”是我从《胡雪岩全传》那里借用的一个说法。晚清的胡雪岩是借助官员手中的权力发财的，他和官员之间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胡雪岩是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规范的商品经济交媾的怪胎，是金钱和权力的

私生子。当代“红顶商人”是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交媾的怪胎，也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当代“红顶商人”大多是有权力背景的人，他们“下海”后还和官员保持密切的联系，靠官商勾结发财。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财富“让”给商人，商人再暗中将所得利益分一部分给官员。当代“红顶商人”既反对市场配置资源，又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前者使他失去寻租的物质基础，后者使他失去特权。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社会财富大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成了一些人聚敛财富的机会，成了产生一批新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机会。这笔正在或将要流动的财富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企业经营者手中，而且缺乏有力的监督。在过去吃“大锅饭”的时候，这些人是“掌勺者”。现在他们把“掌勺”的权力和市场手段结合起来，成为聚敛财富的一条捷径。

20年的改革过程中，“红顶商人”在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在双轨价格时期、在金融资本时期、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更高明。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道德偏差中产生的。

私有企业财富积累中的道德偏差主要是在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的经济基础这一断层的夹缝中出现的。也就是说，中国私有企业的道德偏差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

劳资关系中的道德偏差——过度剥削

私有企业的资产归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资本收入为主。根据马克思理论，资本收入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所有者占有剩余价值称为剥削。从另一个角度看，私有企业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就业者都是有好处的，企业主和雇工既有剥削关系，也有合作关系。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曾说过“剥削有功”，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的。现行的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程度的剥削是允许的，并且保护这种剥削收入。

我这里说的道德偏差是指雇主对工人的劳动没有实行等价交换原则，

从工人身上获取过多，付出过少，甚至于对工人进行残酷压榨。也就是说，雇主对工人有过度剥削。

最近几年报刊上揭露私有企业主残酷压榨员工的事件很多。全国工商联等单位三次对全国私有企业的调查，全国总工会几次对全国职工状况的调查，以及其他权威单位的调查，都反映了这个问题。

据 1995 年全国私有企业调查显示，雇工平均每天劳动 8.3 小时，在每天工作中平均有 30 分钟休息，工间有 60 分钟吃饭时间。39.4% 的雇工每周休息 1 天；14.7% 的雇工每月休息 2 天；7.3% 的雇工每月休息 3 天。还有的雇工农忙停工，平时无休假日。

私企雇工每日劳动时间

劳动时间 (小时)	<8	8	8-11	11-13	>13
雇工人数比例 (%)	9.3	72.2	11.1	6.5	0.9

资料来源：《中国私有经济年鉴(1996 年版)》第 171 页

私有企业雇工一般劳动条件较差。据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调查，雇工的工作条件远不如国有企业，劳动保护投资不足，生产设备简陋，工艺落后，防护设施缺乏。尤其是采矿业、纺织业、机械加工业、化工业等行业，工作环境更为恶劣，工伤事故经常发生。调查显示数据如下：

1. 场所。92.7% 的雇工有固定的工作场所，7.3% 的雇工无固定场所。
2. 高温。10.2% 的雇工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其中仅 12.7% 的工作场所所有降温设备。
3. 粉尘。15.3% 雇工受到粉尘伤害，其中仅 8.9% 工作场所有防尘设备。
4. 噪音。21.0% 雇工在强烈的噪音下工作，其中有防噪音设备的工作场所只占 4.0%。
5. 有毒气体。4.0% 的雇工在有毒气体的环境下工作，其中仅 4.8% 有防毒通风或隔离设备。
6. 其他危险。有 8.6% 的雇工反映工作场所存在危险，如机械伤害等（《中国私有经济年鉴(1996 年版)》第 172 页）。

私有企业雇工劳动保障比较差。以下各项占被调查者的比重为：

1. 工伤。当雇工发生工伤后，工资照发的占 30.6%，工资全部被扣除的占 6.5%，被扣除部分工资的占 62.9%。工伤的医疗费 2/3 的情况下由企业支付，9.8%的企业支付一部分，23.5%的要自己支付。

2. 疾病。雇工因病请假，37.1%的人工资照发，18.5%的人被扣除部分工资，31.5%的人工资全被扣除，另有 12.9%的雇工不了解这方面的规定。53.2%的雇工不能报销医药费，16.1%的人可以报销部分医药费，12.9%的人可以全部报销。有一些企业每月发 10—20 元的医药费，有病不补，节约归己。如果雇工患大病，需要数额较多的医药费，65.2%的人完全由自己负担。

3. 养老。由于雇工年轻，这个问题考虑不多。96.8%的企业对职工退休养老问题没有制订办法(《中国私有经济年鉴(1996 年版)》第 172 页)。

1997 年全国私有企业抽样调查显示，雇工的福利状况和两年前的调查改善不多，31.2%的企业里职工有医疗保险，平均每人每年 127.80 元；39.5%的企业为职工支付劳保费用，每人每年 134.22 元；12.5%的企业为职工交养老保险费，每人每年 115.84 元；18.7%的企业为职工投人身保险，每人每年 67.79 元。

广东省人大常委组织检查组披露，部分私有企业超时加班加点的情况严重，有的每月加班 60 到 80 小时，最多的超过 100 小时。雇工的社会保障很差，广东省全省私有企业只有 0.2%参加养老保险。一些私有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相当严重。1998 年上半年，全省各地累计拖欠工人工资 2.1 亿元。

典型调查中，发现企业主侵犯雇工人身权利的现象比较常见，如体罚、人身伤害、人格侮辱、性骚扰、限制行动自由等。

私有企业大多是雇用外来农民工。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方继顺等人在《佛山研究》上发表的《佛山个体私营经济中外来工现状》一文描述了外来工的状况：

受雇的外来工劳动时间长。从市区调查看，工作 10 小时的占 20%，工作 12 小时的占 60%，工作 14—16 小时的占 20%，普遍没有国家规定的公

假日。劳动所得少，福利待遇低。从调查中看，受雇外来工工资完全由业主决定。加工、制造业绝大部分实行计件工资，一般老板包一顿饭，月工资150-1000元左右。淡季有时一月才挣几十元。第三产业大部分采用计时工资，月工资200-600元。外来工的工资比当地人低三分之一以上，从事劳动强度大、脏臭的工种。有的业主还经常拖欠、克扣他们的工资，因此劳资纠纷时有发生，市区去年发生劳资纠纷142宗。有的业主采取预支应得工资70%，其余年底分红或合同期满时支付，实际占用工人的工资作自有资金。有的外来工中途跳槽不能取回押金；有的业主增加工作量不增加工资。个别业主甚至欺诈外来工，包吃包住不给工资。大多数外来工无劳动保险、无医疗保障，一旦出了工伤，有的业主一辞了之。……张槎镇某私营雨衣厂200平方米厂房仅有两扇窗、四把16寸吊扇，胶臭熏天。私有企业大部分是因陋就简建起或临时租用简易厂房，消防设施、防污染设施、防火设施都很差。外来工一般依赖雇主为其解决住宿，住宿条件很差。

当前，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处于买方市场。大量剩余劳动力等待就业，使得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国有企业有三四千万富余人员要逐步分离出来重新就业，城镇每年几千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还有农村数以亿计的富余劳动力成为市场上的低价竞争者。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力也是如此。此外，多数企业缺乏市场经济所必须规范的劳动制度，工人的利益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工人本身又缺乏组织，没有组织的工人很难对付有组织的企业。再加上雇工大多是外来农民工，得不到当地社区政府的保护，当地政府从地方财政出发，对侵犯外地民工利益的案件不认真查处，客观上助长了私企老板侵犯雇工权益的行为。从现在到今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很容易受到侵害。这是雇主对工人过度剥削的客观原因，也是社会转轨时期中国劳动问题的一个敏感点。

市场经济实行的是契约性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应当通过劳动合同来保证自身的权益。但是，当前劳动合同问题很多。据调查，雇工

中只有 36.3%的人在进入企业时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32%的人有过口头协议，其余的人既无文字合同，又无口头协议。而劳动合同也是内容简单、粗糙，很不规范。其中，只有 33.8%的合同中对发生工伤后的工资发放、医疗、抚恤作了规定。合同不完备，使雇工的权益不明确，一旦发生争议，雇工就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 年版）》第 172 页）1998 年 8 月，广东省人大常委组织检查组对广州、珠海、肇庆等 7 个市进行《劳动法》和《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执法检查，发现广州市私有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为 50%，肇庆为 5.6%，有的企业合同上没有职工本人签名。

由于雇主对工人的过度剥削，使劳动冲突频频发生。通常情况下，雇工采用破坏设备、怠工、毁坏原料和产品、泄露技术机密来发泄不满，深圳曾发生雇工纵火的事件。但是，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劳资冲突一般不采取激烈的对抗方式，或是企业主解雇工人，或是工人另找新的雇主。

工人利益得不到保证这一严酷的事实呼唤着工会的改革。现有的工会名义上是工人自己的组织，但却在企业党委领导下工作，还要执行政府的使命。工会的这种状况是以工人、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完全一致为前提的。在计划经济体制解体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人和企业是劳资双方，利益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政府和企业也脱了钩。工人、企业和政府已经由过去的“三合一”变成了三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企业的利益是利润最大化，工人的利益是工资和福利最大化，政府代表全局和长远利益，保持社会稳定，把劳资双方目标协调起来。工会过去那种“三合一”的地位到现在还没有变化，这使工会很尴尬。工会平时不能真正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发生劳资冲突时不能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一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来的“三合一”应当变为“三独立”，工会应当成为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工资（包括由企业承担的各种福利和保障）是工会、雇主、政府三方合力决定。出现劳资冲突时，政府可以在工会和出资者之间协调。但是，在不少私有企业里，不仅没有独立的工会，连传统的工会组织也没有。

商业活动中的道德偏差——欺诈

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言必信，行必果，交换双方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因此，商业信誉是市场交换能够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诚实守信，也是重要的道德准则。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些私有企业出现了道德偏差。

据统计，自1994年到1998年第三季度，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共处理消费者投诉、申诉争议26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7.8亿元。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共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5.7万起（《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1999》第295页）。显然，能够受到工商行政处理的仅是消费者受害事件中的极少数。现在，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造假售假成了公开的集体行动，商业欺诈肆无忌惮，商业骗子成团结伙，欠债不还已成常规……商业欺诈、信用失效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失信用、无信誉、轻道义的不良风气已经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当然，出现这种道德偏差的不仅是私有企业，但私有企业的情况比国有企业严重。

我相信这方面的情况每一个人都深有体会，这里不再多加论述。

信誉是商人的生命。那些搞假冒伪劣的人，那些欺骗贸易伙伴的人，不仅搞乱市场秩序，危害社会，而且是在拿自己的商业生命开玩笑。这些人只能得到一些蝇头小利，不会有更大的发展。因为成大气候的商人是讲信誉的人。针对私有企业的现实情况，1999年7月，33位私有企业家联名发表了《信誉宣言》，宣言向全社会郑重宣示：“我们要从自己做起，带头在经济活动中做到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他们倡导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都这样做。这是正义的呼声，是有远见的行为。

私有企业上述三个方面的道德偏差归结为一点，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以损害公众的利益或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即在财富积累中利用公共权

力侵占公众利益，在劳资关系中侵害劳动者的利益，在经营中侵害消费者或贸易伙伴的利益。以上道德偏差给私有企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人们对它有着种种怀疑和猜测。当谈起私有企业主时，人们议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是怎么发财的？现在，法律和政策都对私有企业作出了承认，而要在全社会的心理上对私有企业作出承认，还有待于上述道德偏差的校正。

校正道德偏差关键在完善制度。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断层，这个断层是各种社会污垢孳生的基础，是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尽快改变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已成为当今最为紧迫的问题。当前可以做到的是，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尽可能减少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让公共权力从市场中退出，真正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从根本上减少寻租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加快完善。新体制刚刚建立，漏洞和混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漏洞和混乱中存在着不正常的盈利机会，有不正常的盈利机会，必定有人利用。不正当的盈利机会是制度的缺陷所致。我们不要过分相信“人性善”，而要用“人性恶”的眼光中去修补制度的漏洞。完善的市场制度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在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不断的博弈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

我们讲制度重要的时候，并不主张制度万能。制度影响道德，但道德不是制度的附属物。道德作为意识形态，有其相对独立的地位。我们要注重制度建设，也要注重道德建设。在社会舆论中，在每一个企业里，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是与非，善与恶，公正与偏私，正义与邪恶应当泾渭分明。只有全社会高扬道德与正气，鞭挞邪恶与偏私，道德偏差才能校正。

刊于《开放导报》，2000年2月

改革回眸

<<<<<

特色，在历史合力的延长线上

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一台机器，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设计一幢房屋。但是，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设计一种社会。凡是主观设计社会，即使设计者千百次地批评别人空想，他自己也难免堕入空想的深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们并没有为社会主义设计出具体的模式。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具体模式，也不是人们主观意志所能设计出来的。

然而，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是在今天各种社会力量合力的延长线上。

为什么黄河在宁夏、内蒙地区形成奇特的河套？为什么长江在四川、湖北之间有鬼斧神工的三峡？这些地理特色是各种自然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社会特色也是由各种社会力量共同造成的。

过去常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创造历史的人民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他们必须

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这既定条件是他们行为的出发点，也是对他们行为的客观约束。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力的产物。”

要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分析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力量的方向和大小，研究这些力的合力对今天社会作用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整个社会形态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这是从总体上说的。实际上这一动力又具体表现为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文化传统力、习惯势力，还有来自国际上的作用力等等。它们在不停地对抗、叠加、交叉、互补、作用于今天的社会，形成一支合力，这支合力造就着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经济力量是决定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力量。当前能看出的经济力的方向是：中国是八亿人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今后，农业劳动力有一种相对减少的趋势。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业劳动从绝对人数上还占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将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上鲜明的印记。在城镇，企业将是经济舞台上的主角。过去30多年来对企业过多的束缚将解除。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企业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商品生产者的身份活跃于广阔市场之中。企业家的声音在社会生活中将有更大的影响。但是，企业的经营并不是在完全放任的市场下活动，国家还要运用经济杠杆、法律、行政手段来调控市场，市场再诱导企业的行为。我国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较低。今后生产力会有较快的发展，但从人均水平上看，也不可能大跨度地超越。

政治力是各种社会集团在政治较量中的力量。各种社会集团掌握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动员资源等)是不同的。谁掌握的社会资源多，谁在政治较量中的力量就强大。但这些社会资源不是凝固不动的，它

时时刻刻在流动，在重组。哪个社会集团能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能代表更多的民意，能顺应近百年造就的历史潮流，社会资源就向哪个集团聚集，政治力量的对比就会发生变化，政治力的合力方向也会发生变化。

文化传统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改革和开放会促进观念更新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将形成新的文化力量。但是，沉积最深的中华文化传统，将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刻上深刻的印记。

中国社会形态的形成不能脱离国际环境。过去，西方列强对我们的侵略和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一支推力和一支拉力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当今国际社会给中国以什么样的力量呢？中国已实行对外开放，国际经贸往来日益发展、日益自由，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这些都是塑造中国社会形态的重大力量。

以上所说仅仅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思想方法，并未涉及到“特色”本身的具体内容。但我以为，要了解“特色”的具体内容，就要研究上述各种社会力的规律和这些力相互作用的规律，并且找到它们的合力。

刊于《半月谈》，1987年第20期

篱笆、利益与体制

篱 笆

目前，不少地区筑起了“篱笆”，阻止外地商品入境。这种作法先从少数省市开始，后来相互效尤，不断蔓延。开始是简单的行政干预(例如，规定购买外地生产的汽车不准上牌照)，现在从价格、税收、信贷、物资供应等多方面使外地商品无法在本地销售。“篱笆”把本应统一的国内市场分割肢解。今天，一些国产商品却不能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自由流通了。

人们对这种情况十分忧虑。“篱笆”高筑至少带来以下危害：第一，阻碍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建立；第二，强化了行政干预，为深化企业改革设置了障碍；第三，使宏观调控更加困难，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目标难以实现；第四，阻碍了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合理分工，不利于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第五，保护了落后产品和落后企业，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

货畅其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分割、贸易封锁，恰恰与这一大趋势背道而驰。难怪有的同志说，如果任其发展，10年改革的成果将付诸东流。

利 益

市场分割、贸易封锁是地方利益驱使下的保护行为。

经济体制改革以前，财政统收统支，地方政府的利益观念淡薄。改革，使地方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出现了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自从1980年

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以来，地方政府开始对地方经济利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后来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外贸包干和信贷按地方“切块”等措施以后，地方政府的利益观念更加强烈了。在价格扭曲、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竞争条件不平等的情况下，地方利益的强化必然带来地方保护行为。近10年来，地方保护屡禁不绝，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三次高潮，每一次高潮都是以强大的利益冲动为背景的。

第一次是1980年至1982年间。那时刚实行财政“分灶吃饭”。由于加工业利润高、见效快，各地掀起了大办加工业的高潮。为了保护本地的加工业不受外地产品的冲击，有些地方限定本地企业只能在本地进行零部件配套和工艺协作。

第二次是1985年至1988年。由于加工业的膨胀超过了基础产业的承受能力，原材料成了重要制约因素。因原料不足，全国有1/3的加工能力闲置。有了原材料就有了产值，就有了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因此，“原料大战”此起彼伏，如“羊毛战”、“蚕茧大战”等。

自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是第三次地方保护行为的高潮。这次是在市场疲软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需求不足，各地经济增长缓慢，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一批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工人收入下降。只要有了市场，机器就可以开动，就有了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由于这次经济形势严峻，所以这一次保护行为比过去更加猛烈，范围更加广泛。需求不足，就阻止外地商品进入；资金不足，资金准进不准出；就业紧张，外来的劳动力领不到许可证就不能打工。

体 制

地方利益意识的觉醒不是一件坏事。利益多元化也是改革的必然结果。问题在于，如何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比较理想的总体效益？这得靠体制。

市场分割、贸易封锁的出现，固然有价格不合理、竞争条件不平等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即在新的利益格局下，没有相应的体

制来确定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像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又很大的国家，没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明确分权是很难组织好经济的。这是其一。另外，我国各级政府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政治权力的代表，又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各有自己的行为规律。不将这两种身份分开，也是难以组织好经济的。这是其二。只有将上述这两个方面一起来考虑，才能找到合理的体制。

在中央和地方分权中，不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哪些事由中央管，哪些事归地方管)和财权(哪些收入归中央，哪些收入归地方；哪些支出由中央承担，哪些支出地方承担)，就不能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几年改革，中央向地方下放了不少权力。在下放权力的时候，不将政府的双重身份分开，地方政府就会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保护地方利益。多年来，我们由于没有在这两方面下工夫，所以每一次下放权力都出现了混乱，形成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不良循环。

从财政角度来看，税收是以国家政治权力的名义征收的；利润是以资产所有者的名义收取的。按理说，只有税收才能够进入财政渠道。利润应该由国家资产管理部门集中起来，按照规律经营，作为盈利性投资的资金来源。只有“税利分流”才能够政企分开。实行税利分流以后，各级政府将从盈利性的企业活动中解脱出来，真正做好政府应该做的事。这样，地方政府就不会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既然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税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应当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税收：哪些税由中央收，哪些税由地方收，哪些税由中央和地方按确定的比例分享。这就是分税制。

当然，由于条件不具备，“分税制”和“税利分流”目还不可能立即实行。在新的体制确立之前，还得采取权宜之计，运用一些改良办法，来缓解区域经济混乱中的矛盾，减少损失。需要注意的是，在采取权宜之计、运用改良办法来缓解矛盾之时，要有战略眼光，要有改革意识，防止眼前的处置结果为将来的改革设置障碍。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0年6月24日。
《经济参考报》开展了“别了，葛巴铺”的讨论，这篇是这场讨论的总结性文。

<<<<<

艾哈德童话

童话是讲给孩子们听的。要让孩子们听得懂、爱听，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有理想色彩，不能过于实际；二是情节简单一些，不能枝节过多。

在我们的经济宣传中，也是常传播一些带有童话色彩的东西。最著名的要算艾哈德童话。

路德维希·艾哈德，德国人。二战以后，他主持联邦德国的经济工作，在战争废墟上重建了繁荣的经济大厦。人们称之为“艾哈德奇迹”。显然，这中间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可以吸取。当然，在总结这些经验时，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货币学派用八个字来概括这一经验：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我国有些经济学家也把这八个字当作中国价格改革的灵丹妙药。

这八个字中，管住货币是条件，放开价格是目的。作为市场经济，价格既有激励作用，又有传递信息的作用。价格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又影响供求关系。只有放开价格，才能够造就这一机制。在放开价格的过程中，为了防止价格暴涨，就要管住货币。没有钱，价格放开了也不会涨价。这是言之成理的逻辑，它很有说服力，很多人都被这个美妙的理论所征服。

说它是童话，一是它过于理想化，舍弃了艾哈德时代的很多实际情况。二是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艾哈德经验的实施条件。过去我对它也很相信，后来考察了俄罗斯的改革，又思考了我国近几年的改革，才知道“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脱离现实的童话。

第一，这种理论概括并不完全符合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过去很多出版物说艾哈德“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德国的情景”。实际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拿放开价格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前几年，经济学家杨培新教授就这个问题到联邦德国作过调查。实际情况是，1948年只放开了工业消费品价格，对食品仍实行配给制，到1951年才废止配给制。当时由于钢、煤、油、电紧缺，其价格并没有放开。到1956年煤、钢联营大量增产以后才放开。房租管制直到八十年代，每个家庭有一套住房后才废止。现在德国的食品价格仍由政府 and 欧共体共同补贴，对邮电、公共交通费用等，仍实行价格管制，并给以政府补贴。杨培新教授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由统制价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价格放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数十年时间。杨培新教授说的“数十年”可能长了些，但他说“有个过程”我是相信的。

第二，在放开价格时是很难管住货币的。也就是说，放开价格以后很难避免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就是“放开价格，管住货币”的实践。他们的确想管住货币（紧缩银根），但银根一紧，企业之间支付困难，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有的企业发不出工资。这时，要求政府扶持企业的呼声高涨，在各方面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放松银根。大批贷款进入了效益较低的企业，致使社会上货币流通量大增，物价飞涨。物价上涨以后，为保证社会安定，各项社会补贴增加，财政赤字也大量增加。为弥补赤字，又迫使银行发行货币。物价上涨，又不得不调整工资，这又要增加货币发行，造成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货币发行常常是自下而上的“倒逼”出来的。这种“倒逼”的力量十分强大，谁也阻挡不住。谁压住货币发行的闸门，谁就等于坐在火山口上。

第三，放开价格，谁来补偿价格差额？长期实行统制价格的国家积累了大量的隐蔽的通货膨胀。价格一旦放开，这些长期靠行政力量压抑的通货膨胀一定要释放出来，就会导致物价普遍上涨。长期积累的隐性通货膨胀是过去的欠账。这笔历史旧账总是要还的。也就是说，这个巨大的价格差额需要补偿。由谁来补偿呢？无非是三种方式：让富人补偿；让全社会所有的持币人来补偿；政府拿钱出来补偿；或者是以上三种方式的混合。联邦德国当年基本是靠有钱人来补偿的。当时实行货币改革，100元旧马

克只能在银行兑换6元新马克，另外96元充公了。这样，谁手上的旧马克多，谁就充公得多，越富损失越大；完全靠政府拿钱出来补偿的事例还没有。俄罗斯基本上是全社会所有的持币者补偿，也就是不剥夺富人，政府也不掏钱，就把价格放开，任其上涨。全社会所有的持币者都遭受损失。“通货膨胀是对持币者的剥夺”。当然，持币越多，被剥夺的就越多。我国采取的是逐步放开的方式。逐步放开物价实际是逐步消化这笔历史旧账。也就是说，放开一些，等老百姓收入增长了，再放开一些。使物价上涨的幅度总是低于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幅度。这种逐步消化的方式，实际是上述的混合补偿。

不解决对历史旧账的补偿问题，就不能保证价格放开过程中的社会稳定。“艾哈德童话”把这个重要的问题简化了。

第四，价格放开以后，一定能造就市场竞争机制吗？对这个问题，“艾哈德童话”也没有给予回答。要依靠价格机制来实现经济的自动调节，有一个前提，企业必须是真正的企业。只有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才有可能接受价格信号，才有可能根据这个信号来调整供给与需求。实际情况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并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价格放开了，不仅不能造就市场竞争机制，还会带来种种混乱。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连环套：是先有自由价格，还是先有自主企业？正确的答案是，哪一个也不能一步到位。而是二者交替地逐步前进。我们既不能在一天之内让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也不可能一天之内实现自由价格。

“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这一简单的概括，在课堂上向学生讲一讲经济学知识还可以，拿到实践中去指导改革恐怕是不行的。在理论上自圆其说容易，解决实际问题却要复杂得多。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4年11月30日

改革也有“鸡和蛋”的哲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说先有鸡，鸡又是蛋孵化出来的；说先有蛋，蛋又是鸡生下来的。

在改革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先搞政治改革还是先搞经济改革？说先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基础没有动，政治体制改革从何下手？说先搞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方面创造条件，经济体制改革怎能进行？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不活，市场就不可能完善；市场是企业的生存环境和活动舞台，市场不完善，企业也活不起来。是先有完善的市场还是先有灵活的企业？

企业效益好，才有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才有条件裁减企业的冗员，冗员不裁减，企业效益就不好，就没有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先裁冗员，还是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像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使人困惑，似乎改革不知从何处下手。

请不要为这些问题烦恼，还是让我们先回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问题吧！

根据进化论原理，家鸡是由野鸡进化而来的，野鸡也是由更低级的物种进化而来的。沿着这条进化链向远古追溯，它的远祖可能既不是鸡，也不是蛋，而是一种更低级的动物和它的胚胎。如果说先有蛋，这个“蛋”也不是今天家鸡的蛋；如果说先有“鸡”，这“鸡”也不是今天这样的鸡。用静止的观点来看进化，就会提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

明白了鸡和蛋的道理，对改革中类似的问题就会一目了然。

先有政治改革还是先有经济改革？我国的实践是先有初步的政治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等），然后进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之后，又推动政治改革。每一次政治改革行动都不能建成新的政治体制；每一次经济改革行动也不能建成新的经济体制。二者轮番推进，相互推动，逐步演化，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就会逐渐形成。

先有完善的市场还是先有灵活的企业？改革之初，市场是很不完善的。但是，企业不能等市场完善了再进入市场。企业一开始也不可能是很灵活的，但是，不能说没有灵活的企业就不去培育市场。市场是逐步发育的，企业是逐步搞活的。这也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只要我们创造条件，不断推动这种进化，到时候就会有灵活的企业和完善的市場。

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是由方方面面的多项改革组合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方面的改革以那一方面为条件，另一方面又制约着这一方面改革。不能等相关方面的改革完成了，才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也不能让某一项改革孤军深入，企图一次到位。而是在总体目标明确的基础上，各方面的改革轮番推进，你促我，我带你，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逐步进化，新体制才会建立起来，完善起来。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2年7月6日

两个 28 年之后

正视过去的历史才能够创造新历史

1976 年，毛泽东逝世以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摆脱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开辟新的航道。但是，1977 年 2 月，毛泽东的继承人却强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捆住了人们前进的手脚，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当时最为紧迫的历史课题。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两个凡是”，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但是，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的标准，那只能靠新的超级政治权威人物来做最高裁决。

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用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中国要前进，也必须打破用超级政治权威人物来裁决一切的体制。

聪明的中国政治家，用理论之杠，撬动政治之石。真理标准讨论就是一根巨大的理论杠杆。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社会实践不同于科学实验，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需要时间。它不能像自然科学的实践那样，短时间内就能够得出检验的结论。它需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才能看出分晓。所以，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就得抛弃各种陈规定见，勇敢地面对历史、正视历史。正是邓小平这一批改革者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对待新中国成立 28 年以来的实践，才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正视改革以前 28 年的历史，才能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历史。

用两个 28 年的历史看现状

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进行了 28 年。用两个 28 年的实践来检验一下改革以来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很必要的。

近几年来，在底层群众中、新闻媒体上、学术刊物和学术著作中，经常表现出对中国改革现状的批评和改革前景的忧虑。过去多年耳熟能详的马克思的某些论断又以新的语言、新的表达方式在耳边回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改革中出现了改革者当初没有预料到的一些问题有关。 these 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愈来愈严重，社会不公的问题突出。承担改革成本最多的社会群体(工人、农民)分享改革成果很少，承担改革成本小的群体(各级政府官员和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分享了过多的改革成果。当今，不管对改革持何种态度的人，都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人们的看法却是南辕北辙。因此就产生了关于改革的第三次争论。怎么使不同的看法接近一致？我们只能从实践中寻求共识。

现在，我们有了两个 28 年的实践：改革开放前 28 年和改革开放后的 28 年。如果我们冷静地、心平气和地回顾和对比两个 28 年的实践，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的数据证明两个 28 年实践的结果大不相同。前 28 年实践的结果是贫困，后 28 年实践的结果是富裕。28 年的改革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国力大大增强。虽然后 28 年贫富差距拉大，但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境遇都有所改善。

前 28 年贫困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根本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地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的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下，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

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他们没有个人的利益。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和贫困也就成为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民主就成了奢侈品。

20世纪人类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经济贫困和政治专制的制度根源，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被放弃。我们的两个28年的实践同样证明了这一结论。

第二，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也是正确的。

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走什么样的路？由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对市场经济的弊端的揭露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也是人们所公认的。因此很多人探索走第三条道路，即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道路。东欧国家有人探索“第三条道路”没有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理论界曾花几年时间进行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讨论，企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道路，也没有结果。近几年来，批评市场经济现实的人们，也没有指出一条既非计划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新路。看来，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除了走市场经济道路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世界上没有最优。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最优，而是较优。

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批评的市场经济已经有所不同，它保留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和一般特征，例如，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保持高效的竞争机制。因而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它还吸收了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兼顾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它已经克服了昔日市场经济那种“事后调节”和盲目性的缺陷；它不是昔日那种无政府主义经济，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同时不排除政府必要的干预，它兼顾公平和效率。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场经济效率高的一面，又努力使社会保持适度的平等。

第三，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的选择。今天回过头来虽然可以讨论，但如果否定这种路径选择，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对社会公平的考虑不够。

中国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但是，这种改革路径使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新旧并存的双轨制，因而造成了种种后患。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改革者们只能选择这样的路径。因为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一条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不是人们能任意选择的，用今天历史条件下的眼光来否定当时的选择不合适的。

用历史的智慧处理当前的难题

在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以后，两个 28 年的实践还提出了三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解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显露的、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果让市场经济规律自由运行，其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行为弥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中国的改革路径是用行政力量“制造”市场。市场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中国改革的特有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这是产生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

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

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会造成制度性社会不公正。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的危险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已经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面对资本奴役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在资本的主宰下，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实现自我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失业。最近几年，一批自诩为“知本家”的技术人员也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任何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者也是如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仅一般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由于大学加速扩招，大学毕业生也会供过于求。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防止过度消费压榨自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经济发展有三大动力：消费、投资、出口。这三个动力实际就是一个动力：消费。投资是未来的消费，出口是外国人的消费。鼓励消费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企业为扩大产品销售而鼓励消费，政府为扩大内需而鼓励消费，信用制度鼓励人们超前消费，市场经济督促人们加速消费，鼓励人们变着花样享乐。市场经济制度是一架加速消费的发动机，这架发动机没有制动器，没有限速器。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并不幸福，甚至和人性相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仅使资源日渐枯竭，还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规律相悖。市场经济造就的高消费生活方式能持久吗？难道我们不能摆脱市场力量的挟持，更理智地生活吗？

两个 28 年的实践，使我们对这三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由上述第一个问题提出了对公共权力必须加以制衡的问题。公共权力和私人资本的地下交易，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没有制衡，必然成为掌权者谋私的手段。由上述第二、第三个问题提出了必须驾驭资本。自 18 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对资本带来的罪恶有过深刻的批判，写出的文字汗牛充栋。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深刻的一家。这些揭露和批判的大部分是符合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资本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要驾驭它，让它为人类服务。但是，在 28 年的改革开放中，人们注意了利用资本，却忘记了它的另一面。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没有民主制度作保证的市场经济，必然是腐败的市场经济、权贵的市场经济。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加速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从这里引发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以前，邓小平讲了 76 次。最集中的还是 1980 年和 1986 年。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28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些论述是正确的。从两个 28 年的实践出发，现在应当是履行邓小平这些正确论述的时候了。

2006 年 10 月写，2007 年 1 月改定

集体世袭和不公平交易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有的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庇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这是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有机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现实发展和我的期待相反，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了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财富、声望都是社会能量。而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离权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能量越弱。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位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位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

“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易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作“权贵资本主义”。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他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

享权力之患。

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在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利用这种强势左右着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案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 1/3 用于公务，1/3 被官员家庭私用，1/3 被司机私用。所以，1996 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 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 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 500 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 6000 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 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 6104 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 716 亿元，国防费用为 1817 亿元。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 年政府硬性规定，到 1998 年 7 月 1 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 年以后，按每平方米 1480 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 6000 元左右）。2007 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 15000 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 4000 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司局级、副部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入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去世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权政治下，他们走不出这个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刊于《炎黄春秋》，2008 年第 6 期

谨防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中国的暴君

权 力

什么是权力？麦克斯·韦伯说：“权力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种共同活动中违反参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很多学者指出了权力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必需，另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威胁。为了防止权力对社会的威胁，使权力为善而不作恶，对权力需要有制衡。

国家权力是上述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通过国家机器和法律的强制、对资源的集中和配置、国家控制的舆论工具等多方面，使全体国民服从领导集团的意志。

国家权力如此强大，它可以取得社会上任何个人、任何团体无法做出的成绩，也可以制造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不可能犯下的巨大罪恶。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取消国家，马克思说“国家是祸害”。这是对国家可能犯下罪恶的恐惧。

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主张维护国家权力；我不是国家主义者，我强调限制和制衡国家权力。

在改革以前的中国，国家包揽一切，国家权力完全吞噬了社会。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有“国家”，没有“社会”。中国人享受了国家权力造就的“两弹一星”等巨大成就的光荣，也饱尝了因权力钳制社会生产力而造就的极端贫困，同时还遭受了国家权力制造的反右斗争、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种种人祸。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完全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了主要由市

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统管一切、包揽一切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社会活力得到了空前的迸发。这正是30年GDP年均增长9.8%的主要原因。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070万吨，倾全国之力大炼钢铁，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限制国家权力、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然而，直到今天，国家权力制造的行政垄断还广泛存在，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政府部门“设租”，企业“寻租”的现象还相当普遍。改革30年在经济上成就显著，但在权力制衡方面的制度创新却乏善可陈，有些方面还比20世纪90年代倒退了。例如，原来各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对省委还有一定的监督作用。90年代中期以后，由省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人大这么一点微弱的制衡都取消了。上行下效，各级的权力都缺乏制衡力量。这种情况从行政部门蔓延到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各单位的一把手有无限的权力，大事、小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

学者们用“威权政治”来描述这种政治体制。威权政治比毛泽东时代有进步，但和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资 本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个毛孔中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黑砖

窑事件、毒奶事件等种种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但是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即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用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阿瑟·奥肯在他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说：“我为市场欢呼，但我的欢呼不会多至两次。金钱尺度这个暴君限制了我的热情。一有机会，它会扫尽其他一切价值，把社会变成一架自动售货机。”他指出，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制度，使得金钱不能购买权利和权力。他认为“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但需要对市场加以约束。”

防止权力和资本成为危害社会的暴君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

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下，没有制衡的公共权力，是极为稀缺的垄断商品，它可以在市场上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这是腐败制度的原因。

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针对权力和资本的。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驾驭的资本。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

针对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今后的改革任务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改革目标是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转变为“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

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现代民主制度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今天，民主国家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得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时，应当吸收国外成功的经验。

加速民主进程需要政治改革。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社会矛盾会不断积累，最终可能发生爆炸式的突变。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执政集团要坚持民主政治的方向，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改革。民间力量的积极推进和执政集团的主动改革，二者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应当是下一步改革的动力模式。

刊于《中国改革》，2009年第1期



住房改革：永远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 100 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 1000 元房租，实际只付 50 元，这就等于得到了 950 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在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福利性分房制度消灭了房地产市场，国家又无力不断地建房，无力不断地配给。所以，几十年下来，住房条件越来越差、面积越来越小。以天津为例，建国初期人均住房面积 3.8 平方米，1972 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 3 平方米。在工人住宅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临时性小平房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条件之恶劣、环境之污秽难以言状。

1980 年代后期，就酝酿废止福利性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但这件事涉及原来住房面积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即官员的利益。经过反复的利益博弈，直到 1998 年，才下定决心，住房改革付诸实施。

1998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 23 号文件)规定，1998 年 7 月 30 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 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 6000 多元 1 平方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 1450 元，每平方米差价 4550 元。如果住 100 平方米，差价就是 45.5 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

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住宅商品化是在原有的公房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把原来隐藏在房租补贴中的那部分不平等货币化了，又在卖房的价差上加上了新的不平等。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而普通工人得到的则很少。农民根本没有这项收入。

有人说这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赎买，既得利益者得到了买房的差价，社会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官员享受的“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

然而，说“最后”，实在是太天真了。一次赎买没有完成，还得继续不停地赎买。

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想住房吗？拿钱来！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

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

我散步走进在达官营附近的“广源居”。这片住宅分东西两区，总计50多万平方米，有中心花园、地下车库等等完善的设施。我问：“这房子卖吗？”一位中年人回答：“这房子是分的，不是卖的！”我说：“1998年就停止分房了，现在是2008年，怎么还分房？”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用异样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反问：“谁说1998年就不让分房？”旁边的人介绍说他是“国管局”的领导。我说：“‘国发[1998]23号’文件说的。你是国管局的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他态度缓和了，说：“这房子不是分的，是卖给自己职工的。”我问：“卖多少钱一平方米？”他说：“这我就知道了。”没等我再问，他就走开了。经打听，这是新建的国务院公务员住宅，按4000元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卖给公务员。临近的房子市场价是18000元。我进一步了解得知，局级干部的标准是180平方米（1998年局级干部只有120~140平方米）。计算一下，一名局

级干部买一套 180 平方米的房子，可以得到 252 万元的差价！

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颁发的关于《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 号)第三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并按国家住宅建设标准(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建设的普通住宅。”这个文件的第四条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怎么认定？填报规定政府的申请表格，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住房情况，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居民委员会、街道、工作单位层层把关。

在马连道家乐福附近，有一片名为“中兴佳园”的住宅区。分南北两区，大约有近 60 万平方米。这是 2007 年建成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宿舍。有中心花园、假山、石径、游乐区、地下车库。建设标准超过了社会上的商品房。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子正在忙着搬家，我问：“这房子真好。多少钱一平方米？”她很自豪地回答：“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是中直机关分的！”我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住宅区也是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中直机关干部。

这些高档的“经济适用房”不仅大大低于商品房的价格，还有很多商品房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如：人民大会堂在马连道建有约 4 万平方米的两栋南北向板楼，每户 126 平方米，还有一个车库。这 126 平方米少算了很多公摊面积，若按商品房的公摊面积计算，则有 130 多平方米。车库不卖，但出租价每月只有 120 元，大大低于市场价。此外，还不收物业管理费和暖气费。在这两栋楼中还有多套部级干部住宅，每套 260 平方米(按商品房公摊面积计，则有近 350 平方米)，人民大会堂是个局级单位，没有部长，这些部长级的房子至今都空着。

除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以外，很多中央部委也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在北京六里桥西局的“丰益苑”小区，国家发改委建的一大片公务员宿舍即将竣工。连科技部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在西客站南建成了“首科花苑”C、D 两个小区，以“经济适用房”卖给职工，其他有钱的部委就更不在话下了。

和朋友们聊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其他地方，如新街口、广渠门、三里河、朝阳公园等周边环境较好的地段，也有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高级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官员？这应当是不难统计的数字。

我揭示这些情况，不是批评住这些房子的公务员们，而是指出改革政策不公正。

北京以外的地方怎么样？据我所知，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甚至采用行政划拨的办法圈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由政府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外地的情况比北京更为严重。

从住房改革中的问题我想到了政治学中“人性恶”的假设：任何人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因此，政治体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的机制。我们的制度恰恰缺乏这种机制，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在我们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手握制订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他改革何尝不是如此？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部门的利益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的不良倾向。

强势群体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必然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公正，加剧社会矛盾。这是中国改革最令人忧虑的事。

刊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不应当忘却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郑州的一个会议上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叫于向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7年毕业生，改革开放以后当上了德州纺织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国营大厂。他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说：“1994年，我们需要30万吨棉花，计划调拨量不到需要的十分之一，而我们又不能到市场上公开采购。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只好到黑市上去买棉花。一次河北沧州有40多吨棉花要出手，价值90万元。对方不要汇票，只要现金。夜里12点，我们一位副厂长带两个人扛两袋钞票乘吉普车到山东河北交界的一个大堤上交换。由于带这么多钱，又是深夜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所以特地带了两条枪以防不测。到了约好的交易地点一看，对方4辆满载棉花带拖挂车的大卡车一字儿排开。再一看，把我们吓了一跳：好家伙！他们来了10个人带了10条枪，在四辆卡车前一字儿排开。那场景就像电影里帮会交手一样，但确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1994年的中国大地上。”

他后来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文章，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97年第一期上。如果我说得不对，读者可以查这期杂志。为了便于今天读者理解，我需要交代一下他这个故事的背景。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政府为了防止“谷贱伤农”，总是用“保护价”收购主要农产品。当农业减产时，则提高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多次这样的循环，中国的粮棉价格超过了国际市场的水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市场上美国的棉纱比中国的棉花还要便宜。这使中国的棉花生产者和纺织工业十分困难，中国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大幅度下降。出于保护纺织工业的良好愿望，1994年，

国家对棉花实行“经营不放开，价格不放开，市场不放开”的“三不放开”政策。这种作法的意图，是想依靠行政力量把棉花统起来，用以保证国有企业。当时的国务院负责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这样做是为了五千万纺织工人的生存。结果怎么样呢？由于不让农民在市场上卖棉花，棉花都落到黑市上去了。国家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收上足够的棉花，也就不能保证供应国有企业。由于有了“三不放开”国有企业也找不到买棉花的市场，只好进入黑市。

于向阳的经历生动地证明，在改革开放多年以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行不通的。良好的愿望造成的结果是，既损害了棉农的利益，也损害了纺织工人的利益。

在棉花政策失败以后，又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粮食问题。于是又发生了粮食的故事。1998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粮食收购条例》。这个条例的出发点是：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国家每年能收购500万吨粮食；保证国家粮食系统500万职工的利益；防止农民卖粮的钱不被代扣各种税费，在收购农民的粮食时，要“户缴户结”。为此，《条例》明确规定，粮食收购只能通过国家的粮食系统，私人不得向农民收购粮食。粮食由中央定价，要求粮食部门“放开收购”，然后按市场价格“顺价销售”。国家财政给粮食部门以补贴，财政补贴的资金要“封闭运行”，不能挪作他用。概括起来就是“放开收购，户缴户结，顺价销售，封闭运行”。实际上，按国家定价收购的粮食，是很难按市场价“顺价销售”的。这中间的亏损，除了中央财政补贴以外，地方财政要承担很大的份额。所以，地方政府就不愿意收购了。不少地方还拿财政补贴收粮的钱盖了楼堂馆所，买了汽车。但是，地方政府又不愿意让中央知道他们不执行中央政策。明明粮库里没有装满收购的粮食，却向上报粮库全装满了。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到安徽某县看粮库，当地不得不抽调200多人和多辆卡车，连夜从几个仓库调运1031吨粮食供领导人参观。这种剥夺了农民卖粮自由的《粮食收购条例》自然行不通，新一届政府上任以后，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重新放开粮食市场，还农民以卖粮自由。然而，这一收一放，就损失了几千亿元。

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这两个故事说明，无论政府的出发点怎样良好，用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最后往往出现与出发点相反的效果。

为什么我重提两个故事呢？因为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过分迷信政府能力的思想还很有市场。在某些领域还在重复这样的故事，政府至今还越权管了一些市场本身能够做好的事情。在国际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政府万能的思想更是十分走红，批评经济自由的文章经常见诸报刊。有些人还认为中国的现状最好，不仅不需要改革，还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只要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市场有失效之时，有无能之处；都不会相信有不受政府干预的、纯粹自由的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主张搞市场经济的论著中，基本上都强调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都要起作用。有没有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呢？如果有的话，人数也会很少，对中国改革没有、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有些批评市场经济的学者不知道是不了解情况还是其他原因，经常指摘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主张自由放任”、“否定政府干预经济”，还说“新自由主义支配了中国的改革”。现在好了，美国政府也收购银行股份，出钱扶持企业。这些批评者好像一下子得了理：“还是我们说的对嘛！”甚至还有人认为，美国也搞国有化了，我们还需要改革吗？

的确，为了走出金融海啸的危机，各国政府都发挥了前些年很少见的积极作用。但这不是国有化，更不是仿效中国的道路。我们不要忘记，自“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像一个钟摆似的，左右摆动。一段时间，摆向经济自由主义一边，过一段时间，摆向凯恩斯主义一边。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起作用。凯恩斯政策实行多年以后，政府干预过了头，经济发展动力受到太多的伤害，就出现了滞胀。为了解决滞胀问题，倾向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起作用，就出现了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激发了社会活力，使经济走出了滞胀。但时间一长，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用过了头，就会出现混乱和无序，凯恩斯主义又起作用了。这本来是西方市场经济政策的一种自我调节，没有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谁对谁错、谁胜谁负问题。在发达国家，各种“主义”各

种“理论”像中药铺那个大药柜里的小抽屉一样。一味药一味药安放在每一个小抽屉里，不能说哪一味药好，哪一味药不好。各种药都有用。政府就是郎中，郎中根据病情的需要来配药。罗斯福配了凯恩斯这味药，里根配了倾向自由主义这味药，现在形势变了，奥巴马又换了配方。你怎么能说奥巴马用的是补药、里根用的是毒药呢？怎么就凭发达国家政府今天较多的干预经济，就说自由经济思想失败了呢？

政府干预经济是市场经济应有之义。但是，政府干预的着力点是放在那些市场无能和无效的地方，在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不应当越权干预。政府的干预是为保障市场竞争能够顺利地、公平地进行，保证市场主体能够正常经营，那些阻碍市场竞争、影响企业自主经营的政府干预是有害的。我们还必须指出，现在美国政府的干预是为了拯救企业，绝不是搞国有化，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绝不是搞社会主义。

刊于《中国改革》，2009年第8期

>>>>

技术应当如何引进

从1981年到1988年，我国花费162亿美元从国外引进了3324项技术。围绕技术引进，报刊上有种种论述。我就其中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题：进硬件还是进软件？

有些同志撰文批评引进机器设备(硬件)过多，引进纯技术(软件)太少。也有同志写文章不同意这种批评。“软”、“硬”之争有好几年了，其实，进“硬”还是进“软”与接受技术方面的生产力水平有关，脱离生产力水平的“软”、“硬”之争是得不出结论的。

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前，技术通常表现为工匠个人的技巧和心计，工匠是技术的唯一的载体。那时的技术转移是通过能工巧匠的流动和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授来实现的。机器大量出现以后，技术通常凝结在机器之中，这时，技术转移往往通过机器的转移来实现。进入20世纪，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人类掌握的知识更加系统化，技术的转移越来越表现为纯粹知识的转移。它通过图纸、资料作为载体，传播配方、参数、规范、工艺流程、设计思想、计算机程序等，通常称为“软件”的转移。

一般说来，上述三种技术转移方式反映技术发展的不同历史顺序。由于各地区技术发展不平衡，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往往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此，上述三种转移方式在不同地区同时并存；向先进地区的转移主要采用软件转移的方式，向技术水平较低地区的转移主要采用工匠转移和机器设备转移的方式。

总的说来，在技术引进中纯技术的比重越大越合算，但是，对落后地区来说，买来一箱外文图纸，还不如买一台机器更实用。因此，选择引进方式时，不宜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消化吸收能力低的地区可以引进一些成套设备，能制造大部分设备的地区和企业，只买进关键设备就行了，消化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和地区，可以买专利许可证或专有技术；水平更高一些的行业或地区可以买进国外属于试验阶段的技术，自己抢先开发投产。

由于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引进管理工作的改善，在技术引进中“硬件”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从1952年到1978年，“硬件”占技术引进合同数的97.7%，从1979年到1984年，“硬件”下降到50.5%，最近几年，“硬件”比重又有所下降。

二题：怎样看待重复引进？

我国最近10年的技术引进中，有相当多的重复引进。例如，彩电装配线就引进了100多条。这种现象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评。

但是，放眼看看国外，人家的重复引进并不比我们少，日本战后从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号经济大国，与其注重技术引进有重要关系。但是，这样一个技术引进如此成功的国家，重复引进却相当严重。1969年，一种技术平均有四家企业同时引进，其中电气行业5.3家企业同时引进一种技术，在引进技术的总数目中，过去没有引进过的新技术1965年占45.5%，1970年占26.3%，不仅引进技术之间重复，还和国内已经有的技术重复。日本国内已有的同类技术在引进的项目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在1966年到1970年间分别为44.2%、55.8%、68.5%、71.8%、68.8%。这

些技术在日本国内是完全能够解决的，用不着引进。

在商品经济中，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在市场竞争中就占有优势。企业竞争，千帆竞发，万马奔腾，同行业的各家企业都在争夺先进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由一家或几家企业先引进某项技术，然后逐步在国内推广，这是重复引进的根本原因。重复引进主要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同一项技术支付了多倍外汇；二是生产力布局不合理，一拥而上，使引进的生产力部分闲置。但是，重复引进也使众多的企业同时得到了先进技术，较快地提高了这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试想，我国如果只引进一条彩电生产线，我国彩电工业能够这么快地发展起来吗？因此，我们对重复引进也要进行分析。如果外汇实行国家集中管理，统收统支，重复引进会给外汇平衡带来困难。如果由引进地区或单位自己平衡外汇，他引进了技术，提高了创汇能力，多花的外汇自己能挣回来，这种重复引进就不可怕。

审批权限过分分散是重复引进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是根本原因。在权力下放前我国不是重复引进了十几套化肥设备吗？重复引进了根本原因是：市场对这项产品有这么大的容量，需要这么大的生产规模，而我们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速度又赶不上市场的需要。

如果重复引进造成生产能力闲置的情况出现在产品更新快、市场对生产影响大的企业，危害性就要小一些。因为这类企业引进了设备，钱赚够了，投资收回了，市场变化后可以再转产干别的。只要企业自负盈亏，重复一点也无关大局。

重复引进不能根除，但可以减少。减少的根本办法是提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速度，并且建立有效的体制，把吸收消化了的技术迅速转移到需要这种技术的企业。当然，加强对技术引进的宏观管理，也是减少重复引进的不可能缺少的方面。

三题：引进是为了将来不引进吗？

有的同志说：“现在引进是为了将来不引进，少引进。”

就某一项技术来说，今天引进了，经过消化吸收，明天就不必再引进同类技术了。就某一产品来说，过去依赖进口，引进了生产这种产品的技术，自己可以生产了，再不必进口这种产品了。从这两层意思来看，上面的说法是对的。

但是，如果从总体上说现在引进是为了将来不引进，那就不对了。

在今天，谁能够有效地利用最新技术成果，谁就能够取得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的优势。而取得新技术成果多快好省的方式就是技术引进。国外经验证明，从头摸索一项新技术，所花的费用比买国外已有的技术的花费要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更为重要的是，从头摸索需要漫长的时间，等你摸索出来了，更先进的技术已经问世。所以，在技术上走自给自足的路子，其结果是花大钱买落后。一条河上已经有了一座桥，只要交几块钱维护费就可以过河，有一个过路人不愿意花这几块钱，却花十万元专为自己又修了一座桥。技术上的自给自足就像这位过路人那样愚蠢。

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技术能够全都靠自己解决，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坚持技术上的自给自足。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不例外。

所以，一些发达国家，在向外输出技术的同时也大量引进技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输出国，但它技术进口也增长很快。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美国技术出口的收入增长了2.13倍，而技术进口的支出增长了2.21倍。联邦德国是世界上较大的技术出口国，可是，他们引进技术所耗的资金，从1980年到1983年平均为36.67亿马克，相当于1950年至1983年的年平均数的3.04倍。技术进步了，技术引进反而更多了，这是因为发达的经济对新技术需求量增加了。

今天我们需要引进技术。我们技术水平提高以后，引进技术的数量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0年2月14日

注：《科技日报》为此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员的“商榷”文章，引起争议。后该报用了半年时间、几十个版面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最后，支持作者这篇文章的占多数。

工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与阻力

技术进步，是工业发展的关键，几次工业革命都是以技术进步为中心内容。对一个国家来说，技术进步的加速，就意味着经济的起飞；技术进步的停滞，就是工业衰落的先兆。然而，技术进步的加速与停滞，决定于技术进步的**动力**。

稀缺的智力资源被大量浪费

改革和开放加强了我国技术进步的动力，使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从1981—1988年，我国花费162亿美元，从国外引进了3324项技术，工业企业又从国内技术市场买进了200多亿元的技术，这些技术绝大部分用于工业技术改造。仅在“七五”期间，我国完成的工业技术改造总规格就达4000亿美元，这使各行各业都有一大批企业改变了落后面貌，而且出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但是，总的说来，我国工业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的。

首先看工业设备。据统计，在所有的工业设备中，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只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

目前大量工业设备超期服役，带病运转。全国3000多万只棉纺锭中，将近1/3属于需要淘汰的设备；全国80多万台织布机中，超期服役的有25万台，印染行业超期服役的设备占60%。

最近几年，设备老化的情况有加重之势，在1985年工业普查中，大中型企业的设备，役龄小于15年的占77%，15年以上的占23%，而1989年

对 125 家大中型企业调查的结果是，役龄小于 15 年的下降到 55%，15 年以上的上升到 45%。

一些老工业基地设备老化的问题更为严重，据对“一五”时期建设的“156”项中的 75 家企业调查，役龄超过 30 年的设备占 31%。上海纺织行业 12 万多台设备中，有一半超过了使用年限，性能落后。

再看工业产品，我国目前生产的五万多种机械产品中，相当于 50 年代水平的占 16%，相当于 60 年代水平的占 62%，相当于 70—80 年代水平的占 22%，电子计算机中央处理器芯片的集成度(即 $6.2 \times 6.3 \text{ mm}^2$ 面积上的晶体管数)国际水平是 700 万个，已经开始进入大规模生产；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只有 1000 个，我国的科研水平达到了 110 万个，但无法实现工业化生产。国外生产的先进农药，每亩地施几克就解决问题，我国农药施用量还以公斤计，所以对环境的污染就比较严重。

我国产品不仅技术水平低，品种也很少。以农药为例，国际上经常生产的有 500 个品种，可以满足各种情况的需要，我国只能生产 150 个品种。

技术落后必须带来经济效益低下。每投入一元固定资产，发达国家可提供 3—5 元工业产值，我国只有 1.2 元产值(1988 年数)，仅为发达国家的 20%~40%；发达国家出口的纺织品，平均每吨纤维创汇 1 万美元，我国只能创汇 4750 美元(1988 年数)，仅为发达国家的 47%；我国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是日本的 6.1 倍。世界上先进国家机械工业钢材利用率在 80%以上，而我国最高水平的上海才 69%。

以上列举的一些情况说明，加速工业技术进步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但是，我国工业企业吸收新技术的要求不强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一种抵抗技术进步的力量。

目前，我国大量技术成果没人应用。我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只有 30%，70%的智慧之果被打入了冷宫。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技术市场是卖方市场；而在我国国内，技术市场都是买方市场。我国有些发明家的成果在国外展出时，外国厂商争相购买，而在国内却无人问津，由于对技术成果的需求不足，国内的技术成果很不值钱。

对技术成果的需求不足，使得大批科技人员无事可做，虚度年华。一

些从事技术开发的科研单位，有 1/3 的科技人员没有任务。据天津市一份资料介绍，在全市中年科技人员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只占 22%。企业对技术的需求不足，迫使大量科技人员从企业中流出。留在企业的科技人员，大部分也不从事技术开发工作。1988 年，有关部门统计，在 10738 家大中型企业中，有工程技术人员 158.5 万人，占职工人数的 5.9%，而直接从事技术开发的人员仅占职工人数的 3%，占工程技术人员总数的 23%，最近两年，从事技术开发的人员还在减少。

有人说，我国最严重的浪费是智力资源的浪费，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令人惊异的是，我国智力资源的浪费是在技术落后，智力奇缺的情况下发生的。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中的病态。

根本问题是动力不足

作为工业企业来说，技术进步的动力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超额利润的吸引力。第一个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制造出来的产品，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它的产品还是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的，这部分节约下来的劳动时间就转化为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吸引着企业不断采用新技术。

第二、市场竞争的鞭策力。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价格和质量的较量，其背后是技术水平高低的较量，谁不采用先进技术，谁的产品成本就高，质量就差。产品在竞争中失败，企业就可能破产。无情的竞争，鞭策着企业不断追求技术进步。

第三、行政组织的推动力。政府通过行政力量的督促，拨出相应资金，推动企业更新，组织技术攻关，在指令性计划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或在军事工业部门，这种行政推动力起主要作用。

第四、企业家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上述四种动力源中，前两种起决定性作用，是最根本的动力。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几种动力十分微弱，其原因是：

一、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掩盖或抵消了超额利润，削弱了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

首先由于比价不合理，在同样的条件下，企业付出同样的代价，所实现的利税差别悬殊。在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1988年投入每百元资金，所实现的利税是：煤炭开采业为1.6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为3.24元，石油加工业为56.85元，橡胶制品业为38.86元，化学工业为28.38元。其中最高是最低的35.53倍。

这样，有的企业只要开工生产，就可以凭价格优势取得利润，不必去追求进步带来的超额利润。处在价格优势的企业，不断通过扩大规模来吸取不合理价格带来的利润。这类企业的技术改造，大都是新建和扩建，技术改造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扩大规模，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技术更新。而处于价格劣势的产业，其产品的价格本来就低于价值，新技术的超额利润没有什么意义。何况他们苦不堪言，无法积累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只好让旧设备超期服役。

此外，由于某些生产要素定价过低，使得节约这类生产要素的新技术无法推广，例如，由于能源价格过低，采用新技术节约出来的能源价值，补偿不了采用这项新技术的投资。所以，一大批节能的专利技术无人实施。

二、企业缺乏竞争的压力。目前，企业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负盈不负亏，亏损到资不抵债也不能破产。企业搞得不好厂长可以易地做官，职工可以靠贷款发工资。最近两年搞企业兼并，实际是“吃大户”，让盈利企业背亏损企业的包袱。厂长无丢官之虑，职工无失业之忧，谁还去冒险去采用新技术？采用新技术要冒两种风险：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技术有可能失败，新产品推入市场可能滞销。只有采用新技术的风险小于因技术落后而带来的风险，企业才会采用新技术。目前，企业因技术落后带来的风险，小于采用新技术带来的风险，所以企业安于现状。

目前不仅缺乏正当的竞争，还有很多保护落后的因素。例如，区域经济封锁，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同样产品有相差很大的多种成本。某些成本

高出了平均水平 50%的产品，由于地区保护，也可以在本地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对这类企业来说，采用技术来降低成本就没有必要了。

三、政府的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削弱，无力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依靠市场力量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机制还没有形式，原来起作用的推动技术进步的行政力量已经大大削弱。现在，技术改造的资金来自财政拨款占的比重很小，而且越来越小，靠行政力量组织技术攻关，难度越来越大。

有些同志说，目前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主要靠厂长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厂长个人素质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就抓得好一些。但是，不是所有厂长的素质都很好，厂长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为实施一项新技术，他要逆流而上，克服重重的阻力。

技术进步的阻力重要

我国工业技术进步不仅动力不足，而且阻力重重。

阻力之一：企业负担过于沉重。

据中国工业经济协会 1990 年对 193 户国营企业调查结果，1989 年这 193 户企业纯收入(实现利税)的分配情况是：56.1%上交流转税；16.3%上交所得税和利润；10.2%归还贷款；5.7%上交“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3.5%用于支付补贴，债券、建筑税等，企业实际留利仅占纯收入的 8.2%。

这 193 户企业 1989 年人均留利的情况是：1000 元以上有 65 户，占 33.7%；600~1000 元的有 30 户，占 15.5%，不足 600 元的有 98 户，占 50.8%，其中 65 户(占总户数的 33.7%)不足 300 元，300 元仅够职工看两次病。

企业留下的这点钱扣除奖励基金，集体福利基金以后，剩下的才是生产发展基金，而用于技术进步的的钱只占生产发展基金的一小部分，因此，对多数企业，是无力向技术引进上投资的。

据有关部门调查，1989年，在1220个大中型企业中，技术开发经费仅占当年销售收入的1.44%，其中，新产品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到0.5%，而发达国家的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5%~10%。

阻力之二，不合理的折旧制度。

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基金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必不可少的资金。折旧基金维持简单再生产是通过设备重置的方式实现的。在设备重置过程中用先进设备代替落后设备，就可以实现技术进步。但是，由于折旧制度不合理，堵塞了这条技术进步的渠道。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提供的数字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折旧率太低。1988年，国营工业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为5.3%(按19年使用寿命计算)，其中机器设备折旧率为7.2%(按14年使用寿命计算)，折旧周期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长，这就延长了技术更新的周期。

有很多企业为了完成承包利润指标，常常少提折旧费或不提折旧费，使折旧周期进一步延长。据机电部对黑龙江、辽宁、江苏的131家重点骨干企业调查，从1987—1989年，每年都有16%~25%的企业少提折旧。

就这么一点折旧费还被大量挤占、挪用。在企业负担过重的情况下，企业为保财政上交和职工生活福利，一遇到资金紧缺，就在折旧基金上打主意。据推算，企业每年提取的折旧基金中，只有40%左右用于技术改造项目。

我国现行的折旧方法是按固定资产账面上的原值提取的，但是，由于物价上涨，固定资产的重置价格高于账面上的原值。如第二汽车制造厂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24.8亿元，如果按现价计算，达73.3亿元，即使按规定提足了折旧，还不够重置1/3个“二汽”。连固定资产的老本都保不住，哪里还谈得上技术进步？

阻力之三：财政包干、企业承包制、厂长任期制，使地方政府和企业考虑眼前多，考虑长远少。

对企业来说，生产是今天，进步是明天。一项重大技术改进不是一年就能完成的，也不是短期能见到效果的。武钢一米七轧机项目从作决定到见经济效益，花了十年时间。一位承包厂长眼前的利润压力很大，再加上

任期制，他很难把资金和人力投到他承包期满以后才能见效的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中去。就地方政府来说，有了财政包干任务，他们只允许企业利润增加，不允许企业利润减少。而重大的技术改造，必须打乱现有生产秩序，改变原有生产组织，占去一定的生产时间。这就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是和上级考核指标相违背的。

此外，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以后，经济效益提高了，上交指标也跟着提高，企业得到的好处不多。国家有关部门还一再强调，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后形成的固定资产，一律属全民所有，不承认“企业资产”的存在。这样一来，企业留利用来盖宿舍，发奖金，职工很快就得到实惠，一旦变成了固定资产，就成了国家的财产。

这些都使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成为企业技术进步的阻力。

阻力之四：银行贷款利率提高，挫伤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前几年在技改资中银行贷款占 30%—50%。现在占 70%，80%，甚至 90%。1988 年以来，两次调高利率，后又两次降低利率，升降相抵，还是比调整前高了三个百分点。就预算内国营企业来说，每年为此多支付 100 多亿元的利息。有的地方企业支付的利息超过了上缴利润。据河南省对 362 个企业调查，上交银行的利息从 1986 年的 12620.5 万元，上升到 1989 年的 73387.2 万元，相当于三年前的 5.81 倍。

阻力之五：强制性的就业安排，使企业劳动力大量过剩，技术进步后节约的劳动力无法安排。

据工业部门估计，目前一般超员 1/3。所以，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在我国很难采用。

希望在于深化改革

一项新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时，总是动力和阻力并存的，只有动力大

于阻力，新技术就被工业生产所吸纳；如果阻力大于动力，工业技术进步过程就停滞。

因此，要加速工业技术进步，必须从增加动力、减少阻力入手。达到这一目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企业内部建立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在企业外部创造推动技术进步的良好环境。然而，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只有深化改革才能造就。

内部机制的建立在于深化企业改革，外部环境最根本的是技术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就需要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这两个方面都与宏观调控有关，因此，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也是深化改革的关键。

关于企业改革，其目标是把企业从政府的怀抱中推向市场，让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一套好的改革办法。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以前，或在更好的办法还不具备实施条件以前，还得继续完善承包制。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最根本的是要克服承包所带来的短期行为。一是承包合同要适当延长；二是除了承包上交利税外，还要承包企业的技术进步。其指标是：或在承包期最后一年，在新增利税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应占多大比重；或承包期满之日，用多少先进设备代替了多少落后设备等等。然而，承包毕竟不是一种目标模式，应积极寻找更好的办法把企业改革向深层推进。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其目的就是形成竞争机制。用商品竞争带动技术竞争，用技术竞争推动技术进步。市场是运动场，企业是运动员，机会均等，效率第一，优胜劣汰。这也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要努力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和严密的竞争规则。合理价格体系是平等竞争条件之一，还有合理的税负和灵活的利率。当前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种要素市场，技术市场是要素市场之一。在其他要素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技术市场也发达不起来。但是，技术市场是智力市场，而智力是生产力中最富于创造性的因素，因此，技术市场在要素市场体系中有比较突出的能动性。所以，技术市场的推进可以适当加快一些。另外，技术市场也是一种标志：什么时候技术市场由买方转变为卖方市场，就说明我国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开始形成，技术进步的外部环境开始改善。

工业技术进步对宏观控制改革的要求是，保证供求总量大体平衡，防止经济出现大的震荡；实行政企分开，保证企业自主经营；建立保证良性竞争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竞争正常开展；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明确我国工业技术的主攻方向；制订鼓励技术进步的技术经济政策，加强工业发展后劲，等等。

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希望在于改革。

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2期

<<<<<

一个“主意”值多少钱？

“主意”还能卖钱？读者可能以为我这个题目有点荒唐。的确，并不是所有的“主意”都是卖钱的。不过，能够创造经济效益的好“主意”，确实能卖大钱。外国人很早就知道“主意”(idea)值钱，卖“主意”的交易在国外已经风行多年了。

据报载：一个日本商人专门从苏联报刊上搜集苏联科学家的好主意，把它“贩卖”给企业，他从事这种活动 20 多年，成为拥有 3500 万美元的富翁。

一个主意值多少钱呢？这里不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1923 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台发电机出了毛病，自己花了很大力量没有修好。他们请当时在通用汽车公司任职的德国科学家史坦敏茨帮忙。这位科学家在电机旁分析了很久，最后在电机的某个部位画了一条线，并且说：“请打开电机，把画线处的线圈减少十六圈就行了。”按照他的主意行事，电机果然正常运转了。

事后，史坦敏茨索取了一万美元的酬金，他还风趣地在账单上写着：“用粉笔画一条线值一美元，知道画在什么地方值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这位科学家把劳务费(画线的酬金)和“主意费”(确定部位的酬金)分得很清楚，“主意费”比劳务费高出九千九百九十多倍！

“主意”是知识的产物，是智慧的结晶。但是，“主意”仅是一种设想，一种思路，一种科学原理。现代工业比史坦敏茨时代复杂很多，好“主意”必须转化为成熟的技术能够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得到应用。然而，

把“主意”变成一项成熟的技术，中间还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应用研究和中间试验。这正是我国最薄弱的环节。

“主意”值钱，说明社会真正尊重知识。“主意”越值钱，科学技术就越发达。相反，正如“谷贱伤农”一样，“主意”不值钱，也会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只有技术成果值钱。多年来，我国的技术成果不值钱，谁都可以无偿使用。结果还是80%~90%没人使用，成为礼品、展品、样品。进入八十年代，我国实行有偿技术转让，情况开始有了变化。但技术成果还不怎么值钱，“卖一项成果不如唱一支歌”。

能不能用行政力量提高技术成果的价格呢？不能。技术成果的价值由它应用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决定，而它的价格则决定于需求情况。成果再好，采用的人少，买主不多，就卖不出好价钱来。当前我国技术市场上突出的困难是对技术需求不足。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技术市场是卖方市场，而在我国国内，技术市场却是买方市场。我国有些发明家的成果在国外展出时，外国厂商争相购买，而在国内却无人问津。

工厂为什么不那么急切地需要技术？难道厂长们不懂得产品竞争实质是技术竞争吗？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目前企业间还没有真正开展优胜劣汰的竞争。厂长无丢“官”之虑，职工无失业之忧，谁还愿意冒风险采用新技术？另外，企业负担过重，设备折旧率过低，使得企业也没有力量进行技术改造。再加上管理体制上一些问题没有理顺，使企业的行为短期化，也阻碍了技术进步。这样，我的文章又不得不回到当前的一个热门的话题上来：搞活企业，把企业推向市场。也就是说，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它才真正需要技术，技术进步才快。这时，技术才值钱，“主意”才值钱。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0年10月16日“五方杂论”专栏

高技术未必高效益

在报刊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个等式：高技术 = 高效益。在实际工作中，却看到与此相反的现象：高技术，低效益。

某鼓风机厂投入了大量资金采用新技术，不仅没有提高经济效益，反而造成企业亏损。某机床厂提高了产品的技术水平，生产出高档机床，结果产品大量积压。一个科技改革试点城市，其高技术产品的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

高技术为什么产生低效益？我们可以作出种种技术性回答。如，技术选择不合理；经济技术论证不充分；技术改造周期太长；等等。这些回答是正确的。不过，在这些正确的答案的背后，有一个深层次答案：技术第一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在企业经营中，把追求技术水平，作为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

技术第一有什么不对？技术第一把市场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如果不考虑市场，盲目追求技术水平，失误的可能性就很大。

近几年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经济竞争就是技术竞争。企业是否成功，决定于技术水平高低。这种看法不能说不不对，但是，现实并不是完全如此。

广东省南海市有一个西樵镇，这里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布匹市场。一年的布匹流通量达3亿米以上。八十年代，这里用的都是铁木织布机，都是家庭式的织布作坊。有点类似“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情景。正是这成千上万的花木兰式的布机，向大城市的现代技术挑战。在大城市的纺织工业大面积亏损、大批纺织厂不得不转产的时候，西樵市场还有丰厚的

利润，并且得到快速发展。为什么呢？因为西樵市场在机制上比大城市的纺织工业要优越。它能够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变化。例如，他们每天都要推出市场欢迎的新品种。一个品种最多只生产十天。从这里可以看到机制比技术更重要。这种机制使企业有强大的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动力。它驱使企业不断地更新技术和改革生产方式。在不到10年时间内，西樵市场的织布机更新了好几次。每一次技术更新都是经过精打细算之后进行的，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这期间家庭式作坊也变成了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组织。推动西樵市场发展的就是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就是利益机制，就是竞争机制。它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新技术是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武器。但是，没有市场机制，技术就要停滞。没有创新机制的企业是不愿意采用新技术的。我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只有30%，70%的智慧之果被迫打入了冷宫；我国有些发明在国外展出时，外国厂商争相抢购，拿回国内就无人问津，原因盖出于此。对缺乏创新动力的企业，用行政手段强行注入新技术，不仅不能产生应有的效益，反而会造成浪费。

在企业经营中，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当然是市场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律高于技术规律。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技术也有能动作用。新技术可以创造市场，一项重大新技术的出现可以从根本上刷新市场。蒸汽机的出现，电力的应用，都使市场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促进这些新技术的出现、推广应用的动力还是市场的力量。

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能忘记中间还有一个重环节：市场环节。没有市场力量的催生，新技术不能产生；没有市场力量的转化，新技术不能变成现实生产力。

说科技兴市，不能忘记一个重要条件：科技只有产业化了才能兴市。没有产业化的技术成果只是展品、样品、礼品，它不仅不能兴市，反而会造成浪费。要让技术成果产业化，这又是一个市场问题。

我们的企业领导人相当多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他们懂技术，这是优

势。如果他们懂市场，那就优势加优势。如果他们不懂市场，那他还是一位工程师，不是企业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追求技术水平如何高；后者追求资本增值。企业家也重视技术，但他眼中的技术是生产要素，是经营资本，是竞争手段。

还要说明的是，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最好不要混在一起使用。尽管科学发现可以转化为技术成果，而且近年来转化周期日益缩短。但是，科学和技术二者有着不同的功能，二者有着不同的运行机制。科学是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是回答“怎么做”、“怎么用”的问题。科学重在认识功能，技术重在应用功能。科学研究不能完全纳入市场轨道，不能按市场机制运行。而技术是生产要素，应受市场规律支配。我上面说的这些话只限于技术，不包括科学，只限于企业经营，不包括科学研究。

写于1995年4月

不能把知识都装进经济这个“篮子”

知识经济的提出，表明经济发展更加依赖知识，但绝不表明，可以用完全经济的眼光来看待知识。尽管我们要从发展教育和知识创新体系来构筑发展经济的基础，但并不能把全部知识都装进经济“篮子”里，更不应该完全用经济标准来衡量知识。

所谓知识，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属于认识范畴。所谓科学，就是被严格的观察和实验证明了的知识。而技术和科学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偏重于认识，技术偏重于实践。科学着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能不能”，技术着重于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知识不一定都能被证明为科学，科学之花也不一定全都能结出技术发明之果。一些基础研究成果，一些重大发现，代表人类这个群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千万不能把它们都装进经济这个“篮子”里面。在知识、科学、技术这三者之中，只有技术可以和经济发生直接关系。当然，进入 20 世纪末期，科学成果转化为技术发明的周期越来越短，在有些情况下，科学和技术的界限有时难以分清。

但是，如果把科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于经济上的应用，那未免过于狭隘，也会阻碍科学的发展。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用货币衡量它们的价值吗？1964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C.Hy·唐斯说过：“如果仅仅从对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观点来看科学，那就像只凭票房收入来证明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一样荒诞。”如果说，技术上的发明是通过有控制的传播来维护发明者的利益的话，那么，科学知识则需要无限地传播来提高人类的素质。科学发现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如果把它当作商品，只供有支付能力的人享用，这就把多数人打入了无知的黑暗之中。

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能把国家建成经济社会。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有经济头脑，但绝不是把“社会人”都变成“经济人”。我们讲“科教兴国”，但“兴国”不仅仅是振兴经济，不是把科学和教育全都纳入经济领域。

发展经济必须大力提高教育水平，但发展教育不完全是为了经济，更不能完全用经济眼光来构建教育制度、制定教育方针。教育是为了开发民智、促进民识，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通过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来传播知识应当是无偿的。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也有受教育的权利。把一切知识都当作商品，义务教育就没有存在的空间。

构建知识创新体系就是构建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在构建知识创新体系时，也不能全然用经济头脑来思考。不能对每一个科研课题，对每一项基础研究成果都要问一问“它能带来多大效益？”科学发展有科学的规律，经济发展有经济的规律。不能用经济发展的规律来代替科学发展的规律。如果在基础研究中，完全用经济眼光来确定选题，有可能扼杀科学。1831年，法拉第揭示了电磁相互转化的规律，发现了感应电流，英国首相看了实验问他：“这有什么用处？”法拉第回答：“一个初生婴儿能有什么用处呢！”然而，35年以后，就出现了实用发电机——西门子发电机。

技术是最接近产业的。但是，能够作为“资本”进入产业界的也不是全部技术，而只是能够作为商品的那一部分技术。为了和实物商品相区别，我曾在我的《技术贸易学》(杨继绳著，新华出版社，北京，1991年5月)这本书中，把能够作为商品进行买卖的技术成果称为“技术商品”。

所谓技术商品就是能够成熟地应用、并能为应用者创造财富的技术成果。不能为应用者创造财富的技术，就不能成为技术商品；技术商品必须是独占性技术。已经公开了的技术成果、已经普及了的技术也不能成为技术商品。

因此，从宏观上我们可以谈论知识对经济的作用，谈论构建知识创新体系来发展经济，但在产业领域，在谈论“技术资本”时，就只能用“技术商品”这个概念了。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8年7月6日

反一下知识经济的潮流

知识经济的舆论已有两年多了，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传播了很多新知识、新观念。有些基本观点我是同意的：第一，新知识已成为重要的资源，在未来的经济中，知识将起决定性作用；第二，教育和知识创新体系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第三，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结构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对报刊上发表的有些看法，我觉得需要商榷。

物质经济能向知识经济转化吗？

有的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产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还把这一“转变”提到“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经济革命”的高度。果真如此吗？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只有首先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以后，才能从事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活动。不可否认，未来在知识经济的诸多生产要素中，知识要素的重要性将超过物质要素；但是，也必须承认，任何时候不能否定物质要素。生产活动离不开知识，更离不开物质。物质生产需要知识，知识生产也需要物质基础。知识要凝结和物化在生产资料中，凝结在物化产品中。生产活动中的知识和物质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用一个方面来替代另一方面。说生产过程中新知识投入可以节约原料，从而减少物质要素的投入，那是对的。但是，知识投入不能完全替代物质投入；说在产品的价值量中，知识的价值已经或者将要超过物质的价值，这也是对的。但是，即使是纯知识产品也离不开

物质载体，一般产品更离不开物质。衣食住行是人类一刻也不能缺少的，物质经济转变到知识经济以后，人类难道成了不食烟火的神仙？

一位作者著文称，按照发展过程与分布层次划分，人类历史存在三种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其意思是，从层次上看，后一种经济形态高于前一种经济形态；从历史过程上看，后一种经济形态将更替前一种经济形态。这一看法也需要商榷。“自然经济”是相对于“商品经济”的概念，怎么能和“工业经济”并列？该文作者又认为“自然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以后，“工业经济”并没有取代“农业经济”，凭什么断定“知识经济”一定会取代“工业经济”？

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人称农业社会。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人称工业社会。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人称信息社会。正如农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业经济不能取代农业经济一样；进入信息社会以后，信息经济也不能取代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能由分离走向结合吗？

有人著文认为，传统工业经济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异化，生产资料统治劳动者。在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劳动者的知识。知识和劳动者本身结合在一起了。生产资料统治劳动者的现象有可能由此发生改变，异化现象可以消失。

这又是一个需要商榷的观点。

在纯知识生产中，即科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和其“生产资料”能否合二为一呢？纯知识生产中的劳动者是知识分子，他们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但是，他们的劳动不是脱离客观环境的封闭思维活动，他们需要身外的条件。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说过：“图书情报和仪器装备是科学研究的两只翅膀”。这“两只翅膀”实际是科研工作者的生产资料，它是和科研工作者分离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识生产的生产资料，并没有和劳动者

结合在一起。科学技术越发达，科研所需要的技术装备越复杂，越昂贵。现代实验设备是个人技能望尘莫及的。它可以在实验室里呼风唤雨，再现大自然的闪电雷鸣和种种自然奇观(如相似模拟设备)；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出成千上万道联立方程；它可以把几万年的演化过程，在短时间内重演出来；它可以制造出在自然状态下不能存在的化学元素……知识经济不是手工业经济，手工业的匠人的技能和身体是不可分的。而现代科学研究，如果没有仪器装备，科研人员很难有所作为。而仪器装备投资之大，个别劳动者只能望洋兴叹。在技术密集的物质生产中，离开了昂贵的生产设备、仪器和计算机软件，劳动者更是无所作为。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其说是劳动者对仪器装备的依赖，不如说是对资本的依赖。

知识经济可以改变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吗？

“知识经济改变了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这也是近两年报刊上常见的、会议上常听到的看法。

为了便于非经济专业的读者理解，我不得不重复一下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当其他投入要素的量保持不变时，如果一种投入要素不断地等量增加，那么，在超过某一点之后，由此产出的产品的增量会越来越小。

例如，假定一块耕地面积保持不变，在耕作技术不变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变的情况下，第一年投入 10 个劳动力，得到了 10000 斤粮食，第二年再增加 10 个劳动力，粮食总产量 21000 斤。也就是说，第二次增加的 10 个劳动力的收益增量为 11000 斤，第三年再增加 10 个劳动力，总产量 33000 斤。也就是说，第三次增加的 10 个劳动力的收益增量还是 11000 斤。但是，第四年再增加 10 个劳动力，收益增量只有 8000 斤(总产量 41000 斤)，第五年再增加 10 个劳动力，收益增量只有 5000 斤(总产量为 46000 斤)。以后再增加同等数量的劳动力，其收益增量还会继续下降。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

这里说的“某一点”就是临界点(上例中的第四年)。有的宣传知识经济的作者认为,有了新知识投入以后,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的产品总是增加的,即使超过了临界点,也不会越来越小。他们的意思是,在上例中的第四年,由于改良了作物品种,再增加10个劳动力,总产量可以达到52000斤,新增10个人的收益增量11000斤,边际收益没有减少。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知识经济改变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这是不对的。

经济科学规律总是以某些假设为前提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有四个假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假设,就是“技术保持不变”。这就是说,这个规律只能应用于在同一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过程。改良了作物品种,也就是改变了技术条件,这个规律的前提不存在了,也就不能谈论这个规律了。

在工业生产中,所谓新知识的投入无非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产品设计,改变生产工艺,用新材料替代旧材料,改变管理方式。这些改变都会节省原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如果是因为这些改变使得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没有递减,那就不能说改变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因为上述改变以后,技术条件也全变了,也就不能谈论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了。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8年7月7日

“知识”要怎样进入“经济”

知识有一个基本特征，这就是共享性。一个化学配方，成千上万个化工厂可以用它同时生产同一产品。一种计算机软件，可以拷出成千上万张软盘，成千上万人可以同时使用。一张设计图纸，可以复印很多张，很多厂家可以同时用它制造出同样的机器……共享性是由知识的可传播性决定的。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共享性使得知识以指数规律无限扩散而不能回收，发明者(即知识生产者)就会失去利益。

从社会利益来讲，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更多的人掌握最新的先进技术，让全社会共享发明之惠。先进技术推广得越快，社会生产力发展得越快。然而，不顾发明者的利益，不加限制地推广，就会挫伤发明者的积极性，从而伤害了社会创造力，也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知识经济来说，创造力的挫伤，就是对经济生命力的挫伤。

这一对令人棘手的矛盾是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解决的。

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权。这种权利只能是权利人自己利用或经权利人准许他人利用。所谓准许，就是向权利人付费以买得他的许可。不经准许而利用就是侵权行为。知识产权的目的在于，既保护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又可以使知识广为传播。当然，这种保护是有时间界限和地域界限的。

以专利制度为例。专利制度实际是发明者和社会达成一种契约关系：发明者尽可能无保留地向社会公布自己的发明，社会(国家作为代表)通过法律手段给发明者一段时间的独占权——专利权。专利权受法律保护。在保护期内，谁使用这项技术，谁就得向发明者付费。那些不向大范围公开

的技术窍门(know-how)，在转让时，技术转让合同中有保密条款，买方只能使用，不能传播。

这就是说，知识必须通过法律渠道进入经济(严格说是进入流通)。这里说的法律是指有关知识产权的各种法律。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这种垄断权不仅表现为发明者在保护期内可以得到经济回报，更为重要的是，某家企业只要控制有某项新技术的垄断权，就可以通过技术垄断实现其产品的市场垄断，从而在新技术寿命有效期内，其产品可以独占市场。而这种对市场的独占是合法的，是任何形式的反垄断法都不能干预的。因此，技术不断创新可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对于知识的垄断权这一重要现象，有些人相当无知。且不说各种盗版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最近有的报纸还发表文章称：“目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条约，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新的贸易攻势中最强有力的武器。”“围绕知识产权的垄断与反垄断，或许会形成 21 世纪世界经济的主旋律。”

这一说法既违反知识的传播规律，也违反了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一贯态度。1980 年，我国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公约》，1985 年又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在这以后，我国还加入了其他一些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公约。我国还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签字国。在实践中，我们严格履行这些国际承诺。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8 年 7 月 6 日

让发明家暴富

这里说的暴富是指某人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大量财富。在通常情况下，暴富是一种不被人们接受的现象。“暴发户”通常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有一个领域，暴富不仅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而且暴富者备受尊敬。这个领域就是技术发明领域。

瓦特，英国发明家。他因发明了高效率的蒸汽机而成为当时英国的巨富。

诺贝尔，瑞典化学家。他因发明黄色炸药而拥有巨大的财产。他在全世界都有炸药制造业的股权，还拥有俄国巴库油田的股权。

比尔·盖茨是当代的一个暴富典型。他依靠计算机软件，几年间拥有400亿美元的财产，成为当代世界首富。其财富增长之快，连大金融家、大债券商也望尘莫及。

发明家暴富之所以被社会理解，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财产来源正大光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很大。

发明家的发明给社会创造了无可计量的巨大财富，促进了社会文明，社会给他们一部分应有的回报，这一部分回报和他对社会的贡献相比是很小的，但绝对数额十分巨大，所以他们很快暴富起来。

这样暴富的发明家越多，社会进步越快。

个人的消费是有限的。发明家得到巨额财富后，还是贡献给社会。诺贝尔很慷慨地向各种慈善事业和科学事业捐款。他把大部分财产交给了社会，成立了科学最高奖金——诺贝尔奖金。比尔·盖茨已就他的财产写好遗书：1000万给女儿，妻子按法律分走一部分，其余全都献给社会。

不怕发明家暴富的社会，才是有希望的社会。有了让发明家暴富的社会机制，发明家才会涌现出来。

我们已经有了专利制度，也有《技术合同法》，有了给技术创新者回报的法律基础，但还缺乏舆论环境和其他社会环境。最关键的是发明者的知识产权不很明确。这个问题在民营科技企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民营科技企业的成员都是自愿组合的，在草创时期都能齐心协力，同甘共苦。但是，当企业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可观的盈利以后，内部就容易出现分裂的因素。人们说民营科技企业高度集中的中关村“三个月一小震，半年一大震”，就是指这些企业因“裂变”而造成的震荡。

“裂变”现象的背后是产权问题。即没有通过法律手段明确每位成员对企业财产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分出并拿走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是最放心的办法。可以想象，“裂变”会使企业大伤元气。

产权不清的危害不仅在于企业的“裂变”和震动，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日常经营方面。由于员工对企业日益增多的财富有多少属于自己心里不清楚，对增加公共积累就缺乏积极性。在费用上就不精打细算。这是阻碍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最大隐患。

民营科技企业为什么不能把产权明晰到个人？因为一明晰到个人，某些人（尤其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贡献大的人）名下的财富数额就很巨大，人们在观念上很难接受这一事实。所以，几年以前就提出解决科技民营企业的产权问题，但至今还没有进展。

缺乏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社会环境。比尔·盖茨在技术上不是顶尖人物，他甚至没有很高的学历，他的本事就是善于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有些发明家由于缺乏经营能力，社会上也没有把技术发明产业化的机制，大量的专利只好停留在图纸上。社会不能享受发明之惠，发明者也得不到收益。

前几年，某城市重奖科技人员，报纸曾大幅炒作。其实，这笔钱不当称为领导奖给他的，而是他应当得到的。这笔奖金够不够他应得份额的全部还需要考查。当然，这是前几年的情况。广东省允许科技人员的职务发明中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分红，这说明现在人们的认识有了进步。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8年7月8日

“资本家”解雇“知本家”

三年以前，“知本家”在中国是一个很时髦的说法。有了这个说法，“老九们”（恕我沿用文革中的说法）腰板似乎伸直了许多，言谈举止也神气了不少。那时，与知识相关的纳斯达克股市牛气冲天。“纳指”的牛气，也助长了“知本家”的牛气。可是，好景不长，知识经济泡沫破灭，纳指大幅下跌，企业大幅裁员。首先下岗的正是“知本家”。在美国一些IT业大公司，“知本家”成千上万地被解雇。在中国，有名的“知本家”之一的王志东也被“资本家”炒了鱿鱼。

从此以后，在媒体上，“知本家”这个词儿也销声匿迹，原来鼓吹“知本家”的作者们，也挂笔而去。

其实，他们不应当挂笔。从“资本家”解雇“知本家”这一现象中，有更多的话要说。其中，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这个古老的话题。

社会上有三种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知识分子是掌握知识资源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他们为“知本家”未尝不可。但是，“知本家”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一群。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和另外两种资源主体的关系。即和政治家、“资本家”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受政治权力的摆布。

数千年来，中国是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王权是至高无上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类人等一样，只能是王权的奴隶（说得好听一点是臣民）。不过，为了注释王权的合法性和提高王权的号召力，知识分子常以卫“道”和护“圣”的角色为王权所用。

春秋战国时代，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由于仅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权力

难以服众，需要“道”对权力赋以合法性和号召力，所以王侯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自大一统政权建立起来以后，就把“道”纳入权力体系之中，按权力的意志来解释“道”。从秦代李斯“废私学”到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言论自由就受到控制。秦始皇“焚书坑儒”便是知识分子地位的重要转折。“无恒产”的知识分子，生存是很困难的。“无恒产而有恒心”只是他们中杰出的少数。也有一些人“枉道而从势”或“曲学以阿世”。多数人奉行“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实际上，在王权制度下，“达者”只能是权力的附庸或帮凶。在生存的压力下，“独善其身”也是很不容易的。

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千多年。

在现代社会，有两件事情使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重大转折：一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使知识分子有了发表知识产品的自由，不必专事权力合法化的诠释工作和推行权力意志的动员工作；二是知识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知识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一件事使得知识分子不再是行政权力的奴隶，他们有条件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这一点在这篇小文中略而不谈，只说第二件事。

由于知识已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知识分子就有了坚实的立足之地，他们不再是“无恒产”的人，不再是“梁上君子”、“皮上之毛”。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的载体，他们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有了知识创新，资本就可以快速增值，谁掌握了最新的科技成果，谁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使知识分子超越政治资源主体和经济资源主体。知识分子还得受另外两个主体的制约。在经济发展中，知识虽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中，知识分子还是很难摆脱资本控制。其原因是：第一，现代科学研究，离不开昂贵仪器装备。没有资本创造科研条件，科学研究就难以进行。有了研究成果以后，没有资本投入，也不能产业化；第二，知识分子个人的技术成果一般是专业的单项技术，只有多种单项技术组合起来，才能够“物化”为产品。而多种技术成果的组合需要资本作为纽带；第三，新技术成果要变成财富，还有一个市场化

过程，而市场化，优势在“资本家”，而不是“知本家”。

在政治全能的社会，知识分子为政治家“打工”，进入官场的，他为上司打工，下属为他打工，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一级一级地人身依附。在资本专制的社会，知识分子为“资本家”打工，在打工这一点上，他和其他产业工人没有多大区别。在知识经济的泡沫破灭以后，在世界各地，“资本家”无情地解雇大批“知本家”。“知本家”在“资本家”面前只能听任其摆布，连讨价还价的地位也没有，这和被解雇的产业工人没有两样。

“知本家”有没有出头之日呢？有。只有三种社会资源主体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知本家”才能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不会成为其他两种资源主体的奴隶，而是其他两种资源主体的合作伙伴。三种社会资源主体的良性互动，是知识分子的福音，也是社会的福音。然而，三种资源主体的良性互动，既不存在政治专制社会之中，不存在资本专制社会之中。知识分子不当行政权力的奴隶，有赖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知识分子不当资本的奴隶，这种制度还在探索之中。其中，知识股权化，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之一。如果“知本家”的知识在企业里成为重要的股权，“知本家”就有了老板的地位，没有被解雇的忧虑。股权赋予他们老板的地位，他们还不必从事企业经营，可以把精力全部放在知识创新上。这对“资本家”也极为有利，有了源源不断的知识创新，“资本家”的财富就会滚滚而来。

刊于《科学投资》，2002年第6期

人才，人才

<<<<<

怀才不遇与自用其才

我有一个朋友，有学识，有干劲，按他的才能满可以干出一番事业。但是，他调动了好几个单位，处处都和领导处理不好关系，十多年来一事无成。他颇有一点怀才不遇的伤感。有位同志说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建议我就这类事写点文字，批评一下见才不用的领导人。我思索片刻，说：“你说的这类文字已经写了很多了，还是写点知识分子自用其才的文字吧！”

汉朝有个贾谊，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开始汉文帝很重用他，后来由于他得罪了一些老臣，被贬了官，失去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三十三岁就“自伤哭泣”而死。后人写了很多指谪汉文帝不用贾谊的文字。苏轼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写了一篇《贾谊论》，认为贾谊失意的根本原因是他不能“自用其才”。他指出，贾谊不善于审时度势，不能做到“天子不疑，大臣不忌”。他说：“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他批评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我的那位朋友是不是也有贾生这类缺点呢？是有的。

韩愈说过，“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这是强调领导用人这个方面，苏轼说过，“非

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这是强调知识分子主观方面。知识分子要施展才能，仅仅一个方面是不够的，只有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大展宏图。

在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志大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人还是存在的。说他们“量小”，是指他们经不起某些领导人恰当或不恰当的批评，耿耿于怀，患得患失；说他们“识不足”，是指他们不能纵观大局，审时度势，做到“领导不疑，同事不忌”。

能否和本单位领导人处好关系，是知识分子能否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就今天来说，由于长期形成的对知识分子的极左偏见还没有肃清，就总的倾向来说，关系处不好的主要责任在领导干部，但具体到某些知识分子本身，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一些关心知识分子的老同志很早就向知识分子提出过劝诫。记得大学毕业时，我们的校长为此曾向毕业生进行过谆谆嘱咐，其中提到“遇到有缺点、有错误的领导人怎么办”、“遇到水平低的领导怎么办”、“领导批评错了怎么办”等等。当时我未出茅庐，不懂得这些话的实际意义，“文化大革命”中又把这些话当成“资产阶级系学”给否定了。经过十几年实际生活的锻炼，才知道这些话的确是肺腑之言。

领导干部也是人。既然是人，就必有其长，也有其短，如果部属只看领导人之短，那就很难合作。就一个单位来说，领导干部和他的部属在事业上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只有互相看到长处，互相创造条件，让双方都能展其所长，共同的事业才会有成就。著名的美国管理学者杜拉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提出，一个人要使自己的工作有效，他首先要想一想：“我的上司有什么长处？怎样让上司展其所长？”他认为，领导能够展其所长，这个单位的工作才能搞好，每个人也就能展其所长。当然，要使领导能够展其所长，并不是“唯命是从”就可以做到的，而应该从“以是是为，以非为非”入手，将自己的见地用一种能为领导接受的方式提出。只要有共同的事业心、责任感，这是不难做到的。

爱提建议，爱发议论，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但是，议论要恰到好处，建议要看时机和条件。如果你的议论能启发领导的思维，对工作有所补益，就可能受到领导的欢迎；如果你认为应该干的某件事情的实施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你审时度势，不早不晚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就可能被领导采纳。知识分子通常是一位专家，他对某一方面精通的。但是，专家的知识本身往往是片面和孤立的，一个专家的劳动成果必须和其他方面的专家的劳动成果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有益的社会效果。因此，他提的建议从他的专业角度看，无疑是正确的，从各个专业的角度看，就不一定正确。所以，知识分子如果固执己见，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至于受到一次不恰当批评或暂时的冷遇，一个有远见、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是不会介意的。因为“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他一定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取得领导的信任，决不会像贾谊那样“自伤哭泣”。

一位外国学者也说过：“在世界进步中，起作用的不是我们的才能，而是我们如何运用才能。”运用好自己的才能，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的关键。

刊于《光明日报》，1983年1月19日

学历、知识、才能、贡献

近来，人们对学历、知识、才能、贡献谈论得比较多，认识上也不大一致。为了抛砖引玉，这里谈一点个人粗浅的看法。

学历和知识

学历和知识是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一个人的学历高低，可以大体反映他知识的多寡；但是，学历并不等于知识；不能绝对地说，学历高的人知识一定就多。

什么是知识？知识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实践是知识的源泉。但是，人们不可能事事靠自己的实践去取得知识。大量的知识是通过前人和别人的实践间接而来的。书本记载了人类历史长河中积累的大量知识，师承可以直接传授经验。因此，读书和师承是取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在校学习和业余自修都可以得到师承，都可以读书，两条路都是通向知识宝库的通途。

学校是取得知识的重要场所。通过学校有计划地、系统地培训，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比较系统的知识。因此，要重视知识，必须重视教育。有些国家把教育看成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把教育投资看成生产投资，正是基于这一点。学历是教育在受教者身上的标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重视学历就是重视教育，也就是重视知识。“四人帮”就是企图通过否定学历来否定教育、否定知识的。目前，这方面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还有为学历大声疾呼的必要。但是，学历毕竟不等于知识。如果主观不努力，上学时间再长，也学不到有用的知识。具有同等学历的人，知识

水平的差别可以很大。相反，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即使没有什么学历，也可以通过自学求得知识。我们既可以找到徒有虚名而无真才实学的庸人，也可以找到没有学历而自学成才的巨匠。我们要尊重那些既有学历又有知识的人，我们更要尊重那些没有学历却有知识的人，因为后者为求得知识付出的代价更大。

学历应当得到重视，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如果把学历看得高于一切，只看学历不看知识，就会鼓励人只求学历不求知识。两个极端是互相贯通的：否认学历会导致轻视知识，走向愚昧；把学历绝对化，同时也会导致无视知识，走向愚昧。

知识和才能

知识不等于才能。有才能的人是有知识的，但是，有知识的人不一定都有才能。知识是才能的基础，才能是知识的活化和延伸。知识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才能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本领。如果说文凭相对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知识多寡，那么，文凭绝对不能反映一个人才能的高低。

才能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创造。要有所创造，除要有雄厚的知识基础之外，还必须具备运用知识和发展知识的能力。他应该具备多方面的素质：思想活跃，勇于创新，有胆有识。契诃夫说：“你知道天才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勇敢、自由的头脑，广阔的气魄。”如果一个人记住了很多知识，却缺乏上述的能力和素质，他只不过是一部“活字典”，一架“活书橱”，仅仅供人查阅而已。

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有一句名言：“人们的知识在不断地充实着，而人们的智慧却徘徊不前。”今天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学过的书本知识已经超过了达·芬奇、牛顿当时所学过的知识，而才能却有着天壤之别。这里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知识的能力。

知识是建立创见的基础。不过，有时一个人的知识多了反而创见少了。知识就是力量，有知识才会有勇气。但是，有时一个人知识多了创新

的勇气反而小了。还有这样一种情况：知识渊博的人，终生没有什么发明创造，知识比他少的人，却没能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爱因斯坦曾经发问：“为什么有些重要的科学思想往往是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可以用培根的一句话来回答：“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他指的就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知识的书外能力。

由此可见，我们讲知识的价值，主要是讲知识在运用于实际以后的价值；我们讲知识就是力量，主要也是讲活的知识的价值。

我们需要知识，但更需要才能。

才能和贡献

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必定有才能。但是，才能卓越的人不一定能作出贡献。才能不等于贡献。把才能转化为贡献，客观上必须具备施展才能的条件，主观上必须会自用其才。时代呼唤着人才；时代的需要，正是施展才能的重要客观条件。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业绩的条件是优越的，因为我们肩负着历史的重任。但是，长期形成的对知识分子“左”的偏见和不合理的人才管理制度，违背时代的需要，限制才能的施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施展才能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要使党的政策的阳光完全驱散各个角落窒息才能的阴霾，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最近报纸上报道的江永絮、朱毓芬事件说明，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必须作出不懈的努力。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有同等才能的人，在贡献上常常有很多的差别。有的人在逆境中可以作出非凡的贡献，而条件十分优越的人反而做不到。“仲尼厄而作春秋，文王拘而演财易……”，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别林斯基说过：“不幸是最好的大学。”这说明，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否作出贡献，除了客观条件之外，更重要的取决于主观因素。

墨子曰：“志不强者智不达。”一个人有无成就决定于他是否有献身

于事业的志气。那些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人，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才能再高，也不会对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毅力。胸怀大志的人不会在艰难险阻面前畏缩，不会在胜利的喜悦中沉醉。他总是在命运的风暴中搏击，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他的才能都会得到最大的施展。

有才能的人的致命弱点莫过于自恃其才而忘乎所以。自恃其才是对才能的自我扼杀。人人都生活在组织之中。组织这部复杂的机器，可以放大个人的才能，也可以限制甚至扼杀个人的才能，要做到前者而防止后者，对一个组织的领导者来说，需要知人善任；对这个组织中的个人来说，应当善于自处、并善于与别人合作。自恃其才的人通常和组织、和群众很难相处，他的才能也就受到了限制。

才能是赏心悦目的花，贡献是造福于人之果。只有果实，对社会才有实际意义。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他向社会贡献了什么。对一个人的评价和付给他的报酬，应该以他对社会贡献大小为依据。当然，为了鼓励人们增长才干、追求知识，在给予报酬时，也需要适当考虑潜在的贡献(才能)和潜在的才能(知识)，如果过分急于近功，就会失之眼光短浅了。

刊于《天津日报》，1983年5月21日

注：1983年，全社会有一股“文凭热”，过分看重文凭。作者这篇文章切中时弊，多家报刊转载，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在讲话中多次引用。

绝顶聪明和绝顶愚蠢

我有一个朋友，看问题入木三分，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独到的、精辟的见解。

有一次，她对某一社会问题发表了一番高论以后，一位跟她十分要好的长者对她说：“你真是绝顶聪明，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说得这么透彻。”说到这里，这位长者停顿了一下，用半是批评半是关切的眼光注视着她：“你把这样的话说了出来，又显出你绝顶愚蠢。”

我的这位书生气十足的朋友一脸茫然：“绝顶聪明和绝顶愚蠢是不相容的两极啊，怎么能同时加在我身上?!”

看到她镜片后惶惑的目光，那位长者说：“你这样不加掩饰地说出如此尖锐的看法，难道还不够愚蠢?”

这件事使我苦思良久。

是的，把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说了出来，有时会招来明显的或潜在的不利。所以，有些绝顶聪明的人城府很深，不轻易透露自己的看法。

但是，如果绝顶聪明的人发现了某一社会现象的真谛，而又“绝顶聪明”地不说出来，他等于没有发现真谛。在旁人看来，他和绝顶愚蠢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

绝顶聪明 + 绝顶聪明 = 绝顶愚蠢

如果社会上所有的人都“绝顶聪明”地深藏自己的真知灼见，那么，社会将被愚蠢和虚伪的迷雾笼罩，人们将看不到智慧之光。

“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木秀于林，风必摇之。”谁的见解不同凡响，谁就可能遭到某些人的非议。绝顶聪明的人是不甘心将自己殚精竭虑发现的真谛埋葬的。然而，传统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用一种聪明去埋葬另一种聪明。“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句世俗的谚语湮灭了

多少智慧的火花！冷却了多少真诚的炽热！

社会需要真诚，社会需要真知灼见。能够把真知灼见贡献给社会的人，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气。一位先哲说过：“最难得的勇气是理论的勇气。”有智有勇才是大智。还有一位先哲说过：“如果惹人憎恶是为了真理，那么，宁可惹人憎恶，也强似没有真理。”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并且勇敢地说了出来，他为真理献出了躯体，而灵魂却得到了永生。

不过，我们也不能去责备那些一时保持沉默的人。

把“绝顶聪明”的话说出来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绝顶聪明”，而是为了对他人、对社会有所补益。所以，一个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不仅敢讲话，也会考虑他讲话的社会效果。真知灼见需要智慧，让别人接受自己的真知灼见也需要智慧。

《资治通鉴》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刘邦得天下之后，以爱憎进行诛赏，使群臣产生猜忌和畏惧心理。张良看出了刘邦这一缺点的严重后果，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向刘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一次，他俩远远看见将军们在沙地上议论纷纷。刘邦问：“他们在谈论什么？”张良答：“他们在谋反。”刘邦说：“天下刚刚安定，他们为什么还要谋反？”张良说：“您所封的都是亲近的，所诛的都是过去仇怨的。谁过去没有过失？他们害怕因平生的过失而遭诛灭，才相聚谋反的。”刘邦着急地问：“怎么办？”张良建议他赶快加封平生最憎恶的人。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封“与我有故怨”、“数尝窘辱我”的雍齿为“什方侯”。群臣高兴地说：“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有什么担心的！”从此人心大定。司马光在评论这件事时称赞张良“善谏”。张良的“善”就善在选择陈述意见的最佳场合和方式。

要使自己的言论产生好的效果，除了选择场合和方式以外，还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墨子的学生子禽请教说话的诀窍，墨子打了一个比方：青蛙日夜不停地叫，没人理睬；雄鸡只在天快亮时才叫，天下震动。然后说：关键在于叫的时候，“言当其时，一字千金，言背其时，一文不值。”什么是最好的时机？这就需要审时度势。审时度势需要绝顶聪明。

绝顶聪明的人不仅是有真知灼见的人，而且是善于用自己的真知灼见去施惠于社会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直言不讳，是为了社会利益；在另些情况下，他暂时沉默，大智若愚，耐心地等待时机，精心地选择说话的场合和方式，也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检验一个人是否聪明，有多聪明，标准只有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了他的智慧之果。

刊于《方法》，1990年第2期

用人的着眼点放在哪里

一讲人才，人们就会想到“千里马”，似乎达不到千里马水平的都不算人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实际生活中，普通的人具有普遍性，而超人是极为少见的。大量的事情是普通人完成的，历史是靠成千上万个普通人推动前进的。极少数超人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非凡的作用，没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超人也只能发挥一个普通人的作用。因此，会用人的人，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搜罗超人上，而应该把着眼点放在用好普通人上。

普通人不是全才，他只在某一个方面有所长；普通人不是圣人，他往往有缺点和错误。因此，要用好普通人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知人之长，二是容人之短。

唐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但久无所举。唐太宗催问时，封回答说：“非我不尽心，乃是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向异代借才乎？应患己不能知人，安可诬一代之人！”

封德彝把着眼点放在“奇才”上，所以久无所举。唐太宗强调在“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标准上“知人”，所以在他周围人才济济。

所谓知人，就是了解每一个人的特长，从而把他放到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去。用一堆乱石可以砌成平整而漂亮的墙体，其巧妙在于把不同形状的乱石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清代诗人顾嗣协在题为《杂兴》的一首诗中写道：“骏马能力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能够充分发挥每一个普通人的特长，就可以组织普通人干出非普通的

壮丽事业。

要用人之长，必须容人之短。不容人之短的领导者，不可能得到有一技之长的人，更谈不上用其所长了。

美国南北战争初期，林肯依照没有重大缺点这个标准选用了几位将领。而南军中每一位将领都有明显的缺点，但各有所长。结果，林肯麾下每一位“无缺点”的将领，一个一个都被南军中有“一技之长”的将领击败了。基于这个教训，林肯起用格兰特将军为总司令。当时有人对林肯说：“格兰特嗜酒贪杯，难当大任。”林肯回答说：“如果我知道他爱什么酒，我倒该送他几桶！”他看上了格兰特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长处。后来的事实证明，起用格兰特成了南北战争形势的转折点。

笔者到一个十分注重从外地“引进”人才的地区采访。这个地区的一位领导人说：“我们这里的技术人员都是平庸之辈，要开创事业就得有拔尖人才。”笔者进一步采访发现，这个地区本来就有不少工程技术人员没有得到合理的使用。用优厚待遇招来了外地人才以后，更加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外地的“拔尖”人才来到这里，由于领导人不善于发现和利用他们的长处，也逐渐变成了“平庸之辈”。我国北方有一家港口，花数百万美元请了一位外国顾问。这位顾问提出的治港方案中种种创见，几乎全是这个港口的工程师们过去提过的。由于过去领导人把自己的工程师看成“平庸之辈”，对他们的建议不加理睬，而同样的建议一经由外国的“杰出人才”重新提出以后，却被当成了“伟大的创见”。

我不是反对“引进”人才。在有些情况下，“引进”人才是必要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需要依靠现有的人才来完成事业。

有志于成就事业的人们，请把你的目光从遥远的天际移到自己的脚下。抛弃偏见，人才就在眼前。

刊于《方法》，1990年第2期

<<<<<

腾出脑袋，用于创造

安第斯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有哪些？总部设在哪里？拉丁美洲地区最长的土著乐器叫什么名字？它长多少米？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多少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流失土壤多少吨？

上面是抄录的一次全国性的知识竞赛中的题目。我敢说，凭脑袋记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回答不出来。我也敢说，回答不出这些问题的人不是没有学问，其中一定还有不少优秀学者。

人类的知识浩如烟海。如果把莫斯科列宁图书馆的书架排成一行，总长可达 500 公里。据法国《当代百科全书》估计，如果将全世界馆藏图书的内容用打字机打成一行字，可以排成两千多亿公里长；如果将它输入电子计算机，约需一亿美元的费用。这么多知识如果都需要记忆，那将成为一场灾难。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随便提出几个问题，就足以难倒饱学之士。

有这样一个故事。年轻的爱因斯坦到一位长者家里作客。主人考了他几个问题。

问：“在常温下，云母的电阻率有多大？”

答：“在《电工手册》里有现成的答案。”

问：“从纽约到芝加哥有多少英里？”

答：“可以查一下《铁路旅行指南》。”

问：“不锈钢是由哪些成分组成的？各为多大比重？”

答：“可以查一下《金属手册》。”

主人评价说：“你虽然对答如流，可惜只能打零分。”

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从来不记忆词典、手册里的东西。我的脑袋只用来创造性思维。”

这大概是爱因斯坦成功的诀窍。

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而言，今天一个初中毕业生就超过了伽利略，一个高中毕业生就超过了牛顿。但是，今天的中学生和伽利略、牛顿的创造力却有天壤之别，对社会的贡献也有天壤之别。如果把创造成果比作辉煌的宫殿，那么知识不过是片片砖瓦。建造宫殿离不开砖瓦，但有砖瓦不一定能建成宫殿。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对这句话不能作肤浅的理解。确切地说，知识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只有为某一创造性目的把知识组织成切实的行为计划，并努力实施，知识才会成为真正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在于创造。

人的价值在于创造而不在于记忆。科学家不是会走路的百科全书，而是富有创造力的智者。记住一定的知识是创造的基础，但不是所有的记忆都有利于创造。让一些无关的知识塞满了脑袋反而会削弱创造力。知识竞赛可以激发人的求知欲，对于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文化水平有一定的好处。然而，那些鼓励机械性记忆的竞赛却把人的脑力引向了歧途。

我不是一味地反对记忆。对于在校读书的年轻人来说，熟记一些重要的基础知识，是会受用终生的。然而，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人类的知识是无限的。解决这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的唯一办法是选择。即按照我们创造的目标选择需要记忆的知识。

人们把科学知识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然后又按学科进行细分。这是按知识内容来分的。如果按人对知识的掌握方式来分，那么可以分为：

- 一、不可查询的知识；
- 二、可以查询的知识。

那些必用的、不可查询的知识必须记忆，可以查询的知识不必记忆。随着电子计算机进入科技情报领域和计算机检索系统的发展，查询知识越来越方便了。在北京点击电脑的键盘，就能检索到伦敦某图书馆的某期刊

中的某篇文章。将来，第二类知识在知识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如果按不同职业的人对某类知识的应用频率来分，可以分为：

- 一、常用知识；
- 二、不常用知识；
- 三、很少用的知识。

显然，对从事某个职业(专业)的人来说，必须记住自己常用的知识，对很少用的知识就不必记忆。物理学家不必记忆十字军东征的年代，文学家不必记忆氨的分子量。

选择性地记忆，创造性地思考，别让记忆淹没思考。腾出脑袋，用于创造。这是成功者的秘诀，也是信息时代的需要。

刊于《方法》，1990年第3期

也谈“红道”“黄道”和“黑道”

近年来，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说法：当官是走“红道”，经商是走“黄道”，做学问是走“黑道”。当官有权，经商有钱。做学问一无权，二无钱，只有青灯一盏。因此，有路子当官的都奔向仕途了，有办法经商的都“下海”了。

人各有志。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上述三种价值取向都无可厚非。不过，我希望把做学问称之为“黑道”仅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嘲(中国知识分子很善于自嘲，如“文革”中自嘲为“老九”)，不应当是一种自贬。

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其能力大小是以其对社会影响大小而定。根据其对社会影响的范围和久远，可以分为普通人、能人、强人、伟人。当然，“大者安其大而无忽于小，小者乐其小而无慕于大”(苏轼)。人们通过什么来影响社会呢？三个方面：权力，财富，知识。掌握了大的权力，就可以干大的事情。只要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权力越大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个人的消费是有限的，掌握了巨大的财富也可以干大事，干好事。干的好事越大、越多，对社会影响就越大，贡献就越大。古往今来，有的人既没有做大官，也没有拥有财富，却用他的著作或科学发明对社会照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述这三种手段和当今人“红道”“黄道”和“黑道”是完全吻合的。不过，我觉得“黑道”对社会影响更为深远。

知识分子总是有追求的。在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立功，立言，立德。立功，就是掌握一定的权力为国家干一番事业；立言，就是做学问，著书立说；立德，就是做道德楷模。那时由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知识分子一般不愿走“黄道”。但也不乏立过大功者转而“下海”的。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到今天的山东“下海”，富甲天下，成为千古美谈。但是，“立言”者在中国倍受尊重。“人之能载万物者，莫如文章。”“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类似这样的话在中国古籍中到处可见。

无独有偶。外国人也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一些想出人头地的好汉们追求的目标是“三个P”：power(权力)，property(财富)，prestige(声望)。声望和财富、权力有关系，但主要指它的精神影响大。这和我们今天说的“三条道”如出一辙。不过，人家没有把做学问贬成“黑道”。他们还认为，在政治垄断一切的社会里，任何人要得到任何东西，都必须通过政治手段。因而人们被迫盯住“政治这块肥肉”。这样，“红道”就太挤。有了“黄道”和“黑道”(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我们当今的流行语)，就可以“分流”“减压”，因而有利于社会稳定。人家是没有“官本位”的。

最近读加尔布雷思的《权力的分析》，想不到这本书中的一些看法和前面说的“三条道儿”和“三个P”不谋而合，也为我的上述看法找到了新的根据。加尔布雷思把权力分为三种。一是“应得权力”，即通过强制来使别人服从；二中“报偿权力”，即通过给别人利益上的补偿使别人服从；三是“制约权力”，即便别人从思想上信服，从而在行动上服从。根据这一理论，那些学识渊博的编辑，记者，作家，时事评论家，学者，都是当权者。加尔布雷思认为，在现代社会，制约权力比报偿权力的作用更为重要。

在不少情况下，这三条道儿是可以串着走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追求当“三立完人”，即争取在立功、立言、立德三个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实际上很少有“三立完人”。在一个方面比较突出，又兼顾搞一点另一方面是有的。如做官的和经商的同时搞点学问，做学问的也可以在政府里干一些事情，或从事一点经营活动。当然，做官的也可以同时经商，以权经商可以大发其财，但历来为人们所不齿。不过，最好还是专心致志地干好一个方面的事情，因为这三个方面有很多不同之处。一个人不一定都能适

应这三个方面。

譬如说吧，从事精神劳动很有成就的人，他有学识，智商又很高，他能不能当一个好官呢？不见得。搞学问和当官不是一回事。搞学问的目的是研究社会(这里我仅指搞社会科学的)，做官的是要管理社会。研究社会的是要有所发现。为了发现真理，他不理睬成规定见，不顾及人事关系，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管理社会的人却不同。他不能逞才显能，他不能不顾眼前的现实。行事要曲曲折折，迂回前进。说话要环顾左右，收锋藏锐。那复杂和微妙的官场，不是书生意气任意发挥的场所。理论要求深刻，要求彻底，当官的要求适可而止。官、学各有其道不能互通。相反，用官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来搞学问，顶多只能当一名平庸的学者。不过，对“各行其道”也不能绝对化，只要能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从这条道也可以跳到另一条道。

上面说的这些话，对“三条道儿”中的任何一条，都没有褒贬的意思。这三方面的人社会都需要。不过，鉴于今天“黑道”有点被冷落，“红道”有点拥挤，“黄道”有点混乱，在“黑道”上的朋友有点惶惶然。所以，我建议那些有志于“立言”、有条件“立言”的人，不妨一条“黑道”走到底。其实，“黑道”走到底就是光明，不仅给自己带来光明，也给社会以智慧的光明。

刊于《瞭望》周刊，1993年第36期“十日谈”专栏

“人以文名”和“文以人名”

以文墨为生计的人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以文名，第二阶段是文以人名。

没有《家》、《春》、《秋》，谁也不会知道巴金；没有《战争与和平》，人们就不会知道托尔斯泰。邹容的名字和《革命军》相连，范长江的名字和《中国的西北角》同传于世。人以文名，说起来就是如此简单明白。但是，随着出版物的大量增加，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在全国只有一张对开的《人民日报》的时候，谁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谁就扬名天下。当全国有数千家报纸的时候，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就不会引起注意了。过去把写书当作“名人事业”，出版一本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只要有书就可以出书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书在金钱(赚来的钱或讨来的钱)的推动下，潮水般地涌向市场，写书还是“名人事业”吗？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对出版物过多的后果，有一段很悲观的论述：

一个社会富裕了，人们就不必双手劳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动。……那些写满的稿纸车载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档案库里。即使在万圣节，也没人去光顾它们。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

现在已经不是靠写几篇文章、出一两本书就能成为名人的时代了。然而，人们怎能甘心将自己的作品埋在乱纸堆里？于是，各种各样的“包装”就出来了。有的为了出名(何况知名度是可以转化为金钱的)，可以不择手段。冒充某名人政要的“私生女”，写“纪实”小说，以期引起轰动，算是下乘。

这些“包装”，这些手段，还是附加在“文”上面的。作者如果真能够

由此出名，还勉强可以纳入“人以文名”之列。但这名声不会持久。“包装”总要破损，不正当的手段迟早会被揭穿。

确切地说，现代社会不是完全不能“人以文名”，只不过是靠文墨出名的难度大些罢了。这就逼着文人们更加努力，写出出类拔萃的作品，才不至于被乱纸堆埋没掉。

如果说人以文名是第一阶段的话，那么这个阶段是奋斗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三更灯火五更鸡”，必须殚精竭虑，穷究事理，必须“语不惊人死不休”。经过长期苦修苦练，造就雄厚的实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必搞“包装”，不必要手段，实至而名自归。虽说不能洛阳纸贵，一篇篇作品也会引起一阵阵轰动。转载，文摘，口传，他的名字频频出现，人们不得不注意他的名字。时间一长，他就成了名人。

清人龚自珍说：“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作者一旦出了名，人们就开始注意他的作品，看到他的署名，就要读他的作品。这时就进入了“文以人名”阶段。龚翁在后面以一“尤”字作强调，我想用今天常说的“名人效应”作注释。名人效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威效应。名人的作品影响大，名人的言论有号召力。二是成就放大效应。一个人出名以后他的劳动成果容易得到社会承认，有时还名过其实。在出名以前不能发表的作品，在出名以后可能被捧为佳作；三是马太效应。一些还没有出名的人，总是想借助名人的名字出名。例如，为了使自己的作品便于发表，就在自己的名字前面署上名人的名字，这样，已经出名的人就更出名；四是盲目崇拜。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把名人的一切作品当作楷模；五是商业效应。例如，现在由企业出钱搞的各种研讨会、评议会、论证会，和各种卖门票的讲习班，请人的原则是重名气不重实学。在这种场合讲学，有没有水平主持者是不在意的，只要有更好的广告效益就行。所以越出名，请的就越多；参加活动越多，就越出名。

名人效应告诉我们，名人头上的光环有虚幻的部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如果说，人以文名是奋斗阶段，是上升阶段，那么，文以人名就是成

熟阶段，收获阶段。第二阶段，他没有第一阶段的胆怯、拘束。他更没有第一阶段作品难以发表的苦恼。现在，他文债累累，只苦于精力不足。他进入了自由王国。他的才华可以自由地发挥。他的文墨可以任意挥洒。他的潜能可以充分显现。

但是，进入第二阶段以后若不自觉，不知道自己头上的光环还有虚幻的成分，就会受名声之累。就会失去了已经得到的自由。如果他靠吃老本为生，不再努力奋斗，总会有江郎才尽之日。“人怕出名猪怕壮”，正是指这些缺乏自知之明的名人。

文以人名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名人政要写的回忆录，名人的子女写名人，英雄的母亲写英雄……文章不是借作者文化方面的名声提高身价，而是借所写的对象提高身价，作者没有经过“人以文名”的奋斗阶段。这另当别论。

刊于《群言》，1994年第11期

>>>>>

奏折经济学

改革十五年是中国经济学大繁荣的十五年。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经济学界就显得异常活跃。当时人们谈论中国学术文化界的状况时，用“经济繁荣，文艺的春天”来描述。这种繁荣状况一直持续到十六年后的今天。

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功绩不能忽视。它推动了改革，指导了改革。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学界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经济学空前繁荣的今天，在治学态度上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我把它们称之为“经济学的左道旁门”。

第一即奏折经济学。

还是在七、八年前，我同国家机关的一个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闲谈，他介绍经济学界的某些情况使我不胜惊讶。原来，有的学者在选择研究题目、确立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时，先揣测中央领导人最关心什么问题，最爱听什么意见。他搞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写一篇能引起中央领导人重视的论文。当然，如果能得到中央领导人对他的论文的批示，那就达到研究的最高目的了。

后来，我接触到其他一些学者，交谈起

经济学的左道旁门

免费资源
网购返利

PINMUCH.COM

来，才知道上述情况不是极个别的。

我们把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奏折经济学”。奏折经济学，是以揣摩中央领导人的意图为出发点，以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察觉为归宿。

经济研究为中央领导人的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是无可非议的。也应当有一部分学者专门从事对策研究。不专门从事对策研究的学者，希望自己的学术见解能被政府采纳也是正常的。

但是，奏折经济学并不是真正的决策研究。决策研究是科学，奏折经济学不是科学。它既不是一般的经济学研究，也不能同决策研究鱼目混珠。

奏折经济学脱离现实。它虽然也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也运用各种现实数据和事实，但这些现实问题，是他认为领导人最关注的问题；这些现实材料，大都是以他所揣摩到的领导人的意图而选择的，都是为论证这一意图的。

奏折经济学虽也充满了经济学的名词、术语，有时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但它缺乏科学的灵魂——追求真理的精神。它的研究结论不是穷究事理的结果，而是为了迎合领导人的意图。奏折经济学不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它当然得不到真理。

奏折经济学误国害民。它既对领导人产生误导，也对经济工作者产生误导。这些误导是以科学的名义、科学的形式、科学的语言进行的，因而危害极大。

经济学家应当有独立的人格，刚健的风骨。追求真理是科学家的最高宗旨，经济学也不例外。迎合是科学的沦落，奏折经济学的要害在于迎合。

如果科学成为权力的恭顺婢女，则科学就不成为科学。如果权力在科学面前俯首称臣，则权力是英明的权力。奏折经济学就是权力的恭顺婢女，它既玷污科学，又玷污权力。

从事奏折经济学的人们，你如果曾经是科学工作者，那么，请你从匍匐在权力的宝座下站立起来，挺直科学的腰板，理直气壮地宣布：真理高于一切！

刊于《经济日报》，1995年6月19日

论证经济学

在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中，还有一个左道旁门，这就是“论证经济学”。

所谓论证经济学，就是专事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进行论证。当中央领导人提出某种看法时，他们立即引经据典，说这一看法如何科学，如何有根据。如果领导人的看法不完善，不圆满，研究者就费尽心机地从内容上加以充实，从理论上加以润色。也就是说，把领导人的思想火花、只言片语加以理论化，使之能自圆其说。所以，论证经济学又被称为“园学”。

“园学”之所以能称为“学”，首先要求研究者熟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有较高的思辨能力和写作能力。不过，他们的这些知识和能力，不是用在真正的科学研究上，而是用在为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貌似科学的粉饰上。

需要说明的是，“园学”的工作和秘书工作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秘书工作和它有着根本区别。秘书为领导人的言论进行理论润色，甚至代为起草讲话稿，是以领导人的名义发出的。这言论的社会责任在领导人。秘书是名正言顺地为领导服务，他仅是领导人的助手。他没有借用科学的名义从旁加以论证，更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表。

“园学”的悲哀在于，它并不是用科学的尺度去分析、去检验领导人的讲话，而是不加分析地为领导人的讲话盖上科学的“图章”，把一些本来不是真理的东西当作真理来推销。

“园学”只能给领导人的讲话涂上科学的色彩，它本身不是科学。科学必须有创造，“园学”不会有创造，科学有风险，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必须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园学”没有什么风险，它在领导人的保护伞

下苟且偷安。

“园学”也有尴尬的时候。过去某领导人在台上提出某种看法，“园学”有根有据地论证其如何有理，如何科学。后来，某领导人失势，他的看法受到批判，“园学”又振振有词地说它如何如何错误。

“园学”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科学工作者所必需的独立思考。他的脑袋长在领导人的头上，他的思想仅是领导人思想的延伸和完善。

科学家应当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人格就不会有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科学。

刊于《经济日报》，1995年6月26日

舶来经济学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的传播有语言障碍。所以，通过翻译来引进国外的科学成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科学著作的翻译家们，对促进人类科学文化的交流功不可没。过去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近年对西方大量经济学著作的翻译，都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问题就出在对引进的科学思想的运用方面。任何科学原理都是有条件的。水在摄氏 100 度沸腾，这是人们公认的规律。不过，这个规律是以一个大气压为条件的，气压变了，水的沸点也随之变化。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它的原理、定律，必须以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为条件。社会科学没有国界，但社会科学原理的运用要依据国情。

舶来经济学，其要害就是脱离中国现实。它不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从国外引进的原理出发。它用国外的经济学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所以又称为“套学”。“套学”，其低级形式是，在外国的原理中，加上中国的事例，在外国的公式中，填上中国的数字。较高一等的是，用外国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实，用外国的逻辑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似乎有新的视角，新的思维，听起来也言之成理，但一到实践之中，他那美妙的理论就被中国的现实撞击得面目全非。

把外国的经济学引入中国，如果仅作为一种知识介绍，则另当别论。如果要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则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化过程是一种艰苦的创新过程。消化，吸收，创新，对引进自然科学是必要的，对引进社会科学更为必要。“拿来”很必要，创新更重要。只“拿来”，不创新，只是经济学的翻译家，不能说他是经济学家。改革以前，我们拿来

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拿来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但西方经济学拿来不多。现在都可以拿来，可以兼收并蓄。但总的来看，拿来有余，创新不足。有的甚至走上了“套学”的歧途。

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是否永远要靠引进外国的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显然不行。中国要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学。当然，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应当有国别之分，正如不应当有“中国物理学”、“中国化学”一样，不应当有“中国经济学”。我这里说的建立自己的经济学，是指要立足中国这块土地之上，广泛吸收人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充分考虑中国的特点，总结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真正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太多了，有多少经济学家能说清中国的经济问题？有多少经济学家能提出切合实际的对策？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经济学，才能够为中国经邦济世。“舶来品”只能摆在展览厅的柜子里供人玩赏。

刊于《经济日报》，1995年7月3日

地图经济学

一位学者到河北省发表高见：“河北省应当发展北斗星经济。”听者茫然。这位学者解释说：“位于河北省的大、中城市呈北斗星分布。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是北斗星的‘勺’，保定、石家庄、邯郸是北斗星的‘柄’。河北省的经济可以按北斗星形式布局。”河北省有关人士初听恍然大悟：“哎呀，怎么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想到！”细想，才发现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只根据河流、山川、平原、铁路、城市在地图上的分布状况，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我称之为“地图经济学”。“北斗星经济”是地图经济学中的典型之作。

地图经济学不同于经济地理。经济地理要分析资源分布、产业结构、气候、人文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地理是生产力布局、区域经济规划的重要理论工具。而地图经济学主要是从地图出发的：从地图上迸发灵感，从地图上产生联想，从地图上做出判断，从地图上得出结论。

地图经济学不是科学。说它不是科学，是因为它过于肤浅。它肤浅到只有地图的一纸之薄。它的视力不能穿透地图之外。地图经济学有时能提出气壮山河、视野开阔的战略构想，但是，这些构想很难付诸实施。因为它只限于地图上提供的信息，对很多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考虑。这些构想一付诸实施，就会被种种没有考虑的因素所阻挡。

地图经济学这些年还有一定的影响。它提出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经济发展战略。“环渤海经济协作区”的发展战略是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例。

渤海湾周围有十几个城市。如果把这些城市统称为“环渤海经济区”未尝不可。这些城市联合起来招商也是可以的。但要说把这些城市弄成一体化的经济协作区，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那就有点“地图经济学”的味道了。“环渤海经济协作区”已经搞了十年了，但总是“环”不起来，这些城市之间也很少“协作”。这些城市之间的经济联合，并不比十年以前更加紧密。为什么“环”不起来呢？原来，渤海周围的城市各有自己的经济腹地。青岛、天津、大连，其产业并没有互补性。从历史到现在，这些城市之间没有相对稳定的大宗商流。地图经济学没有看到这些，只从地图上看到渤海周围的一个城市圈，就“望图生义”。

没有深刻，就没有科学。深刻就是能揭示深藏在表象之内的规律。地图经济学所缺乏的正是这一点。

刊于《经济日报》，1995年7月10日

诠释经济学

只在书本上讨生活，不面向实际的经济学研究，称之为“诠释经济学”。这样的学者只对经典著作进行诠释。这种倾向在改革之前比较严重，近年来很少了，但还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说明“诠释经济学”，让我先引用一段话。这段话出自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这是一个人（“我”）在一家图书馆看到满屋都是关于《圣经》的著作，和图书管理员（“他”）的一段对话：

“这些都是圣经注释家的著作。”他说。

“数目可真不少！”我接着说，想必在这以前，圣经十分晦涩，如今非常明朗了。是否还有一些疑问，可能其中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他回答说：“那还用问，善良的上帝！问题之多，几乎和书中的行数相等。”

“是吗？”我说，“那么这些作者都做了些什么呢？”

他说：“这些作者，并未在圣经中寻求应当相信的，却寻求了他们所相信的；他们丝毫没有把圣经当作教义的经典，从而接受这种教义，却把它看作一本可以给他们的意见增加权威的书。因此，他们歪曲了书中的一切意义，折磨尽了所有的篇章章节。这是一块土地，不同宗派的人都可以闯进去，如同打劫一样。这是一片战场，敌对的国家在那里相遇，在那里打仗，有人冲击，有人作前哨战，方式很多。”

孟德斯鸠对《圣经》诠释者的批评得多么淋漓尽致！从这里我们难道没有看到我们周围一些人的影子吗？

自《资本论》1867年问世以来，各种文字印刷本有140多种，各种注释的读物更是汗牛充栋。仅中国，研究《资本论》的学会就有上百个，出版研究《资本论》的专著有二十多种。毫无疑问，这些注释者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的确有孟德斯鸠所批评的倾向。我不是把《资本论》和《圣经》相提并论，尽管有人说《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但也不能用对待《圣经》的态度来对待《资本论》。我们说，对马列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要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就要面向现实，就不能从经典作家已有的结论出发，而应从生动丰富的社会现实出发。

中国现在有多少现实经济问题啊！这是中国经济学家赖以生存的沃土。谁能真正解决一两个现实经济问题，谁就是了不起的经济学家。而那些只在书本上讨生活，就书本论书本的经济学家，最终必在沉闷的书斋里窒息而死。

刊于《经济日报》，1995年7月17日

显学的危机

1995年5月，我在《经济日报》理论周刊上连续发了五篇短文，总题为《经济学的左道旁门》，表述了我对经济学界某些不正学风的想法。没想到这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经济日报》和有关研究单位还联合召开了多次以《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为题的研讨会。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经济学界圈子里的人，而是一名从业30年的经济记者。因为不是圈里的人，写这样的文章才无所顾忌；因为我采访了30年的经济(其中有近20年经济改革)，我才有条件写这类文章。

我跟踪采访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近20年，我对经济学界是很崇敬的。我原计划写三篇文章，第一篇就是讲经济学界对我国改革的巨大贡献。后因手头资料缺乏，这篇文章的论点就浓缩在《经济日报》发表的我的第一篇文章的按语之中：“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功绩不能忽视。它推动了改革，指导了改革。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学界起了重大作用。”《经济学的左道旁门》是我想写的第二篇文章。我想写的第三篇文章就是《显学的危机》。

显学的特征、作用和局限

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学说、学派。韩非子著有《显学》。《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是指韩非子所处时代的情况。在不同的时代常有不同的显学。纵观学术历史，显学有以下特征：

一、显学同其他学科相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

热门学科。它不仅受到群众的重视，也受到当权者的重视。

二、从事显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比其他学科庞大。有一批在全社会有影响的学者，群星灿烂。学术活动多，学者们十分活跃。

三、显学的出版物覆盖全社会，比其他学科的出版物要多得多。

四、显学的理论掌握了较多的群众，它的不少看法被群众接受。

显学对社会的作用比其他学科要大得多：

一、对社会的价值观有较大的影响。

二、对当权者的政策取向有较大的影响。

三、对其他学科有连带影响。

然而，显学也不是常显不衰的，在它兴旺的时候就潜藏着危机。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任何学科一旦偏离了真理，就会走向反面。显学之所以能成为显学，就是因为它掌握了部分真理。但当它成为显学以后，又容易产生一些偏离真理的因素：

——显学一旦进入权力中枢，为掌权者所重视，就有可能用权力来推行其成果。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权力和真理的关系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偏离真理；

——显学一旦被更多的群众所接受，就可能形成一种舆论态势。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多数人的看法和真理的关系问题。真理开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偏离真理；

——显学一旦占有统治地位，就有一个如何处理显学和非显学的关系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压制和取代其他学科，从而有可能偏离真理；

——显学一旦成为显学，人们趋之若鹜。就难免泥沙俱下，队伍庞杂，左道旁门奇出，有可能把真理引向歧途；

——显学一旦占有重要地位，就可能承担不应由这门学科承担的任务。就可能成为万能科学。像包治百病的药不是好药一样，万能科学也不会是真正的科学；

——理性认知的易错性。理性认知一般是靠逻辑力量推动，而逻辑本身是不讲前提的。不同的前提通过同样的逻辑链会有不同的结论。理论只

是人们对客观的认识，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在推行我们认为正确的理论时，如果只顾按照逻辑一推到底，很可能偏离真理。

经济学是当代显学。

说经济学是当代显学有以下根据：

经济学学者在全国学者队伍中占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刊物在所有学术刊物总量中占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著作出版量占整个出版量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科文献量在社会科学文献总量中占的比重最大。

全国高校的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中，学经济学的占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学科。

经济学对决策者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学科。

经济学的地位在今天如此显赫，是由它所处的时代决定的。自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工作成为全国上下的中心工作。各阶层人士对经济知识的渴望，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

经济学的显赫地位，使它承受着如此之重的社会负担，但它本身却面临着重重矛盾。

作为当代显学的经济学，同样面临上述历来显学所包含的危机。这里不再细说。中国经济学由于其历史原因，在基础上，理论上，危机更要深重一些。

中国经济学先天不足

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队伍是原来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更确切地说，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队伍，因为省一级社会科学院绝大多数是改革以后才成立的。这支队伍的理论基础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73年，我在经济采访中遇到很多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到一所著名的大学里去求教。当时几位经济学讲师（到八十年代后期大都成了经济学家）接待我。当我问到如何减少当时实际存在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时，一位讲师回答说：“剪刀差是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剥削，你说的剪刀差是不存在的。”我提到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等和现实相矛盾的理论时，一位讲师不作回答，却说：“我们是教师。我们的责任是帮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背景下，他们不可能讲心里话。上述回答也许不是他们真正的经济思想。

改革以后，这支队伍中相当多的人觉察到原有的理论体系和现实的冲突，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所承袭的和多年宣扬的理论体系进行急转弯。例如，有一位学者，在“文革”中主编了一本批判前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书（灰皮书），这本书中收集了前苏联六七十年代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反思，强调利润、经济核算，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等改革主张。我们这位学者，除了写了一篇很有战斗力的“前言”、对这些文章大加挞伐以外，还在每篇文章前都写了一篇“按语”，批判人家的“修正主义”。在当时那种政治条件下，也许这位学者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这些有改革气息的文章。到八十年代初，这位学者发表了很多倡导经济改革的文章，其中不少看法是他所批判的这本书中的观点。他成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进入改革时期以后，中国的经济学一直在改革的现实和原有的理论之间痛苦地挣扎之中。一批学者，不是从他所承袭的理论体系出发，而是从改革实践出发，为改革寻找理论根据。这时，他们面临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所讲授的理论体系的束缚，还面临着这个理论体系所造就的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

这时，一些学者把危机归罪于斯大林，认为斯大林主编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于是，在经济学界出现了一阵子“考据热”。想从马克思的原著中寻找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据。但是，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终究不能解脱理论的困惑。对一百多年前文字的考据毕竟不能解决今日的现实问题。

另一些学者面对现实，大胆地突破原有理论体系的种种约束，对改革现实进行理性的解释。这批学者对中国的改革贡献最大，他们是近二十年

来中国经济学者中的主流。依据年龄来分，他们大体可以分三个层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孙冶方、卓炯、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一批老经济学家为主，对文革以来左的经济思想拨乱反正，为商品经济在中国的理论殿堂找到了应有的位置，为改革作了舆论准备。继其后有刘国光、董辅仁、吴敬琏、厉以宁、林子力、王琢、戴园晨、王珏、赵人伟、何伟、高尚全、童大林、杨启先、蒋一苇、杨培新、张卓元、周叔莲、萧灼基、唐宗昆、晓亮、熊映梧、谷书堂、何炼成、刘诗白、林凌等为数更多的经济学家面向改革实践，进一步突破原有经济学体系的束缚，使市场经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理论殿堂，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舆论先导。到八十年代后期，经济学者中一大批新秀登上舞台。他们完全跳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新概念和新方法。他们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三代人后浪推前浪，一代比一代思想更解放，一代比一代队伍更庞大。

然而，这三代理论队伍的种种突破，只能使得原有理论体系更显得百孔千疮，却没有能构造出新的理论体系。理论危机更加深重。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作为一门学科，如果它的理论不能解释与其有关的实践问题，如果在实践面前，原有的理论体系出现了破绽，我们就可以说，这门学科出现了危机。

改革以前，我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理论的本质内容，是分析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从而证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着眼于解决政治方向，而不是着眼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这些都是苏联政治经济学中承袭来的。进入建设年代以后，我国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突破这一体系，如孙冶方和顾准在1956年就突破了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只在两种所有制之间起作用”的论断。1957年《经济研究》第一期和第

二期发表了南冰(王琢)、索真(戴园晨)的文章,提出价值规律不只在流通领域里起调节作用,也在生产领域起调节作用。卓炯在1962年的上海《财经月刊》上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他们的文章都被看成离经叛道之作,并没有动摇原来的理论体系。由于原来理论体系没有面对二十世纪后期的社会现实,从而出现了重重危机。危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原有的理论体系不能解释经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现实情况和理论提供的结论处处矛盾。且不谈近几十年来原有理论体系所做出的重大结论在历史的印证中失败,迫使理论不得不节节后退。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理论和实践也处处碰壁。这样的例子随手可得。例如,为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要求国有企业“自负盈亏”。而原有的理论体系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自负盈亏”中的“自”显然不是企业自身,因为只有所有者才能自负盈亏。而硬让企业自负盈亏,其结果自然是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又如,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认为,在公有制内部只有“分配”,没有“交换”。现实要求在公有制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搞市场经济。但是,在我们所承袭的理论体系中,公有制和商品经济之间,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如何建立无懈可击的逻辑联系?

二是原有的理论体系不仅不能为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反而成为发展和改革的认识枷锁。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在原有的理论体系中,都看成社会主义的异物,是迟早要消灭的“异教徒”。所以,改革的过程实际是对原有理论体系的不断突破过程。

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面前,经济学者努力寻找出路。有的在原有理论体系中揉进市场经济理论,但原有的理论是以计划经济思想为出发点,这种牵强附会的努力,使得原有的理论体系更加不伦不类。有的干脆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原有的政治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基础和中国大不一样,用在中国也是处处碰壁。在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方面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只能用具体结论,不能用其基础理论,有的认为只能用基础理论,不能用具体结论。有的采用混合方法,即在制度分析中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经济运行分析时采用西方新古典主义,在发展分析上又引

人结构主义。结果，整个体系没有贯串始终的逻辑。经济学家为寻找出路而努力，就是希望把原有经济学这件衣衫进行修补，但是，越补越不像样，补成了叫花子的“百丁袄”。

三是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失去了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作用。作为基础理论学科，其基本理论应当是应用学科的基础。如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它的基本原理、基本结论，在机械工程学、电工学、电机学、工程热力学、材料力学等学科里，都是不可动摇的基础。政治经济学，一直作为各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今天的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会计学、市场营销等应用类教科书，已经与政治经济学失去了理论上的联系。政治经济学已经失去了‘基础’作用，经济应用学科也没有基础理论。

中国经济学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近二十年来，经济学同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实践的联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社会各方面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从来没有这么密切。但是，这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各方面的人对经济学寄予过高的期望。各行各业都想从经济学那里寻找锦囊妙计。这样，经济学就承担了很多不应由它承担的任务。经济学常常替代了其他学科，成为包打天下的万能科学；用经济学原理来设计社会，用经济学原理来观察国际关系，甚至用经济学原理设计人生道路，把人生的种种选择归结于对功利的权衡。

在今天，经济学几乎涵盖了一切领域，它几乎左右着各行各业的方向，支配着千百万人的行为。工厂、商店、医院、学校、文艺团体，都在谈论着“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规律代替了其他规律。教育界为创收，可以出卖文凭；科研单位为讲经济效益，重视“短平快”项目，轻视基础研究；医院为了增加收入，不顾病人的需要乱开贵重药方；出版社为了尊重经济规律也得自负盈亏，低俗出版物泛滥成灾；报纸为了经济效益，大搞有偿新闻。

这些都不是经济学的过错。过错在于人们把经济学看得太万能了。在于人们把经济规律用于不应当通行的领域。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把中国建成经济社会，更不是把“社会人”都变成“经济人”，当然也不会用经济学来代替其他科学。上述一些不应当出现的情况使人们感到，在社会科学这架大天平上，经济学的砝码太重了。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改革，不是经济学一个学科所能胜任的历史任务。只有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才能做好这项伟大的社会工程。但是，开始参与这项社会改革的几乎只有经济学家。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有少数社会学家、法学家参与。单凭经济学设计的改革方案，由于对政治的、社会的、法律的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不够，在执行中常常变形走样。

在改革中，常常遇到“度”的问题。如，经济决策权的集中和分散程度，治理整顿的紧缩力度，“适度从紧”的度，等等。有些“度”，单纯用一门学科难以确定，只有在另一门学科的交叉点上才能确定。社会问题像一个坐标系，一门学科在这个坐标系上只能划出一条曲线，它没有确定的点，也划不出“域”。两线相交才有“点”，三线相交才有“域”。“域”是指一个范围，社会问题的“度”多数是“域”，而不是“点”。改革中很多问题举棋不定，就是没有找到确定的“点”和“域”。这是因为经济学以外的学科对经济改革参与不够。

经济学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太重了。对经济学过多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又化为对经济学的抱怨和轻视。

危机是飞跃的前夜

对某一学科来说，其理论出现了危机不是坏事，是学科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我们都知道，经典物理学经历了几次危机才发展为现代物理学。十九世纪末期，牛顿三大定律和麦克斯韦电磁学能够解释物质世界中的物体

运动、热、声、光、电、磁等一切物理现象。人们认为物理学已经进入了完美的状况，达到了“顶峰”。但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有两个发现，一是美国人迈克尔逊和莫雷的试验，证明绝对静止的空间是不存在的。而牛顿力学的前提是物体的运动与空间和时间没有关系，即时间和空间在牛顿那里是绝对静止的。二是高温物体辐射形成的光谱分析，即黑体辐射问题。经典物理学不能解释光谱分析中所发现的现象。这两个发现使得经典物理学在新的实践面前无能为力，原有的严密的体系出现了漏洞。因此被人们称为“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

但是，物理学的危机促进了物理学的飞跃。第一朵“乌云”动摇了经典物理的时空观，却导致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第二朵“乌云”在经典物理的完美苍穹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却成了通向原子物理学的通道。

需要指出的是，经典物理学出现危机以后，经过一代物理学家的重新审视和批判，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但是，经典物理学的创始人牛顿等人的历史功勋并没有被否认，他们的画像依旧挂在科学的殿堂，受人顶礼膜拜。而经济学就缺乏这种宽容、博大的气概，这种科学应有的气概。

某学科出现危机，就是表明社会正在急切地需要新理论，而社会需要是发展科学最大的动力。危机是飞跃的前夜，有危机就会有飞跃。谁把这门学科引出了危机，谁就是伟大的科学家。

经济学面临飞跃的新契机

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是我国经济理论飞跃的新契机，也是预示着将要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条件。

经济学要摆脱危机走向飞跃，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摆脱万般科学的尴尬地位，回到经济学本来应有的位置；第二，摆脱统治人们思想几十年的、现已百孔千疮的理论体系的约束，面向实践，面向现实，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发展经济学；第三，学风要端正，研究方法要更新。

经济学要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经济学真是经邦济世吗？希望经济学能经邦济世，是这个学科以外的人们对“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的误解。

经济两字连用，最早出现于隋代王通《世说·礼乐》：“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该处“经济”大概源于东晋学者葛洪《抱朴子》：“以聪明大智，任经经济俗之器而修此事。”这些都有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意思。李白诗：“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杜甫诗：“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以及《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子劝贾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都是指经经济民的意思。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译英文“economy”时，借古汉语中“经济”一词，却赋以财政经济之意。十九世纪末期，中国人又将它从日本移植过来。社会上不少人还是把“经济”理解为经世济民，经邦济世。当时译为“博物学”的后来发展为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当时译为“格致学”后来发展为物理学、化学……这些学科开始翻译过来时范围都很大，由于这门学科发展了，前进了，分化出一门又一门研究范围比较小的新学科。而“经济学”自翻译过来后一直没有改变。

有没有一门科学能经邦济世？没有。只有多门科学协同起来才能经邦济世。说哪一门科学能经邦济世，那一门科学就成了万灵药丹。

经济学要摆脱危机，首先要摆脱万能学科的地位，回到经济学应有的位置，也就是摆脱这门学科以外的社会负担，专心致志地发展这门科学。显然，这不仅是经济学家所能做到的。还需要整个社会的理解。

经济学本身的位置在哪里？这个问题实质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是讲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即用最小的消耗来满足人们最大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到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经济学要走出危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摆脱原有体系的束缚，面向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发展缓慢，原因之一是学者不能摆脱原有体系的束缚。这个问题我在《诠释经济学》一文中已经谈到，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

者把过多的精力花在对经典著作的诠释方面，有的还用一百年前经典作家的结论来套今天的经济现实，这显然是不行的。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经济学更离不开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需要是新理论产生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条件在我国已充分存在。社会紧迫地需要经济学理论创新，在解决现实矛盾中产生新思想，在新思想的积累中产生新理论。

要摆脱原有体系的束缚，应当在实践的根基上，兼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精华。科学研究应当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不能因为“市场失效”就否定市场经济，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失败就全盘否定马克思经济学。要在二十世纪的广泛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各种传统理论的扬弃中兼收并蓄。

要摆脱原有理论体系的束缚，学者就得独立地研究，自由地思考。这需要有宽松的政治条件，要有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但是，那些有志于为真理献身的学者，是不会等待这些条件的。哥白尼等待了吗？达尔文等待了吗？马克思等待了吗？科学不是为了迎合世俗，而常常是对世俗的超越和背叛；科学研究不是在鲜花和掌声中满面春风，而常常是在炼狱的烈火中痛苦地涅槃。

学风要端正，方法要创新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确有一批学风很好的学者。他们扎根于实践，切实地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以追求真理为最高职责，不随波逐流；他们安于寂寞，不追求一时的风光……

但是，我们也遗憾地承认，中国经济学界也存在一种不太好的学风。对这种学风我在《经济学的左道旁门》一文中已有钜论。需要补充的是，当前经济学界有一种浮躁情绪。相当一批学者静不下心，坐不下来，深不下去。愿意参与热门话题的讨论，不愿意年复一年地坐冷板凳。

不过，这不要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伟大学者，当多数人浮躁、随波逐流的时候，就可能有人做出石破天惊的创造。

把经济学引出危机的也许不是当今在台面上十分风光的人。

一门学科的发展除了理论创新以外，方法的创新也是重要方面。提起

方法创新，年轻学者马上强调数学方法。运用数学是必要的，中国的经济学过去都属文科，经济学者大都不懂数学。所以，过去经济学的研究缺乏量的分析。但是，数学对经济学来说，是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不是方法。工具是为方法服务的。有的学者在论文中列出大量的数学公式，以为是方法的创新，其实不然。1980年，某大学一位经济学教师发表了一篇长文。整篇都是用线性代数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再加上满纸矩阵计算，很是吓人，不懂数学的人感到高深莫测。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读懂了这篇文章。遗憾的是，这么大篇幅的数学分析却没有得出任何新的结论，只不过是把人们常知的理论进行一番数学推导而已。

数学模型只是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数学模型不是研究对象的本身，而是研究对象的简化。经济现象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经济现象时，简化什么，如何简化，就要靠研究者对这一经济现象本质的把握。在这里，一是对现象实质的理解，真正了解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否则作不出正确的数学模型；二是要把握应用数学方法的前提条件；三是要看所研究问题所允许的误差范围。定量分析应当以定性分析为基础。当然，定量分析会加深对事物性质的认识。

在学风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这就是“国际接轨”问题。我承认，为了方便国际交流，写文章尽可能让外国人能看懂，但这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知识增量，你写这篇论文，为这个领域提供了什么知识增量，有什么创新，提出了什么新思想、新资料、新方法。如果不努力创新，只在表述形式上“接轨”，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真正有创新，形式上和外国人不一样，那就不愁没人和你“接轨”。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想到和中国接轨了吗？但全世界不得不和它“接轨”。有些人写文章生怕外国人看不懂，就不怕中国人看不懂，甚至以外国人看不懂为耻，以中国人看不懂为荣，与其说这是与国际接轨，不如说这是为了让外国人引以为“知音”。成了外国人的“知音”，外国人就会邀请他去讲学，外国人就会给科研经费。有些学者不是把主要精力花在研究学问上，而是成年累月地到外国去讲中国，回中国讲外国。看起来很风光，实际是提供不了任何知识增量。当然，这种国际文化交流是必要的，但这不是科学研究的主要部分。

我觉得在方法上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多年来过分注重价值判断，而不注重实证研究。我并不是否认研究中的价值判断，而是认为必须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作价值判断。最近有人提出“经济研究要有政治立声”，我希望这种说法不是把价值判断先验地加在研究之前。如果经济学真正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研究应当站到科学的、客观的立场上，不能站在某个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如果一定要站在某个利益集团和立场上说话，就得公开声明自己的立场，不要把自己装扮成代表全民的立场)。提出“经济研究要有政治立场”的论者认为，经济研究“要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这话没有错。然而，只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够真正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方法论上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要有更多的人做扎实的微观和专题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对宏观层面似是而非的讨论上。人们说，中国的思维偏重于综合，西方的思维偏重于分析。人们惊叹五千字的《道德经》，把整个宇宙万物、天文地理、世态人情论述得那么深刻精辟。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进行《道德经》式的研究，科学大概也发展不到今天的水平。很多经济学家喜欢谈论宏观。但是，由于对微观缺乏精深的研究，没有科学的准确的依据，谈论宏观常常难以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轨迹和发展态势。判断失误也就在所难免。应当有一批人潜下心来就一个经济问题进行十年、二十年的科学研究，拿出不是似是而非的、而是确实确实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而是有独到见解的，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刻的成果来。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不如西方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都是世界级的。解决中国的一个经济问题，就能给人类的经济科学作出一份新贡献。中国经济学界不乏博学而睿智的人才。中国经济学大有希望！

刊于《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后《经济参考报》以《中国经济学的危机》为题发表

“经济人假设”和“经济人”现实

有些论者一再批判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并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一条罪状。例如，一位中国当代经济学界地位很高的老经济学家在批评西方经济学时第一条就批“经济人假设”。还有一位很有名气的戏剧家认为，当前这么多社会问题就是“经济人假设”造成的。对这一类说法我持保留态度。

在这里，我不得不谈一下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假设，是科学研究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是抽象出研究对象最本质的部分而暂时舍弃其他特征，而后再通过其他方法来修正这些舍弃所带来的误差。假设这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经常被采用。学过热力学的人会知道“理想气体”的假设。所谓“理想气体”，就是假定气体的每一个分子都是不可压缩、没有黏滞的刚性小球。而实际的气体分子是可以压缩的、是黏滞的。现实没有“理想气体”，没有一个人生活在“理想气体”之中。然而，如果没有“理想气体”这一假设，就无法认识气体的温度、压力和体积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不能推导出了“气体三定律”。没有“气体三定律”的基础，就发现不了其他热力学定律，就没有现代的汽车、轮船和飞机，在家没有冷暖空调，出行没有气象预报。

在经济学研究中，假定任何个人和集团在给定的条件下，总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就是“经济人假设”。这一假设只是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并不是社会伦理的一种论断。它是按照经济学研究的需要，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简化。通过这种简化，推导出一系列的经济学规律。大家都公认的价值规律也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和其他学科

一样，经济学也是自治的，它会从其他方面给在研究中舍弃的其他方面作补充。“经济人假设”只用于学术研究的过程之中，不能用于社会实践，绝不是改革的指导思想，更不是提倡大家都当没有血性、没有同情、没有礼让、只追求个人和集团利益的经济动物。有一些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鼓励人做“经济人”，这是天大的误解。

1993年初，当时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确立不久，我发表了《发展市场经济，防止拜金主义》的文章（《经济参考报》1993年3月23日一版头条），其中谈到“经济人”问题：“尽管我们承认经济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但是，经济活动不能代替一切社会活动，国民生产总值不是评价社会的唯一指标，经济原则也不是维系社会的唯一原则。不能把社会上的一切都换算成美元，英镑，人民币。很多东西的价值是用金钱无法标明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的一种方法，不能广泛地推行于现实社会。”

我的上述看法，是当时多数人的共识。1992~1993年间，我采访了很多主张搞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倡让“社会人”变成“经济人”。

然而，当今社会的确有不少“经济人”。现实社会的这些“经济人”唯利是图，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肆无忌惮；他们贪得无厌，不断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经济人”危害社会、腐蚀社会。显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经济学上的“经济人假设”的罪过。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关键在于，在经济改革的年代，我们一直把经济发展当作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而忽视了社会目标。没想到在经济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也没有想到要搞好经济体制改革，除了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以外，还要遵照其他规律。这种倾向可用“经济主义”这个词儿来概括。这个问题在学术界的表现就是在很长时间内只有经济学一枝独秀，其他学科没有参与到经济改革的设计之中。对此，我曾在《显学的危机》（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一文中批评过这种现象。我在此文中指出：“这些都不是经济学的过错。过错在于人们把经济学看得太万能了。在于人们把经济规

律用于不应当通行的领域。”

现实中“经济人”的出现当然不只是学术上的偏差，也不仅仅是“经济主义”的问题，还有制度层面的原因。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公共权力还保持着高度垄断、高度封闭的状态。不受制衡的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那些执行公务的官员本应以执行社会职责为最高责任，却放弃了社会责任，用公权来换取私利。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权力不断扩张，官员权力越来越大，官员的贪污腐败日益严重。从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高检察院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被查处的贪官越来越多，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据有关专家估计，被查处的贪官仅占贪官总数的5%~20%，大部分贪官不仅逍遥法外，还继续掌权，继续贪污腐败。官员贪婪的示范效应冲垮了全民的道德体系，官场腐败的臭气污染了整个社会。首先是有些官员成了“经济人”进而成了犯罪分子，然后才有社会上的“经济人”。而大批官员成为“经济人”进而成为犯罪分子，是不良的政治体制造成的。

刊于《中国改革》，2009年1月10日第2期

<<<<<

所有科学的第一定律

一个古怪的定义——熵(shāng)。生疏，神秘。

什么叫熵？它的定义在外行人看来如读天书：“物质在不可逆变化过程中 dQ/T 是一个函数的微分，这个函数的变值只由过程的始态和终态决定，我们叫这个函数为熵。”

然而，这个难以理解的怪字，在今天的报章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它不仅用来描述自然现象，也被用来分析社会。二十世纪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熵定律是所有科学定律的第一定律。”英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把熵称为“整个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哲学定律。”

其实，熵并不神秘。让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它那深奥的定义，从我们身边说起，慢慢就会看到，熵与你、与我、与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六十年代，我在清华大学学热力学这门课时，讲到熵这一节，陈宏方教授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出“天下大乱”四个字。这四个字几乎占满了整个黑板，我至今记忆犹新。

熵 与 社 会

SHANG YU SHE HUI

熵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延伸。

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生，只能从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

既然能量不能消灭，那么我们能不能毫无顾忌地挥霍这总量永远不变的能源呢？且慢。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诫我们：能量虽然不能消灭，但它只能不可逆地沿着一个方向转化，向不能做功的方向转化。

什么叫不可逆呢？水只能从高处向低处流动，热量只能从高温向低温传播，物质只能从密集向稀缺扩散……“不可逆”是能量转化的一个重要规律。如果没有这个规律，江河就会倒流，岂不天下大乱了吗？

分子由密集处向稀缺处扩散，是有秩序的定向运动。然而，当扩散到处处密度相等时，分子就从定向运动变为“布朗运动”（无规则运动）了，从而使定向运动的秩序遭到破坏。不可逆运动是秩序，但是，不可逆运动的本身又在破坏秩序，结果又“天下大乱”。不过，从“耗散结构论”看来，不可逆运动最终还是会使混沌变为有序。这一点留待以后再谈。

要使能量能做功，在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必须有能量集中程度的差异（如温度差、水位差），差异越大，做功的能力就越大。不可逆过程恰恰是能量由集中向分散转化，这就是不断地将有用能变为无用能。高处的水可以用来发电，流到低处以后就不能发电了。一块烧红的铁块可以使周围温度升高，当它的温度和周围的温度平均以后，再也不能起任何作用了。滚滚长江东逝水，一泻千里不回头。能量一旦从有用变为无用，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提出来的。1865年（一说为1864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Entropy”概念。“Entropy”表示混乱程度，Entropy越大，表示混乱得越厉害。“Entropy”也表示能量分散的程度，表示无用能量的多少，Entropy越大，能量就越分散，不能做功的“废能”就越多。

“Entropy”这个词儿进入中国以后，有人根据它的发音和含意译为“能趋疲”。这个中国词儿不好念，不好记，没有被人们采用。上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刘仙洲首先将“Entropy”译为“熵”。刘仙洲首先创造了这

个汉字。我在清华上学时，刘仙洲是副校长。陈宏方教授 1991 年 4 月 23 日在给本文件作者的来信中讲道：“我们大家都要感谢刘仙洲教授，他给了我们大家这个领域里的知识。我是在聆听他亲自讲授《热工学》时才懂得热力学的基础知识(1951 年)的，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讲述将 Entropy 译为‘熵’的思路过程。”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9 年 10 月 15 日

<<<<<

以最少的消费获取最大的幸福

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和熵有密切的关系。

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换成棉花，通过一系列消耗能量的加工制成衣服。衣服逐渐磨损、破旧、腐烂，变成几种不同的气体和少量矿物质，分散在大自然之中。衣服破烂了，能量没有消灭，但有用能变成了无用能，环境中的熵增加了。

高楼拔地而起，把环境中的能量(以建筑材料的形式)集中起来，建设成有序的结构。建筑材料的开采、加工过程给环境增添了混乱。若干年后，高楼这种有序的结构也被耗散，有序也变成了无序。

汽车在奔驰。它把汽油的能量转换成机械能和废气。机械能消耗在路面上，废气分散在空中。汽车每前进一米，世界上的熵就增加一分。

衣、食、住、行、用，最终都是把有用能变成无用能，都在给环境增加混乱。因此，人类的生活是以环境中熵的增加为代价的。

国外不少学者用熵的观点来检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效率，过去需要几天做完的工作，现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但是，人们的闲暇时间为什么比过去更少？过去能够在田园间悠然漫步，为什么今天在城里却步履匆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需要大得多的能量来维持。现代工业社会每个成员所耗费的能量比三百年前高出上百倍。人们创造这种高能耗的生活条件所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机器所节约的时间。人类真是作茧自缚，想得到轻松，反而招来了繁忙。但人类并不满足现有的能量水平，为了“舒适”，他们追求更多的能量消耗，从而使他们更加繁忙。

今天，在经济统计中，用消费量作为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的指标。高消费，成了人们的追求目标。然而，这种追求是无止境的，达到了一个新的消费水平，又追求更高的消费水平。七十年代追求“老三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八十年代追求“新三件”（电冰箱、电视机、收录机），九十年代的要求更高。但是，人们对消费水平的追求，受到了资源的限制。占世界人口1/20的美国，为了维持目前的消费水平，耗费着1/3的世界资源。即使重新分配资源，全世界也不能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生活。从熵的观点看，高消费就是高增熵，就是加速我们这个世界的混乱。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新的需求的增长，都会使人类更加依赖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外部力量，从而增加生存的不安全。

因此，从人类最根本的利益出发，发达国家那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应当改弦更张。学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理论：以最少的消费，获取最大限度的幸福。这句话看起来似乎很平常，实际上它将改变人们的幸福观、审美观，改变人类的衣食住行，它将从各个领域刷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人们将以节约资源为荣，以高消费为耻。既然穿衣是为了御寒和美观，那么服装设计师就应当以最少的布匹、最少的劳动投入来设计服装。建筑师、厨师都将按照新的生活方式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规范。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9年10月29日

<<<<<

经济指导思想的革命

在甘肃白银市一个铜矿已被采尽的矿山上，我看到两个直径 130 米、深 100 多米的被废弃的矿坑。大坑底部是一汪粉蓝色的液体。大坑周围草不生，鸟不飞，虫不鸣。苍凉，寂寞，混乱。

采矿工人的辛勤劳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但却为大自然留下了创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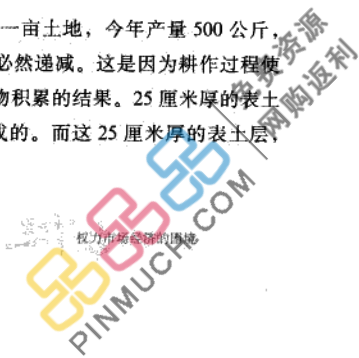
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生产劳动也在创造熵，这一点未必所有人都明白。

现今的经济活动就是把自然资源加工成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条件。所谓增长，就是这种加工规模的扩大和加工速度的加快。经济活动不断创造新的需求，需求又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部门发展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

从熵的观点来看，这种经济活动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压榨，使环境中的熵不断增加。

把矿石变成钢铁，把钢铁变成机器，对于产品本身来说，是能量的集中，是秩序的建立，是熵的减少。但是，每一次由人力或机器在某一局部造成熵的减少，都伴随着周围环境中熵的更大增值。所有的劳动产品都以某种原材料(即有效能)开始，以废物(无效能)而告终，每种产品从生产到报废，又使环境中的熵在增加。

工业生产如此，农业生产亦如此。同一亩土地，今年产量 500 公斤，如果年复一年地以同样条件种下去，产量必然递减。这是因为耕作过程使表土的熵在增加。表土是岩石风化、有机物积累的结果。25 厘米厚的表土层，是太阳能 1000 年输入负熵而逐渐形成的。而这 25 厘米厚的表土层，



只需要几十年时间的耕作(如果不施肥)就会被侵蚀得不能继续耕作。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能量转化越快,效率就越高。而从熵的角度看,能量转化得越快,非必要耗费的能量就越多。一台汽车发动机在某一特定的速度下耗油最少,这个速度称为“省油点”。但一些性急的司机,往往用超过“省油点”的速度开车。结果,跑同样的路程,耗费了更多的油。

按照熵的观点,所谓劳动生产率就是生产熵的速率。劳动生产率越高,环境中的熵就增加得越快。

一个全靠体力进行劳动的农民,每消耗一卡能量可以生产出10卡左右能量的产品。现在一个美国农民,用一卡人力的能量,可以生产出6000卡能量的农产品。但是,如果把农机、化肥、农药等相关的能量计算进去,一个现代化的美国农民,用10卡能量才能生产出一卡能量的农产品。

可见,技术进步也是以环境的增熵为代价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能给经济带来增长的行动,都应当受到欢迎。从熵的角度看,经济的增长同时会带来熵的增长。因此,无限的增长是有害的,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学把资源(包括能源)看成无限的,而从熵的角度看,资源是有限的,有用的能源也是有限的。

发达国家以耗费大量的资源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实行从传统的农业方式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转变,高能耗,高消费,快节奏,追求人均GNP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市场又像一部失去控制的加速器,使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也使熵的增长不断加速。现在,这条发展经济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些发展中国家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结果,与西方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

看来,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生活方式上不能步发达国家的后尘,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模式上,也不能步发达国家的后尘。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9年11月5日

<<<<<

愚蠢地“向地球开战”

我们 60 多亿同类乘坐一艘宇宙飞船昼夜不停地在太空遨游，这艘飞船叫“地球”。“地球号”飞船是否安全可靠？它是否能永久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在我们的乘客当中，思考这类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我们这艘飞船上，太阳的辐射为我们输入了负熵。负熵使自然资源不断更新，使新的自然秩序不断建立，例如森林、草原的复生，土壤的活化，农作物的生长等。在人类诞生以前从太阳输入“地球号”的一部分负熵已深埋地下，不断供人类发掘享用，如煤、石油等。人类的活动不断增熵，它使自然资源不断被消耗，自然秩序不断被破坏。只要增熵和负熵保持平衡，我们这艘飞船就有稳定的秩序。

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出现忧虑：“地球号”上的增熵是否超过了负熵？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向人类提出警告；1973 年舒马赫出版了《小的最美好的》，对工业社会进行了批判。近 20 多年来，科学家们提出了大量报告，指出我们这艘宇宙飞船上种种严重问题：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土壤流失和沙化，绿色植被减少，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被破坏……这一切，都证明“地球号”飞船上的熵在迅速增加。著名的美国哲学家里夫金大声惊呼：“极目四望，世界的熵已经增到惊人的地步！”科学家们认为：熵污染是 20 世纪人类的头号灾难，随着熵的增加，这种灾难日益深重。

要减少熵污染的危害，关键是使地球内部的增熵低于它从外界吸收的负熵。这一点人类已经觉悟。1988 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明确指出：“耗用自然资源的速度不应高于自然资源的更新速度”。

然而，“地球号”的前景也并不像罗马俱乐部说的那么悲观。在“地球号”飞船上负熵的传递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物圈从宇宙那里得到负熵；第二个层次是人类从生物圈那里得到负熵。现在，人类从生物圈里吸收负熵的规模和速度已经接近或超过生物圈从宇宙中吸收负熵的规模和速度，因而出现了增熵危机。能不能扩大生物圈从宇宙中吸收负熵的能力呢？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遗传工程发展，使人类有可能选择、培育新的生物物种，将它置于自然群落之中，从而提高生物圈从宇宙中转换负熵的功能。

但是，技术不能滥用，技术不应当破坏生物圈的组织原则。过去，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技术的作用，这种看法和唯意志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自然的“征服论”。在震天价响的“征服自然”的口号下，山河哭泣，大地呻吟。其实，恩格斯早就指出了这种危险。他说：“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请注意，我们是在一艘在无限空间中飘荡的飞船上。如果我们 60 亿乘客都抡起“征服自然”的板斧，愚蠢地“向地球开战”，我们这艘飞船还能安全航行吗？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9 年 11 月 12 日

<<<<<<

愿社会稳定有序

对一个社会而言，熵就是社会流弊的积累，就是腐败和混乱，也是建立新秩序的催生婆。

国家也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内部的熵也是不断增加的。一个新建立的政权，充满了活力。它的各种机构都按照既定的目标有效地运行。随着时间推移，种种社会流弊开始出现：冗员不断增加，机构不断膨胀，法律逐渐失效，道德日益沦落，腐败越来越难以清除……社会流弊(熵)是时间的函数，如果没有负熵加入，政权建立的时间越长，社会流弊就积累得越多，国家机构就慢慢变成了一架生了锈的机器，日益失灵，社会的混乱程度越来越严重。结果，这个系统就从有序变为无序。

然而，国家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它不停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在与外界的交换中可以吸收负熵，以抵抗内熵的增加。闭关锁国，熵的增加就快；对外开放，可以防止熵的增加。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开放系统从外界可以得到负熵，也可以得到正熵，而吸收正熵会加速系统走向无序的进程。这里的关键是控制系统对外开放的条件，让负熵无障碍地进来，将正熵拒之门外。用我们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排污不排外”。

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作为国家这个系统的熵才是与日俱增的。第一，将国家变为一个封闭系统，与外部没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第二，虽然是开放的，但系统的状态始终保持一个“定态”，没有发展变化；第三，系统接近定态，它虽然不是定态，但有惰性，一有变化就会滑向“定态”。

因此，要防止系统内部熵的无限增加，除了打破封闭以外，还必须打破僵死的“定态”，克服惰性，使整个社会“活”起来。这就需要对系统

内部进行改革。

普里高津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熵会变成有序的源泉”。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度量无序的熵才能够成为有序的源泉呢？这就是远离平衡的状态。

为了说明远离平衡状态，我举一个不十分贴切的例子。一个大饭馆，顾客不断地进来，不断的出去。这是一开放系统。如果进来的人和出去的人相等，就处于平衡状态，总是每个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吃饭，如果进来的人比出去的人多一点，这就是近平衡状态，少数没有椅子的人站在椅子旁边吃饭，希望等上一把椅子。如果进来的人大大超过出去的人，饭馆原来的格局就会被打乱，就进入了远离平衡的状态。进来的人越多，饭馆就越混乱。

耗散结构论认为，处于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当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一个小的“涨落”可能引起系统的重大变化。所谓“涨落”，就是系统中某个局部(甚至很小的局部)超越常规的行为。上述饭馆中一两个人的粗暴行为就是“涨落”。一个局部的“小涨落”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巨涨落”。这时，整个系统在短时间内会发生突变，原来的秩序被彻底废除，重新建立了另外一种秩序，一种更高水平的秩序，这种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被称之为“自组织现象”。

不用再作说明，读者就会想到，社会的这种突变式的重新“自组织”就是革命。极度的混乱产生革命，革命彻底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革命这种“巨涨落”是以社会大震荡为代价的。对于无可挽救的腐败政权，这种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为大众谋利益的且具有理性的政权，它会自觉地通过内部的小“涨落”(例如一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也是一种局部的“涨落”)对系统内的结构实现“微调”，系统通过不断地“微调”减少内部熵的产生，增强系统吸收外界负熵的能力。这样的政权就有较强的生命力。

刊于《经济参考报》，1999年12月24日